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著 .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4

ISBN 7 - 80109 - 159 - 0

布...

郑...

. 布哈林, . . . - 人物研究

布哈林, . . . - 思想评论

.K835 .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920 号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 - 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 32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6.40 元

序 言

布哈林是列宁以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可以说,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著作长期被打入冷宫,对他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成了禁区。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了布哈林这一段是不完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缺了布哈林的名字就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

大致从 50 年代起西方开始了布哈林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了历史的反思。人体解剖是猿猴解剖的钥匙,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浩劫以及对浩劫的反思,非常有益于理

解苏联历史上所发生的种种反常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从70年代末开始的对布哈林的再认识,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8年布哈林在苏联获得政治上的平反,然而政治平反只证明此人不是特务间谍,不是“人民公敌”,并不能表明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最多只是恢复了历史的公道,为恢复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式除去了紧箍咒。对于布哈林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档案资料使用的限制,认识上的局限性,布哈林研究仍未穷尽一切,大量问题仍有待深入。

在中国人学的外国史中,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历史都不能同苏联史,特别是联共(布)党史相比。我们国家有几代人曾孜孜不倦地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真掌握这部“百科全书”的内容,学习它所提供的经验,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搞社会主义只有这个唯一的本本可学,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当年苏联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中国的唯一选择。然而,历史教给中国人民,联共的这一套经验带来的是灾难,是普遍的贫穷,是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不能把自己的过错全都推给别人,但苏联模式的弊病是其中的主因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搞社会主义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经过十年的动乱之后,学者们开始了新的探索。人们发现,历史上就存在过同斯大林模式不同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而就人物而论,布哈林在其时代就曾经同斯大林模式展开过激烈的抗争,他所捍卫、阐述和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与斯大林选择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布哈林提供了另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有机的长入过程,应当把重心从抓阶级斗争转向文化经济建设,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否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布哈林并不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反对单纯采用机械的镇压办法,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斗争。要采取富民的方针,提出“发财吧”的号召。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的民主,要建设“公社国家”。与此相应,布哈林还提出一套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采用经济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用竞争,而不是查禁的办法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布哈林不讳言俄国的落后,他承认俄国是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是用暴力,而是以经济利益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政策上,同样反对发号施令,主张展开作品之间的竞争,无产阶级通过作品的竞争,赢得领导权。布哈林的所有这些主张并非另搞一套、自作主张,而是对列宁的晚期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多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至文学艺术、新闻学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先于列宁对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创的见解。他首先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他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情况下,挤时间编写了体系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他的著名的平衡论,其中闪耀着十多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系统论思想。为理论宣传的需

要,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了解释俄共(布)新纲领的《共产主义 ABC》。他在同斯大林争论中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还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当法西斯在欧洲露头的时候,布哈林立即敏感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此后不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他在“自己的”监狱里给我们留下的《哲学短篇集》,更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哈林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不研究布哈林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

中国的读者尤其需要了解布哈林,研究布哈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最早送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手中的是哪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本就应该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了,这本书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革命家,它的传播要大大早于斯大林的著作。当然,对中国革命起极大影响的还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它的影响是不能同前两本书同日而语的。不仅如此,布哈林的其他著作在 20—30 年代也对我国的知识界有过巨大的影响。例如,我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源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这样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我们必须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无法说清楚。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有一个缺陷,就是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传播,而忽略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研究是欠完整的,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并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全貌。布哈林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还不仅仅限于思想理论的影响,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

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哈林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布哈林提出或捍卫的上述发展模式 and 建设模式,有不少东西是可供借鉴的,至少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如果说在 20 年代苏联的发展已经存在多种选择,那么时代发展到 20 世纪末,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走自己的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在这过程中,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他反对左倾激进主义的斗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布哈林在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的失败,标志着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开始。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是布哈林的悲剧,不仅是他所捍卫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悲剧,也是苏联人民的悲剧。本世纪初,俄国革命阵营里曾经有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最初译作《做什么》,是很贴切的,反映了当时争论的内容)。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争论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历史学家也许很难告诉读者“做什么”,那是理论家的任务,但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已有的实践教训,指出“不做什么”,即哪些事是不应当做的。总结苏联 30 年代的实践,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使后人不再重复人家的错误。

本书是作者从 70 年代末起研究布哈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国内目前已有多种布哈林传记问世,因此本书把重点放在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上,大致勾画了布哈林的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但是作者始终认为,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必须同他的实践,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以便看到该理论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其局限性何在,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先查明事实经过,例如 1928—1929 年间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布

哈林之死等章节,作者有意对事件的历史进程作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和判断。对待人类的文化遗产的态度,作者很同意一种主张,即把重点放在继承吸收上,而不是否定排斥上。人类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当然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基于这一原则,本书以较多篇幅介绍了布哈林的贡献,即使在一些错误较多的著作中,作者也力求既指出错误之所在,说明错误的原因,同时发掘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希图囊括布哈林的全部理论遗产,对他早期的经济著作(如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著作),他后期关于科研规划的论述,他在30年代的著述,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他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都未能展开阐述,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了。

布哈林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序言中声明:“作者的口号是: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一本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理应遵循布哈林的这一实事求是的口号。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文献信息部的大力协助,查阅和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文献,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列·德·希罗科拉德、伊·奥·列金娜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布哈林著作和资料,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6年4月于北京北太平庄

布哈林传略

布

哈林全名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公历10月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自幼聪慧过人,四岁半即能读会写,小学毕业时是第一名优等生,在中学期间几乎门门拿5分。兴趣广泛,在父亲伊凡·加甫里洛维奇的影响下,从自然史、文学史直到反宗教的书籍,抓到就读,还在完全是个孩子的时期就读遍了古典作家的作品,海涅的诗能倒背如流。这种兴趣使他后来能够成为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也喜欢自然科学,曾热衷于搜集甲虫、蝴蝶标本,少年时代的梦想之一是有一本《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后来甚至得到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赞扬。他喜欢绘画,从现在看到的他的油画遗作可以看出,他的绘画造

诣是相当高的。1912年他正是被当作青年画家介绍给列宁的。

上中学时期,布哈林开始阅读地下报刊和著作,参加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学生组织。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处是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906年下半年莫斯科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革命形势恶化,反动势力大肆逮捕革命人士,正是在这关头,布哈林毅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最终归属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它那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相形之下,“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的行径也使他产生激烈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入党后布哈林开始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担任宣传员,1907年春在中学毕业考试期间,同他的同学,后来的著名作家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拉德科夫壁纸厂发动了罢工。

1907年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学专业,利用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进行秘密接头。190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次年,被选入新的莫斯科委员会。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区担任组织员、宣传鼓动员。在反动时期,党内外知识分子中间在哲学思想上出现一种反动思潮,造神派、寻神派、经验批判主义盛行一时。布哈林本性是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这时候自然“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端的偏爱,并且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看来,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接受了波格丹诺夫的某些思想和术语,这种影响直到他写作《过渡时期经济学》仍然可以感觉到。对波格丹诺夫的作用,布哈林始终不是完全否定的。其实,列宁对波格丹诺夫也是

一分为二的,把他的早期同后期分开。1928年波格丹诺夫因在自己身上做输血实验而牺牲后,布哈林在悼文中说,波格丹诺夫是“在我党发展中和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起巨大作用”的一个人。

但政治上布哈林始终是坚定的,始终是一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既不是召回派,也不是调和派。

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后被释放,此后还曾被捕过一次。1910年在合法机构中从事党的工作,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还参加工会刊物的工作。1910年底莫斯科组织遭破坏,布哈林又一次被捕,在狱中关押了几个月,然后行政流放奥涅加,不久从那里逃亡。

1911年10月来到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布哈林后来总结流亡生活时认为有三大收获: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图书馆,从而积累了“学术资本”;二是认识了列宁,受到巨大的影响;三是掌握了多种外语,获得了丰富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1912年秋,布哈林在克拉科夫会见了列宁,列宁建议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一方面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他曾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

1912年冬至1913年移居维也纳。在这里他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听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同时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他写了《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巴维克的观点。老一

《真理报》1928年4月8日。

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同民粹派斗争,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市场问题和土地问题上。和前辈不同,布哈林直接涉足最新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同其心理学派和折中主义做斗争。他是最早批判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对边际效用学派的批判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参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为之起草演说、报告等等。

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收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当作奸细逮捕,由于私交颇为不错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作证,得以获释,随即被押送到瑞士边境。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洛桑逗留期间,他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以及洛桑图书馆里的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考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1915年7月布哈林取道法国和英国,辗转来到瑞典。同以后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建立联系,为其机关报《警钟报》撰稿。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把他当作“炸桥”、“扔炸弹”的“列宁的间谍”逮捕,驱逐到挪威。在挪威他参加“青年派”的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不久转移到丹麦。在1916年的5个月里,布哈林在挪威《阶级斗争》周报上至少发表了13篇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文,12篇其他内容的文章。1916年10月秘密赴美国,在这里参加了《新世界》的编辑工作,该报原先立场动摇,自布哈林到达以后革命的国际主义明显地占了上风。布哈林还到各城市做宣传旅行。

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后来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但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大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列宁则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在归途中布哈林也没有停止革命宣传,在车里雅宾斯克就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而被孟什维克逮捕,回到莫斯科后,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参加过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是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在当时的莫斯科组织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激烈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夕反科尔尼洛夫叛乱中起了重大作用。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公历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

适于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在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人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页。

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1917—1918年间,布哈林曾多次受党的委托出国。1918年在德国认识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斯巴达克团建立了联系。同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前几天同苏俄使馆一起被驱逐出境。在回国途中又奉命参加出席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苏俄代表团,但仍未被当局准许入境。

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 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正确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不是布哈林个人的作品,而是时代的产物。

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临近结束,或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1921年春,终于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来了一次大爆发。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

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深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

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是列宁根据自己同布哈林的接触交往得出的看法,并非对布哈林的盖棺论定。1926年布哈林在一次未公布的讲话中说,他完全记取了列宁的批评,并彻底摆脱了托洛茨基式的“高谈阔论”。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完全证明他记取了列宁的意见,学好了辩证法,在这以后的20—30年代,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好的一个。这使他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信中敢说,他在狱中所著的《哲学短篇集》,“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布哈林在1924—1927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1929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

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能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转,通过市场关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

《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第72页。

《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

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布哈林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在过渡时期它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向计划调节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根据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要求经济领导注意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要实现平衡发展,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平衡发展。因此,他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片面地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做法。

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作殖民地,也反对斯大林的“贡款”论。他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可以也应该取自农村,但不是用剥夺的办法,而是用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农村富裕了,就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

布哈林认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合作社,它是农民易于接受、乐于参加的组织,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引导农民从生产上组织起来。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他反对斯大林无视个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搞强迫集体化的做法。

布哈林为过渡时期设想了一条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国内战争即为国内和平所代替,新社会开始有机的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须再搞第二次革命,对城乡资本主义,应当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逐步排挤以至消灭。

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不顾后备资源的条件,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反对“贡款”理论,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

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以及支持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集团”,或称“布哈林集团”、“三人团”,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中央全会撤销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联共(布)四月全会的决定。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是历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和报告人。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之后,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的撤职是联共(布)党内的分歧造成。联共(布)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扩大到共产国际,株连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在30年代布哈林被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对苏联的最高决策已没有多大的影响。在1930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起初担任苏联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局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布哈林在制定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曾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1932年出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际一些,这可能有布哈林的作用。

1934年1月联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22日该报第2版报道了这一消息。8月出席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就苏联的诗歌问题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报告坚持他在2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政策,反对强制性的指令,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开展广泛的竞争。报告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

1935年2月苏联成立宪法委员会,起草新的宪法。布哈林是委员之一,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制部分。

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同行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和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 . 阿罗谢夫。稍后,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也在4月初去巴黎会合。但由于对方要价太高,而斯大林又坚持压价,谈判没有成功。布哈林一行于4月底返回莫斯科。

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遭暗杀,这是基洛夫在党内和国内威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在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1936年8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

的审判。8月15日各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审判和惩办有关人员的通报。8月22日《真理报》发表了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对布哈林等人进行审查。9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称:“ 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证据,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8月初布哈林已到南方帕米尔度假,对此一无所知。返回莫斯科后,他就再没有去《消息报》上班。他的境况越来越糟。12月2日公布的宪法委员会名单中已没有他的名字。

布哈林的第一个妻子是娜捷施达·卢金娜,是在革命前结的婚,后来长期病卧在床,于20年代初离婚。但一直同布哈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在布哈林受审查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党证退给了斯大林,并在给他的信中声明,鉴于对布哈林指控的性质,她认为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她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被捕时服毒自杀未遂,后被枪毙。第二个妻子是经济学家艾斯菲尔·古尔维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生有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由于她的要求离婚。布哈林被捕后,她和女儿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捕流放。1934年初布哈林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结婚,并于1936年5月生了个儿子尤里。结婚时布哈林45岁,拉林娜只有20岁。这个年龄差距使布哈林身后有一个为他平反奔波的人。

对布哈林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中。

1936年12月初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托派和右派反苏组织》的报告,力图证明“右派”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地下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指责他参与组织暗杀基洛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

夫的阴谋。面对这种诽谤,布哈林要他“住嘴”,并对斯大林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的言词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会后布哈林曾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否定对他的无端诽谤。但如石沉大海。

12月15日《真理报》发表未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以来的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消息报》主编正式易人。

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于1937年2月召开。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会议,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他的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于是布哈林决定边绝食,边出席全会。在赴全会前夕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著名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她熟记在心头。

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委员会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

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送监狱。

在狱中布哈林写作了他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哲学短篇集》,还写了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时代》,它们经半个多世纪才得见天日。

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

案”的审判。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闹剧，一切都事先安排好，而公开审判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举。在法庭上布哈林尽管做了某些抗争和申辩，否定了某些强加于他的罪名，但他无法根本上推翻这件案子本身，他抽象地承认了所有加之于他的罪名，因此，他也无法逃避他早就作好思想准备的死亡的结局。正如布哈林在其遗言中所说的，面对“恶魔的机器”，他感到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大胆妄为”。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等“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案犯死刑。15日布哈林在托木斯克被处决。

无产阶级培养和造就一个自己的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当之无愧的领袖颇需时日，然而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物，只在倾刻之间！布哈林之死是无产阶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他和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幸被无端镇压，是导致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的伏因之一。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拉林娜把布哈林口授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写下来并于1961年交给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平反事拉林娜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提出申诉，一些老党员也曾提出给布哈林平反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

1988年布哈林恢复了名誉！

世界 经济

和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创新

年布哈林开始研究帝国主义和世界
915 经济问题,并把专题论文发表在《共产党人》文集中。此后对此文作了增补,形成一部专著,书名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以下简称《世界经济》)。和论文相比,书中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分工问题,考察了世界经济联系发展的因素,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此外,增加了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新的一章,对统计资料作了相当大的更新。但是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看法并没有改变。列宁于 1915 年 12 月根据杂志的文本为它写了序言,给以极高的评价。但此书在送回俄国出版时多次遭劫,几经周折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得以问世,于 1918 年出版单行本,而列宁的序言直到 1927 年 1 月才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

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在十月革命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两人对帝国主义作过系统的研究,一个是列宁,一个是布哈林。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于1916年1—6月,而布哈林的《世界经济》的成书时间要比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早半年多。可以说,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最早着手帝国主义研究的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成书后布哈林并没有放下这个课题,1916年他接着又写成《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把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研究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研究结合起来。这篇文章本来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 文集》写的,但由于列宁对此文有不同看法,文集没有采用,直到1925年才在《法的革命》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不过1916年布哈林曾用同样的观点写了几篇短文发表在欧洲的一些左翼激进杂志上,如荷兰《论坛报》上的《新奴隶制》、《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等。

1920年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前几章中又进一步发挥了他在《世界经济》一书中的论点。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列宁同布哈林曾有过分歧和争论,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列宁在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吸收了布哈林的某些研究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把研究深化,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论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

布哈林《世界经济》所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所有基本问题。对帝国主义的特征: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的形成、资本输出、殖民地和世界的瓜

分等等,都依据最新资料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特别着重分析的是世界经济的形成及其意义。他一开始就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

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生动地描绘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开拓世界市场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世界市场只是在建立的过程之中,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还没有最终形成。

世界经济的形成是 20 世纪的事,是和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同步的。布哈林在谈到世界经济时指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相加,“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形成是建立在各国经济的交往的基础上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分工和国际交换,这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价格存在的前提”。当然,各国有时也交换不属于国际分工的同类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的基础就不是国际分工,而是生产成本的差异。世界经济形成的过程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容量已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到国外去寻找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同上书,第 6 页。

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对原料的需要,也迫使厂家到国外去寻求廉价的原料。国内资本的积累与过剩,促使资本家把投资转向国外,形成资本输出。这样就出现了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激烈竞争,这是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竞争。当世界瓜分完毕之后,为了重新瓜分,就只能依靠战争去决定世界各个部分的归属。到了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济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时的经济就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世界经济。

有人借世界经济的出现,否定经济中的阶级关系,否定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布哈林予以反驳。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不过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所以他给世界经济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归结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在资产阶级各大小集团之间的分配,这种生产和分配是在两个阶级(一方面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为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关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

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作了区分。世界经济是依据经济联系的范围确定的,而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则是以生产方式作为判断依据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如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概念显然大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看到这一点非常必要。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复存在,1917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依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在这个整体中出现

了帝国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存的局面。如何看待这种局面下的世界经济,是认识这个世界并采取正确战略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在当时苏俄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存在不同的看法。

托洛茨基看到帝国主义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除了生产力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他把生产力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看作当代的一个重要矛盾。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范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变得过于狭小,国家的边界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极不适应。帝国主义国家用兼并、争夺殖民地来解决这个矛盾,而无产阶级则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去解决。这个观点是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消灭国家之间的一切关税壁垒,建立起广泛的民主联盟。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壁垒,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托洛茨基的立论尽管有点过激,却是他那个时代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所普遍承认的。和托洛茨基的这套主张比起来,布哈林的世界经济概念则要现实一些。这就是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冲破国家的疆界,到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中去进行交往、交换,在通常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以在资金、原料、市场、劳动力等等各个方面互通有无,提供相互支持、相互交换的可能和机会,在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矛盾的积累会转变成战争,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是大致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大规模的战争暴力。

托洛茨基:《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和经济》,见《托洛茨基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9卷第208—209、214—216页。

因此承认世界经济的存在并利用世界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的最新成就,参加进去,对各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千方百计地参与世界经济各项活动,利用这个无比广阔的场所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之后,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过渡时期经济)同世界经济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作为统一整体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否因此一分为二,而不再成为一个整体了?

布哈林看到,当代的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各个部分间有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各企业间的无政府关系,另一个是社会的无政府结构。“生产力的破坏和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使阶级间的矛盾大大地尖锐化了,当这两个因素达到某种结合时,就会发生整个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开始于这个体系中组织上最薄弱的环节。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这里布哈林是从世界经济所包含的经济社会矛盾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布哈林预期,所有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将结成联盟(“如果各国无产阶级是彼此孤立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将发生改变,重心将向无产阶级国家及其联盟转移,“世界经济的整个面貌也改变了”。布哈林这里是指望随着一个接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并结成联盟,而逐步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他并没有由于无产阶级国家体系的出现,而否认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10 页。

同上书,第 136 页。

世界经济的统一性。世界经济将仍然存在,但其面貌将会发生变化。

否定统一的世界经济,否定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存在的是斯大林。

1924年斯大林修改了自己关于单独一国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论点,提出苏联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新论点,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认为可以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关起门来,靠单独一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脱离同过去的联系,在“空白地”上创造出来的。“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样,在斯大林的理论中社会主义经济是脱离过去、脱离周围世界、脱离世界经济的一种经济制度。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封锁,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它逼得苏联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建设。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千方百计地打破封锁,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联系,借助于这种联系搞好国内的建设。20年代初苏俄参加热那亚会议,同德国建立经济联系,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证明。另一种情况则是把苏联的孤立状态上升为一种理论,认为无需同西方的联系,无需西方的先进技术,单靠一国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执行什么都靠自己的理论的结果是,经历一个历史时期之后苏联发现自己除了个别领域以外(如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第542—543页。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停留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上。1939年他开始提出一国共产主义问题。在谈到共产主义下是否要保存国家的问题时,斯大林认为,如果那时资本主义包围尚未消除,外来武装侵犯的危险尚未消除,那么在共产主义时期仍需要保存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共产主义,自然是一国共产主义,至多是数国共产主义。1946年,正当苏联在战后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开展紧张的工作的时候,斯大林正式声明:“‘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这样的国家的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斯大林又提出了他的“一国共产主义理论”。

这个理论并没有因为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而取消,他的基本思想是,苏联加上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在这个阵营的范围内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建设,把“一国社会主义”扩展成“一个阵营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没有为这一理论提供更多的论证,但他的“两个并行市场”的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分析战后形势时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世界上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并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各国具有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因此“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 256 页。

同上书,下册第 478 页。

商品输往他国。”

实际上当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一点暂且不论。问题在于统一的世界经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分裂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中的作用。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短短 100 年之间创造出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是同开拓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世界市场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它必须继承并发展其生产力,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把这看作是新社会制度战胜旧社会制度的根本保证。在必须继承和利用的资本主义的成果之中就包括世界经济。在有可能以社会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参加和利用现存的世界经济,通过同世界经济的交往来弥补本国的不足,以自己的商品去交换自身必需的商品,从参加世界经济的运行中获取本国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先进科学技术,等等。靠一国的力量关起门来建设,既建不成社会主义,更建不成共产主义。这是自苏联成立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按照布哈林的说法,世界经济是“以经济联系的范围来分类的”,因此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个混合的概念。在十月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中既有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落后的殖民地经济,还有被一步步卷进世界经济之中的封建、半封建经济,而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在世界经济中又加入了社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61—562 页。

参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 9 页。

会主义经济。即使这样,世界经济仍然像布哈林所说的,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它“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并没有像斯大林所说的形成“两个并行市场”或两个并行的世界经济。

布哈林本人在十月革命后也曾经有过让苏俄脱离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一切靠自己不求人的态度。1918年在讨论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布哈林就表示,苏维埃国家原则上不允许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器,哪怕是用帝国主义的武器去打帝国主义也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能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去打敌人!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的观点有了根本变化。1924年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进口外国商品的问题,并举进口拖拉机为例。他说,有一种“真正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意见认为,不许进口拖拉机,因为这会毁灭国内的拖拉机制造业、破坏国内金属工业的发展,给我们同样多的钱,我们差不多也能制造出同样多的拖拉机,即使国外提供贷款,也不能进口拖拉机。布哈林认为,这种论据过于简单化了。他算了一笔帐:假定国内实际需求拖拉机5000台,而在目前可能投资的情况下本国只能生产1000台。再假定可以从国外任意赊购拖拉机。至少不少于所短缺的4000台,试问,我们是否可以进口这些拖拉机呢?布哈林回答说:“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改变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也能改变工业本身的发展速度”。他解释说,进口拖拉机能立即提高农业的产量,而这意味着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提高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而拖拉机本身也会提出对许多工业品如石油的需求,对石油需求的增加,又会对许多与石油生产等有关部门发生作用。这一

切又产生对于拖拉机的追加的需求。这样,进口拖拉机本身并不会消灭国内拖拉机制造业的基础,而会使之及时赶上去。如果为了“原则上的纯洁性”去保护工业,不进口拖拉机,那就会因此而放慢积累速度,从而放慢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包括放慢社会主义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1929年12月布哈林在《技术经济革命,工人阶级和工程师》的讲话中重申,进口的机器加入社会主义系统以后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因为物本身是‘中性的’:同样的一门大炮,当它从白匪手里转到红军手里之后,就开始起着完全相反的社会作用”。

列宁曾批评过布哈林不懂辩证法。但是我们看到,几年后布哈林的这些议论充满了辩证法,他看到了进口同国内发展的关系,看到了苏联同世界经济的有机联系。把发展国内经济同世界经济对立起来,拒绝参与世界经济的运行,企图用闭关自守的办法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一国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乌托邦思想。这样的社会主义是缺乏生命力的,是缺乏经济活力的。

1915年布哈林就依据大量事实指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联系在范围上的扩大,伸展到过去尚未卷入资本主义生活漩涡的地区,这是世界经济在广度上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国际经济联系向纵深发展,形成一个愈益紧密的网,是为世界经济在深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生产力空前提高,使世界经济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他指出,“经济生活的脉搏愈快,生产力的增长愈迅速,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就愈广阔、愈深入”。他据此批判了桑巴特所歌颂的那种力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209—210页。

同上书,中册第392页。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9页。

图走向经济上“自给自足”以求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统一体的帝国思想。如果说在本世纪初这种帝国统一体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在今天,在科技和世界经济又得到更加飞速发展的今天,谋求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统一体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世界经济的概念是发展的,它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发展成既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体。这两种经济体系就其本身而言是存在原则差别的,然而当它们加入到世界经济的活动中的时候,它只能按照国际通行的贸易原则行事,而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

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世界经济的总体系之内。从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无不竭力跻身于世界经济之中,参加世界市场上的交换,这里有过去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这是当今合作与发展时代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指出的世界经济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有如上述,是“国际化”的趋向,但与此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趋向。两种趋势同时并存,这有如列宁经常强调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与竞争并存一样。

布哈林指出,“金融资本渗透进世界经济的每个孔隙,同时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势:使国民经济有机体与外界隔绝,以经济上自给自足作为加强各自资本家集团垄断地位的手段。于是,与经济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资本的‘民族的’缠结过程,即资本‘民族化’的过程”。例如英国,在实行征服,推行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同时,还有另一种趋势,即把国家有机体的分散部分结合起来,使殖民地的分散部分结

合起来,使殖民地与宗主国合并,组成一个有共同关税壁垒的广大的统一帝国的趋向。建立中欧关税同盟的议论,也无非是要建立一个广大的经济领土,作为在外部市场上进行更有效的竞争的垄断性体制。布哈林进一步指出,这个资本“民族化”的过程,即在国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是由于世界经济中三大方面——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发生的变化促成的。他对这三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些不过是同一现象——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组织的“民族性”之间的冲突的三个方面。

布哈林的这一论断是颇具独创性的,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敏锐地看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在 90 年代的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经济地区集团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两种趋势的加强。欧共体建立欧洲大市场,美洲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资本“民族化”在规模上的扩大。也许可以把这看作通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步骤,但在目前它仍然只是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与其他地区集团进行经济竞争的组织。与此同时,各国经济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趋势越来越强劲,生产协作国际化,出现大量的跨国公司。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正是布哈林当年所说的“国际化”进程的表现。

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概念大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世界经济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在今后的发展中,帝国主义有朝一日会崩溃、消亡或变形,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世界经济仍将存在。只要地球不消失,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停止,那么世界经济就不会消失。世界经济是人类活动的共同成果。

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还是最新阶段？这是世界众多学者、理论家都在探寻答案的问题。

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对此作详细的论证。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成熟、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在此之后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因此，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的估计可以说是许多革命家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9 世纪就曾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我们通常看到的列宁的这一著作是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生前 1917 年出版的此书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版本有列宁写于 1917 年 4 月 26 日的序言。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 1 版以及 20—30 年代出版的第 2、3 版，书名用的都是“最新阶段”。一直到列宁逝世 10 年以后，到 30 年代本书才改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出版。从提法本身看，“最高阶段”是到了顶的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有新阶段出现，而“最新阶段”则意味上不封顶，此后还可能有更新阶段出现。1935 年的版本大概是根据 1916 年的手稿标题改回去的，但是这种改动是否注意到列宁 1917 年改名的考虑？这是列宁思想史研究中有待查明的问题。

有一个人物曾经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提出在帝国主义之后有可能出现“超帝国主义”阶段的设想。此人就是考茨基。他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星期，而于大战爆发后发表的文章《帝国主义》中预言，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还能够继续发展。他写道：

“大企业、银行和亿万富翁的疯狂竞争，使并吞了小财阀的那些大财阀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

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世界大战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帝国主义意图和军备竞赛首先加剧——这一来，继战争而来的和平就只是一项短暂的休战。不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

1915年4月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更为完整地提出他的超帝国主义的设想：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军备的意图，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资本阶级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意识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资本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是否也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加入发展中来的新成分’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赞同库诺的看法即发现和考察这些新成分，是理论家的一项

最重要的任务。”

考茨基谈到两种可能性,它们取决于战争的不同结局。“战争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军备竞赛继续进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另一方面,“战争也可能有别的结局。它的结束方式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这恐怕就是他所谓的还看不清楚的加入的新成分。对这种可能性的设想考茨基后来也没有放弃。1927年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重申了这种设想:“但是,金融资本通过世界大战的教训也许会看到这种扩大剥削范围的方法过于冒险。这种追求增值利润的活动,会使全部资本遭受太大的风险,而相反地过渡到超帝国主义,过渡到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的国际卡特化倒会更为有利。”

为理解考茨基的观点需要弄清楚他的一个看法,这就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这个看法当时是理论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布哈林也持这种看法。因此概括起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指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世界上各金融集团通过战争的办法去争夺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其代价太高,有可能搞得两败俱伤,因而有可能把经济上组织卡特尔的政策推广到对外政策上去,组织国际大联合,使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实现国际卡特化,用联合起来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残杀。这样在帝国主义之后会出现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对出现这样一个阶段的可

《考茨基言论》第 229 页。

同上书,第 230 页。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 分册第 166 页。

能性考茨基没有说得很肯定,而只是说“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否实现,还“没有足够的前提”给予解答。他提出,理论家应当考察能影响这一设想实现的“新成分”。

在俄国党内最早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作出评价的是布哈林,他在《世界经济》一书中有专门一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批评考茨基的新理论。布哈林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超帝国主义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从理论上讲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因此这种竞争一消除,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也就消除了,这就出现把分解为各民族集团的资本变成统一的世界组织的过程,这个世界组织就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世界托拉斯。布哈林认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这样的托拉斯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因为一般来说,卡特尔化的过程是不存在经济界限的”。但是他随即指出,“这种抽象的经济可能性决不意味现实的可能性”。他引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的话说:“从经济方面看组成一个领导全世界的托拉斯,从而消除危机,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尽管从社会与政治上来看,这种状态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极端紧张的利益对抗必然造成卡特尔的崩溃”。布哈林接着说:“实际上由于社会政治原因甚至不容许成立这种囊括一切的托拉斯”。对于这个论断,布哈林作了详尽的论证。

订立比较稳定的协定的首要条件是世界市场上大致势均力敌的状态,否则占据有利地位的集团就不会参加协定,它会用斗

参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06—107页;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第87—88页。

争的办法去打垮对手。因此,国际托拉斯的建立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纯经济的相等,其中包括生产成本的相等。生产成本的相等归根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相等,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因此经济结构相等是达成协议的一个条件。否则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会因参加协议无利可图而拒不加入。第二,经济政治上相等。资本与国家的结合可以转化为一种附加的经济力量,强国可以为他的工业争取到有利的贸易条件。所以在估计世界市场上的条件时不仅要考虑斗争的纯经济条件,而且要考虑其经济政治条件。即使经济结构大致相同,如果军事力量悬殊,那么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与其参加协定不如继续斗争更为有利。

对上述相等问题还不能仅限于从静态即现状去考虑,还要从动态即发展的可能性去考虑。资产阶级的民族集团不仅依据现状,而且会依据未来的可能去制定计划。如果目前旗鼓相当,但未来也许某一集团会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这也会使协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用军事手段进行斗争耗费巨大,但是其主要负担大部分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另一部分落在战争中被剥夺的中间经济集团身上,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不仅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能发挥作用——支持金融资本进行“和平的竞争”。布哈林认为,上述的地位相等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在最近的将来,在我们即将目睹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资本主义将以吞并弱者的办法,朝着全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方向行进。一旦现在的战争结束了,又有新的问题不得不以剑来‘解决’”,任何协议或合并都只能以新的规模来重演。如果欧洲统一起来,那还会出现以欧洲为一方,以美洲和

亚洲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斗争。

应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布哈林的这一判断。一个判断能得到这样的证实,能管那么几十年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布哈林对世界经济还作了进一步的预测。在回答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是否会放弃帝国主义的方法时,布哈林回答说,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无产阶级的行动是分散的、不坚决的、软弱的,这样他就达不到考茨基所说的目的;或者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百万无产阶级大军所发动的攻击,那时这就不是超帝国主义新时代的开端,而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端”。

布哈林认为,如果机械地看待社会进程,那么各国资本主义托拉斯通过彼此吞并最后是有可能出现战胜所有对手的强国的,这就可能出现“超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这种设想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在内。“实际上,接踵而至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使无产阶级把全部革命能量付诸行动。工人阶级吸取了血的教训将起而反对为资本家的超额利润而把他们变成炮灰的制度。”而“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集中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对抗的社会政治的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

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10页。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第92页;参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12页。这里引用的是《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字,中文版《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是从英文转译的,其英译文似乎为适应某种需要作了修改。例如上述引文最后一句成为:“而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这未必是布哈林的用语。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93页。

逻辑上的终点,在此之前就会崩溃,而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之中才能完成。”

资本主义有适应环境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越来越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罢了”。他在1915年提出了这个观察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到20年代末在评价资本主义稳定和改造时期仍坚持这一观点。这一点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论述。

现在看看列宁继布哈林之后对超帝国主义论批判的情况。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作出的最早反应是写于1915年11月17日以后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但是这里的批判主要是政治上的。他指责考茨基以超帝国主义的设想来否定“无产阶级在今天,在危机已经开始、战争已经发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在同年12月21日为布哈林《世界经济》一文所作的序言中才较为详细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一理论。在序言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同时沿着布哈林的思路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他写道:“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推断,那就会得出考茨基已经得出的结论(……):这些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像上一篇文章一样,列宁认为,作这样的结论是用天真的幻想,来回避现在已经到来的、现实存在的、充满冲突和灾变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列宁接着指出,“能不能反驳说,不可以抽象地‘设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13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26页。

想‘帝国主义之后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毫无疑问，发展正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可以看出，列宁批判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论点是同布哈林一致的，并且暂时没有超过布哈林。直到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才有所展开。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一节中，列宁用较多的篇幅批判了考茨基。他指出，瓜分势力范围只能依据实力，而由于各国发展不平衡，实力是要变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争夺就不可能停止。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而已。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它同时也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具有统治的趋势，而不是自由的趋势，结果是全面的反动。因此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看到，布哈林和列宁否定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论据，是认为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是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实现，还在它出现以前帝国主义就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这个论断反映了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日，不能说这个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一个或者几个国家无产阶级

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崩溃和灭亡,也不意味着它再也不会得到发展。直到今天超帝国主义固然没有出现,但帝国主义也没有崩溃,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资本主义这一新现象呢?

十月革命以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革命风暴,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也用了几年时间去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到1924年前后,资本主义出现了叫做相对稳定的现象,这以后资本主义出现继续发展的趋势。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围绕这个问题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他据此批判布哈林的“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的论点。

布哈林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早在《世界经济》一书里布哈林已经提到,“如果不可能使社会发展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就需要认真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利用资本主义的相对进

第一次使用“稳定”一词是在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称之为“民主-和平主义时期”。1925年3月共产国际全会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某种局部稳定状态,但同时指出这种稳定是相对的,是极不巩固的。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234页。

同上书,第12卷第20页。

步性……”。在这里对于实践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对于客观前提’的估计，即对于该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第二，对当时无产阶级力量的估计。”

1918—1919年布哈林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它的潜力，已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1922年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写道：帝国主义战争表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以后布哈林注意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大量搜集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资料，看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从而得出了和过去不同的结论。

1928年他为准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研究了专门的技术文献并搜集了有关经济增长的资料。他在报告中指出，1917年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时期：1917—1923年是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这一时期强大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二个时期从1924年开始，是资本进攻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恢复的时期。资本主义依靠自己政治上的胜利，达到某种经济上的稳定。大体上从1927年开始进入了所谓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改造时期。这种改造在质和量上都超过战前的范围。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究其原因，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相当巨大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的普遍改组。”

布哈林列举了世界技术进步在各部门的表现，如电气化的发展，应用化学方面的重要发明，传送系统的普遍采用，工厂中新的劳动组织，标准化、定型化、规格化、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些技术成就都意味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38页。

同上书，下册第368页。

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例如,美国加工工业的总产量比 1923—1924 年度的平均额增加了 4.5%,而工人人数却减少了 5% 以上。这意味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差不多 30%—40%。布哈林指出:“那里在工人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用马克思的话说,V(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同 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在减少,而且是绝对的减少。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在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情况。”与此同时,布哈林还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庞大的企业主组织产生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性的大托拉斯在形成。这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战时特点的、实行配给制的“军事资本主义”(也被叫做“军事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组织同国家机关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新趋势,它无疑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929 年 1 月布哈林在《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中根据大量资料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继续发展的事实。他说:“总之,毫无疑问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沿着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了;毫无疑问,在技术方面,……在利用改良主义方面,资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增长过程中现在发挥着它空前未有过的作用。”

历史证明,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可能性的论述在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资本主义至今仍存在自我调节的能力,即使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征候,而是

通过危机用大规模的经济破坏去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更新固定资本,把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国民经济。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写道,在危机期间企业停工,失业增长,市场减缩,许多企业破产,总之,生产力受到局部破坏。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提高了;最大的企业加强了,托拉斯和其他垄断联合组织发展起来了。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发展循环,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高涨,此时更高的组织形式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规模。“由此可见,以危机和危机期间生产力的消耗为代价,换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世界战争也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而是列强通过实力较量来重新调整世界格局,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布哈林写道,战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表现,它使生产力暂时衰落。但是战争过后,强国变得更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加集中,获得更大的剥削场所,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扩大了,积累过程进行得更加迅速。可以说,战争以生产力的暂时低落换来了扩大生产的可能性。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科技革命更是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呢?布哈林用帝国主义矛盾的扩大去说明。他说,“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设想成这样:资本主义几乎在一切国家或者在大多数国家都正在垮台。情况并不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由于从前直接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结果,现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生了根本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4 页,还可参看第 298 页。

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或者换种说法,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必将到来,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各部门中将变得越来越软弱,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与自身相联系的和由其整个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内部和外部的巨大矛盾,将导致越来越强烈的冲突。而在这些对抗力量冲突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被炸毁并灭亡。”他在同卢森堡争论的著作《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中以极其明确的语言表述了这一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是这些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既然是这样,那么显然这些矛盾终究有一天会把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炸为齑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

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必然继续存在。因此用矛盾的发展和扩大以至爆发和激变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是符合辩证法观点的。这样既可以看到并承认资本主义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也不至于因此而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景。布哈林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15年布哈林就指出世界经济中存在两种趋向,即“国际化”的趋向和“民族化”的趋向。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经济地区集团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两种趋势的加强,同时也存在着民族国家、地区经济集团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76页。

同上书,第386页。

同上书,第360页。

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国际化的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上述矛盾和对立是否允许一个超帝国主义世界的出现,仍然是个有待历史来回答的问题,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它尽管遭到了某些挫折,但仍然是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在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最有争议的恐怕要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了。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在谈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说,布哈林起草的提纲“企图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投降主义理论强加给代表大会,这个理论得到与六大同时召开的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批准。布哈林的提纲被否定”。第2版说得更厉害:“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提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以改良主义观点评价资本主义的稳定(资本主义‘健康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抹杀资本主义越来越尖锐的危机,否认资本主义稳定的不稳固;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和否认革命的前景。”大会揭示了“布哈林反革命伪科学‘理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等等)有害实质,指出这是旨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和拯救西方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瓦加诺夫写道,在未通过联共(布)中央而散发出去的六大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中,布哈林否认存在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稳固性的因素,看不见新的革命高潮条件在成熟。提纲中断言,在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38年第1版第33卷第779页。
同上书,莫斯科1953年第2版第22卷“共产国际”条。

时期,资本家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将逐渐消除,不会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和革命形势。只是在联共(布)代表团的坚持下才在提纲中作了补充,认定该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动摇,资本主义总危机在尖锐化。

由此看来,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真是既荒谬又反动的伪科学。

最早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是希法亭。早在1910年,他在《金融资本》一书中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时指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产生由统一机构协调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在考察卡特化时提出一个问题:卡特化的界限在哪里?他认为,对卡特化来说,绝对的界限是没有的,存在的是不断扩大卡特化的倾向,其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总卡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由一个主管机构有意识地加以调整,这个机构决定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他把这样的社会叫做“得到有意识调整的对抗形态的社会”。

1915年他进一步提出金融资本有缓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趋势,包含把无政府经济制度变成有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萌芽,国家权力的加强也促进了这一趋势。在他的用语中出现“高度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

1927年5月希法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作《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报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参见 . . . 瓦加诺夫:《联共(共)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莫斯科1970年版第196—197页。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94页。

以后,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纯粹由盲目的市场规律所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化,也就是从各种力量的自由比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影响。与此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国际化,即“把国家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企图”。他原先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的推测,到这时候在他看来已经变成了现实。他把这种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他主张,“依靠国家的帮助,依靠社会的自觉调整的帮助,把这个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成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经济”。这样,社会主义问题就通过经济发展本身提出来了。

布哈林在考察帝国主义的时候同样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垄断的形成,国内的经济生活将越来越有组织,竞争将转移到国外。早在《世界经济》一书中他就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

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垄断的形成。这一过程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通过同生产部门的兼并,形成大的生产垄断组织,另一方面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兼并,形成联合企业。布哈林把这叫作横向的积聚和集中与纵向的积聚和集中。“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这全部过程趋于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所有各生产部门间有组织联系的一个统一的联合企业。”“各个领域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221—223 页。

同上书,第 225 页。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 48 页。

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极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这样,便由许许多多个人所有的企业间的竞争,发展成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家同盟之间进行的竞争,在整个生产部门中竞争归于停止,竞争仅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辛迪加之间进行,最后,工业中的同盟与银行业辛迪加统一了全部“国民”生产,全部“国民”生产又形成由众多公司所组成的公司。“竞争达到最高、最后的发展状态,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与此同时,国家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国家机器不仅一般地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体现统治阶级集体地表达出的意愿。国家机器面对的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分散成员,而是他们的组织。于是,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企业家组织的代表所选出的‘委员会’,而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由于全国性垄断组织的形成,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国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开始消失,出现有计划、有组织经济。

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把上述思想作了这样的概括:

“资本集中消除竞争,但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竞争在更大的基础上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它消灭小生产单位的无政府状态,但随后它又使大生产单位之间的无政府关系尖锐化。一般经济体系中的‘磨擦’在一个地方消失,只是为了在另一个地方更大规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 51 页。

同上书,第 93 页。

同上书,第 101 页

模地再现出来：它们变成巨大的世界机制的各个基本部分之间的磨擦。”

这里所谓世界机制各基本部分间的磨擦，指的就是在各国之间的竞争。

1929年5月24日，布哈林在《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问题的看法》一文继续发挥这一思想。他肯定，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与竞争并存，不过当前的特点是“巨大的组织的竞争代替个人的竞争”，“从竞争的观点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

接着，在同年6月写的《“有组织的经营混乱”的理论》一文再次强调竞争向国际舞台转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的问题，而在‘本国’内部则为组织问题所代替。”

布哈林的这一观点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1919年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就资本主义下的计划调节写道：“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阶段……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

1919年通过的《工会国际行动纲领》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各个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资本主义联合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9页。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406页。

同上书，第417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529页。

组织的成员。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开始为有组织的状态所代替。”尽管这个文件是布哈林起草的,但它是经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可以认为,也是得到出席大会的列宁同意的。由此可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早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布哈林无需通过提交六大的提纲塞给共产国际。

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一定程度的计划性,这一点恩格斯在19世纪末已经注意到了。他在1891年6月写道: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

列宁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一见解。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27年前就已指出,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从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第一,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在增长,在托拉斯里无计划性开始消失;第二,计划性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册第9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35—436页。

主义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计划性,尽管那时候一般都把社会主义同计划性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布哈林的观点同恩格斯和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出现了有组织状态,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秩序能够永世长存。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将继续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必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1928年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使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切矛盾成千倍地尖锐化并最终导致它的灭亡。”

可以看出,布哈林对有组织资本主义的论述,其目的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想探讨和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布哈林同希法亭的根本区别。事情很明显,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只有明白时代的发展趋势,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方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不照搬本本,勇于创新,自觉地去探讨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正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的本色!如他本人所遵循的口号所说的:“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布哈林的研究经常采用抽象的方法,这既是他的优点,也可能是他的短处。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德文版跋中强调指出“抽象的研究同经验的现实之间的差别,抽象的研究从‘理想化的横断面’(马克思语)去描绘事物和过程,而经验的现实在任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卷第285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6页。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比抽象的描写要复杂得多”。在考察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时布哈林用的正是这种抽象的方法。根据抽象的推论,他得出帝国主义有发展成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他随即否定了其实现的可能性。同样根据抽象的研究,他得出结论,随着国内垄断的发展,有朝一日整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垄断组织,从而在国内消灭竞争,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这个抽象的结论同样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历史表明,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帝国主义时期仍然是垄断与竞争并存。另一方面,尽管国家的干预在加强,但这种干预毕竟是有限度的,只有战时才出现由政府直接控制全国经济的局面(因此有人把这叫做“军事社会主义”,布哈林批判了这种说法)。在世界各国,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大多限于宏观调控,在国家的调控下,各企业、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布哈林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方面有所期望,这很可能影响了他的结论。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后在修改俄共(布)党纲时,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对这场争论后人议论纷纷,甚至把它看作是布哈林反列宁的“罪证”。对这场争论的是是非非有必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作一番考察,特别是看看布哈林本人的说法。

俄共(布)第一个纲领是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感到过时。1917年列宁在四月提纲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7页。

中提出修改的建议。在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列宁建议:1、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2、修改党纲,主要有:(1)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2)对国家的态度和我们关于公社国家的要求,(3)修改落后的最低纲领;3、修改党的名称。

关于修改党的总纲部分当时有两种观点:党纲修改委员会的多数人主张修改纲领的整个理论部分(格·洛莫夫、格·索柯里尼柯夫、德·博哥列波夫等)。布哈林不久加入了此委员会。委员会选出的小组委员会建议删去对交换、商品生产、危机等的分析,代之以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的分析。列宁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未能完成修改党纲的工作。

1917年6月,列宁受中央委托发表《修改党纲的材料》并加上说明。几乎与此同时出版了《修改党纲材料(文集)》,其基础是索柯里尼柯夫的草案,代表纲领委员会的观点。6—7月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审议了委员会的记录,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讨论新的党纲。列宁为此作了准备,10月发表《论修改党纲》的长篇文章,批评索的草案及布哈林的意见。然而原定10月30日(俄历17日)召开的专门代表大会延期。1918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由列宁领导的委员会准备新的党纲草案。3月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党纲问题,列宁起草了《党纲草案草稿》,供代表们讨论。当时战争与和平问题紧迫,大会未能仔细讨论党纲问题,再次选出以列宁为首的纲领委员会。1919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委员会制定了《俄共(布)纲领草案》,并于2月25—2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草案的所有基本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1919年3月召开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和列宁都是党纲问题的报告人,他们在纲领的写法上再次出现分歧。列宁一直主张修改党纲时需要增加关于帝国主义的新内

容,同时也要保留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1918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表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必须在纲领中确定下来。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继续坚持把有关旧资本主义的内容写进党纲,他说,“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³⁴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列宁特别强调,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党纲中保留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非常必要,具有现实意义。

和列宁不同,布哈林主张在新党纲中删去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而只写进有关帝国主义的内容。布哈林在报告中指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是把全部纲领要求建立在对在其中从事活动、斗争和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时代作具体分析的基础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3、54页。

同上书,第36卷第137、140页。

同上书,第36卷第161页。

础之上。因此非常自然,纲领中应有的理论导言中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分析,不仅考察一般的资本主义,不仅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潮流和一般规律,还要分析资本主义发展领域中的新现象,即帝国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产物”。接着他对党纲草案提出自己的方案,说现在的导言由三部分组成:不长的前言,长长的旧纲领的引文和对新时代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的分析。他建议去掉从旧纲领中引来的文字,对新时代作较为精炼的表述,更多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分析这一阶段不仅涉及其发展的最初时期,还要分析其现实表现——其发展的开端和衰落。针对列宁所说的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布哈林承认,确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重心转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旧纲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俄国更是如此,它保存了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它们同资本主义发展成分同时并存,但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还在进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但是纲领谈的主要的不是这些落后的形式,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首位。“在旧党纲中谈的正是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布哈林指出,现在的情况同样如此。“任何国家也不存在‘纯粹的’和‘绝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形式。如同任何科学的概念一样,某种‘纯粹’的概念是科学的抽象。然而,金融资本主义乃是决定新时代和新阶段的最典型的现象。因此应把注意的重心集中在它身上。”布哈林认为,“任何纲领都应首先以分析基本的、根本的东西为依据。其他成分,视其重要性不同而写入纲领或者不写,但重心应是此基本的和根本的东西。”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基本的和根本的乃是金融资本主义,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如果不提

这个“根本”就会寸步难行。

从以上两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列宁本来就不反对在纲领中写进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而布哈林也不是绝对反对或者原则上反对写进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人的分歧并不像后人所描写的那么大。

如果说上述分歧并不是根本原则问题,而只是个怎么写更恰当的问题,那么下面的议论就有意义得多,用布哈林的话说,“分量要重得多。”这就是由资本主义问题而引起的关于商品经济的作用的争论。

列宁认为,简单的商品经济正在俄国产生新的资本主义,所以很有必要在党纲中保留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布哈林同样看到,俄国经济正在资本主义瓦解的基础上部分地回到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手工业在发展,小生产在产生。但是他认为,“旧的简单商品形式决不是一定会成为产生新资本主义的根据”。“这些现象是存在的,这是事实,甚至它们在发展,也是事实,但说它们将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生则不是事实。我们不应把它们看作新一轮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看作必然重新生长的大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应看作是旧资本主义形式瓦解的过程,这些形式不会导致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复活,而是旧形式的瓦解的表现。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式。”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是不现实的”。为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举了一个“奇特的例子”。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采纳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同农民达成某种妥协,那时我们说过,土地社会化及其平均使用,小资产阶级的追求,转向相当古老的社会经济形式,把业主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这样的纲领在社会主义变革条件下不像在其他情况下那么有害。“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从马克思主义看是站得住脚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

弃这种看法”。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对从小生产中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1920年4月他曾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一段时间里,他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看作是“主要敌人”。甚至到1922年4月谈到“最后的斗争”时,还特别指出,这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是同他当时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他把经商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劳动者农民、种地的农民同私有者农民、经商的农民、投机的农民对立起来,把经商的农民看作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这里所谓的经商和投机,指的无非是那些在国内战争中出售粮食的农民。在当时的环境下把他们看作危害革命的大敌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这一论断看作普遍适用的真理,那就未必正确了。按一般常识讲,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生产了粮食,首先显然用于充饥,其次是拿出去交换所需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布、食盐、火柴以及其他工业品,这些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农民家庭自身的需要,同资本主义无关。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的首先是满足其日常衣食住行需要的行为,而不是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存在当然离不开商品交换活动。农民除了需要交换日常用品外,还需要工业品,包括扩大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农机设备和化肥等等。事实证明,农村越富裕,为城市、工

《俄共(布)第八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第39、45—46、107—109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

同上书,第43卷第82—83页。

业以至全国经济所能提供的粮食、原料以至劳动力就越多,为工业品提供的市场容量就越大。这样一种平衡发展是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后来布哈林在 1925 年针对新经济政策下的农村发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发财吧!”可以看出,布哈林的这一结论根源于他在八大做出的论断:旧的简单商品形式不一定会成为产生新资本主义的根据。列宁在其最后时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农民的估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把学会经商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已不把经商做买卖等同于资本主义,1923 年初,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更是把做买卖的合作社当作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把合作社的发展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得出结论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布哈林把提出这一问题归功于列宁,说“这是他的功绩”。我们今天也完全有理由把这一问题的理论解决归功于布哈林。

这场争论本来是关于党纲写法的党内讨论。但是后人在评论时却无限上纲,把布哈林的主张说成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布哈林建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小商品生产、关于中农经济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布哈林的这种观点,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又抹杀富农正从小农商品经济中产生和滋长的事实。”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争论直接涉及的只是要不要写上资本主义,其余的什么中农富农都是推论出来的。而《教程》所说的则是强加于布哈林的。其实,列宁还在 1918 年党的七大上就讲得很清楚,关于党纲理论部分的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65 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57 页。

两种写法或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布哈林在八大上也表示，“我认为，我们纲领的理论部分十分之九是形式问题。如果第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重新改写过的好的草案，我认为也必须投票赞同现有的草案，不要把通过纲领一事束之高阁，不要交给委员会去改写此理论部分。”由此可见，两人都没有把分歧看得过于严重，布哈林也不想坚持己见。1919年3月19日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党纲草案的决定，认为“草案无论是结构的形式（纲领的类型）上，或是在对我们党的基本原则、任务、目的和策略的说明上，都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要求和任务的”，决定以此为基础，交委员会作最后修定。22日大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党纲。可见夸大党纲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是缺乏根据的。

列宁的主张要全面一些，因为帝国主义毕竟是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不说清资本主义，就很难讲清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会成为无本之木。但布哈林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所阐述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论点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说是今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起点之一，是布哈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一论断对我们今天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仍然不无教益。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2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第46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26页。

“炸毁”国家

和“无政府主义”公案

年下半年至 1917 年初,布哈林和列宁在国家问题上一度出现过意见分歧和争论。从 20 年代末联共(布)反“右倾”斗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它揭示了布哈林“理论弱点的根源”。但是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表明,这种评价如果不是有意捏造,至少是一种误解。可惜这种误解也存在于我国出版的第 2 版《列宁全集》的“前言”中。第 28 卷的“前言”写道:“在《青年国际》这篇短评中,列宁批评了布哈林在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2 卷第 62 页,。在我国也有这种看法,如王炳煜、陈凤荣《关于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见《世界历史》1981 年第 6 期;周耀明《也谈谈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见《兰州学刊》1982 年第 2 期。

义观点。布哈林……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必须‘炸毁’，因为无产阶级在原则上敌视国家。这就错误地把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炸毁’国家的观点加到社会主义者身上。”第47卷的前言重复这种论断，说“本卷收入的有关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书信”，包括原则上敌视国家，断章取义，等等。这种情况说明，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对这桩历史公案很有辨正之必要。

事实上，存在于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国家这一问题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看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当时在报刊上也没有争论起来，见诸报刊的只有两篇文章：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和列宁的《青年国际》，其余都是不供发表的两人之间或同第三者的通信，以及列宁所作的札记和评注。这种形式也说明这是一种内部的商讨。

弄清这场争论的真实历史对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学说的发展，对研究列宁主义的形成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值得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布哈林本人的言行，对照列宁的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

引起争论的首先是布哈林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在写此文之前，布哈林对帝国主义时代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1915年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这是得到列宁好评的书，列宁为它写了序。此书对当时出现的新世界经济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 页。

同上书，第47卷第 页。

首次发表在《法的革命》文集莫斯科1925年第1辑第5—23页。

中译文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辑。

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此书完成后布哈林并未放下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而是对帝国主义作进一步的考察。他从大量的事实中发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强烈,国家的职能从在政治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制度,转变成直接进行剥削,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写道:“国家从剥削的保护者和庇护者变成了统一的、集中的剥削组织。”这方面的考察研究的新收获促使布哈林在1916年上半年写出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篇文章(以下简称《国家理论》),并把它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文集》编辑部。此文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续篇。其大部分篇幅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批评和揭露。列宁肯定了这一部分,他在评注中写道,“论国家资本主义。很有意思。实际上可以公开”。布哈林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由于文章探讨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同经济的关系,自然就涉及国家的一般理论,因此布哈林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国家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当时,在机会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国家学说遭到粗暴的篡改和歪曲的情况下,这种探讨和研究尤为必要。但是列宁对这一部分不满意,加上大部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材料可以在合法刊物上发表,列宁不同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 文集》上发表此文。收到退稿后,布哈林以同样的论点写了好几篇短文,先后在荷兰、挪威、不来梅以及美国的《新世界报》上发表,其中之一是署名 Nota Bene 的《帝国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25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8页。

主义强盗国家》。此文在《青年国际》杂志上发表后，列宁写了一篇评介该杂志的文章《青年国际》，其中批评了布哈林的某些观点。

列宁对这两篇文章看得很仔细，做了评注。这些材料加上1916年8月到1917年初布哈林和列宁，以及他们同第三者就这一问题进行的通信，给我们提供了分歧和争论的基本面貌。

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态度。这涉及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区别、“炸毁”国家以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名词术语是否适当准确，引语是否完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

布哈林在《国家理论》中写道：“这样，未来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组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完全不像许多人所断定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对未来结构看法上的真正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公共经济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出现的集中化倾向中产生的，是集中化的和技术完善的经济，而主张非集中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乌托邦则使我们返回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使任何经济进步都成为不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保存国家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在这里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最后形式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的一个注释中也有类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7—126页。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13页。

似说法：“说到这里，我们要指出，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实际上，区别是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真正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只能意味着向旧技术、向旧生产形式倒退。”

作者提出了国家问题，但是没有深入下去，而是接着谈经济问题。列宁对此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在布哈林指出区别不在于反对或赞成国家的旁边批上“对”，而在下一个论断（集中化生产，等等）旁边则批道：“不准确，不全面”。列宁在公开的文章中指出，“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

把布哈林的论述同列宁的批评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列宁关于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差别讲得全面准确。但他并没有指责布哈林反对这一论断，而是提醒他不要忘记，或者像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22页。

同上书，第31卷第122页。“不准确”俄文是中译文不甚准确，本文对个别语句作了校订。

同上书，第28卷第289—290页。

。鉴于某些

一地方说的，“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列宁的用语很有分寸，“忘记”并不等于“反对”。其次，我们看到，布哈林紧接着就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形式，虽然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但至少可以看出，布哈林既没有否定，也没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其实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需要国家是布哈林的一贯主张。在此之前，他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中已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国家，因为那时阶级不存在了。“诚然，就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是暂时的统治阶级）而言，他们主张要有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机器，以统治被推翻的阶级，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接着写道：“国际无产阶级要进行武装斗争，推翻金融资本的专政，摧毁金融资本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权。”

问题是布哈林的文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似乎答非所问的奇怪逻辑。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中是用一个注来说明他的观点的，给读者以突然的感觉。但是只要看一下《国家理论》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出，布哈林的上述议论是针对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批评的。例如，耶里涅克写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无非是剥削阶级为维护其外部生产条件的组织，而历史的内部的必要目标则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在这未来时代里，国家将根据共同利益来调节全部生产。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56页。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同上书，第134页。

与此同时,发展的目标是社会和国家的完全统一……然而关于社会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同无政府主义极端矛盾的。这里是社会取消国家,而那里是国家取消社会”。他在另一地方又说:“至少就未来而言,社会主义者是否认国家的必要性的”。正因为这些议论涉及未来国家及未来社会的生产,并且观点混乱,前后矛盾,因此布哈林认为有必要对此作出回答。他在谈到问题不在赞成还是否定国家后,接着就谈未来的社会经济就可以理解了。即使他回答得不完全,欠准确,也不能由此得出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列宁也确实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

“炸毁”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这里还涉及“炸毁”国家问题。列宁对“炸毁”一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像 Nota Bene 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后来布哈林的话被引申为“炸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断定“‘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这成了指责布哈林“半无政府主义”的根据之一。

且看布哈林本人是怎么说的。他有两个地方谈到“炸毁”。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12—13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290页。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64页。

其一是《国家理论》一文,这是明确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他写道:“理论上这里有两种情况:或者工人组织如同所有资产阶级组织一样长入一般国家组织,并变成国家机关的简单附属品,或者它们冲破国家的框框并从内部炸毁它,同时组织自己的国家政权(专政)。这第二条道路是李卜克内西等革命者的道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这里既谈到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又谈到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布哈林的这一提法是正确的,根本谈不上无政府主义。

其二是《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现将布哈林的原文和列宁的批注抄录如下:

“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这种制度的政治表现即 国家也将被消灭 (gesprengt),于是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不复存在。”

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布哈林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马上消灭国家。其实列宁所说的“不确切”是箭头所指的“国家被消灭”,特别是后面所附的德文 gesprengt——“被消灭”的提法。因为国家不是“被消灭”或“被炸毁”的,而是自行消亡的。但是只要对用语作相应的修改,布哈林所表述的思想就同《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一致了:“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

《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30—31页。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22页。

消亡的。”可见问题在于布哈林的用语不准确,这样的用语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列宁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

顺便说一下,有同志认为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消亡’(自行消亡),逐渐‘泯灭’(自行停止)”是“布哈林片面引证恩格斯的话而得出的”。这是张冠李戴了,事实上这是列宁本人的见解。从行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列宁是把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把恩格斯的观点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作对照,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是被“炸毁”的,而是“自行消亡”的。列宁的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炸毁”资产阶级国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指出,“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1917年初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旁边批道:“注意:‘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来代替它……’”过不多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直接使用了“炸毁”一语,把“打碎”、“摧毁”、“炸毁”看作同义语,并特意指出,“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应该说,到这时候,列宁和布哈林在“炸毁”问题上的看法已归于一致。必须指出,分歧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引起的,而是“炸毁”一词引起的。尽管在此之前列宁早已看到《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为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30—631页。

王炳煜等的文章,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括号内是《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新译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90页。

同上书,第102页。

此书写的导言,并谈到过“打碎”的必要性,但是没有使用过“炸毁”的说法,很可能恩格斯的这一用语被疏忽了,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列宁把“炸毁”国家机器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这是1916年12月的事,但列宁很快(1917年初)就发现了这一点,再没有为此去指责布哈林,并且自己也使用“炸毁”这个词了。

然而,时至1929年,在恩格斯关于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已经很清楚、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已出版多年的时候,还硬说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这里批判的已不是布哈林,而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以至列宁本人了。

布哈林提出炸毁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这自然是同他敌视这种国家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他在两篇文章里都提出过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观点。他在《国家理论》中写道:“只要不发生社会主义变革,国家机体最近唯一可能的发展形式是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化将成为军营的集中化,在上层中间必然加强最丑恶的黠武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粗野的机械训练和血腥迫害。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任何发动在这种条件下都必然变成反对国家政权的发动。由此得出一条明确的策略要求: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强调自己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这里说的是在议会——应当投票反对实行任何垄断,反对任何关税联盟等等。”

这一论点是布哈林从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估计中得出的。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触角已伸入社会政治经济的所有领域,国家已成为前所未见的列维坦,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即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31页。

级的发动决不可能局限于某一部门、某一领域,而必然要变成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态。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他敌视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变革”之前的国家机体。其次,也看不出他拒绝现在利用国家,强调敌视态度之后他接着指出的恰恰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反对票。利用议会进行斗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利用国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在实践上布哈林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流亡国外之前一直在莫斯科从事地下斗争和合法斗争,并且同当时要求从杜马召回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召回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12—1914年他虽身在国外,但仍然积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起草发言稿、报告和宣言等等。

列宁在1916年8月给布哈林的信中援引了布哈林说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坚决强调自己在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态度之后,接着指出:“请对照一下: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权力的临时国家组织’”。这后一句话是布哈林在文章末尾说的,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特意要他对照一下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但是列宁也只是提示一下,并没有引出明确的结论。顺便说一下,列宁本人也曾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中布哈林为“敌视国家”又补充了一条论据,这就是当时社会爱国主义泛滥,它以“保卫祖国”为号召驱使工人互相残杀,而这种社会爱国主义也侵入了工人的思想意识。布哈林说:“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20页。

同上书,第29卷第179页。

深深渗入工人的心灵。”1916年10月布哈林给列宁的信中说：据我看来，国家问题“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现在一切都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来了，而对此群众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因此需要全面提出这一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和估计，他认为作为“群众教师”的社会民主党应当鲜明地强调自己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以启发和教育工人群众。当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布哈林所使用的“国家观念的根蒂”是个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语，这里实际上应该说的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机会主义态度之间的冲突。布哈林的用语欠准确，但他的意思显然也想说明这种冲突和对立，想要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爱国主义。

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的这一现象，他写道：“不论工人阶级怎样大力宣扬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结果又如何呢？结果，甚至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确信资本主义不可动摇、对资本主义国家留恋、国内和平的心理，都还异常强烈。需要有整个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一个阶级才会去反对另一个阶级。”

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念早已有之。早在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在谈到炸毁旧的国家必要性时就曾指出过“对国家的迷信”、“对国家的盲目崇拜”现象。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这有其哲学根源，也有长期的习惯，这就使“这种崇拜更容易生根”了。列宁对有关论述都在旁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25页。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88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

边批上“注意”的字样。后来,列宁在《论国家》的讲演中也谈到“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布哈林所说的国家观念的根蒂深入工人的心灵是否从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得到启发,当然无从确定,但至少他看到的现象同恩格斯在上世纪末所看到的有某种共同之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国家观念”、“对国家的迷信”更加变本加厉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对考茨基提出许多批评,其中之一就是指责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只字不谈要同‘对国家的迷信’做斗争”。相形之下,布哈林确实比考茨基好得多。

此外,列宁还对一些表述和引文提出不同的看法,顺便说明一下。

1916年8月,列宁给布哈林的信中指出他的“一系列的极不确切的提法”。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的’国家理论”。

布哈林在10月初的回信中解释说,“我没有这种谬论。我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社会学的国家理论”,因为关于国家理论有社会学的,也有法学的。布哈林在文章中论证了法学的国家理论无法说明国家的本质,而多半陷于循环论证,“用法来为国家下定义,又用国家来为法下定义”。他强调必须“把国家看作社会现象”才能得出国家的正确定义。他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中继续使用这一提法,例如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其次,布哈林在《国家理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摧毁资产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91页。

同上书,第37卷第75页。

同上书,第47卷第419页。

阶级的国家组织,利用其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的临时国家组织”。列宁认为“权力的国家组织”一语不清楚,他评论道:“对谁的权力?是对整个社会吗?对社会的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同义语叠用。同义反复。”布哈林回答说:这是因为还有权力的另外一些范畴,例如父权。“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尚有恩格斯的文章引用不全的问题。列宁写道:“作者援引了恩格斯的话,而一引到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的地方恰恰就中断了。”“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竟如此断章取义,以致原义表达得不正确,或者能使人得出不确切的结论”。一处是布哈林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说:“在这里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奴役(Niederbaltung)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指出,他只引用了恩格斯论述中从“照例”起的那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31—32页。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9页。

1916年10月初布哈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6页。从布哈林的解释可以看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译作“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暂时的国家组织”是不确切的。如果这样,列宁接下去所说“‘国家政权组织’!?”——这一说法同样是极不确切的,或者错误的”云云,就完全无法理解了。“国家政权组织”是个很正常的普通用语,何错之有?列宁认为不确切或错误的是“权力的国家组织”。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19页。

同上书,第441页。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8页。

一段,却没有引用恩格斯指出的也有“例外”的那一段,即“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等等。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既然要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就应把“照例”和“例外”引全,以免陷入片面性。另一处是,布哈林在谈到国家消亡时引证了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下述论断:“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管理职能。”但是他没有接着引下去:“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生产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由于布哈林在文中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区别问题,因此在这里不把恩格斯的论点引全,自然就引起了列宁的批评。对《反杜林论》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引文,列宁也希望能引详细点,因为这里谈到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要在一天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布哈林回答说:“我好像曾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来加强这些论点,引文的下文我知道得很清楚。但在有关各点上这几处引文所包含的意义是不会遭到曲解的。”就国家消亡这一论点而论,布哈林所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应该说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国家消亡问题是当时被机会主义者严重歪曲的一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8页。

同上书,第2卷第554页。

见同上书,第3卷第320—321页。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67页。

论点,所以列宁要求把引文引全,全面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点,避免断章取义被机会主义分子所利用,这是合理的。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全面引证和阐述,弥补了布哈林文章中的欠缺。顺便说说,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引文作了仔细核对,这似乎是列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点的开始。

由于受到列宁的批评,布哈林在10月初给列宁的信中把自己的观点归纳成三条:“据我的看法,整个第一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条无可争议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1、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组织,2、社会主义不是国家组织,3、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国家,其中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如此而已。”但列宁认为,“这些论断(1)十分笼统,远远不够具体;(第2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这并非是文章中所谈的东西!!”且不论这些论断在文章中的发挥程度,布哈林的这一简短的声明至少说明了他当时的观点,再次说明他并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之意。而这三个观点确实是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

列宁对布哈林的指责并不能归结为“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然而多年来布哈林的批评者一直把列宁的批评引申为对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连布哈林本人当时也有此误解。为此列宁在10月14日给布哈林的信中特意声明:“我们并未因此指责您散布‘谬论’或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写道:‘尚需让它成熟起来’”。可以肯定,为布哈林的这两篇文章给他戴上“无政府主义”的帽子,这不是列宁的意见。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67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41页。

同上。

不错,列宁过去曾在一封信里指责布哈林有“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是1916年3月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说的。列宁写道:“战争使他沾染了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作出伯尔尼决议的会议(1915年春)上,他提出了一个提纲(我这里有一份!)——荒谬绝伦;可耻;半无政府主义。”可见“半无政府主义”指的是布哈林1915年春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此提纲本身以及列宁的评价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半无政府主义”指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问题,实际上列宁提出这一指责时,布哈林论述帝国主义的文章最多只在酝酿之中。

列宁在1917年2月17日写给柯伦泰的信中曾指出,布哈林“每次都在这个地方栽跟斗”(原译“失足”)。有人认为,布哈林关于国家问题文章中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他栽跟斗的地方。其实不然,列宁原信是这么说的:“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了全部最低纲领(这对于布哈林是一种诱惑和危险,我们的这一位从1915年以来‘每次都在这个地方’栽跟斗!!)。”过了两天,列宁在给阿尔曼德的信中再次谈到这一点。这同列宁1916年10月14日给布哈林的信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们大家对您的评价一向是高的,几个月几个月地同您通信详谈,从1915年春天就指出,您在最低纲领和民主问题上摇摆不定,——这一点您是知道的。”这就很清楚,布哈林“栽跟斗”之处是1915年初要求取消最低纲领,直接把社会主义革命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73页。

同上书,第547页。

同上书,第550页。

同上书,第442页。

问题提上日程,而不是 1916 年底国家问题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

列宁有一个很好的作风,关心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对涉及的问题研究不够、所知不多的情况下,他是不惜花时间和精力去深入钻研的。不可否认,1916 年底在国家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布哈林对这个问题已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也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论调。而相比之下,列宁当时还来不及对国家问题做系统的探讨。所以对布哈林的观点除了发表一篇《青年国际》的短评外,主要是在不供发表的来往书信和文章批注中较为具体地谈自己的看法,但这也仅仅是些要点,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和完善。布哈林的文章显然引起了他对国家问题的重视。他在《青年国际》一文中表示,“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此后他即开始潜心研究国家问题,于 1917 年 1—2 月写了一本厚厚的读书笔记,即著名的“蓝色笔记本”,系统地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主要论述,加了重要批语,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1917 年 8—9 月,列宁利用避难的机会,写作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随着对国家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逐渐减少,而对考茨基的批评则逐渐加重。现按时间顺序考察一下。

布哈林的文章大约是 1916 年 7—8 月间寄给列宁的。列宁看过后即同《社会民主党人报 文集》编辑之一季诺维也夫通信

交换意见,认为“布哈林的文章无疑是不适用的”,拒绝在文集刊用。在另一封信里,列宁要季诺维也夫在给布哈林回信时说明,“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文章有原则性的缺陷”。

8月列宁草拟的给布哈林的复信中认为布哈林的一系列提法“极不确切”,认为“尚需让它成熟起来”。在12月发表的《青年国际》中说:布哈林的文章“犯了很大的错误”,表示打算写一篇专文。他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说明他已着手这项工作,但显然后来改变了主意,没有写成。

经过1917年初对国家问题的深入研究,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已大大缓和。他在1—2月做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有两处提到布哈林。一处指出布哈林对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引文引得不全,另一处在说到“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我们主张(a)现在利用国家,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列宁接着在括号内指出,“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笔记对考茨基的错误极为注意,对他的几本著作作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列宁一方面指出,布哈林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考茨基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过,从实质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更接近于真理。”1917年2月17、19日,列宁接连写信给柯伦泰和阿尔曼德,表示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11页。此处俄文原译“绝对不行”,不确切。

同上书,第420页。

同上书,第31卷第127—129页。

同上书,第156页。

同上书,第157页。

的文章。他说,同布哈林比起来,此文更多、更尖锐地反对的是考茨基,重申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于真理。这时候列宁已把布哈林的错误看作“小错误”,他写道:最好能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4辑,“把布哈林的文章、我对他的小错误所作的分析以及我对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大肆歪曲和庸俗化的情况所作的分析发表出来。”

把考茨基同布哈林作一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对考茨基的一些著作作了评论,指出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中“没有谈到‘打碎官僚军事机器’的任务,没有谈到‘消灭国家’,甚至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同‘对国家的迷信’作斗争”。相比之下,这一点布哈林都谈到了:打碎或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敌视帝国主义国家,反对国家观念的根蒂等等。尽管用语不那么准确,对有些问题论述的不够全面或没有深入展开,但不管怎么说,这至少证明列宁所说的“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从以上分析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起初对批判国家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看得较重,因而对布哈林文章中在这方面的“缺陷”也就看得比较严重,但是随着列宁本人对国家问题的深入研究,随着对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深入考察,列宁后来显然把批判的重心转向考茨基主义了。

1917年7—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列宁已转入地下,没能出席,参加大会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见到布哈林时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您,在国家问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47、550页。

同上书,第31卷第205、209页。

题上他现在和您没有意见分歧了。”请注意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份,她既是列宁夫人,又是实际上的秘书,流亡国外期间列宁的好多通信是由她处理的,有些信是由她代笔的,不得到列宁的授权,她是不可能代表列宁说话的。其次,同布哈林的争论她是参与的,知情的。1916年10月初布哈林在给列宁的信中曾抱怨说:“现在来谈谈倒霉的文章。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引注)写信给我谈第一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引注)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即第二章,您把两者综合在一起……”可以断定,她代表列宁所作的声明是权威的,不是见面的客气话。1925年布哈林引用她的话时,她没有提出异议;1929年斯大林重提此话时,她也没有否认,而斯大林对此语的真实性也没有否认,而只是作了另一种解释:“很可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真的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

可以说明消除分歧的直接证明是列宁于同年7—9月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此书以及为此书而写的提纲、纲要中都不再提布哈林的名字了。关于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差别,列宁只作正面阐述,没有提布哈林,更重要的是在谈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时也用了“炸毁”的提法。

至此可以说,1916年下半年开始的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业已消除,它不是以一方驳倒另一方达到的,而是通过互相启发和

《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5页。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页。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71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2页。

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而取得认识上的一致的。

公案余波

本来问题可以就此结束,但是后人在评论这段历史时往往把布哈林后来的观点以至和列宁的分歧同 1916 年的分歧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必须再往下考察几个问题。

1918 年初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列宁发生严重分歧,主要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但也涉及国内经济建设方针。1918 年 4 月 20 日出版的《共产主义者》杂志第 1 期发表了布哈林的一篇关于列宁《国家与革命》的书评。书评虽然赞扬了列宁的著作,但列宁却不满意。他认为,“这个书评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这段话常常被引用来证明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继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共产主义。因此很有必要查明列宁所说的“过去”和“未来”指的是什么。“过去”很清楚指的是“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关,列宁说,这一点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18 年 2 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说明,从理论到实践在“炸毁”问题上列宁和布哈林的分歧已消除。列宁所说的布哈林“面向过去”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分歧消除的佐证。那么分歧还有没有?有的,但那是新产生的分歧,是对“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这明天的任务是什么呢?从列宁在文末所引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引文可以看出,是指纪律、强制、统计和监督。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 年 4 月 29 日)》中也是这样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292—293 页。

说的：布哈林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我们应该前进，不要往后看，而要向前看，要建立公社国家。他（布哈林。——引注）所写的都是已经在苏维埃组织中体现了的东西，而对计算、监督、纪律却一字未提。”这不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具体任务之一——计算、监督、纪律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分歧。说“可能”是因为“一字不提”，“保持沉默”只说明他忽视或轻视这一任务，而不一定反对。有同志把“明天的任务”说成是“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所阐明的任务”，是缺乏根据的。

布哈林的这篇书评并不长，总共才 1700 字左右，其中心内容是批判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歪曲和修正，强调“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不是“某种全民组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没有任何国家”，不能把“未来国家”作为理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以便最终扼杀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有各种装饰的议会共和国，而是公社国家”；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摧毁、打碎、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资产阶级国家做斗争直至将其摧毁，敌视它，把它看作主要的压迫工具”。布哈林认为，上述几点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即共产党人同机会主义的社会叛徒之间的基本区别点”。

从以上所引布哈林的议论可以看出，他谈到了摧毁、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时也反复强调过渡时期必须有无产阶级专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244 页。

见《兰州学刊》1982 年第 2 期第 102—103 页，周耀明的文章；《世界历史》1981 年第 6 期第 88 页，王炳煜等的文章。

《共产主义者》杂志俄文版 1918 年第 1 期第 10 页。

政。布哈林过去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时也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的这篇书评重点在于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因此没有谈到诸如计算、监督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是可以理解的,在不到两千字的短文中要面面俱到恐怕也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主义者》第2期上布哈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政府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文章,阐述科学共产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文章指出,两者的分歧之一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问题”。布哈林写道:“在资本主义和‘未来制度’之间横亘着整整一个阶级搏斗的时期,根除资产阶级社会残余的时期,击退虽已被推翻,但还在暴乱的资产阶级进攻的时期。”为进行这种斗争,无产阶级需要组织,“这种暂时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工人政府、工人专政”。“作为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必须维持统治者的地位,直到把其他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过来为止。到那时——只有到那时,无产阶级才会解散自己的国家组织,国家才会‘消亡’。”

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后布哈林一如既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上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了计算和监督的必要性。布哈林谈到,要从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剥夺剥夺者”就不应当是简单地瓜分剥夺所得,这种简单的瓜分还会制造出新的富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社会-合作地使用剥夺来的生产资料”。俄国面临的困难的原因不仅是生产力的直接破坏,还在于全部经济机关的瓦解。“因此工人现在应比任何时候更关心对所剥夺来的生产资

料、房产，征收来的消费品等等的严格计算和监督”。

此文发表在列宁批评之前。《共产主义者》第2期是4月27日出版的，而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写于5月5日。列宁批评布哈林自有其道理，但后人评价布哈林的观点时也不能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为依据，还得看看布哈林本人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计算、监督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估计很高，认为经济发展到今天，管理一个国家无非是计算和监督而已。然而，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此在俄国仅靠计算和监督来管理显然是不行的。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已把运用市场机制提到了首位。因此，即使在计算和监督问题上，布哈林同列宁如果说有分歧的话，也是在一个具体任务问题上的分歧，何况在一篇短文中“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并不见得就是反对这一点。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的一段话，有同志认为是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

“社会化”是一个含义不十分明确的概念，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试图对这个名词的概念做一些解释。他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集中起来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杠杆完成的。借以完成这一过渡的措施的体系通常是用‘社会化’这个名词来表示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生产的社会化。过渡时期的社会化指的不是这种社会化，而首先指的是剥夺剥夺者，所以布哈林说：“社会化指的

《共产主义者》1918年第2期第13—14页。

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第88页。

是把生产资料转入社会之手。”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剥夺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转入全社会之手,而是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以社会化一词仍有“某种不确切之处”。他进一步说明:“然而,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样也就给‘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按照布哈林的意思,到阶级差别完全消失,生产资料就完全归全社会所有,社会化就完全实现了。列宁在布哈林的这最后一句话旁边批道:“??丝毫没有。‘给’混淆一个人的生的‘过程’和死的‘过程’找到了根据”。列宁指的应该是布哈林论证上的缺陷。在当时的用语中社会化往往等于国有化,其直接含义就是剥夺、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1918年底,列宁曾经指出,应把社会化理解为“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并由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可见,按列宁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措施,现在布哈林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阶级的消灭来为“社会化”寻找根据,列宁认为,这是混淆了生与死的过程。但从这里得不出“实质上也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过渡时期的国家”的结论。一本理论探讨的著作,谈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趋势,谈了过渡时期的发展趋势,以至于谈了阶级消灭和国家的消亡,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了国家的消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3—94页。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01页。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461页。

阶段,能因此给他们戴上什么“国家取消论”、“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的帽子么?何况布哈林这本书的任务本来就是探讨过渡时期的发展规律的。还应该看到,严格地说,国有化和社会化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作为经济学家的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之初,看到并提出两者的区别问题这恰恰是他的功绩。

1925年《法的革命》文集第1辑首次发表了布哈林《论帝国主义国家》一文,布哈林为该文写了一个题注,介绍他写这篇文章及其他几篇同样性质的文章的经过,然后写道:“弗·伊·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上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13卷)。读者可以很容易看出,我并没有犯那个加之于我的错误,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不正确地对待了关于‘炸毁’国家(自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把这一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问题上了。”从我们前面的述评可以看出,布哈林的说法是符合他写文章时的历史情况的,并无“教训”甚至“反对”列宁之意。相反地,布哈林在援引克鲁普斯卡娅传达的列宁的话之后,高度评价了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布哈林说,列宁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反对列宁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评价来的!

见《法的革命》1925年第1辑第5页。

十月革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贡献是肯定的。

1924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2卷为1917年2月17日列宁给柯伦泰的信作注说：

“布哈林用 Nota Bene 的笔名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发表国家问题的文章，文章批判了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公认的’，而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篇文章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研究这一问题。”192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重申了布哈林在促使列宁研究国家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布哈林的著作促进列宁从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有重大价值的深入研究。”

对以上说法，在1929年以前未见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更没有被看作是什么“反对列宁”的行为。直至1929年春在联共（布）反“右倾集团”的斗争中，才重翻这笔历史老帐，目的是要证明，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但其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已经看到，所谓“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这一论断不是列宁下的，说布哈林“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断言“‘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则是错误的。要用布哈林1916年关于国家的观点来说明1929年布哈林的“一大堆错误”的根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布哈林喜欢在理论上钻研问题，列宁曾称赞他说：“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

《列宁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4年第1版第2卷第284页。

《苏联大百科全书》1927年第1版第8卷第284页。

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由于本章主要介绍他同列宁的分歧以及分歧的消除,因而未能全面介绍他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是在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考察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但是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国家问题的迫切意义是敏感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遭到粗暴歪曲的情况下,他首先埋头钻研,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批判社会爱国主义,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敏感和理论勇气,这不是他的短处或弱点,恰恰是他的长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列宁生前,常用的是“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称呼本身说明,它是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创造。在列宁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通过交换意见,甚至相互批评,最后统一思想,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它促进了列宁主义的发展。在这里随意戴上“路线斗争”、“反对列宁”之类的帽子显然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国家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在探讨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时交换意见,互相启发,然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入钻研消除分歧。列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探索中吸取前人的成果,纠正前人的缺陷,批判错误的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终于写出了像《国家与革命》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巨著。

战争与和平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

苏维埃政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诞生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用以动员广大群众投入革命斗争并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和平是首位的，只有实现了和平，广大身着军装的农民才有可能复员回乡，耕种分给他的土地，才可能供给全国以充分的面包。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通过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这并不是偶然的。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和平法令》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显然，需要和平，

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艰难的和平历程

《和平法令》通过后,苏维埃政府即采取措施同有关国家接触。和谈的建议遭到英、法等国的拒绝,于是苏维埃政府决定同德、奥等国进行谈判。谈判于12月3日在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俄方代表团团长是越飞。德方团长是屈尔曼。12月5日签订了为期10天的休战协定,15日又签订了28天的停战协定。12月22日起开始正式的和平谈判。俄方根据《和平法令》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签订不割地不赔款、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公正和约。德方代表表面上表示可以接受这一建议,但声称只有在所有交战国都遵守这一原则的条件下,德方才能接受,实际上拒绝了俄方的建议。12月28日,苏俄代表团建议中止谈判10天,以进一步了解协约国的态度。30日苏俄政府再次敦促英、法、美等国参加谈判,但仍遭拒绝。

1918年1月9日苏俄政府改派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任首席代表,与德方恢复和谈。这时德方首席代表也改由霍夫曼将军担任。托洛茨基奉行的方针是拖延谈判,以等待西方爆发革命。这是得到中央同意的方针。1月18日德方提出苛刻的条件,希图夺取前沙俄帝国的大片领土,并把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3国变成德国的附属国。这是直接违背《和平法令》规定的原则的,因而它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但列宁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认为,必须不惜代价地立即签订和约,以保存苏维埃政权。

这样列宁就面临两方面的艰苦斗争——既同德帝国主义的侵略兼并野心作斗争,又要同党内的左倾激进主义作斗争,使自

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央多数人的支持。

1918年1月21日党中央召开会议,列宁宣读了他的《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参加会议的约有60人。会议表决结果是: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得32票,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得16票,列宁得15票。继续对德作战的主张占了上风。1月24日中央继续讨论和约问题。由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转而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结果会议通过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列宁的提案:“千方百计地拖延和约的签订”(12票对1票);另一个是托洛茨基的提案:“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复员军队”(9票对7票)。1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举行联席会议,一部分出席者提出了“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主张,另一部分人坚持宣布神圣的革命战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决定,建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提法。2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党有各派代表参加的中央会议上以多数票(9比5)否决了当前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可能性。

列宁曾同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就坚持拖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再让步。由于列宁主和的意见没有在中央取得多数,所以两人只能有一个没有约束力的“约定”。

2月9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和德方单独签订和约。根据条约,德国取得乌克兰的粮食、煤炭和其他原料,而拉达从德方取得军事援助。得到乌克兰的支持后,德方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73页。

同上书,第283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7页。

要求按德方的条件签署和约。10日在布列斯特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声明说,“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我们的庄稼汉士兵要回到自己的耕地。我们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场,以便在那里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设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让德奥帝国主义“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同时声明,复员全部军队。俄代表团随后离开了布列斯特。

2月16日德军事指挥部正式通知中止停战。2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德军进攻问题。列宁建议重开谈判,以5票赞成,6票反对被否决。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定:在德军进攻和进攻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弄清楚以前,不恢复谈判。2月18日德军全线恢复军事行动。这一天中央开了两次会议。在上午的会议上,列宁要求通电德方,同意立即缔结和约。列宁认为,现在一小时也不能再浪费了。托洛茨基要求看看德国人民的反应,而布哈林则表示,对方情况不明,德国人有可能仅仅是进行恫吓。他们反对发出建议和谈的电报。列宁的建议以6票赞成,7票反对被否决。由于形势紧急,当晚又举行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了两次表决:1、是否马上向德国政府建议立即缔结和约?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2、愿意在旧的条件上签字,但声明不拒绝更苛刻的建议。7票赞成,4票反对,2票弃权。

《第七次代表大会。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44—24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197—205页。

18—24 日德军继续进攻,先后占领了德文斯克、明斯克等 10 个城市,直接威逼首都彼得格勒。

原先,和约问题上的争论只在党内进行。21 日列宁发表《论革命空谈》的文章,不点名地公开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鼓吹革命战争的种种论据,同时发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中”的警告,号召保卫共和国。

22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开会,讨论是否接受英、法的援助问题。当时英、法提出协助苏俄与德国作战的建议,在讨论中布哈林认为,“这是协约国把俄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的计划”,“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建议,无论如何不与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缔结购买武器和利用所提供的军官与工程师的协定。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接受这种援助。托洛茨基说,如果我们要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就应该利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列宁在缺席的情况下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说“我赞成接受英、法帝国主义强盗的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的一票也算进去”。在这次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正式声明。布哈林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并辞去《真理报》编辑的职务”。

2 月 23 日 10 时,收到德军的复电,它提出最后通牒,条件也更苛刻了。根据新的条件,苏俄要丧失波罗的海沿岸的全部土地和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要把卡尔斯、巴士姆、阿尔达干让给土耳其,立即全面复员军队,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出军队,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德国政府限 48 小时内接受条件,立即派全权代表到布列斯特,于 3 日内签署和约。

23 日的中央会议就是在这种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召开的。

会议一开始,列宁就提出,“革命空谈的政策必须结束。如果这种政策现在还继续下去,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列宁强调,他是认真的,提出最后通牒,就不想收回。在这次会上,布哈林没有多发言,而是洛莫夫等出面维护革命战争的主张。斯大林主张不签字,但开始和平谈判,受到列宁的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起了变化,鉴于列宁的最后通牒,他认为在党内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革命战争的。因此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他和他的支持者投了弃权票。这样,列宁的建议终于以 7 票赞成、4 票反对、4 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获得通过。当时与会者共 19 人,其中 15 人有表决权。这就是说,列宁的得票仍然没有过半数,但毕竟得到了通过!这里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克列斯廷斯基、越飞和捷尔任斯基也声明说,只有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担当得起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他们投了弃权票。

表决后乌里茨基代表中央委员布哈林、洛莫夫、布勃诺夫和候补中央委员雅可夫列娃以及列席的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发表声明,认为“已经通过的决议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来说是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是极端有害的,因此我们不愿对它负责,特别是这个决议是由中央委员会的少数通过的,因为从弃权者所申述的理由来看,他们是赞成我们的立场的,因此我们声明,辞去党和苏维埃的一切负责职务,保留自己在党内和党外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并保留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立场”。

2 月 24 日苏俄政府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3 月 3 日,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

为最后解决和约问题,1918 年 3 月 6—8 日在彼得格勒召

开了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布哈林作了副报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以 30 票对 12 票(4 票弃权),批准了列宁的和谈路线。

3 月 14—15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紧急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

共识与分歧

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无疑是布尔什维克党迄今为止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决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的一场斗争。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之一”。然而,尖锐的争论却没有导致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万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结局?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时出现的分歧不是根本理论上的分歧。

最初提出和谈的建议的时候,全党有一个共识,未来的和平应当是公正的和平。当时《和平法令》要求,“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列宁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对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将予以考虑,但并不是说就予以接受。对这样的纲领主张,布尔什维克全党并没有异议,大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11 页。

同上书,第 33 卷第 9 页。

同上书,第 33 卷第 12 页。

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可见分歧在于对一个屈辱的割地赔款的和约是否要签字。

在和谈的初期还有一个共识,即充分利用谈判进行政治宣传,为此尽量拖延谈判,不急于签字画押。列宁曾充分肯定了托洛茨基在谈判前期的拖延策略。他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把托洛茨基活动的两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这时候的“不战不和”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列宁认为,当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我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

十月革命时期,有一条全党公认的理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可以先开始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俄国革命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才能保持这个政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观点往往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而遭到批判。实际上,这是包括列宁在内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所公认的原理。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宁反复申明一个真理:“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在这一点上当时全党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在对什么时候欧洲会爆发革命的估计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布哈林等人认为,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革命马上就能爆发,德国的无产阶级能很快给革命的俄国以支援。和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同,列宁认为欧洲的革命爆发尚需时日,按照他的估计,大约需要3—4个月,“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么,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在半年内发生。看来,这是当时估计的极限。请看列宁的“总的结论”：“如果最近三个月到半年德国发生革命,那么,尽管有革命战争的重压,我们也能打赢。如果再晚一些发生革命,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将要推翻我们的政权,把政权交给冒险家,而冒险家会去签订更加不利的兼并性和约。”即使德国革命有可能在几天几周内发生,也不能把当前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他说:“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近期内,即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短时间内开始,就拿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8—9页。

见同上书,第33卷第253页。

同上书,第33卷第458页。

同上书,第34卷第13页。

险。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冒险”。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列宁的策略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1918年1月21日列宁对和约问题的提纲做了一个补充：鉴于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罢工，柏林和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月18—29日柏林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列宁承认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因此认为，“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推迟和拖延和平谈判”。列宁的基本主张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为等待国际革命而退却。可以说，双方对欧洲革命的估计是一百步同五十步之差，但由此得出的策略结论却有天壤之别。

各派的分歧是策略上的分歧，是对形势的估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策略上的分歧。

布哈林认为，既然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国际革命，那么出路就在于革命战争。“唯一的前景，唯一可能和必然的前景是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具有国内战争性质的战争”。他在俄共七大的副报告中认为，“俄国革命或者是扩展开来，或者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灭亡”。他认为，主和派对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估计不足，这很像十月革命前夕党内一部分人（指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反对起义者）对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那样。我们的全部社会力量现在还没有用尽，还没有把庄稼汉发动起来去对付德国人。这个估计同列宁的估计大相径庭。列宁并不一般地反对革命战争，相反地，他认为现在就应该准备革命战争。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53页。

同上书，第33卷第255页。

同上书，第34卷第84页。

1918年2月18日晚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见《我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202页。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马上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打仗必须有军队,而当时遗留下来的俄国旧军队已完全丧失战斗力,在德国军队面前望风而逃,甚至连破坏遗留的武器装备都做不到。正因为这样,当时党内一致认为旧军队必须复员。而没有军队却高喊革命战争,这就是革命空谈。空谈误国,由于这种情绪占了上风,贻误了和约签订的有利时机,致使最后签订的和约条件更为苛刻。

左派共产主义者中还有人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奥新斯基就曾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军“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只要德军胆敢进攻,德国工人阶级就会起来造反,从而激起欧洲的革命。布哈林略有不同,他并不否认德国人进攻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如果德国人进攻,那就会激起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起来保卫祖国,保卫土地和家园。他认为,列宁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捷尔任斯基说得很清楚,“列宁同志隐蔽地干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里所干的事情”。

签订和约的必要性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土崩瓦解,不可能进行任何战争。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复员,然后新的基础上组织红军,进行卫国战争。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喘息的时机,以便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忙于战争之际,在国内整顿经济,组织红军,脚踏实地地准备革命战争。列宁一直在谋求几个月的喘息时机。他写道:“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使社会主义政府得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3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172页。

组织工作。”俄国需要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在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然而,对利用喘息时机的可能性,布哈林表示怀疑。他认为,几天的喘息时机是不值得去争取的,因为在短短的几天里什么也做不成。这种喘息时机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因为无论是整修铁路,整顿运输,整顿经济,还是对居民进行射击训练,在几天之内都是办不到的。“这样的工作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几个月的时间,无论是霍夫曼将军还是李卜克内西都不会给予我们”。布哈林认为,所谓喘息时机是“幻想的东西,而这种幻想的东西倒确实可以认为是空谈,而且远不是革命的空谈”。如果根据这种现实不存在的前景来解决问题,那就会有遭到最严重的打击的危险。

可以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和约,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能不能同帝国主义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1918年2月3日(俄历1月21日)党中央和各派代表协商会议上曾对10个问题进行表决,其涉及的问题颇有意思。表决结果分为4组:第1组是主和派,共6人。第2组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洛莫夫、克列斯廷斯基、布勃诺夫、柯秀尔、布哈林、乌里茨基)。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48页。

同上书,第33卷第254页。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4页。

第3组是奥新斯基和斯图科夫。第4组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蓬德和费尼格施泰因。尽管布哈林、乌里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提前早退,没有参加投票,但各派的观点还是很清楚的。对这10个问题的表决结果如下:1、一般说来,是否容许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媾和?在参加投票的14人中有12人赞成。2、现在是否容许同德国签订兼并性的和约?除主和派的5人外,都投反对票。3、是否拖延和谈?多数赞同,2人反对,1人弃权。4、是否把和谈拖延到德国人破坏为止?第1、2组和第4组(1人弃权)赞成,第3组反对。5、是否立即中断谈判?除1人赞成,其他均表示反对中断。6、在德国人破坏谈判和提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是否容许签订对德割地和约?第1、2、4组赞成,第3组反对。7、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签订和约?赞成的只有第1组,第2、4组弃权,第3组反对。8、如果屈尔曼在德国内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同意我国代表团最初的条件,是否需要签订和约?同上一个问题一样,只有第1组赞成签订,第2组弃权,第3、4组反对(1票弃权)。9、是否需要创建红军?全体赞成。10、是否容许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经济协定?第1、2、4组赞成,第3组反对。从以上表决情况可以看出,列宁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签订兼并性的和约。极左派是第3组。

在2月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对8个问题进行表决。这时德国人已经提出了最后通牒,因此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立即向德国提议举行新的谈判,签订和约。共有11人与会,这一次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投票。上述问题以5票赞成、6票反对被否决,他两人都投了反对票。第2个问题是:主

张革命战争。结果没有人说赞成。布哈林等 3 人拒绝参加这种提法的表决。除 1 票反对,都主张一旦德国开始进攻,就全力抵抗。布哈林等 6 票主张在德国进攻充分表现出来和这一进攻对工人的影响显露出来之前,不恢复和谈。但也没有人主张宣布恢复战争状态,布哈林、列宁和洛莫夫在这一问题上弃权。同上次会议一样,全体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原则上允许同帝国主义德国签订和约。如果德国的进攻成为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又未到来,是否缔结和约?对这一问题,布哈林等 4 人弃权,托洛茨基和列宁等 6 人投了赞成票。

从以上两次会议的表决情况可以看出布哈林和他那一派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也允许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经济协定,但不能签订兼并性的和约。他们同意拖延谈判,直到德方破坏并提出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允许同德国签订兼并性的和约,但对是否签订问题,他们弃权,实际上是不表赞同。这就使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的立场。布哈林在 1 月 24 日(俄历 11 日)的会议上表示,“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最正确的”布哈林反对一般地提“主张革命战争”,不赞成这种提法。但是,很明显,在媾和与战争之间,他选择的是革命战争。布哈林派虽然不反对同帝国主义媾和,但是他们坚决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认为在敌人的威逼下签订和约是不战而降,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月 22 日布哈林等几个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向中央委员会递交声明,反对中央通过的媾和决定,声称在无产阶级敌人的初次逼攻下,就同意签订和约,“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 194—195 页。

同上书,第 169 页。

国际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它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软弱无力,从而使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受到打击,而在西欧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刻,这种打击就显得更为严重,并且使俄国革命脱离了国际运动”。他们声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最后的堡垒以后,在无产阶级面前必然会提出把国内战争推到国际范围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在任何危险面前都不能止步不前。放弃这个任务就会使它由于内部瓦解而灭亡,就等于自杀。”而莫斯科区域局在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更把这个论点推向极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签订可耻的和约就是“面对着未来的国际革命现在就放弃我们的阵地,并意味着作为这一革命的先锋队的我们的党必然灭亡”。反对不战而降是当时领导层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和想法,除左派共产主义者外,托洛茨基也持这种立场。他们的估计是,群众中存在进行革命战争潜力,应当发动他们投入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其次,他们认为,如果不战而降,西方的无产阶级不会理解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屈辱的和约,而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同帝国主义德国相互勾结的阴谋。只有对德国的进攻进行抵抗,用事实表明确实无力作战而不得不签订兼并性的和约,国际无产阶级才会有所理解。因此,托洛茨基直到最后时刻一直坚持不战不和的立场,而布哈林在眼见革命战争

《第七次代表大会。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22—224页。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1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182页。

策略行不通的时候,也转过来支持不战不和的主张。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副报告中对签订和约的利弊作了分析,他认为,和约唯一有利的将是得到喘息的时机,然而,几天的喘息时机是无济于事的。和约使我们失去了组织力量的条件,因为它割去我们的乌克兰,夺走顿巴斯,使我们失去工业的原料、粮食和煤,失去一半的居民。它使我们放弃最锐利的武器——国际宣传和国际革命。最后,它迫使我们放弃民族自决权。布哈林的结论是,“有利方面最多不过是得到几天的喘息时机,不利方面是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我们得到的不是喘息时机,而是破坏自身的实质,我们毁灭自己,使自己不再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他坚持认为,出路在于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他说,如果认为革命战争根本不可能,那么我们的所有运动,所有事业就应当完蛋,就应当说,我们没有任何前途了,“就应当给自己系上兜肚,躺在热炕上睡懒觉了”。

其实,列宁为自己的立场所作的辩护并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完全出于现实的策略考虑。他为签订和约所做的辩护,依据的是浅显的道理。第一,苏维埃政权没有军队,而没有军队就谈不上任何战争。其次,列宁并不讳言这是一种投降。他说,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别情况,“因为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放弃战斗也可以叫作投降,但是这样的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应该做的”。第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当支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需首先保住已经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第四,退却是暂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34—38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3 卷第 389 页。

时的,是用空间去换取时间。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应该在实际上退却,让出领土,以便赢得时间”。列宁多次举德国当年同拿破仑签订的蒂尔西特和约作为例子,说明“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苏维埃国家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

由于列宁的耐心的争取说服工作,也由于在紧急关头列宁以自己的威望为王牌,提出辞职的最后通牒,他的缔结和约的主张得到了通过,在危急关头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拖延了和约的签订,最后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政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德国人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要价。苏俄丧失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约 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必须复员全部军队,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等等。

毫无疑问,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它给苏维埃国家带来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是必须看到,这决非布哈林个人罪过,而是当时在党内占多数的一种左倾激进主义的表现。以往史书都据此指责布哈林搞派别分裂活动,这并不符合实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哈林派的观点是中央多数的观点,即中央的正式观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18 年 2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上以 7 票赞成、4 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列宁的主张为止。因此从组织纪律上讲,根本谈不上派别活动问题。倒是列宁尽管长期处于少数地位,仍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不顾多数的反对,不断地向中央提出媾和问题,要求中央改变错误的决定。即使通过列宁的主张之后,布哈林所采取的做法,如退出中央委员会、退出《真理报》编辑部,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副报告,等等。也没有违背当时通行的组织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31 页。

同上书,第 19 页。

原则。正因为列宁起初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在媾和问题上发号施令。例如,他同托洛茨基只能“约定”,一旦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就签订条约。从后果来说,托洛茨基不签字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说他违抗列宁的“指示”或“命令”。这里不存在谁指示谁的问题。后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指责布哈林搞派别活动,那是因为这时列宁已成了多数!即使这样,列宁也不认为可以用简单的纪律来解决问题。他在代表大会上指出:“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的。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说一点。在1918年2月23日的中央会议上洛莫夫曾问列宁:“是否允许进行反对签订和约的隐蔽的或公开的鼓动?”列宁作了肯定的回答。24日的中央会议又谈到辞职和鼓动自由的问题。克列斯廷斯基提出一个决议案:“中央建议递交声明的同志暂且留在原位,不承担政治责任,在党内、在报刊和社会上有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完全自由。”此决议得到全体赞同。托洛茨基也提出一个建议:“鉴于在4位中央委员辞去所负的政治职务之后,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不是业已形成的局势的结果,且不会有成为党内分裂的出发点的危险,中央委员会建议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保留他们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自由鼓动的权利。”这个建议得到全体赞同。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页。

同上书,第33卷第381—38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211—21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第219—227页。

在不担任党内外的职务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不仅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采取进行反对中央决定的行动,这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生活的惯例。列宁本人就这样做过。1917年8—9月间列宁曾多次建议,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然而由于当时中央对列宁的建议不理解,因此久久不予置理。9月29日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声明:“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列宁这里说的是进行武装起义的鼓动,而这是当时的中央尚未作出决定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尖锐斗争的形势下,会允许有反对签订和约的鼓动自由。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论上党内并没有根本分歧。列宁和布哈林的分歧也不像后来史书所描绘的那样严重。列宁在七大上宣布,“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列宁也从没有怀疑布哈林的动机,而是说他“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进了那间屋子”。

一个神话

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故事值得一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引证1938年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材料写道:“审判证实:布哈林及其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当时策划过反苏维埃政府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78页。

同上书,第34卷第24页。

同上书,第33卷第435页。

的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曾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新政府。”

深查起来出人意料,这段神话的始作俑者竟是布哈林本人! 1923年底,布哈林可以说是狂热地投入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之中。为了以亲身经历揭示托洛茨基派别斗争的危害,1923年12月初布哈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由于党内斗争极其激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建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一起逮捕列宁,以进行革命战争。这个讲话没有正式发表过,但当时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分别引用过。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当时已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图科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12月11日的讲话中是这样引用的: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一个正式建议”,要逮捕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打算任命皮达可夫为主席。他引布哈林的话说,“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志愤怒地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可以看出,这两人的转述已经开始变了样。当时显然没有到“公然说要撤换”的程度。

布哈林讲述的历史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之一皮达可夫以及当时的几名左派共产主义者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认为“事情被描述得面目全非”,有必要予以澄清。据他们说,在塔夫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页。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10页。

利达宫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列宁正在做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报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可夫走到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的跟前。“在谈话时——这次谈话不仅不是什么正式的谈判，而且甚至不是事先认真进行互相试探的谈话，卡姆可夫只不过是半开玩笑地说：

‘喂，如果你们在党内取得了多数，你们打算怎么办呀？列宁准会离开，那时就只好由我们和你们来组成新人民委员会。我认为，那时可以选皮达可夫同志当人民委员会主席。’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卡姆可夫的原话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记忆尽可能真实地追述的，并且当时参加谈话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严重的意义。当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不仅’没有被愤怒地拒绝，而且根本就没有被拒绝，因为没有讨论过，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任何建议。”这一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没有提到什么逮捕或推翻人民委员会的事”。

第二件事是在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到乌克兰去之后。一天拉狄克到邮电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那里发电报。“普罗相笑着对拉狄克同志说：‘你们还在写决议案。要是把列宁逮捕一昼夜，对德国人宣战，然后再一致选举列宁同志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岂不更省事。’”⁸这个‘建议’仍旧不仅没有被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没有被讨论过，只不过是普罗相的一个十分离奇古怪和滑稽可笑的幻想而已。”1918年还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之前，当列宁为普罗相写悼词的时候，拉狄克曾向列宁谈及此事，“当时列宁同志对这个‘计划’置之一笑”。

《真理报》1924年1月3日。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9页。

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还刊登了布哈林本人的声明,说他要强调的是当时“派别斗争如此尖锐,以致左派革命党人敢于向我们提出这一类建议”。但是“我没有讲过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任何联盟”。他认为,至于说列宁同志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计划“置之一笑”,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记得,他们提建议是在斯莫尔尼,而不是在塔夫利达宫。事情仅仅相隔5年,而当事人的记忆相差如此之大,可以想见,当时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

从各方的叙述看,可以得出这样的大致印象。1918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争论正酣之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确实曾有意无意地提出过更换政府的建议,但左派共产主义者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建议,也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会认真看待此类建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布哈林等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反对列宁为首的政府的联盟。这本来就是一桩无头公案,它由党内斗争引发,也因党内斗争而提起。布哈林的本意是想以自己的经历告戒全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坦率过于天真,反而落下话柄,成了招致杀身之祸的罪名之一。但不管怎么说,被列宁叫做“软蜡”的布哈林竟然会勾结其他党派,阴谋逮捕政府成员,杀害列宁,这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至于在“杀害”名单上会有斯大林的名字,那显然夸大了斯大林当时的地位了。

过渡时期

经济的最初探索

1918年夏至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政策，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后来列宁在总结教训时命名的。

先说一下军事共产主义的译名。军事共产主义()亦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加上一个时间概念，削弱了军事手段、军事方式的概念。然而军事共产主义所包含的概念首先是用军事强制的方法在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而这种军事强制的直接过渡的方法在国内战争即战时状态结束之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查 的语义：1、同战争有关的，2、同军事有关的，3、同军务有关的，4、军人。严格讲，“战时”的俄语应是

。鉴于“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列宁事后总结教训时提出的用语,其覆盖的范围包括战时和战后(尽管时间不长)两个时期,译作“战时共产主义”不够确切,所以我主张译作“军事共产主义”。30年代起斯大林实行的也是这种主义,它不属于战时,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军事强制性性质,在这里叫做“军事共产主义”显然要贴切得多。

我们能看到的军事共产主义文献并不多。列宁的这一时期的某些著作当然反映了这一政策。然而最典型地、集中地表现了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是布哈林的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在1919年10月完成的《共产主义ABC》,另一本是1920年5月问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这两本著作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ABC》是专门阐述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的,目的是为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提供一本通俗的教材,作为“党校必读的教科书”,也供想了解党纲的工人和农民自学之用。这是对党的纲领的解释,因此这本书严格按照党纲的内容展开,文字通俗易懂。《过渡时期经济学》就不同了。此书也许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第一本探讨过渡时期规律的专著,其中所表达的完全是布哈林本人的观点,“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其表述方式有些地方就像“代数公式”一样。这就不可能做到通俗易懂了。个别地方甚至深奥难懂,为此列宁在书批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例如第五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因此,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更新,在社会主义格式下工业的复兴,是较为迅速地使农村卷入组织化过程的必要条件。”

列宁把“格式”两字框出,并在句旁嘲笑道:“哈,哈,哈!!极

不正确的术语！越深奥，理论上就越不正确。”列宁在“总的评论”中甚至模仿布哈林的用语，用了一个“愈聪明”（基础）这样一个“可笑的、学究式的词”来批评他乱用波格丹诺夫的术语：“他不想一想，波格丹诺夫这些术语及其含义是以他的哲学，即唯心主义的和折中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

不过在总体上列宁给了这两本书以极高的评价。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满意地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已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对它作了极好的解释。”在给《过渡时期经济学》作的“科学院的评价”中，称赞“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祝贺它的院士写了一部辉煌巨著”。列宁写评价时用的是戏谑的口吻，但其内容是严肃认真的，它表达了列宁的看法。

这两本书流传甚广，曾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过译本。《共产主义 ABC》在 1926 年就有中文版问世，成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党校的教材，使年青的共产党人学到了不少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过渡时期经济学》仅在 1930 年就出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本。苏联著名历史学家 B. 达尼洛夫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完全可以看作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辩护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马克思列宁主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69 页；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291 页。此书译文为：“愈聪明，理论上就愈不正确。”按俄文为愈聪明，是深奥难懂之意，译作“聪明”显然不对，使列宁的批语本身也变得莫名其妙了。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320 页。

同上书，第 40 卷第 155 页。

同上书，第 60 卷第 321 页。

义中就包括布哈林的这两部著作。

对这样两本著作显然不可以用“军事共产主义经典”一语予以全盘否定,而应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给以全面的评价,看看哪些属于传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哪些是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不是布哈林本人特有的思想,而是当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出现既是当时俄国特殊形势的产物,也是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继续。

《过渡时期经济学》同列宁有一种不解之缘。布哈林在书的扉页上写有一个中文版上所没有的献词:

“献给伟大的思想和行动的革命家、我热爱的导师、同志和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祝贺他 50 寿辰。作者。”

也许正因为书是献给列宁的,所以列宁很快就在当月(5月)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和评论。5月31日分两次在书的最后写下了“总的评论”和“科学院的评价”。在这些评点中有对某些论点,甚至整章交口称好的,也有指出不足之处以至严厉批评的。列宁所作的个别批点甚至超出书批的范围,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例如,布哈林在第3章中写道:

“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

列宁批道:“# 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列宁的这一论断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作了发挥并得到了发展。

从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点中可以看出,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81—282页。

列宁最不满意的是布哈林在书中大量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和概念，认为这是“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因此，作者就很经常地，甚至非常经常地陷入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玩弄术语的烦琐哲学（按其哲学基础说来是不可知论的、休谟-康德主义的）的泥坑，陷入唯心主义（‘逻辑’、‘观点’等等，没有认识到它们是从物质，是从客观现实中产生的）的泥坑等等，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许多理论上的（为什么要企求‘一般理论’？）谬误、学术上的垃圾、学院派的蠢话。”列宁希望再版时作者能删去二三十页此类玩弄术语的地方，增添二三十页的实例。

另一方面，列宁所称赞的则包括书中论证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的言论和章节。第10章“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是公认的宣扬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章，列宁在边页上一连批了4个“非常好！”，13个“对！”，并在此章的末尾总评说：“这一章非常出色！”

因此，这本书不仅对于研究布哈林的思想发展阶段极为重要，而且对于研究列宁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本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的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不成熟的甚至谬误的东西。

本书的头3章是布哈林以前有关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论著的综述，其中许多论断、资料以及文字表述，都同《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等极为相似。从第4章“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开始才转入正题——有关过渡时期的一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20页。

同上书，第60卷第309—316页。

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布哈林为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论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统一体。布哈林认为,这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资本主义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因此这个社会是个“无组织的统一体”。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垄断的发展,各国在国内消灭了竞争,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体系转变为合理的体系,从无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经济的主体”。竞争越出了国界,在各国之间进行。因此“世界经济体系同以前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样,是盲目的、不合理的和‘无主体的’”。

布哈林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各个企业间的相互的无政府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无政府结构。既存在“纯经济”矛盾,也存在“社会矛盾”。生产力的破坏和资本集中的过程,使阶级间的矛盾大大尖锐化了,当这两个因素达到某种结合时,整个体系就崩溃,“这种崩溃开始于这个体系中组织上最薄弱的环节。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

共产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开始。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布哈林提出此思想比斯大林要早好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7—8页。

同上书,第10页。

几年。但是在结合到俄国革命上时，布哈林在判断上或至少在表述上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在本书第 11 章再次涉及这一问题时，布哈林断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他随即联系到俄国，说俄国国家机器在组织上最为薄弱，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刚刚粗具轮廓，又是个农业国，国家机构不稳固，所以无产阶级能较为容易地在各大城市把它推翻。布哈林提出一条总的原理：

“世界革命过程是从世界经济中发展水平最低的那部分体系开始的，那里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新关系的形成却比较困难；爆发革命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革命类型的高度成反比。”

布哈林的论断有其合理的成分，他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现象，即革命不是像历来所认为的那样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而是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开始。把这一点作为规律来表述，布哈林很可能是第一人。后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落后国家先开始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成了某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但是布哈林的表述显然把问题说的过于绝对了。因此在他谈到“最薄弱的”那句话旁边，列宁提出异议说：“不对：是从‘比较薄弱的’体系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在布哈林提出上述“总的原理”的旁边，列宁批道：“冒险了：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31 页。

同上书，第 132—133 页。

应该说‘不是从最高的’——‘和不是成正比的’”。

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俄国尽管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到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俄国的工人阶级能形成一支有相当力量的队伍,这才保证了俄国革命的胜利。

布哈林论断上的失误不是表述上的问题,而是出于对俄国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认为,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这种论断同他对俄国发展水平的估计直接有关。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 ABC》中的论述要切合实际一些。作者在这里写道:革命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开始得早,因为资本主义的瓦解在这里开始得早。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同其他国家一起于 1914 年挑起了血腥的战争。但由于其本身的虚弱和涣散,他们早早地就垮台了;崩溃出现得早,饥荒出现得也早。因此,正是在俄国无产阶级能比较容易地战胜自己的敌人,第一个取得胜利,第一个实现自己的专政。布哈林没有忘记提醒说,这绝不是说,“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就越革命,国家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如果这样推论,那社会主义首先应在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完全实现。而这样,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也就是不正确的了。”这里对俄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显然比《过渡时期经济学》所作的理论概括要符合实际得多。

落后国家易于开始革命,但是要完成这个革命却难得多。这是布哈林对俄国革命的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即使是在军事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317 页。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三联书店 1982 年第 126 页。

共产主义的高潮中,布哈林仍然多次阐述了这一思想,显示出一个理论家对现实问题的清醒思考。

在《共产主义 ABC》中布哈林指出,必须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革命的开始,另一个是它的性质、它的‘完备性’。革命在我国开始得早,是由于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薄弱。但是正由于这种薄弱,由于我国是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占少数,有很多小商贩等等,我们组织公有的共产主义经济就很困难。”相反地,例如在英国,革命来得晚,但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组织共产主义就会快一些,因为那里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生产无比集中。英国的革命要比俄国的‘更高一些,更完备一些’。”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里重申了这一思想,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容易取得胜利的原因,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就辩证地转变成产生巨大困难的根源了”。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大量存在的同真正社会化劳动相对立的分散零碎的小私有者的劳动,都是组织有计划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巨大障碍。此外,在革命时无产阶级得到反对地主的农民的支持,“但这些农民又是建设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时期中的最大阻力”。德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德国的革命发生得要晚一些,“但革命的类型却会高一些”。

布哈林的这一思想同列宁大体同时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作的分析是一致的。列宁说:“全部真理是:俄国在 1917 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上引布哈林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126 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32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43 页。

论述的有关语句下划了横线并在旁边写道：“对！”

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一旦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能快一些，迄今未有实践来检验过，但比俄国要容易一些则是可以肯定的。布哈林的论断可贵之处在于在举国上下都梦想一个早晨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能对俄国的现实进行冷静的思考，看到建设的困难，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当时他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这种现实的认识显然有助于他后来迅速地抛弃军事共产主义转而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热烈辩护者。

为俄国革命辩护——“革命的耗费”论

当时俄国的现实是经过革命和战争全国经济陷于瘫痪，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内外敌人纷纷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把俄国搞糟了，使俄国陷入崩溃破产的境地，布尔什维克是使俄国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

面对对革命和共产党人的指责和攻击，布哈林挺身而出，为革命进行辩护，对各种攻击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出了著名的“革命的耗费”理论。

革命无疑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布哈林同时指出，一切革命的经验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靠生产力的巨大耗损和破坏换来的。同样，“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有生产力的巨大衰落，因为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把破坏旧关系和按新方式改造旧关系进行得这样深，这样透”。即使如此，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由于经济外壳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能相容而产生的。这种资本主义外壳（其体现者是资产阶级）的反抗是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巨大耗费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耗费也是“由共

产主义变革的深度,生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所决定的”。

布哈林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对比。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无须改变私有制这个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在经济领域只是对从前的东西作某些修正,在政治领域只是把政权从一种类型的私有者之手转到另一类型的私有者之手。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就不会出现像无产阶级革命中那样的经济衰落。经济的暂时衰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规律”。

耗费有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在物质上的消灭。这包括消灭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也包括消灭生产的人的要素,如工人、技术知识分子。

2、生产要素失去专门技能。这包括机器等生产资料变旧使坏,技术知识分子失去专门技能,等等。

3、生产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如社会分裂,城乡联系的解体。生产力在物质上并没有消灭,但变成了潜在的生产力,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布哈林认为,“生产力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是过渡时期生产力水平下降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4、重新分配生产力,把它们集中到非生产性消费方面。这首先是满足社会主义战争的需要,这种战争的耗费同样造成经济穷竭,还夺去优秀的人员。

其结果则是“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中断、停止,而有时甚至瘫痪”,这就是生产力的下降。布哈林认为,在革命初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他随即强调,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应当“不仅从社会再生产的近期周期,而且从巨大的历史范围的广泛角度看待生产力的暂时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在生产力的暂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80—81页。

同上书,第84页。

时下降之后,接着是生产力的逐步上升,以至得到飞跃的发展。他是这样设想这一过程的:

在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生产力平衡之后,生产力的下降就会停止,这需要“对人的劳动机构进行改造”,改造的目的是消灭发展生产力的障碍,突破由“发展的形式”变成“发展的桎梏”的外壳,即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然后就可以进行技术革命,这次变革要解决的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同外部自然界的联系。布哈林的这些提法无疑是正确的——用变革生产关系来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但是他用了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来说明技术变革之前的时期,认为需要有这样一个时期去动员脱离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把广大非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劳动过程;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专利权和营业秘密,统一计划等等,使向电力过渡成为可能。这样,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后将是真正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技术的革命。他写道:“‘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这完全正确地说明了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技术特征。”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语引起列宁的批评。列宁在旁边批道:“极不成功。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列宁希望他多谈一些如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电气化过渡之类的实际问题。

布哈林的革命耗费论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不失为一种理直气壮的论据。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尽快渡过这种因革命的耗费而导致的生产下降时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87页。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97页。

性,而不能以“耗费论”,或者通俗一点讲——“交学费论”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状态作辩护。

社会化和国有化

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化问题。如布哈林所说,“借以完成这一过渡的措施的体系通常是用‘社会化’这个名词表示的”。但是他认为,社会化这个名词“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如果社会化是指整个劳动过程满足社会需要,那么这种“社会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存在。但过渡时期讲的并不是这种社会化,而是“在根本改变私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创造新生产关系类型的那些措施”,“社会化指的是把生产资料转入社会之手”。这样在过渡时期这一名词就显得不确切了,因为在这一时期,“自觉的经济主体不是‘全社会’,而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还不是归全社会所有。列宁同意布哈林所指出的不确切之处,他在有关语句下划了两道,并在旁边批道:“正是!”

布哈林显然想把问题说圆,所以接着解释说:“然而,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样也就给‘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这次列宁不同意布哈林的解释了。他在最后一句下划了两道线,在旁边打了两个问号批道:“丝毫没有。给混

社会化原文为 或 。这两个词,前者往往被译作“社会主义化”,欠妥。这两个词在含义上并无区别,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为外来语,而后者为俄语。

淆一个人生的‘过程’和死的‘过程’找到了‘根据’。”

列宁的这段话比较费解。社会化历来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社会主义也因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而得名——实行社会化的主义。但马克思并未明确规定实施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具体形式。恩格斯谈到过作为社会主义先驱的国有化的过程，认为这标志着生产资料社会化已势在必行，但他也只停留在抽象论证上，并未对未来社会的社会化具体形式作出预言。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道：“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什么形式？他没有讲。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立即采取了社会化的措施，俄国的社会化是以国有化的形式实现的，也就是采用剥夺和没收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谈到社会化的时候对这一名词本身表示了不满，他在一个脚注中写道：用社会化“这个名词代替‘剥夺剥夺者’和‘没收’，这是国际妥协主义思想的特色。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把‘社会化’同声名狼藉的‘整体’联结在一起，也就是把资本的国家政权的措施也包括到‘社会化’里去。”布哈林看到“社会化”一语过于笼统，因为它也包含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社会化的内容，因此他要求用“剥夺剥夺者”的提法强调苏维埃政权实行社会化的新内容。列宁同意布哈林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93—94页；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0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7页。

的这一论点,在边上批了赞语:“对!”

但是布哈林还看到把社会化用于当时的苏俄又有点名实不符。社会化的本义是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但在无产阶级国家里,通过国有化实行的“社会化”只是把生产资料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经济的主体不是全社会,而是工人阶级,因此严格地讲,尚未真正做到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社会化。正因为这样,布哈林才从过渡时期结束、无产阶级同全体工作者之间差别的消失中寻找社会化这一说法的根据。但是在苏俄,苏维埃政权是随同国有化这一社会化的具体形式同时诞生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采取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宣布银行、大工厂企业的国有化,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因此不应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死的过程”中寻找根据。就苏俄的实际情况而论,列宁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布哈林提出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他看到了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力求找到实现真正社会化的途径。

我们记得,1918年4月布哈林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曾发表过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其中提出,“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列宁在批评这种提法时区分了国有化和社会化,他指出在国有化上可以有坚决与不坚决之分,但是“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列宁强调指出,“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94页;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01页。

这种才能就不行。”实质性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很可惜，列宁没有说下去。1918年12月列宁曾建议把社会化理解为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并由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在这里社会化同国有化基本上仍然是同一个概念。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把社会化同国有化区别开来无疑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工作。布哈林从要求“最坚决的社会化”退回来，探寻社会化一词所表达的深层次的意义，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同社会化和国有化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社会化把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由此产生的所有制应是社会所有制。而国有化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其所有制形式因国家性质不同而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产生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在无产阶级国家则产生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通常把这种所有制等同于社会所有制，称作全民所有制。在把社会化等同于国有化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果把社会化同国有化区别开来，像列宁和布哈林所做的那样，那就应该承认社会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的区别，看到国家所有制还不是社会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应当设法使国家所有制逐步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当然，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必须在实践中探讨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至布哈林都没有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73页。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461页。

社会主义靠建设

有一个论断深得列宁的赞许,这就是“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是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列宁批道:“非常对!”

布哈林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作了对比。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建立过程是自发地进行的,所以当时的口号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不是被建设起来的,而是它自我建造起来的”。

但是社会主义则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定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这两个因素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但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特点:1、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其基础是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全部生产是有组织的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2、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和形成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工作的时代”。

布哈林认为革命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的推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这引起无产阶级造反,而无产阶级的胜利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平衡。布哈林指出革命过程的四个阶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86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49页。

1、意识形态革命。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看到自己应当成为主人的阶级。

2、政治革命。工人阶级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3、经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经济变革的强大杠杆,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4、技术革命。增加生产力,改变和迅速改善合理化的社会技术。

布哈林认为,这种用演绎法得出的规律性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最初的经验证明。

简而言之,就是先认识革命的必要性,起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改变生产关系,进行技术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

布哈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科学技术革命。就如他在《共产主义 ABC》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生产力应该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一个观点出发,围绕着一个目标行动,这就是要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应当注意布哈林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环境,当时正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高潮,整个国家都忙于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在这种热潮中能看到并提出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这说明布哈林的头脑还是保持了相对冷静状态。他的这一思想同列宁后来在《论我国革命》中所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在 1923 年初在反驳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前提因而不应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论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51 页。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270—271 页。

调时指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这一政治前提去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这里列宁同样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管理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管理的方法和形式必须适应不同的条件,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会只有一种管理形式。这是布哈林在第8章中提出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定的阶级在细节上都是同唯一的、不变的管理形式联系着的”,布哈林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写道:“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可能处于不同条件之下,管理的方法和形式必须适应这种条件”。在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和国家政权的一定阶级性质业已确定的情况下,“管理的方法和形式是由技术合理性的标准所决定的,并且不同的形式具有相同的阶级内容”。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多种形式,有议会制、小内阁制、总统负责制等等,但这并不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性质。在工业管理的领域,管理的形式取决于技术合理性的需要。十月革命后,苏俄在管理形式上有过“委员制”即集体领导制同“一长制”的争论。起初,委员制被认为是贯彻民主制的唯一形式,是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一致的。然而国内战争爆发后,形势使得政权具有“军事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管理的事务机构大大压缩,广泛的委员制被代之以一

长制。对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当时好多领导人并不理解,纷纷表示反对。

布哈林在谈到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的时候指出,一长制并不是削减阶级的权力,也不是削减其组织作用。这是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紧凑的、压缩的形式,适合于快速工作,即工作的“军事”速度条件的形式。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生产关系,而是“寻找能保证有最高办事效率的管理形式”,领导工厂的管理人员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机关挑选和任命的,同时也由工人组织提出和推荐。因此,委员制也好,一长制也好,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形式。

根据管理形式应适应不同条件的观点,布哈林认为这种极端的军事管理形式也不是永恒的。他看到,尽管这种形式具有毫无疑义的优越性,“但也有由强制纪律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缺点”。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将被“发达的管理体系所取代。而再往共产主义发展,随着国家政权和人与人相互关系上的任何强制规定的消亡,共产主义的人类将创造出‘对物的管理’的最高形式,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委员制或一长制问题本身都将消失”,“对人的管理将永远消失”。

把管理形式同国家政权的性质区分开来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做这样的区分,使管理形式服从于效益、合理性和需要,而不是给它贴上各种阶级标签,在当前的改革中才有可能放手探讨、试行各种不同的管理形式和方法。布哈林的这一论点对我们无疑是有启发的。从另一方面说,正因为布哈林持有这种辩证的观点,所以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俄共(布)党内某些人那样为“资本主义复辟”而惊慌失

措,而是挺身而出,为新经济政策鼓吹、论证和辩护。

“政治经济学”的末日——一个错误的判断

布哈林对过渡时期经济的论述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这就是原先用于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整个政治经济学都已经过时,不适用于过渡时期经济了。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开宗明义地宣布,“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在生产和分配都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规律才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规律、以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规律显现出来。但是,“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的。……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的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因此布哈林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也说,政治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布哈林在这里提出了几个站不住的论点。1、政治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商品经济的,而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商品,因而政治经济学的末日到了。2、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生活规律是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言下之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就可以改变这个规律。布哈林在20年代的论述中多次把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客观规律同政策法规混为一谈不是偶然的。3、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范畴如价值、价格、利润统统消失了。

列宁在读到上述论断后在边页上指出,第一,“定义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第二,“告终”的说法是不对的,“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v + m$ 和 c 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第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商品经济的。

十月革命后直到 20 年代,持这种观点的决非布哈林一人。例如布哈林写作《共产主义 ABC》的搭档和后来的论战对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持类似的观点,他在 1926 出版的《新经济学》中同样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揭示商品和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无计划、无组织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平衡的规律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揭示其衰落的规律的科学”。这种商品经济要被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取代。在计划经济中,产品同商品是对立的,劳动时间的尺度同价值是对立的,计划经济的簿记同作为价值规律表现场所的市场是对立的,剩余产品同剩余价值是对立的。与此相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政治经济学将让位于“社会工艺学”,即关于社会组织生产的科学,研究有组织的生产、有组织的劳动的科学。

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要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这一论断,布哈林写了《过渡时期经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出版了《新经济学》,都是用来取代他们认为已经过时的政治经济学的。

但是,如果再深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取消商品生产,取消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价格、利润等等一系列范畴的想法并非少数经济学家头脑的产物,而是十月革命后从党的领导人到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275 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6、13 页。

理论家们的共同看法,也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初,人们正在大力消灭商品货币,消除商品经济,推行计划经济,实现理论家们的宿愿。在这种背景下,布哈林提出了“末日”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列宁显然要比他清醒一些。我们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然而,布哈林及其同时代人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通向这门学科的重要阶段。

论过渡时期的经济范畴

布哈林在考察诸经济范畴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认为范畴不是永恒的,所以他提出,必须重新考察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概念,以弄清它们在所考察的时期内的适用程度。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或者,“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列宁完全赞同布哈林所引用的这一提法,他在边页上批道:“这是一个确切、简明、不矫揉做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

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布哈林在具体分析各种经济范畴时,便由上述的正确前提出发,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是商品。布哈林认为,这一范畴是“以社会分工或其分裂及因此造成缺乏经济过程的自觉调节者为前提的”,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存在着经常的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商品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14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07—308页。

才会成为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

列宁对这一提法是赞同的。他在最后一句话旁写道：“对！”但是他对笼统地说变成“产品”提出某种异议，认为“不确切”，“不是变成‘产品’，而是另一种东西。例如变成不经过市场而供社会消费的产品”。从列宁的这一批语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是当时公认的看法。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过渡时期经济学》是探讨“过渡时期的一般理论”，是进行“抽象的研究”。所以一些提法相当笼统。相形之下，一年前写的《共产主义 ABC》则要具体一些，较为接近俄国的经验现实。此书把未来社会分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是建设中的共产主义，是未建成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产品没有商品，不需要货币。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仍将部分存在，因为农民仍是商品的制造者，还存在私人商业，存在货币（以发行纸币代替税收）。

关于价值，布哈林写道：“价值是在我们拥有正规的商品生产的时候出现的”，“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体系的平衡规律”。并不是任何交换都是商品交换，也不是每次商品交换都是价值的交换。列宁赞同布哈林的下述结论：“价值这一处于平衡状态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15 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308 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7 页。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346 页。

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那里也不存在平衡。”

关于价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价值关系的表现,这可分为三种状态:1、价值在量上同价格相符;2、价值在量上与价格不相符,这是典型状态;3、价格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商品所固有的派生的量。另一种状态情况与上述三种状态不同,是一种虚假的价格形式,价格不依据价值关系,完全脱离价值。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虚假形式的状态必然会接近于典型的状态”,也就是说价格不完全脱离价值,而是在量上同价值不相符。过渡时期消灭商品体系的过程也是货币自我否定的过程。这表现在:1、货币的贬值,2、纸币的分配脱离产品分配,而产品的分配也脱离纸币的分配。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通的约定的符号。

《共产主义 ABC》中关于货币问题谈得具体一些。书中认为,在过渡时期货币将逐步停止使用,因为:1、国营企业无须货币买卖,可用非现金结算;2、在农民中间商品交换将提到首位;3、货币贬值等于其自行消亡;4、将采用预算手册和用产品来偿付工作者的劳动,作者设想取消货币流通的先后次序为:国有化企业内部产品交换领域;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者之间的结算;国家与小生产进行交易时取消货币,而代之以商品交换;小经济内部商品交换中取消货币;货币与小经济一起同归于尽。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学》第 115—116 页;《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309 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16 页。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346—347 页。

在社会主义下不存在雇佣劳动,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工资只留下它的外壳——货币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将同货币体系一起自行消失。因此布哈林得出结论:“工资变成没有内容的虚假的值”,“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工人’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列宁称赞这种提法,认为“对!而且说得很好,不矫揉造作。应该发扬这一点(去掉几十页的各种‘观点’)。”

布哈林还认为,“既然我们说的是新的生产周期,那么利润范畴以及剩余价值范畴就都同样消失了”。

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过渡时期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冲破商品拜物教的外壳”。相应地,经济理论也有必要转向“自然经济思维,也就是说把社会及其各个部分当作自然形态中的各种因素的体系来观察”。

布哈林的基本论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在商品经济,因此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各种范畴也将随之消失。列宁对这些观点从整体上说是完全赞同的。同《共产主义ABC》一样,《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所表述的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对俄共(布)党纲的进一步发挥而已”。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规定,要“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国内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分配上“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党纲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初期,共产主义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还未完全组织起来,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1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09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17页。

因此取消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俄共可以依靠银行的国有化，采取一系列办法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

从根本上说，布哈林、列宁和俄共(布)党纲上的观点都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货币将消失：“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将消失。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會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恩格斯写于1879年的《反杜林论》和写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用同样的文字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的劳动，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不必通过迂回的道路予以确定，不必通过第三种产品来确定，社会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而可以用“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41、546—54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41页。

同上书，第3卷第303页。

同上书，第3卷第633、757页。

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病,一是由商品生产引起的竞争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二是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产生的对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恩格斯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而如果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这些萌芽就会显露出来。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使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必须同时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当时所能看到的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未能看到商品生产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它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一系列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下仍将存在并且将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

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须苛求于古人,这是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造成的。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只能依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料去推想和预言未来社会。恩格斯在谈到圣西门、欧文这些“社会主义创始人”时指出,当时的历史状况决定了他们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

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他们极其小心谨慎地拒绝对未来社会作详尽的描绘,他们知道在这里纯粹的理论推论是危险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限于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他们作为例外对未来所作的某些具体设想,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很难要求完全准确无误。我们看到,和他们不同,布哈林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尽管在 1921 年以前他也曾坚持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能并存的观点,但苏俄的现实使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很快转变了看法,对商品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作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超经济强制种种

《过渡时期经济学》中的第 10 章“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是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一章,批语中赞词不绝,末尾的总评说:“这一章很出色!”列宁只是对表述上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或对某些内容作一些补充。

然而,这一章也正是公认的集中反映了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章,许多人认为布哈林在这里对暴力和强制的作用作了过分的颂扬,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理论概括。本书之所以被看作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经典之作,这一章起了重大作用。对这一章的种种提法,对它的得失很有必要作较为具体的深入的分析,

全盘否定也未必恰当。

所谓“超经济强制”也可译作“经济以外的强制”。强制历来有两种,一种是用经济的力量或需求迫使就范,另一种则是用暴力手段达到强制的目的。

本书写于 1920 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久,国内战争尚未结束。俄国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暴力革命。当时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国内战争中,无产阶级依靠的首先就是暴力,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布哈林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受到列宁的称赞:国家权力就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列宁在旁边写道:“注意。‘定义’真妙。”

布哈林没有把强制看作是一种与经济无关的单纯暴力,一种杜林式的“纯粹暴力”。他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把强制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察。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革命暴力摧毁社会发展桎梏,摧毁旧的反革命的“集中的暴力”、旧国家和旧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帮助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新式的“集中的暴力”,新阶级的国家。他指出暴力同经济的关系,社会暴力和强制会影响经济生活。它可以起两种作用:如果它沿着客观发展着的经济关系的路线进行,满足已成熟的生活要求,就会“加速经济发展”;而如果与经济发展相抵触,它就会“延缓发展,成为发展的桎梏”。

把强制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在整个 20 年代他始终注意谨慎地使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不把无产阶级所握有的权力(暴力)看作可以无视甚至违背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19—120 页;《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0 卷第 309 页。

经济规律、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力量。他看到,一方面“革命的国家政权是经济变革的最强大的杠杆”,但另一方面,如果用不当,又会成为最大的破坏力。他后来同斯大林的争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滥用暴力,特别是用暴力去对待广大农民。当然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他还未能如此明确地提出问题,相反地,甚至提到对农民要施加超经济强制。

那时候布哈林还希望通过超经济强制的力量去缩短过渡时期。他写道:“这种‘超经济’力量愈大,过渡时期的‘耗费’也就愈小……这一过渡时期就愈短。”这种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组织过程”。对这一点列宁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在旁边写道:

“应该加上:(1)取决于数量;(2)取决于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3)取决于同劳动群众的联系;(4)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性。”

列宁的补充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及所应具备的条件规定得更全面更具体了。

布哈林把强制的对象分为两种: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强制和对无产阶级自身以及接近它的社会集团的强制。

有9个阶层、阶级和集团被认为“必然在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领导和将军们的军事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包括:寄生阶层,商业资本家、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行政贵族;企业主;熟练的官僚(包括文职的、武职的和教会的);军官;富裕的大农;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僧侣。但是布哈林列举的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的面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0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10页。

太宽了,被算作敌对力量的还有:“5、技术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多数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动物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记者、教师等等)”。尽管布哈林接着提出要吸收“这些对新制度也有用的人员”,对这些阶层“不断进行再教育”(列宁对“再教育”一词极为欣赏,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但是把在旧社会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对推动生产力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同资产阶级、大官僚、大农场主等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妥当的。这也许同十月革命后某些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有关,由于对新政权不理解,他们中间有人实行过怠工,但其性质同资产阶级的反抗是不同的。布哈林的论断反映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

布哈林认为,强制不仅适用于过去的统治阶级,在过渡时期也适用于“劳动人民本身,用于统治阶级本身”。列宁赞同这一提法。

布哈林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并不具有完全的单一性,其内部存在不同的阶层,如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工人贵族,季节工人,拥有私人财产的工人,有时经营农业的工人,战时来自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工人,由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政治特征选拔出来的工人,农业工人,纯雇工和半雇农,等等。这些集团中有“完全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集团,甚至工人阶级中比较广泛的阶层也都带有商品资本主义的印记。这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因此布哈林认为,“强制性的纪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他进一步指出,甚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内部也为自己规定了强制性的纪律,尽管由于这种纪律同内在的动机是一致的而不感觉到这种纪律的存在。布哈林得出结论说:“在过渡时期工人阶

级的主动精神是同强制同时并存的,这种强制是作为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各部分规定的。”列宁对此批道:“对!”

还有一个对农民实行强制的问题。农民不是一个整体,布哈林对此作了区分。对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富农,必须给予坚决的反击。中农以及部分贫农是“不断动摇的”,对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仇恨把他们推向共产主义,而“私有者(而在饥荒时期还有投机者)的感情又把他们推向反动派的怀抱”。其表现就是“反抗国家的粮食垄断,追求自由贸易(这就是投机活动)和追求投机活动(这就是自由贸易),反抗劳动义务制和整个地反抗国家制止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形式”。因此,在这里强制也是无条件的绝对必要的。列宁对上述分析表示完全赞同,他在有关语句下划了线并在旁边批道:“对!”作为对照我们可以引列宁大致同时说的一句话:“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

农民具有两重性是当时列宁和布哈林对农民的共同看法。现在看来,对农民“投机活动”(农民买卖粮食被看作最严重的投机倒把活动)的评价,显然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产物,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这一估计起了变化,对农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布哈林说:“总之,对过去的资产阶级集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强制是对异己阶级所实行的强制,这个阶级同它所强制的对象进行着阶级斗争;对非富农的农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所实行的强制,就农民是私有者和投机者而言,是一种阶级斗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4—125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14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45页。

争,就农民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者而言,它则是从劳动上组织农民,团结、教育农民和吸引农民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手段;最后,对无产阶级本身来说,强制是工人阶级自己规定的组织方法,即加快强迫自我组织的方法。”

这段话集中了布哈林对超经济强制的看法。对农民和无产阶级自身来说,如果把强制看作教育或自我教育的手段之一,是无可非议的。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的正是把强制同教育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把全部工作统统归结为强制,单纯依靠强制去解决一切问题,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对小农的改造仅仅依靠强制是不够的。然而到1920年为止,苏俄的实践主要还是强制,从禁止自由买卖到强迫加入公社等等,依靠的都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手段。如果说在国内战争时期这种做法还能农民所接受的话,那么一旦战争过去,就只能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了。正是这时候列宁提出了决不可对农民发号施令的警告,把农民工作转向经济利益的刺激,转向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上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制自然是必要的,但作为更经常的方法,应该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细致的教育,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而恰恰是这一方面布哈林在本书中始终没有提及,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痕迹——过分强调了强制的作用。布哈林对强制的论证最后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以至在本章的结尾中写出这样的论断来: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

方法。”

任何措施都有一定的度,把包括枪毙在内的强制说成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共产主义新人的方法,这就失去了必要的度,夸大了强制的作用。布哈林把特殊时期为解决当时的任务而采取的某些非常措施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措施,看作规律性的现象,因此他作出了这么一种概括:“国家强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这样,包括苏维埃共和国在为自身的生存而同反革命斗争时代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在内的做法,以至不经审讯镇压真正的或虚构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做法,就统统成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方法。这种为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所作的论证,在实践上包含着极为有害的后果,这在30年代得到了证实。这种理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布哈林本人,而且连同意布哈林上述论断的列宁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当然,这样的后果不应由布哈林来负责。他并没有把强制永恒化,恰恰相反,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极端的军事管理形式”,强制将随之逐步消除。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集中的暴力也在“最终消灭任何暴力。作为阶级的最高表现,它在消灭任何阶级。作为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阶级的制度,它在为一切国家的死亡做准备工作”。在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强制都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

布哈林这样设想外部强制规定的消亡过程:“首先消亡的是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27—128页。

同上书,第93页。

同上书,第104页。

同上书,第128页。

陆军和海军,这是最尖锐的对外强制工具;其次是惩罚和镇压机关、系统;然后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等等。”

列宁对这一设想提出了疑问:“是不是倒过来呢:先是‘然后’,然后是‘其次’,最后是‘首先’?”按照列宁设想的顺序,先消亡的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然后是惩罚和镇压机关,最后才是对外的强制工具。布哈林的设想是以“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前提的,既然世界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对外的强制工具就无须存在,因此被他列为首位的是军队的消亡。列宁也许感觉到一国或多国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哪怕取得“决定性的世界胜利”,也不能排除世界某些地区的某些集团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因此他主张先从内部消除强制开始,而把对外强制的工具的消亡放在最后。其实,无论列宁还是布哈林,他们说的都是相当遥远的未来的可能性,是一种推断,一种观测,最后答案如何,只有等待未来的实践。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强制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他并不否定革命初期,即革命的破坏时期实行强制的必要性,但他看到了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局限性。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正是布哈林反复强调要从超经济强制转向经济强制。他指出,同耐普曼的斗争不应当用机械的办法,不应当用敲掉牙齿的办法。“我们可以两万次再做这种敲掉牙齿的事,简单地镇压,但这不是解决问题。”他号召从机械的镇压转向经济的斗争,说“随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固程度的增加,重心正在由直接地、机械地镇压剥削者和那些敌视工人阶级的社会集团残余,越来越转到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事业,转到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37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319页。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00页。

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转到同私人企业进行经济斗争,转到建立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国营企业,合作社等等)的事业”。

对广大农民,布哈林看到用强制手段不解决任何问题。他的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是根据列宁生前同他的谈话内容写成的,全书始终贯穿着列宁的一个思想: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经济学》写于军事共产主义的顶峰时期,因此书中对军事共产主义的颂扬或论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他有义务为那时的政策提供论证。这一切都不足为怪。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倒是本书的另一方面,即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狂热之中,布哈林却能保持相对的冷静,在书中提出许多至今仍不失其意义的论断和观点。此类观点除了上面已提到的,还有不少。例如作者指出了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的不同目的:“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这里多少已具备后来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某些论点。

具有重大价值的——不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是布哈林在本书中提出的经济平衡理论,他把平衡规律看作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找到这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44 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97、92 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09 页。

关于平衡问题,我们将结合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予以阐述。

哲学上的“新东西”

年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92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问
世。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1926年他在谈到列宁时说：“每一次列宁的思想都是贪婪地、猛烈地向着当时工人运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扑去。列宁同志善于找到‘当时必须抓住的‘理论’环节’”。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布哈林本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抓住当时最迫切的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率先进行研究。十月革命后为宣传共产主义，为解释党的新纲领，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了《共产主义 ABC》。接着，他又针对当时面临的

过渡时期的众多问题,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开创性的论著。在完成这本著作之后,布哈林又应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学习理论的迫切需要,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样的通俗读本。

这时候苏俄国内战争已告结束,国内建设开始走上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国内和平开始取代国内战争。人们的注意力由战场转向工厂、农村、课堂。在过去的革命夺权时期,任务是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平衡,实行革命破坏,而现在进入建设时期,需要社会的稳定平衡,在稳定中创造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前提。这时需要的已是“进化”、“长入”,而不是革命、破坏,不是社会的剧烈动荡。除了斗争哲学更需要建设哲学。学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列宁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托洛茨基为红军规定“学习年”的任务。此学习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显然是每个准备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所必须学习的基本理论。然而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大都分散在大量论战性的文章之内。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是一部论战性的巨著,而他的《哲学笔记》首先是供自己用的札记,根本不是大众读物,何况当时还没有发表。普列汉诺夫写过几本相当优秀的此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等,但都不是通俗读物,不是系统的教科书。这样,布哈林就面临另起炉灶、构筑新的体系、通俗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艰巨任务。就通俗而言,布哈林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布哈林不仅是严谨的理论家,他同时也是写通俗读物的大师,他可以把深奥的理论写得深入浅出,其文笔在党内也许只有托洛茨基可以与之

相媲美。

布哈林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学究,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家。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通俗的叙述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他不甘心于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讲些众所周知的东西,而力图依据自己的多年研究,讲出点“新东西”,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原理,也力图用新的形式去表现。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有一个重要的声明:

“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它们进一步加以发挥。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停滞不前,那就未免奇怪了。然而,作者无处不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最正统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观点的传统。”

对这个声明,他确实是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地使之贯彻全书的!纵观全书,可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总体上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作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例如坚持了因果论,反对目的论;坚持物质第一性,同时也指出意识的反作用;正确阐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党和国家政权、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等,其中许多说法一直被后来的教科书所沿用。不过本文所关心不是这些共同的东西,而是想列举一些属于布哈林个人的“新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世以后,在30年代以前一直被当作权威的著作在苏联以至全世界使用。当时出现了不少评论文章。也许那时的评论者和读者没有发现或者忽略了书中的“新东西”,为此布哈林在《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1923年第3期发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简略的札记)》一文,专门介绍他的“新东西”。文章一开头就重申他的写作方针:“在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我试图不仅重复以前说过的东西,而且试图一方面对这些东西作出某些不同的表述,另一方面确切地阐明和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大家知道,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说过,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还只是迈出最初的几步。看来,深入研究一些理论问题是伟大导师的学生们的直接任务。”他指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们的著作在大量增加,必须给予回答,并且“是在我们自己的理论原理越来越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反击”。同时声明:“这些‘新东西’全都是(我敢肯定这一点)遵循‘对马克思作出最正统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解释’的路线的。”

布哈林列举了 11 条自己的“新东西”:

- 1、不能把“机械的”和“有机的”对立起来,现代的物质观念已推翻了旧的观点。
- 2、平衡论揭示了辩证法的物质根源。
- 3、借助于平衡论解决为什么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的问题。
- 4、强调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反对“唯灵化”和心理学派。
- 5、区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 6、指出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关系。
- 7、从劳动的观点分析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被划分出来的劳动的范围”。
- 8、恢复被遗忘的马克思关于“表象方式”的原理。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126 页。

同上书,第 127 页。

9、揭示人的生理现象(生物学、生理学规律)同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反对二元论。

10、发挥社会现象物质化的理论,即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凝聚固定为具有特殊的社会存在的物的形式的文化积累的特殊过程。

11、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和衰落的规律性。布哈林认为,以“生产力发展”的词句作为开端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表述太狭窄了,因为它既不包括衰落的时代,也不包括革命的过渡时期。

布哈林认为,这就是他所涉及的主要的新东西。当然,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新东西,如关于阶级、关于领袖和政党的相互关系、关于革命等等的学说。

哲学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布哈林的问题。从1905年革命失败后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某种异端的偏爱”,到写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问题的探索。此书出版后,他也没有到此为止,在此后的年月里他继续关注这一问题。1936年春为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布哈林被派遣出国。当他有机会接触马克思的手稿时,他马上如饥似渴地翻阅《资本论》的手稿,想在其中找到马克思对“阶级”所作的解释。然而他没能找到,对此他不禁叹道:“啊!卡尔卢沙,卡尔卢沙(指卡尔·马克思——引注),你为什么没有写完呢?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困难的,你要是解决了它,对我们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阶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布哈林言论》第127—138页。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178页。

布哈林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那面临宣布消灭阶级或剥削阶级,全国建成社会主义之际。

1937年布哈林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写出了他的最后的哲学著作,也是他最后一本著作《哲学短篇集》,继续研究辩证法问题。

不可能在这里详细阐述布哈林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简略的札记)》中所举的“新东西”。这里谨根据此文并参照《哲学短篇集》中的某些新提法,对布哈林在哲学上的某些“新东西”作一些简短的介绍,希望能引起有兴趣的读者的注意。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在这里作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这恐怕是布哈林的一个发明,并且是一个不无道理的发明。

布哈林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某时某地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历史学。另一类是研究一般性问题的,可以叫做理论科学。在社会学中有两门重要的科学,它们研究的不是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而是整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它们不是考察某一类现象,而是研究和考察所有各类现象。这就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历史学探索和阐述某时某地社会生活之类的经过。而社会学则提出一般性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发展或衰亡取决于什么?各类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发展的原因何在?社会的各种历史形态是怎样的?社会形态更替的原因何在?等等,等等。“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一般的(抽象的)科学”,它往往被叫做“历史哲学”、“历史过程理论”等等。布

哈林认为它们的关系是：“历史学为社会学的结论提供材料”，“社会学则为历史学指明一定的观点、研究的方式或通常所谓的方法”。

根据这种划分，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的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最锐利武器，无产阶级可以借助它搞清楚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的最复杂的问题。布哈林得出结论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煞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他说，一门较为抽象的科学给不太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方法，是常见的现象。

在苏联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学是从布哈林开始的，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其奠基之作。在 20 年代这是苏联社会学的主流，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标志。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我国 20—30 年代的进步社会学基本上接受了布哈林的这一主张。瞿秋白 1923 年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主持社会学系，讲授《现代社会学》。他显然采纳了布哈林的主张，认为社会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现代社会学》的序言（1926）中说：“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

转引自《社会学百科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1990 年版第 861 页。

可磨灭者。”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在 30 年代，陈翰笙继续持此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探讨人类进化之原则，以为研究史学之方法，故可称为社会科学中最概括，最抽象之科学；史学则整理可靠之史实，以供研究社会学之材料。史学固当以社会学之哲理为指南而后可得正确之方法，社会学亦需筑于历史事实上而后可免错误之论断”，“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时的实质的科学。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

以上说法可以明显感到布哈林的影响，陈翰笙的说法简直是布哈林表述的翻版。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和对象至今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的说法。布哈林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至少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创阶段所作的开创性的探寻。即使不能把社会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它们两者也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仍是无可争辩的。

平衡论与系统论思想

平衡论是布哈林哲学中最有争议的理论，往往被等同于机械论，甚至被斥为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不过在批判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布哈林本人对平衡论所作的解释。平衡的通常概念是：“某种系统如果不能自动地，即没有从外面加给它的能，改变本身的状态，人们就说它处于平衡状态。”平衡可

《李达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卷第 237 页。

《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43 页。

以区分为稳定的平衡和不稳定的平衡。

布哈林用另一种说法予以说明：世界上存在各种不同的互相反对的力，它们只有在某些例外的场合才在某一时刻互相平衡。这时就出现“静止”状态，也就是说，它们实际的“斗争”隐蔽起来了。只要其中的一个力改变，“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平衡遭到破坏。如果立即确立新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各种力的另一种结合条件下确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运动是受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斗争’、‘矛盾’即对抗制约的。”“变化的规律、不断运动的规律是一切的基础。”“静止即绝对的稳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然而相对的平衡是存在的。在生物学中这叫做“适应”，与外界相适应的生物，能与外界长期共存。在无机界中可以看到，地球没有掉到太阳上，整个太阳系与它周围的世界处于长期共存的关系之中，等等，这就是物与物之间的平衡。

社会同样如此，它同自然界处于平衡状态，社会内部的各个部分也互相适应，以便同时并存。布哈林指出，这些例子谈的都是平衡。不过，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静的平衡，而是动的平衡。也就是说，平衡一经确立，随即就被破坏，以后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起来，然后又再度被破坏，如此循环反复。

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平衡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社会发展本身作出解释，特别是说明社会同自然界的联系。布哈林在这里提出了包含现代系统论的思想。他说，“任何事物——不管是石头还是生物，是人类社会还是别的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6页。

同上书，第74—75页。

什么,我们都可以看成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各个部分(要素)组成的某种整体;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体看作是一种系统”。“系统”()一语在布哈林著作的中译本中通常都译作“体系”。显然,这里译作“系统”要确切一些。布哈林解释说,在系统的周围有自然界的其他要素,这些要素对系统来说,就是它的环境。对森林中的一棵树来说,所有其他的树木、小河、土地、青草等等,连同它们的全部特性,就是环境。同样,人类社会是人的环境,外部自然界则是人类社会的环境。“在环境和系统之间存在着经常的联系;‘环境’作用于‘系统’,‘系统’反过来又作用于‘环境’”。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社会 and 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或停滞倒退。这种关系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稳定的平衡,二是正平衡(系统的发展),三是负平衡(系统的破坏)。“经常重现的环境和系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运动的基础”。

除了系统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系统内部也存在矛盾。“既然环境和系统之间没有绝对的平衡,那么系统本身的各个要素(部分)之间也没有这种平衡”。例如,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就存在无数的矛盾。

阶级斗争是最明显的表现。此外还有诸如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人们劳动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生产中的不协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系统的矛盾着的构造产生出来的系统内部的矛盾(‘结构矛盾’)”。布哈林强调,对社会的考察,要求我们从充塞社会的那些矛盾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矛盾的发展。布哈林在平衡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8—80页。

同上书,第81页。

同上书,第81页。

论这个术语下对矛盾所作的解释是符合辩证法的。

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详细探讨了社会平衡的种种现象,他强调指出,他所说的都是“动的平衡”,也就是说,平衡不断受到破坏,接着又在不同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然后又受到破坏,如此循环反复。“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矛盾的过程,看到的不是静止的状态,也不是绝对适应的状态,而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的运动过程。”他把平衡分为“社会的外在的平衡”和“社会的内在平衡”。外在平衡指的是社会同自然界的联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社会与环境之间平衡的破坏,都属于这个领域。而内在平衡则涉及社会内部同一序列社会现象内部的矛盾、不同序列社会现象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平衡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布哈林还指出一种异常重要的发生矛盾的情况,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和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这里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内部形成的关系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对社会生活会起非常重大的作用。他再次强调,“社会平衡规律是动的平衡规律,它不仅不排斥,反而以对抗、矛盾、不适应、冲突、斗争为前提,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以剧变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为前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

那么两种矛盾——环境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系统本身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布哈林认为,“系统内部构造(内部平衡)的变化,应当取决于系统和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因素。因为系统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衰落、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283 页。

同上书,第 284—285 页。

决定的”。“内部(结构)平衡是依赖于外部平衡的因素(是这种外部平衡的函数’)”。

以上所述包括了布哈林平衡论的基本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布哈林为什么要用平衡论去说明这一切?

黑格尔提出用三段论——正题、反题和合题去说明运动的过程。不过,布哈林认为,黑格尔的三段论是在唯心论哲学的思维运行中构建的,他把一切看成是精神的自己发展,在他看来,作为精神的、第一性的东西的思维,也就是存在的特性。尽管这三段论已被证明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仍有必要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布哈林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简略的札记)》中指出,“应当揭示辩证法的物质根源,也就是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形式中找出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相符合的东西。各种力量的不断冲突,解体,系统的发展,新事物的形成及其自身的运动,——换句话说,平衡的不断破坏和它在新基础上的恢复、新的破坏等过程,这就是同黑格尔的三段式现实地相符合的东西。”这里提供的新东西就是“指出了物质的过程和物质形式的运动。换句话说,这里是以黑格尔的三段式最完美的表达的物质形成的辩证法”。因此,布哈林用现实世界的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去取代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

布哈林预见到会有人出来指责这种观点为机械论,特意指出,这种非难是完全不正确的,不能把现代力学同辩证法对立起来,他写道,“如果力学不是辩证的,即整个运动也不是辩证的,那么在辩证法里还剩下什么东西呢?恰恰相反,运动就是(如果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81—82页。

《布哈林言论》第129页。

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辩证方法的物质灵魂及其客观基础”。所以布哈林写道,“我们认为把马克思称之为‘神秘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翻译成现代力学的语言,是完全可能的”。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使用力学的术语,那是因为旧的原子观念把原子看作单独的、与旁的粒子无关的孤立的粒子。而现在关于电子的学说、关于电子是像太阳系那样的完整系统的学说的出现,就没有理由害怕使用力学术语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这种提法有过明显的暗示(关于各生产部门之间平衡的学说,以及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劳动价值学说等等)。在社会科学领域需要反对“机械的解释”,但是不应把有机同无机对立起来。现代的物质观念已推翻了旧的观点。“孤立的和无质的原子已经完结。联系的要素、相互依赖的要素、新质增长的要素等等,正在充分地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机械的’和‘有机的’对立起来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的世界观,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既适用于有机世界,也适用于无机世界。至于各有其特殊的自身的规律,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不能把有机和无机(机械)世界对立起来。布哈林指出的这一点是辩证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什么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这是布哈林想要从新的视角去予以说明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甚至普列汉诺夫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令人满意。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举了两种看法:一种断言“观念支配世界”,另一种则认为“生活条

《布哈林言论》第 129 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78 页。

《布哈林言论》第 128 页。

件创造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结果就出现基础影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基础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起作用的第三个因素“生产力”。布哈林认为，其结果是出现新的鸡和蛋的起源问题，即上层建筑和经济影响生产力，生产力又影响上层建筑和经济。他认为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本身为什么会不断发生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会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布哈林认为，唯一正确的答案是：“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社会的发展，是因为它体现着作为一定的现实总和的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环境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归根到底决定任何系统的运动的因素。这是运动形式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之一。这是一种在其内部产生着力的分子移动、系解着相互作用和矛盾的无数纽结的框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生产力不断地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但这丝毫不会改变下述基本事实，即“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社会赖以生活的并且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可以任意变换的物质能量的数量永远是决定的因素”。

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布哈林认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界汲取（并吸收）的能量愈多，就愈能适应自然界；只有在这方面数量有所增长，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他引马克思的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

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的第5章“现代唯物主义”，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卷。
《布哈林言论》第131页。

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使自己适应自然界,也使自然界适应自己。布哈林写道:自然界的一部分——环境,即我们这里称之为外部自然界的東西,与另一部分——人类社会相对立。而这个统一整体的两部分的接触方式,是人的劳动过程。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社会与自然界的直接接触,即从自然界汲取能量,是一个物质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一定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他(指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这种物质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与系统、外部条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

社会生产过程是人类社会适应外部自然界的過程。布哈林这里使用了“适应”的说法,然而他立即指出,适应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过程——人类社会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使环境适应自己。人类社会是在同自然界的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社会与自然界在物质变换过程中社会消耗自己的劳动即人的能量,从而取得一定数量的自然能量。布哈林用平衡的理论来说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能量(物质)变换的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社会支出的全部劳动时间所换回来的产品,仅够抵偿自身最必须的需求,收支勉强相抵,社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极其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这是一种平衡状态。

第二种是仅用上述的一半劳动时间就可以获得社会所必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68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0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18—119页。

的产品,这时社会就可以腾出原来劳动时间的一半,用于新的生产部门:制造新工具,开采新原料,还可以用于精神劳动。这样,在下一个再生产的循环中所需的劳动时间就会更少。平衡被打破,社会得到发展。

第三种情况是入不敷出,社会失去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必将倒退,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毁灭。

布哈林分析了上述情况后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即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耗费的劳动数量之间的比例。他认为,“社会劳动生产率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整个‘平衡’。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环境与系统之间那种相互关系的指标,它决定着这一系统在环境中的状况,它的变化标示着社会全部内在生活不可避免的变化”。

社会物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量构成的,只要知道了这两个量,也就可以知道产品量。生产资料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原料和劳动工具,劳动工具是主动部分,人是用它来加工原料的。因此,布哈林认为,“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系统,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布哈林认为,这一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解决。他指出,人类社会的适应不是消极的、生物性的,而是积极的,是用技术装备来适应的。因此,社会的技术装备系统是和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认理论》第123—125页。

同上书,第1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精确的物质标志。他进一步解释说,社会技术装备指的不是某一件工具,也不是一堆各种各样的工具,而是这些工具的系统、整个社会中的工具的总和。因此,布哈林所说的“技术装备”包含了科学技术,但并不等同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它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当马克思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工艺学”来说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关系时,布哈林则用更为明确的“社会技术装备系统”来予以说明。技术装备是一个变数,技术装备的变化引起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变动,因此,布哈林认为,对社会变化的分析也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历史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的发展所决定的。

布哈林关于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取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说法,曾被看作是外因论而受到批判。然而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布哈林的意思决不是环境决定系统。在人类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说得很清楚,不是自然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是它们两者的关系决定人类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变化,不是人类社会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人类也使自然环境适应自己。在决定两者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生产力,是“技术装备”。由于应用了系统观点,布哈林相当辩证地解决了系统和环境的关系,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在布哈林的理论中,客观事物是由大大小小的互相联系的系统和环境构成的。在这里是系统和环境的关系,在更大一些的层次上,上两者又构成一个系统,它与更大范围的环境构成另一层次上的系统和环境的关系。同样,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待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一个系统来说是外因的因素,在更大的系统里则可能是内因的组成部分。布哈林的基本观点同外因论不相干。如果说,系统内部的变化,是孤立地进行的,同它的环境毫无关系,那倒是奇谈怪论。

长期以来,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技术装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抓阶级斗争,社会就会得到发展。实际上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是目的本身,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已越来越明显,七八十年代第三次浪潮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后果,更为直观地向我们显示了这一切。看来,随着社会向前发展,科学技术或“技术装备”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忽视者将大吃苦头。

斯大林在 1931 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中曾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他这里说的技术同布哈林所说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技术装备不是同一回事,斯大林只是号召党的经济工作人员不要鄙视技术,而要掌握技术,掌握现成的、既有的技术。并且在他看来,这仅仅是“改造时期”的任务,在一个特定时期的临时任务。几年以后,他就以“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取代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而布哈林是把技术装备看作解决人类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决定性因素,看作是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现代的系统论把事物看作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论的创始人 L. V. 贝塔朗菲在 1924—1928 年间开始提出系统论思想,1937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系统论才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3 卷第 39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体系。它吸收先前各种哲学流派的成果,把前人的成果加以改造,予以革新。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它并不拒绝吸取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系统论思想。然而,明确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同自然界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布哈林是第一人。布哈林哲学研究中所坚持的正是这种开放的创新的科学态度。19世纪下半叶一些哲学家如奥·孔德、赫·斯宾塞等人已经把平衡论思想加以发挥,运用于社会问题。到20世纪初,平衡论又有所发展,亚·波格丹诺夫在运用平衡论的时候,想到了控制论和现代系统论方法的某些原理。我们已经说过,布哈林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波格丹诺夫,1925年他曾说过,波格丹诺夫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在哲学观点上布哈林显然接受了他的某些东西。但是,布哈林不会照搬照抄,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如此,对波格丹诺夫更是如此。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使用了系统论的方法,提出了系统同环境的关系、平衡和不平衡的范畴等等系统论中的重要概念。现代系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如系统观点、层次观点、功能观点、动态观点,在布哈林的著作中都可以程度不等地找到完整的表述,或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火花。为了历史的公正,应该说,布哈林提出和具体运用系统论的某些思想甚至早于贝塔朗菲,特别是把它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只是由于布哈林在30年代所遭受的厄运,使他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和发挥他的系统论思想,他的思想连同他的著作一起被打入冷宫。马克思主义对系统论、对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0页。

人类思想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遂淹没无闻。

哲学遗稿《哲学短篇集》

1937年春布哈林被投入监狱。监狱的环境为布哈林提供了一个哲学思考的机会,就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布哈林写出了长达20多字数印张的《哲学短篇集。辩证法概要》,其最后一页所标的日期是“1937年11月7—8日,伟大胜利20周年之际”。

关于布哈林在狱中写作的情况,布哈林本人及其同时代人有过一些介绍。

1938年3月8日布哈林在法庭上声明:“我说一下我自己,我在监狱里关了将近一年,我工作并写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20年后米高扬对美国记者L.费舍说,布哈林没有遭到肉体的折磨,在狱中还工作。

当年关在索洛夫基监狱的贝尔格尔保存了布哈林的学生亚·爱恒瓦里德关于他同布哈林对质的回忆资料。贝尔格尔介绍说:

“亚历山大是同布哈林对质者之一,对质几达5小时。对质结束时布哈林终于同爱恒瓦里德和解了,请求审讯员允许单独同他谈谈。审讯员同意了,走出办公室,只在门口设岗。这样,布哈林同爱恒瓦里德在无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面地谈了将近两小时。布哈林首先向爱恒瓦里德询问了自己家庭的情况和他的学生们的遭遇……然后布哈林联系所发生的一切向爱恒瓦里德讲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允许布哈林在狱中读书和写作。给他提供了书籍和打字机。爱恒瓦里德问布哈林,他写的书是

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2—3、4—5期第3—37页。

谈什么的,回答使爱恒瓦里德惊异不已,说是‘关于人的本性’。布哈林甚至力图使爱恒瓦里德相信,今后他只应研究一个问题:忘记意识形态问题,忘记经济、政治,而试着理解生命的一般意义和价值。根据爱恒瓦里德的叙述,我还是未能准确理解布哈林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的探寻是否具有神秘主义的、纯伦理的或者哲学的性质。不过,布哈林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日所研究的正是这一问题。”

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回忆说,她根据布哈林所开的书目,往卢比扬卡监狱送去 1936 年在柏林购买的德文书籍,供布哈林在狱中写作《法西斯主义下文化的退化》一书,侦查员柯甘甚至向她展示了其中的几页手稿,说“他甚至有可能工作”。我们看到,批判法西斯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哲学在布哈林的《哲学短篇集》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看,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想,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和辩证法问题。布哈林本人为此书写了一篇很短的序言,全文如下:

“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采取了这种叙述形式,有些地方具有政论性质(主要是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仍力求保持一定的比例,把‘短篇’连成一体。在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只谈实质性的东西。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段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

从这短短的序言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布哈林始终力求遵循

. 贝尔格尔:《动荡的一代》,佛罗伦萨 1973 年版第 138—140 页,转引自《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3—4 页。

见《旗》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第 165—166 页。

《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19 页。

列宁的哲学观点,坚持辩证法,并力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基础上予以发挥和发展。

本书除前言和导言外,共有 40 章。目录如下:

- 1、论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并论唯我主义的诡计。
- 2、论对世界的认可和不认可。
- 3、论自在之物及其可认识性。
- 4、论空间与时间。
- 5、论间接认识。
- 6、论抽象与具体。
- 7、论感觉、表象、概念。
- 8、论生动的自然界和对自然界的艺术态度。
- 9、论理性思维,论辩证思维和直观。
- 10、论一般实践和认识论中的实践。
- 11、论对世界的实践、理论、审美三者统一的态度。
- 12、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出发点。
- 13、论物活论和泛心论。
- 14、论西欧哲学中的印度教的神秘主义。
- 15、论所谓同一性的哲学。
- 16、论机械唯物主义的过错。
- 17、论存在的一般规律和联系。
- 18、论目的论。
- 19、论自由和必然。
- 20、论有机体。
- 21、论现代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
- 22、论思维的社会学:a)论作为一般历史范畴的劳动和思维。
- 23、论思维的社会学:b)论“生产方式”和“表象方式”。

- 24、论所谓种族思维。
- 25、论社会立场、思维和“感受”。
- 26、论哲学的客体。
- 27、论哲学的主体。
- 28、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 29、论作为占有的客体和主体的社会。
- 30、论真理：a)论真理的概念和真理的标准。
- 31、论真理：b)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 32、论幸福。
- 33、论作为一个体系的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
- 34、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 35、论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和作为艺术的辩证法。
- 36、论科学与哲学。
- 37、论进化。
- 38、论理论与历史。
- 39、论社会理想。
- 40、论作为哲学家的列宁。

俄《哲学问题》杂志 1993 年第 6 期发表了其中的 11 章，因此现在还很难对布哈林的这一遗作作出全面的评论。

《哲学问题》在发表布哈林的部分遗作的时候，还同时发表哲学家 A. . 奥古尔佐夫写的导言《湮没无闻的布哈林》，对布哈林写作的情况及手稿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他给予布哈林的哲学研究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布哈林的思想是同 20 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卢卡奇的思想朝同一方向并行发展的。布哈林在手稿中提出的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新观点直至今今天仍保持其价值。他所发挥的思想本来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全新的观点，哪怕它在 50—60 年代能问世！布哈林的

手稿是创建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的最后一次尝试。此后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就中断了。

奥古尔佐夫列举了特别值得指出的布哈林在《哲学短篇集》中提出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其他“新东西”：

抽象和具体问题,这当然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已提出的,然而长期以来被其追随者遗忘了,直到 50 年代中期才被重新提起(. . 伊利延可夫、 . . 季诺维也夫、 . . 马马尔加什维里);

阐述实践上、理论上和审美上把世界看作统一的过程,这就使得能对实践作比较广泛的理解,并把实践当作认识标准;

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循环”,即理论向实践和实践向理论的不转化;

阐明自然界中联系的各种不同的类型,不局限于因果性,也包括功能关系、统计学上的联系、目的论上的联系,等等(这成了 60—70 年代的研究对象);

强调自由形式的多样性和必然性形式的多样性,克服了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种极为狭隘的定义;

研究有机体的完整性问题,这后来成了施马尔豪森著作的研究对象;

把目的论看作必然性的一种这一独特的见解,“认识和生产作为理性的能动过程,乃是目的论的过程,在其背后是必然性”;

研究作为哲学导论的思维的社会学问题;

分析“生产方式”和“表象方式”的相互关系;

. . 施马尔豪森是苏联生物学家,进化学说的理论家,著有关于比较解剖学、进化形态学、动物生长规律性、进化的因子及规律性、生物控制论等方面的著作。

强调艺术中感受和体验的作用,科学中直接知识的作用,包括“接近自然界”的重要性,“同自然界的感情联系”的重要性;

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思想,“理论是历史的,而历史是理论的”。

布哈林眼界广阔,不拒绝吸收和利用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他引用 . . . 维尔纳茨基关于生物层的学说用于分析自然界的完整性,指出遗传学在认识生物界规律中的作用,微观物理学在揭示间断性与不间断性这两重性中的作用,在批判种族主义中利用人种志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种族和民族起源的大量研究成果,分析著名的国外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如 . 莱辛、. 凯泽林、. 舍勒等人的著作。奥古尔佐夫认为,布哈林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述的许多问题甚至到 60 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仍然是新的。这充分说明布哈林哲学思想的超前性。

布哈林在这里研究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想,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他像过去一样,仍然不安于墨守成规,而是继续他在 20 年代初开始的哲学探索。本文没有可能来全面研究和评价布哈林在手稿中所作的探索,而只能举例介绍其中的某些观点。

关于“表象方式”(Vorstellungswiese)

早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就提出,与生产方式相对应,应当确立“表象方式”的概念。在写于 1923 年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简略的札记)》中他明确

见《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6—7 页。

此词有不同的译名,在《布哈林言论》中译作“观念方式”(第 136 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译作“概念形成方式”(第 272 页),本文统一作“表象方式”。

宣布说：“我认为我的理论职责在于把已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表象方式’的原理提到首位。毋庸置疑，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同‘生产方式’相应的概念。换句话说，有一个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并由它决定的相应的表象方式。”布哈林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原理，生产方式决定表象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乃是把人和物这两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这种生产方式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没有像研究生产方式那样明确研究过表象方式问题，但有过一些暗示，如关于必须研究“智力层”（Ideologische Stande，或译作“意识形态层”）的意见。表象方式指的是“装容认识材料的意识形态形式”。布哈林给表象方式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总的风格，也就是一定时代特有的，各种观念、思想、感情、形象的特殊结合方法。”布哈林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从上到下社会生活的唯一基本的“风格”问题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相对性问题。这里确实讲得比较简略。到1937年写的《哲学短篇集》里，问题就比较展开了。

布哈林之所以要恢复表象方式这个概念，是想以此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应当确立这个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概念：既然在物质生产方面存在生产方式，那么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就应该存在相应的表象方式。其次，必须科学解释表象方式同生产方式的

《布哈林言论》第136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54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272页。

关系,即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这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私有制出现,社会分解为对立的阶级,劳动分化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后,物质和精神二元论成了思维的普遍形式,普遍的“表象方式”,当然,各有其与不同类型的阶级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较为具体的不同方案。布哈林以封建社会为例说明表象方式的存在。封建社会的“经济风格”可以用固定的等级制原则,或者等第观念来表达。在封建社会里农奴和土地占有者、附庸和领主等等在经济上都处于等级依附关系之中。相应地,其他“生活领域”,整个意识形态也都具有等级制的“风格”。那时人们的思维都是宗教性质的。而“宗教就是按等级制、等第的方式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科学、艺术等等无不浸透了等第观念,这在其风格上都有表现。“等第,这就是全部生活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统一性中也表现出‘表象方式’对‘生产方式’、‘观念体系’对‘人的体系’的依赖关系;而‘人的体系’又决定于‘物的体系’即社会物质生产力。”

布哈林反复强调“表象方式”对“生产方式”,“观念体系”对“人的体系”的依赖关系,这不是偶然的。自从人也一分为二——灵魂和肉体——之后,这两者的关系就经常被颠倒了。一方面,灵魂、精神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主人,而肉体则是消极地俯首听命的奴隶。世界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世界精神、神、创造者、造物主,或者“第一推动力”、天道,或者非人的、无定形的、无所不在的精神,活力的普遍原则,自在的目的,总之,积极的、起决定作用的、发号施令的原则;另一方面,与之对立的是物质,某种惰性的、消极的、受罪的、俯首听命的、粗野不文的东西。

从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层”的观点看,人被一分为二,世界被一分为二,甚至普遍的概念也成了对个体的一种指挥控制的原则。使“一般”独立存在并神化,是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根源。如列宁所说,概念在其形成的萌芽状态中已经存在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布哈林指出,实际上,要辩证地,即全面地理解概念本身,必须把它同物质的和社会的根源联系起来,即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关于科学学说或哲学体系也同样如此。必须在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它们,把世界看作认识的客体,必须从外部世界的观点,从世界是真实的存在着的观点,从继承性和在思想王国中的地位的观点,从它们社会—物质的起源的观点,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能的观点出发,否则就会是枯燥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即不全面的理解或不理解。

关于因果论和决定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有一章专门谈因果性和目的论。在这里布哈林对目的论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他指出,目的、合乎目的等等概念,完全不适用于整个宇宙,现象的规律性并非目的论的规律性,而是因果论的规律性。目的论的观点是以宗教为立足点的。就其来源而言,这就是把世俗的奴役关系生搬硬套地运用到整个世界。目的论的观点是与科学的观点根本对立的,它所依赖的是信仰。为了解释现象,需要的不是目的论,而是探讨现象的原因,即指出因果规律性。布哈林的这些说法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对因果论还需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在《哲学短篇集》中布哈林又反过来谈因果论和决定论。他指出,规律性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必然性是事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57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9—23页。

物和过程的联系,主体存在或不存在与之无关,主体如果存在,可能揭示它,也可能不揭示它。如果揭示它,则根源是外部世界及其真实联系。因此,“规律”、“必然性”作为某种客观存在,在“规律”、“规律性”、“必然性”、“目的论”等等中得到反映。不过,它们的反映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布哈林接着分析了目的论的必然性问题。在现实世界里是否有确实存在并能引向错误道路的东西?有。这首先是人自身的实践。在人之外的客观联系中被当作客观规律的东西,在有目的的实践中就变成规则。培根把这种联系叫做:在观察中是原因的,在实践中则是规则。如果热能使物体膨胀,那么,要使物体膨胀,就需予以加热。因此,存在相对适应外部环境意义上的目的性,这是事实。问题不在于否定这一事实,而在于揭示其实际内容,找到自然界的辩证联系。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个事实。在自然界中是存在合乎目的性的东西的,如适应性,在其背后隐藏着必然性。然而,在社会一分为二的条件下,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自然界的必然性反映在人的社会意识中却成了超人的目的论。他举自然界中的突变为例,指出突变并不是按照目的论进行的。古代哲学家完全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自然选择抓住偶然的突变。凡发生有益的突变的品种就有较大的机会生存下去,凡不适应的则灭亡。自然选择经过筛选并留下最能适应的品种。不管怎样解释突变,这里并不存在事先定下的目的。目的性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其反面则是成千上万的“不适应性”,是大量的不适应的物种的灭亡。目的性本身在这里是事后的,而不是起推动作用的。它可以说是必然性的副产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47页。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59页。

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目的性是必然性的一个因素。这一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不懂,俄国的像丹尼列夫斯基一类的反达尔文主义者不懂,以汉斯·德里什为首的现代活力论者也都不懂。布哈林承认,这里存在真正的目的、目的论,这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但目的论本身是历史地产生的必然性的一个因素。目的是(地上的)人的目的。如就全球而言,我们可以说,地上存在目的,这是人的目的,是地球、自然界的产物,而不是超人的星球的目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把人看作机器,不否定特殊品质,不否定目的,正如它不否定理智一样。然而辩证唯物主义把这种特殊的品质看作自然必然性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把人看作矛盾的两位一体:自然的对抗者和自然的一部分,主体和客体,而把特殊的目的性原则看作必然性原则的一部分。这符合事物和过程的真正联系,而幻想的联系必须毫不怜惜地予以摧毁。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目的论是必然性的一个因素,在这里“认识和生产作为合理的积极的过程乃是目的论的过程,在其背后则是必然性”。布哈林这里的解释显然比过去进了一步,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独特观点,或者说,是布哈林的一个“新东西”。

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

从 20 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和政界一直指责布哈林在鼓吹机械论,认为机械论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是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的明证。然而,什么是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真正过错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当时的理论家们并没有

《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47—48 页。

《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47—49 页。

《哲学问题》1993 年第 6 期第 6 页。

能说清楚。显然是为了回答众多的指责,布哈林在《哲学短篇集》里用了专门的一章来谈“机械唯物主义之罪错”。

布哈林认为机械论的特点是:偏重对象和过程的数量特征,把质量变成某种主观的东西,把一切联系都归结为作机械理解的因果关系,把生物还原为机械联系,把整体还原为部分的总和,把目的论排除于科学之外,反历史主义。机械论的错误表现为,把世界图景简单化、贫乏化,“把世界庸俗化”。

布哈林指出,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反辩证法,其表现为:

只见量,而无视质。原子无质的差别,只存在量的不同。其运动的规律是机械运动即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规律。把任何整体看作是动的组合物,它与其他组合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其构成的原子的数量和位置不同。而实际上,整体并非组合物的堆积。甚至太阳系也不是星体的总和,而是存在特别联系的特殊统一体。运动的规律也有质的不同,而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

机械唯物论的另一个缺陷是看不到发展,反历史主义。实际上,如果任何统一都是机械的平面的统一,而不是辩证的,不是矛盾的,不是向新的质过渡的统一,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发展——使“新的”形成,并使“旧的”消失。

布哈林接着就此谈到了平衡论,对平衡论发表了自己的新看法。他写道:

“因此,例如在精致的机械唯物主义方案或表现中,在著名的‘平衡论’中,对生产关系(物质的‘活机器’在劳动空间的协调配合——社会物质同物理世界的物质是一样的!)提出了极端机械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又把平衡(哪怕是动态的平衡)作为出发

点,而实际上一般平衡只可以看作是运动的个别状态。”

这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包括他本人所主张的平衡论的反思,或重新评价。无论如何,这里布哈林已把平衡论归入机械唯物主义之列。

布哈林把几种哲学观点进行了比较,指出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它对主体的理论看法是消极的。对主体持积极看法的是唯心主义,但它否定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并且是积极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但是革命的。在其后面的进化论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反对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既是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是革命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反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这些对立面联合在统一之中。

* * * *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几部著名的著作是在监狱里写出的。卢森堡在德国资产阶级监狱里写下了《论俄国革命》的未完成的手稿。葛兰西在法西斯意大利的监狱里写成了《狱中札记》。而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竟然也是在监狱里写成他的最后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的!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也是在监狱里完成他们的著作的,如经济学家尼·德·康德拉季也夫的《经济静力学和动力学》,此书直到1992年才得以问世。生物学家 . . 瓦维洛夫在狱中也写有札记,但是,据说没有保存下来。

为了成为“哲学权威”,斯大林必须打倒历史上的以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1929年斯大林在中央四月全会的报告中用专门的一节“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来论证布哈林是“不懂辩证法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42—43页。

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显然,不否定布哈林作为党的最宝贵的理论家的形象,斯大林就无法树立自己的理论家的形象。当然这还是不够的。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作了《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其他哲学家来了一个横扫一切,指名要批判德波林派、“揭露普列汉诺夫”以及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警告“别忘记梁赞诺夫”,声称“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布哈林当然是少不了的。斯大林提出,“还应当把布哈林好好捣腾一番。应当狠狠批他,因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搞得混乱不堪。报刊上对布哈林在这些问题上的批判是不准确的。这里还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好好捣腾一番”。斯大林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只有米丁当时所作的笔记,藏于档案馆。既然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也上了“黑名单”,其他哲学家自然更不在话下了。在哲学战线上彻底捣腾一番并最后从肉体上消灭了布哈林之后,斯大林终于端出了自己的哲学巨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对自己的这一著作的安排颇有意思,把它放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里,这一章本应好好介绍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而斯大林却趁机塞进了自己的东西,显然是要把它当作列宁主义的哲学经典!

布哈林以研究经济学开始自己的理论家生涯,以研究哲学结束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对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1—62页。

见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莫斯科1990年版第29页。

自己的理论研究、政治活动,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作系统的总结,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布哈林一向没有以哲学家著称,他的头上一直戴着“不懂辩证法”的“烦琐哲学”的帽子。列宁当时给予的评价自有他的道理,但是,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他的政治、经济、哲学论著充分证明,他是那个时代最好地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家。对布哈林的哲学遗产至今研究得很不够,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缺了布哈林这样的哲学家,那是残缺不全的。

布哈林和文化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文坛出现一个颇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它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为指导,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据点,宣传在空白地上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尽管他们在普及大众文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们的一些领导人闭门造车,企图在实验室里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狂热努力,无疑给苏维埃文化事业造成了损失。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群众文化活动,列宁是支持的。但是,列宁坚决反对他们抛弃人类文化遗产,关起门来杜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一切企图。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是一

致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

布哈林曾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热心支持者,十月革命后有一段时间他的观点接近于无产阶级文化派。1918年7月23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书评栏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化》杂志的评论,表示同意它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和文化教育运动的必要性的思想,这种运动是同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并行的工人阶级的运动的特殊形式。”布哈林完全同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这一关键立场,只有一个保留:“如果抛弃波格丹诺夫所固有的、在杂志上常常见到的某些夸大和偏向。”与此同时,他也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验室”的提法,不过他反对“实验室脱离政权机关的法律命令而独立的要求”,认为“当国家机关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工人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也不应当)不服从法律命令”。该杂志第3期对布哈林的书评作出反应,表示“满意地欢迎布哈林同志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种熟练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不同意有关法律命令的提法。1919年布哈林在《复仇者》一文中宣称:“旧剧院应当摧毁。谁要不懂得这一点,他就什么都不懂”。1922年10月9日他在《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消灭教育中的人文倾向而代之以实际技术知识”。1920年10月9日政治局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时,布哈林在给列宁的条子上表示不同意利用文化遗产的提法,认为“‘夺取’全部资产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莫斯科1993年版第7—8页。

见《真理报》1919年12月16日。

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阶级文化,正如‘夺取’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不摧毁它是不行的,……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系是在其组成部分的另一种联系上为无产阶级所吸收”。

在艺术实践上,布哈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热心提倡者。1919年秋,正当尤登尼奇攻到彼得格勒城下、邓尼金威胁共和国中部之际,布哈林到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观看了《红色真理》一剧的彩排。10月16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短评《同白军的斗争和戏剧》,称赞此剧的上演对群众的影响要比几十次群众大会强千倍,并对没有像样的演出场地表示不平。1926年当《劳动报》攻击梅耶霍利德剧院上演的《怒吼吧,中国》时,正是布哈林出来为之辩护。在此期间他经常出入工人剧院、红军剧院和梅耶霍利德剧院,这些地方斯大林是从来不去的。

可以看出,布哈林不属无产阶级文化派,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同他们有共同之处,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甚至把布哈林叫做无产阶级文化的“保护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间存在分歧。

托洛茨基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的。他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估计得比较乐观,认为有20—50年就足够了。无产阶级在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之前,其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

其次,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没有可能去掌握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夺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在专政时代是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的,即谈不上具有最伟大的历史规模的建设的;而当专政的铁钳已无必要的时候出现的、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建设,将不会再有阶级性了”,“无产阶级专

政并不是新社会中管理生产和文化的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秩序。”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无产阶级掌握文化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全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所以他得出结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我们这里大概在十分之三的场合下是不加批判地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下指无产阶级的个别集团掌握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个别要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下,谈论的概念和文字是如此混乱,以至完全不知所云。”当然,他更不同意无产阶级文化派关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验。他写道,“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似乎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在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阶级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托洛茨基表示支持。他说,“让我们约定,共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学文化的运动,亦即为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1924年5月9日他在俄共中央文学讨论会上在回答协会领导人普列特涅夫时重申:“我答应您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存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将支持,但在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抽象概念这一问题上,我是完全反对您和您的保护人布哈林的,我是完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

十月革命之后布哈林也曾是激进的世界革命拥护者,指望

《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378—386页。

同上书,第384页。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同上书,第545页。

在几天几星期内世界革命大功告成。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渐进的、比较缓慢的有机发展过程,一种进化过程。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完全有时间创造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错误的,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忽略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不平衡性。例如,一个国家取得了政权,而另一个国家尚未取得政权,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延长了。布哈林在1925年2月的上述会议上指出,托洛茨基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说,“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托洛茨基从这一错误估计得出结论: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这一特点发展得比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快得多。布哈林认为,旧文化在“消散”,而无产阶级文化则越来越快地“在形成”。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会具有自己的特点,如集体主义精神、都市主义的情绪等等。“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被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

撇开文化问题不谈,这里的根本分歧是对过渡时期的估计

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389页。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339—340页。

问题。在这一点上,布哈林的估计显然要现实得多,实际得多。至于无产阶级文化,那么它的概念在那个时候就已是明确的,论者各有自己的理解,并不存在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谈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各讲各的,谈不到一起去。

在这一点上,在布哈林和列宁之间也存在分歧。1922年9月27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列宁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对文章作了批注,寄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种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东西来虚张声势的昏话,指出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要编辑部予以批驳。接着列宁又同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雅可夫列夫多次谈话,让他写文章批驳普文,10月19日,雅可夫列夫把第一稿交给列宁,但是布哈林对文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看法,拒绝予以刊载。23日在有作者、布哈林、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在列宁处讨论了该文,最后定稿。从次日起分两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布哈林曾坦率地谈过这段历史。他说:我没有理由污蔑自己,“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列宁是反对布哈林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的观点的。布哈林说,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是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我就这件事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他坚持在《真理报》上发表雅可夫列夫文章的第一稿,我就将给以尖锐的反击。于是,列宁劝雅可夫列夫删去文中的一些段落。

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也是很差的”,我们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因此,目前摆在广大群众面前的问题是掌握起码的文化知识,而不是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所以雅可夫列夫的文章强调,首先应当学会文明生活,防止头上生虱、床上长臭虫,养成工后饭前洗手的习惯,不以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为荣,扫除文盲,消除官僚主义,等等。他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这真正‘落后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应当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布哈林对列宁的思想是这样概括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还未能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还是高谈阔论。”

列宁和布哈林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布哈林本人讲得并不清楚。最根本的一点是列宁基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存在,他支持作为群众文化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但是坚决反对他们臆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他虽然有时也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个词,但赋予它另外的含义。例如他在1920年10月11日给布哈林的便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这就把无产阶级文化的出现推到遥远的未来了。如上所述,列宁多次以学习全人类文化、学习资产阶级文化去同臆造“无产阶级文化”相对立,他认为,在俄国普及一般文化比创造无产阶级文化

参见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49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1页。

要重要得多。所以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中写道“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而布哈林承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他不否认普及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还有提高的任务,否则就形成不了无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化理应高于资产阶级文化。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也补充说,除了普及文化的任务,还应当研究高级文化问题。布哈林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他说,“应当在广泛的战线上开展文化工作。主要的注意力要放在消灭文盲上,但不应当忘记熟练干部”。他举例说,如果我们现在只让所有人学文化,而不培养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姑且不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那么教课的就不是我们的教授,而是其他的、异己的教授。而他们要教谁呢?教那些中间环节,那些最不成熟的群众。那我们就在这里把事情搞坏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既然我们讲的是千百万人中间的政策,我们就应当强调消灭文盲,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培养干部的技术力量这比较狭窄的领域不应当提出另外的问题。

其次,在对待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上两人的态度显然不一样。从本世纪初 1905 年革命失败以来,列宁一直对波格丹诺夫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先是对他的“经验一元论”,后来是对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中多次批评书中使用波格丹诺夫术语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布哈林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却多少有些偏爱。他在自传里承认对经验批判主义有过“异端的爱好”。他一直反对完全否定波格丹诺夫的

理论。1921年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阐述了宗教的起源后写道：“上面介绍的宗教起源学说，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学说应归功于亚·波格丹诺夫；是他在《社会心理学》文集中第一次提出的。后来的专门研究完全证实了这种推测。”1920年针对波格丹诺夫主义的复活，列宁再版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此他请涅夫斯基撰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作为此文的附录。列宁介绍说，涅夫斯基“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布哈林对涅夫斯基的文章颇不以为然，他给列宁写便条说，波格丹诺夫过去持承认哲学的观点，而现在却废除哲学，代之以“组织形态学”或“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布哈林写道，“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属于经验一元论，而属于另一个方面，对它可以争论，但至少需要把它弄明白。而涅夫斯基却连这个最低要求都没有做到”直到1925年布哈林还认为，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似乎可以说，有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的结合……”

第三，列宁作为政治家、布哈林作为理论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列宁特别关心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独立于党之外并领导文化事业的要求。据卢那察尔斯基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1页。

见同上书，第49卷第569、768—769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0页。

回忆：“列宁担心波格丹诺夫主义，担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里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倾向、科学倾向，而最终产生政治倾向。他不愿意在党的旁边建立一个与之竞争的工人组织。他要防止这种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他给我以个人指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向国家，服从国家的监督”。尽管布哈林在1918年已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脱离无产阶级国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这一点上布哈林主要是作为理论家考虑问题的，在分寸上同列宁有所不同。

从理论上说，用提高文化去补充普及文化，这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列宁那时强调普及文化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这一点布哈林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实践才有比较深刻的体会。1928年1月他在纪念列宁逝世4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列宁在晚年致力于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农民合作化，为此需要一场文化革命。另一个是反对官僚主义，改造国家机关，这同样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这就是时代的伟大的文化组织任务”，对列宁来说，处于中心的是群众。布哈林回忆说，许多年前有过关于文化任务的争论，许多人在十月革命后想立即升入天堂，心向神往，打算立即在科学技术的一切部门进行革命，某些人幻想用实验室的实验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对这样提问题，列宁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行动的。他正确地担心，人们热衷于臆造的、狭隘的实验室的、温室里的问题而抛开群众性的、最起码的，正因其起码而显得绝对必要的文化需要。他用同诸如贪污、共产党员的自大狂、文盲之类的东西作斗争去对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空谈’、‘空话’，其原因就在于此。”问题不在于立即把所有的科学颠倒过来，问题

在于瞄准识字和文化的最基本的敌人,以最快的速度摧毁之,把这些任务放在首位,把我党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用殊死的战斗去打击这一敌人。”可以说,到这时候,布哈林实际上已承认,他同列宁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消除,不是说布哈林错了,而是说他进一步理解了列宁主张的针对性和迫切性,看到了列宁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眼光。

顺便讲一下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是承认无产阶级文化的。1925年5月28日他在东方民族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人类的文化。“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斯大林这里用了一个“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矛盾用语。全人类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无产阶级文化是阶级文化,它是全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全人类文化则是人类历史上阶级文化的总和。而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阶级之后出现的全人类文化中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因此,说“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表示此文化属于全人类则可,把无产阶级文化等同于全人类文化,则缩小了全人类文化的内涵,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社会主义和文明

俄国是个文化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布哈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50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7、119页。

林是看到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布哈林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革命之初他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立即取得胜利上,指望他们胜利后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的援助。所以他坚决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不久他承认了错误,改而到国内寻找出路,把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提到首要地位。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和俄国国情的深刻分析的结果。他曾打算写一本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这本书没有问世,只发表了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把这两种不同的革命做了深入的比较。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的组织,它们的机构是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整个地,即同它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城市里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两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中整个地,即同生产机构的行政上层一起成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是:1、新经济的物质骨架,已经积聚和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技术上可能的劳动调节过程;2、无产阶级;3、组织、行政、指挥的工作人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能成为未来行政机构的骨干的工人组织。顺便说一下,这显然比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是在“空白地”上产生的说法有说服力得多。两个不同时代的革命阶级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放在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已经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已经是工业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5页。

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有可能在敌对制度内成长起来。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自己的文化,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落入这个阶级手中,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教育的垄断者。贵族的、骑士的学校迅速让位给工商业学校。因此可以说,在封建制度内,资产阶级文化已经高于封建农奴主文化。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前在文化方面已经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然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却不相同。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与此相适应也垄断了教育。无产阶级所获得的技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技能。“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而言是比较高的,例如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法学家等等。布哈林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

这一点在 1923 年 2 月《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的报告中讲得更清楚。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起来,这个阶级有能力砸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剥夺资产阶级,镇压内部敌人的反抗,也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残余的反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善于全部完成新社会的组织职能的阶级成熟起来,不可能全部完成,也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只能在过渡时期逐步完成。

布哈林在这里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天不足之处,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落后于资产阶级的事实。看到并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会千方百计地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克服自己的不足,掌握管理国家和工厂企业的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列宁所说的不仅夺取俄国,而且还要管理俄国。

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问题还有更严重的另一面,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文盲众多,科技落后。在这样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困难的。同列宁一样,布哈林也认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相对来说夺取政权比较容易,而要巩固政权,进行建设则要困难得多。这是俄国的国情。

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有被文化更高的资产阶级战胜的危险。他举了一个列宁也经常说起的例子。历史上常有野蛮的部落征服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胜利者被人家从下面削弱了。过去的胜利者掌握了被战胜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每次都是这样发生的:“社会的必然性要求比征服者所能提供的技能更高的文

化力量来执行职能”。那时,文化较高的被征服的阶层有意无意地逐步实行渗透,不知不觉地慢慢站到胜利者的位置上去,并使他们在一切方面实际上服从自己的影响,从而把他们同化了。布哈林指出,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可以简单地镇压敌人,工人阶级可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集团,在物质上可以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有可能被自己敌人的文化更高的力量从下面吃掉”。“这种危险必然摆在每个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前”。因此,布哈林认为必须正视事实,必须承认,俄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学无术的,要大声疾呼:我们什么也不懂。

同这一危险相联系的是另一个危险,从敌对或半敌对的社会阶层中产生新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再次成为被剥削阶级。一方面是从部分耐普曼中、从部分知识分子中可以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然而,“还有另一个可能是更加本质性的危险”,这就是“甚至无产阶级出身和异常粗糙的手以及其他优秀的无产阶级属性,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变成新的阶级”。布哈林认为,这一点他必须坦率地、毫不掩饰地指出,“这是我的职责”。他说,如果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们凭借这种出身而长期占据垄断地位,那么他们也可能变成特殊等级,变成新的阶级。他解释说,如果工人阶级第一批进高等院校学习的人形成了小圈子,后来受高等教育的只是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那就会形成一个排他性集团,作为教育的垄断者进行统治,这样他们就会形成垄断的特权阶层,蜕化为一个新阶级。对于这种危险,一方面只有用文化力量在数量上的优势去解决,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要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干部,逐步代替

旧知识分子和旧职员,他们在质量上不比旧的低,数量上又比旧的大,另一方面,获得教育的工人干部不要自我封闭,不要搞垄断。“如果能保证从工人群众本身中源源不绝,与日俱增,形成来自工人阶级的补充阶层,我们会胜利,我们就会在这方面排除这个深刻危险”。换句话说,必须让更多的工人受教育,得到技术训练,掌握管理的技能。这样,就可以从文化教育方面防止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蜕化。

在1921年问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蜕化的危险是这样说的:在过渡时期,由于工人阶级不是在它成为单一成分时取得胜利的,是在生产力衰退和广大群众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蜕化’的倾向即分化出一个作为阶级的萌芽的领导阶层的倾向,是必然存在的”。但它也被另两种相反的倾向所抵消:“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教育垄断的消灭。从整个工人阶级中扩大再生产出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将动摇可能发生的新的阶级分化的根基。”至于斗争的最后结局,将取决于何种倾向更为强大。

指出工人阶级蜕化的可能性,并提出预防的办法,这是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

当然,在俄共(布)党内看到蜕化的可能性的并非布哈林一人。1924年2月布哈林在为纪念列宁而作的报告《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中谈到,他曾写文章论证过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和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之间的巨大原则差别,后来又继续予以发挥,在理论上加工提高。他真诚地相信“已经在这个小小的理论领域中,在一定的小分支里总算说了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新看法”,然而,布哈林发现,他所说

的一切,实际上都已包含在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次讲话的短短四行话里。

作为对照,现引列宁原话如下:“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的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后来列宁也借胜利的野蛮民族被战败的文明的民族同化的历史事实,来说明提高文化水平的极端重要性。

工人阶级的蜕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权力的滥用,权力向资本的转换,等等。然而,不可否认,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是其原因之一。今天,当我们面临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的事实,在总结历史的教训时,很有必要也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去考察其深层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资本主义在技术改造的基础上的复苏和发展,布哈林越来越感到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20年代后期他多次作报告写文章论证科学技术的作用,如1927年为文集《十年来的科学和技术》而写的文章《科学和苏联》、1928年为纪念列宁而发表的讲话《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1929年1月发表的文章《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1929年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后写的文章《技术经济革命,工人阶级和工程师》,等等,布哈林宣布,现在已经可以提出被列宁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的那些任务,即“可以叫做科学革命的任务”,而这在以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62—163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页。

前是不可能提出的。

布哈林强调,“科学是巨大的补充的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革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科学从神学的婢女、金犊的婢女变成了劳动人类的朋友。“它正在帮助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行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繁荣也意味着人类知识的巨大胜利。

布哈林发挥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论点——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有“自己的”相应的技术。利用旧的技术遗产或进口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他认为,如果不是着眼于短的时间间隔,不是着眼于过渡时期最初阶段,那么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单位的巨大规模势必引起新的需要,即需要新的、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即有质的不同的机器,需要发展和合并扩大技术综合体,需要增设规模越来越大的技术设施,需要建设联合型的电站,等等。而日益提高的经济的计划性,联合企业原则的发展,工业同集体农业的新关系,更适宜的工业地理布局,新城市的新规划,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同各种劳动工具及其技术综合体的质的改变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将产生出自己的技术,这种技术反过来又将推动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

在运用科学技术方面,这时候布哈林已经是拿来主义者,主张从西方取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生产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对资产阶级科学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56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337 页。

同上书,第 392 页。

进行批判的革命的改造的结果。技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次首先是在技术科学领域,但是做的时候不能从初步知识开始,而应当利用西方科技的最新成果。

他不无感慨地承认,同我们的许多资本主义对手比起来,我们是太落后了。“我们在技术领域应当依靠西方的成就,从敌人那里吸取一切能够吸取过来的东西”。布哈林强调,“这在经济上对我们是绝对需要的”。布哈林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在已能依靠技术变革,并以空前地提高群众的福利为己任。他引德国教授邦洪的话说:“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让居民享有同样好的——而不是同样坏的——经济福利。因此,合理化问题在苏维埃俄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不能建立一种比西方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家所创立和领导的更加有效技术的机构”。布哈林认为,问题的这种提法基本上是很正确的。这样,布哈林又把科技革命同群众和福利联系起来。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是布哈林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讲此话是1929年底,这时布哈林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失势,斯大林一方面向农民的利益大举进攻,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沙赫特事件打击旧工程技术人员。布哈林在文章中不得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利用机会为技术经济革命和工程师说话,大力提倡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从30年代起,尽管苏联经济的某些部门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管理体制,由于对科研工作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苏联并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36页。

同上书,第336页。

没有发生预期的科学技术革命,甚至面对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而无动于衷,错过大好时机。

总的说来,列宁逝世以后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中,只有布哈林念念不忘列宁在最后的时日提出的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指示,布哈林通过几年的实践,深深感觉到文化的落后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也阻碍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此,在20年代后期,布哈林反复宣讲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他认为,列宁的巨大计划可分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民群众的合作化,为此需要整整一场文化革命,第二个问题是改造国家机关,用文化上成熟的工人去充实它的所有毛孔,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个文化问题。“全体合作化的农民同摆脱了官僚主义祸害的国家政权的骨干——真正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骨干之间的结合,这就是时代的伟大的文化组织任务。”这个概括是准确的,是符合列宁的最后思想的。

开明的文化政策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成立了新的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只有布哈林没有担任政府职务。1917年11月27日,列宁建议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列宁显然想发挥布哈林作为经济学家的才干和作用,认为经济政策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需要像布哈林这样“内行、能干的人”。然而,中央委员会讨论时布哈林本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50页。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19页。

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中央书记斯塔索娃也认为,《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他可在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他反正也不适于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3人进入编辑部。这个职务布哈林一直担任了12年,中间只有过一次短暂的中断(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真理报》主编是布哈林的主要职务,这样他也就自然而然地主管起意识形态的工作。在《真理报》出版的所有时期,布哈林主编时期可以说是办得最好、最活跃的时期。那时报上各种争论、讨论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真理报》都出版“争论专页”,发表对党的方针路线的各种不同的看法。直到1929年布哈林被解除主编职务以后,《真理报》才变成只有—种声音的“—言堂”。

20年代也是文化艺术领域思想最活跃的年代。当时各种文化艺术团体蜂起,各种艺术主张并立,各种学派争雄,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然,这里也免不了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其中就有自命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稍后出现的“岗位派”。它们的出现造成了文化思想工作方针的混乱。为此,俄共(布)中央于1924年5月9日和1925年2月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布哈林在这两次会上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讲话。

1924年的会议由俄共(布)中央召开,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雅·阿·雅柯夫列夫主持。会议在1923年就已开始筹备。参加会议的有党的领导人,—些文学团体的代表。雅柯夫列夫在会上宣读了由—批著名的无党派作家写给会议的信,在信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页。

签名的有 . 皮利尼亚克、. 叶赛宁、. 曼德尔施塔姆、. 巴别尔、. 托尔斯泰、. 普里什文、. 吉洪诺夫、. 左琴科、. . 伊凡诺夫、. 福尔什等等。他们反对《岗位》杂志对他们的无端攻击,信中写道:“我们认为必须声明,这样对待文学是同文学,也同革命不相称的。我们苏维埃俄国的作家深信,我们的写作劳动是它所需要的,是对它有用的。”会议听取了 . . 沃隆斯基和 . . 瓦尔丁的报告。参加讨论的有 . 奥辛斯基、. 拉斯科尔尼科夫、. 波隆斯基、. 列列维奇、布哈林、. 雅柯夫列夫、拉狄克、. 普列特涅夫、托洛茨基、梁赞诺夫、. 别德内依,等等。会议通过了雅柯夫列夫提出的决议案,其中有6条肯定了文艺领域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创作,同时必须支持站在十月革命立场上的同路人。决议谴责了《在岗位上》杂志使一些有才能的作家离开党和苏维埃的做法。决议强调,任何文艺流派或团体都不能也不应该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

1925年2月俄共(布)中央再次召开文艺政策会议。会上各派代表继续就党的文艺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会上的报告成了这次会议决议的基础。

在1924—1925年间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在岗位上》为代表的岗位派,他们继续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为己任,自命为无产阶级代表,号称得到党的支持,他们要求建立党对文学的专政,并由他们领导的“伐普”充当这一专政的工具。布哈林在两次会上的讲话主要就是针对他们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领导权问题

布哈林认为,领导权问题是存在的,但是,领导权不能自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还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无产阶

级取得政权以后也就取得了政治领导权,然而在艺术、科学和其他领域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掌握领导权的地步,因此布哈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权利”。要获得这一领域的领导权靠发宣言、写提纲是不行的,归根结底要靠作品,靠作品的竞争。从总的方面讲党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并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诸如创造新的风格问题,不同风格的共存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问题,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等等,“这只能在分子的运动中成长,我们将在这里开辟最广阔的竞赛天地”。文化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文化问题同战斗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通过打击的办法,施加机械暴力的办法去解决。它也不能用骑兵突击的办法去解决。它只能用同理性的批判的方法相适应的综合的办法解决。而主要是在相应的作品上竞争的办法”。布哈林声明:“我主张进行总的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扼杀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好办法,最好手段就是抛弃自由自在的竞争”。如果由国家政权去调节文学,让它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那就会扼杀无产阶级文学。他认为,作家的任务不是起草各种各样的宣言和提纲,而是深入生活,观察、概括并竭力把握尽可能多的生活面。一本好的文学作品胜过二十个纲领!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46 页。

同上书,第 350 页。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64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52 页。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 65 页。

因此,布哈林反对岗位派提出的把国家出版社交给他们、由他们去整肃文学界的要求,反对他们的垄断原则。

要用作品去争取读者。在这里基本任务在于提高读者的水平,使得无产阶级作家能引导他们。无产阶级作家应当为自己树立一定的威望,争得领导这些读者的历史权利,正如党和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得领导权一样。1927年1月12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辛辣的短评》,评论“叶赛宁现象”。他指出,我们现在经常给读者提供令人吃惊的单调的意识形态食品,而忘记了消费者的兴趣,消费者得到的经常是一模一样的条文和通告,写得单调枯燥,令人恶心发呕。过渡时代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复杂,它充满了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个人的矛盾和冲突,这里有戏剧、喜剧、悲剧、抒情诗的表现之余地,有发挥一般世界观和科学、哲学——所有贴有人类“精神文化”标签的东西的广泛兴趣之余地,共产党人和一般工人不是会行走的抽象物,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们有爱有追求,他们有喜乐悲哀,他们战斗,他们活着和死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有两只脚的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不是关于目前局势的决议中的一个章节和条文。布哈林指出,在群众的需求同产品质量之间存在“剪刀差”。他以叶赛宁的影响为例问道,叶赛宁用什么去掌握青年?为什么在我们青年中间有“叶赛宁小组”?为什么在共青团员家里,在《共产党人手册》下常常摆着叶赛宁的诗集?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思想工作者没有去拨动青年人的心弦,而叶赛宁却拨动了,虽然是在实质上有害的形式之下。布哈林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不能用大量相同的东西去喂养我们的青年。要提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更多地关心有特殊心理的活人!更多地注意多姿多彩多方面的神奇复杂的生活!少一点质量低劣的模式化

的材料这种官僚的思想创造物！

二、同其他阶层作家的关系问题

1924年的报告中，布哈林一开头就提出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读者问题、作家问题、我们对这两者的态度问题。岗位派把任务简单化了，认为我们这里只有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集团，因此问题只在于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寻找不是纯无产阶级的艺术观，对他挥舞大棒，而此大棒组织上的化身就是“莫普”之类的组织。布哈林指出，我们目前的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而是存在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文艺界的情况也与此大体相似，除了无产阶级作家以外，还有农民作家和“同路人”，这就有一个三者的关系问题。对农民作家不能因为他是非无产阶级而扼杀他。对农民我们要考虑到他们的分量和特点，逐步地引导他们走非农民化的道路，在文艺领域以及其它意识形态领域也应这样做。“我们应当引导农民文学追随无产阶级文学”对同路人也应如此，应该像吸引农民那样吸引同路人作家，而不应该用大棒打脑袋，或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布哈林认为，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他领域中所没有的很重要的特点。对农民，我们必须改造他们，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对同路人也应该这样，对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以驱逐。他说，如果这样做是对的，那就不应该像某些农村支部党员那样，像对待牲口那样对待农民。他强调，“在改造人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分寸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109—110页。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64页。

感”。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自身的自我教育问题,要反对“共产党人自大狂”。他指出,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什么成就、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共产党人自大狂,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就可能把事业毁掉。是骂我们一无所有的人,还是吹我们是大地精华的人更有害呢?恐怕是吹我们的人更有害。

因为,如果我骂无产阶级作家,这绝不意味着我暗中否定他们有权发展自己,只不过表示:请注意,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最危险的东西。

三、关于文艺团体

为了开展竞争,布哈林主张成立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但任何团体都无权代表中央说话。岗位派宣称,“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他们的头上缭绕。布哈林对此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尽管他本人支持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列宁反对这种观点却是事实。岗位派并不代表列宁的思想。中央委员会并不把自己像发针一样别在某一团体身上。布哈林号召“组织起一千个、两千个团体吧,除莫普和伐普之外,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但是,它们不能按照党、工会和军队那种类型去组建,在文化领域应提出另一种组织原则,问题不在于称呼,它们必须是完全自愿的组织,非常灵活的组织,而不是靠拨款生活的组织,当然,它们在色调上可以有所不同。它们之间可以开展最广泛的竞赛。这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必由之路。

布哈林的这些主张写进了俄共(布)中央 1925 年 6 月 18 日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48 页。

《布哈林文选》,第 351 页。

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有材料证明,此决议的作者就是布哈林本人。应该说,这是苏联 70 多年来关于文化政策的最好的一个决议,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实践上看,20 年代也是苏联文坛最活跃的历史时期,那时流派繁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和 30 年代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针之后的形势迥然不同。

1929 年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对布哈林所主张的文艺政策作了如下评介:布哈林反对仅仅因为作家的艺术观点不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就把他们统统“碾碎”。布哈林认为文学领域的领导应该仅限于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文学的形式、创作风格等等则应听任各流派思潮之间的公开竞争。

1934 年 8 月布哈林出席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当他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受到“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而在报告结束之后“热烈的掌声响彻会议大厅,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全体起立,高呼‘乌拉!’”。布哈林受欢迎之程度仍不减当年——不过,这对布哈林的命运来说,未必是好事,布哈林的报告已越出诗歌范围,他在肯定诗歌以至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也对某些现象和作家提出尖锐的批评,为了消除误解,他特意声明,这类评论无论如何不可与政治性评论相提并论。在诗歌界,艺术创新的探讨,课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必须有广泛的竞争自由。在这方面使用强制命令将导致创作过程的官僚主义化,并将有害于艺术领域的全面发展。

* * * * *

布哈林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上述主张。

见《拉普“资料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7 页。

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间,恐怕只有他始终同知识分子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布哈林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据说,他是苏联领导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个,按说并不存在做知识分子的朋友的问题。然而,他那时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握有一定的权力,他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往往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同某些知识分子发生矛盾,他是文学评论家,他的评论也常常引起不同的看法,这就存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布哈林为人温和,平易近人,文采出众,机智幽默,广大知识分子对他很有好感。连列宁有时遇到棘手的问题也请布哈林去解决。

1921年高尔基被说服出国,这等于国内少了一个常替被契卡逮捕的知识分子说情的人,高尔基也同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失去直接联系。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沉默下去,他公开抗议他所不同意的一切。例如他在《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给阿·法朗士的信,抗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称之为“卑鄙的谋杀”,“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罗斯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同时他还把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的信的抄件寄给法朗士,信中警告,判处被告死刑定会引起“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对俄国实行道义上的封锁”。为此,1922年9月7日列宁写信给布哈林说:“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高尔基那封写得很坏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太过分了。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常同他交谈?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那时高尔基同列宁周围的多数人的关系颇为紧张,大概是布哈林出面同高尔基进行了坦率的

通信。高尔基给布哈林的信是相当友好的：

“我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谢谢您友好的同志式的信。不会为这样的信生气的，为这些信紧紧握手……关于残暴行为问题，这是使我深感痛苦的问题，我无法放下它……紧握您的手，您是好人，非常好的同志。”

布哈林一共写了4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1928年正值高尔基60大寿并行将回国之际，布哈林在他主编的《真理报》上发了一批庆祝文章，他本人也发表文章《我们期待高尔基什么》，文中给予高尔基以高度评价，称颂伟大作家是集体主义者，是熟悉群众的行家里手，是文化和劳动的鼓吹者，是反对市侩作风的斗士，布哈林颇有感慨地写道，我们历史的英雄首先是群众，而我们这里谁能在文学作品中较好地描绘这些群众呢？可惜寥寥无几。正像绘画中竭力描绘“领袖”（圣像画）那样，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英雄”压倒“群氓”。我们大声疾呼“多写群众！”而响应者寥寥。布哈林寄巨大希望于高尔基。他说，就才能而言，高尔基能够填补巨大的空白。作为自己的艺术家，我们苏联，我们工人阶级和我们党都期待着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期待着高尔基的归来：他是回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的，从事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光荣工作的。

布哈林的这一期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还在1925年高尔基就给布哈林写道

“我们的工人非常好，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这是大写的人！我这一代人无法把握这一极其简单，因而也极其复杂的主题。给我们的任务是描写旧的，但我们没有力量去描绘生活提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306页。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141—143页。

出的规模如此宏大的新的一切。因此聪明适时的做法是去关心青年作家,给他们以激励”。

问题不仅如此,在30年代的气氛下,高尔基也很难写什么新的东西。1928年5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布哈林迎接了他,并发表了欢迎辞,高尔基发表了简短的答词,然后拥抱了布哈林。1932年9月25日斯大林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40周年。这次布哈林被挤到了后边,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没有讲话,直到10月17日才发表他的题为《新人类》的文章,副题为《迟到的为高尔基致庆的文章》。文中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把他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可夫相比较。后3人自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文学巨匠,然而他们也各有其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在世界观上。布哈林写道:“相反地,高尔基沿着自己的深航道游去:大革命的河流负载着他,他同新的阶级一道行进,同它的党歃血结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表现历史的动向,此历史走过一段弯路之后,突然飞速奔跑起来,在它面前著名的果戈理的‘三架马车’也不过是病态的外省人的病态的幻想而已。”1936年高尔基逝世,6月23日《消息报》发表布哈林的悼念文章《高尔基》,其副题是《最后的告别》,这不仅是同大作家的最后告别,也是布哈林同文学评论的最后告别。3个月后,8月23日布哈林主编的《消息报》头版发表文章《把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同卑鄙的恐怖分子的联系清查到底》,而这一天的社论是《枪毙疯狗》,这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的政论活动从此停止。

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1907年春他们曾一起在斯拉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47页。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197页。

得科夫壁纸厂发动工人罢工。此后布哈林从事职业革命工作，爱伦堡则走作家的道路——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月被捕，12月审前取保出国。在巴黎起初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工作，后脱离。十月革命后，爱伦堡曾因有人密告他是“弗兰格尔的奸细”而被捕，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得以获释。后来，1921年在听了爱伦堡关于创作以世界大战和革命为题材的讽刺小说的详细计划后，布哈林又帮他取得出国护照——“创作出差”。1922年初爱伦堡的小说《胡里奥·胡烈尼托》在柏林出版。1922年4月布哈林同拉狄克一起赴柏林参加3个国际代表会议，同爱伦堡在一家点心店作了几小时的长谈，看来向他转告了列宁对此小说的肯定评价。5月5日爱伦堡在给女诗人M. M. 施卡普斯卡娅信中说，“我高兴地获悉，尽管《胡里奥·胡列尼托》写得尖锐而又具有现实性，列宁和盖森还都喜欢它”。1922年国家出版社同爱伦堡签订了出小说第2版的合同，11月25日，爱伦堡给女诗人波隆斯卡娅写道，“国家出版社向我购买了第2版，条件是必须有布哈林（我也希望）或波克罗夫斯基写的序言”。布哈林为此书写了简短的序言。序言说，这首先是本有意思的书，当然，可以就作者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他的掩盖着怀疑主义的虚无主义“无赖行为”等等发好多议论。不难指出，作者不是共产党人，他并不很相信未来的制度，也不那么热切地盼望它。这一切都对。然而，此书并不因此而不成其为吸引人的讽刺作品。特殊的虚无主义，“大挑拨”的观点使得作者能够揭示各种制度下生活中可笑的和丑恶的一面。那些抨击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文化及其道德、哲学和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330页。

同上书，第330页。

宗教的地方,作者写得特别成功。作者原是布尔什维克,了解各社会党的内幕,他眼界开阔,熟悉西欧生活,眼光敏锐,语言准确。因此,此书写得生动活泼,机智而又吸引人。应该说,布哈林的序言写得颇有分寸,并不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这篇序言成了小说的保护证书,使得小说能在莫斯科出版。然而,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此书在30年代难以再版。1929年以后,批评家们不仅批判这本小说,而且批判布哈林的序言。例如,1931年诺维奇的文章《论争取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指责布哈林为“明显的资产阶级作家依里亚·爱伦堡”作序。时过几十年,爱伦堡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用亲切的语言回忆了他同布哈林的交往。

布哈林对叶赛宁的评价引起了不同的看法。1927年1月12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辛辣的短评》,对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叶赛宁现象”作了抨击。所谓叶赛宁现象,不仅指酗酒、放荡、打闹,还有因诗人的死亡引起的对自杀的崇拜。布哈林对叶赛宁现象的抨击同他对叶赛宁诗作的评价不是一回事。他高度评论叶赛宁的诗,就在这篇短评中他把叶氏诗歌的声音比作发出银样的声响的小溪。早在1926年1月19日他在《真理报》上就诗人之死写道:“一种想法减轻了我们心里记忆犹新的无比悲痛,这就是这位优秀的真诚的诗人用自己的方式反映了时代,用诗歌丰富了时代,用新的手法描绘了爱情、落在小河里的蓝天、在天上牧羊的月亮以及不再有的精华——诗人自己。……诗人死了,诗歌万岁!缺乏保护的人类之子突然逝去!直到最

见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30页。

同上书,第330页。

后一分钟谢尔盖·叶赛宁还用诗的丝线编织的创作的生命万岁。”托洛茨基也在这上面签了字。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布哈林称叶赛宁为“用古斯里(俄罗斯古代的弦乐器)伴奏的响亮的歌手,天才的抒情诗人”。但是,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他不能不看到叶赛宁诗作的消极面及其众多的仿效者对当时青年人的影响。他认为叶赛宁现象是当今文坛最有害的现象,需予以大力抨击。从叶赛宁能吸引大批的青年读者中,布哈林看到了无产阶级作家的差距。他写道,文学,包括诗歌,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诗歌塑造性格。然而我们的文学作品提供的却是千篇一律的意识形态的食品。不是说它们都是按照一种共产主义的配方配制的,共产主义当然很好,并且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忘记了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要比降低物价的问题广泛得多,不管降低物价问题多么重要。我们的诗人队伍不是做需要做的事,所有诗人都变成了批评家、组织者、政治家,而不是去研究生活,提高自己,联系群众。而在生活的逼迫下试图“歌唱”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它们所抒发的是别人的声音。资产阶级的最伟大的人物不是天才的醉鬼那号人物,而是像歌德、黑格尔、贝多芬这样一些比任何人都善于工作的巨人。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布哈林号召,更接近美好的生活,更接近正在改造世界的群众!

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评价。还在布哈林获得正式平反以前,1987年,杜勃洛文娜就写文章认为,正是布哈林的这篇文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20页。

同上书,第104—110页。

章使得她们那代人不能去读和爱叶赛宁的诗。然而正是在布哈林处于鼎盛时期的 1926—1929 年间出过两本叶赛宁文集,只是在 1935—1939 年间没有出版他的著作,这时布哈林已不能影响出版政策了。1940、1946、1952 和 1953 年还出过叶赛宁的著作,只是印数不能满足要求而已。· 乌尔诺夫想抹去布哈林理论遗产的意义。对此 · 沙尔诺夫回答说,“上帝保佑,哪怕把布哈林的基本著作印出来,让我们读一读,那时甚至无须乌尔诺夫的帮助,我们也许就能够断定,布哈林和苏斯洛夫谁是更大的理论家,对苏斯洛夫著作的理论价值,乌尔诺夫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马克西莫夫依据《辛辣的短评》断定,布哈林是“日丹诺夫的先驱”。由于大批读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愤慨,编辑部承认发表此文是错误的。叶夫图申柯认为,“布哈林是党内第一个懂得帕斯特尔纳克的世界意义的人,是第一个提出还非常年轻的波里斯·科尔尼洛夫的名字的人。反对‘叶赛宁现象’的不仅有布哈林,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此外,那些年的气氛还相当民主,布哈林对叶赛宁的批评并不会造成导致查禁叶赛宁的诗作和他的名字。因此把布哈林叫做‘日丹诺夫的先驱’,是对杰出的革命家和斯大林及其亲信反民主制度的牺牲者所作的侮辱性的牵强附会”。因《辛辣的短评》而攻击布哈林,此事至今仍在继续,“问题的实质非常清楚,目前布哈林的论敌就是不能原谅这位布尔什维克对准人民的民族主义的无情批

《我们的同时代人》1987 年第 9 期。

《文学报》1988 年 1 月 27 日。

沙尔诺夫:《集团有利于谁》,莫斯科 1988 年版第 41—42 页。

《文学报》1988 年 4 月 6 日。

《苏联文化报》1988 年 4 月 14 日。

判,直到今天这种批判也是致命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是俄国的大生理学家,他不仅在生理学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也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对作为生理学家的巴甫洛夫评价甚高,认为他在生理学领域创立了整整一个学派。他为人类作出的丰功伟绩是不容置疑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不容置疑。“他的条件反射学说是完全为唯物主义效劳的”。他特别欣赏巴甫洛夫从生理学角度对平衡论所作的下述阐述:“什么是适应这个事实呢?不是别的……无非是复杂系统的诸因素自身之间以及整个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精确联系。不过,这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无机体中都可以看到的完全相同的东西。就拿复杂的化学机体来说,化学机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个别原子和原子群自身之间以及它的整体与周围条件的平衡。高级机体和低级机体能够完全同样复杂地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只是因为它的组成部分自身之间以及与周围条件都是精巧地和准确地联系着的、平衡的。分析系统的平衡也是生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目的。”然而,当巴甫洛夫直接论述社会科学问题时,就不免说出一些错话来。例如他自认为态度“客观”地批评布哈林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说“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认定,这就是真理;他们不愿知道更多的东西”,而“科学同教条主义是互不相容的”。他把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说成是“从受奴役的观点去看问题。”为此,布哈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给以回答。文中逐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第336页,上述有关争论的资料均引自此书的题注。

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16页。

条批驳了巴甫洛夫的论点。这篇文章显然伤了巴甫洛夫的心，他同布哈林的关系大为恶化。此后有一天布哈林去巴甫洛夫家拜访，巴的接待极为冷淡。这时布哈林偶然发现巴甫洛夫收藏的蝴蝶标本，便以行家的口吻谈论起来。布哈林在幼年的时候曾着迷于收集蝴蝶标本，曾梦想得到一本《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这样他们开始找到共同的语言，气氛马上改善了，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布哈林既坚持原则，又处处关心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可能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排忧解难。而且他以自己的广博知识、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各界知识分子的好感。正因为如此，布哈林的遭遇也引起他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同情。当他被明令审查的时候，著名作家帕斯杰尔纳克给他写信表示同情和慰问。当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镇压的时候，维尔纳茨基在日记里写道“疯子……谁会相信？”毫无疑问，‘所搞的’审判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奇怪的是，当局竟没有想到无人相信。”

关于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这一阶层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来大，越来越重要。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在当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方面面临着迫切的建设任务，另一方面，又面对大批的职员和知识分子怠工的严酷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清醒地看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主张一方面粉

《民族友谊》1991年第2期第240、244页。

碎知识分子的总工，同时以高薪赎买。在 1918 年 4 月发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写道，“‘有机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但它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并在熟练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参加下完成”，主张“彻底粉碎总工”，“让熟练的专家和知识分子搞义务劳动”。不过，他似乎觉得这样做并不解决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布哈林提出给专家以高额薪金，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列宁也同意赎买，但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做法确实违背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并且不应该混淆专家和资产阶级。列宁指出，“现在所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吸收专家的问题”，吸收的办法，或者用高薪收买，或者通过思想工作。有一个说法不很清楚，据说布哈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说过，有些人收入 4000 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脚下枪毙。由于看不到发言记录，不清楚布哈林从何而发。反正列宁不同意布哈林的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正需要发现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这里能领取 4000 卢布的职位并不多。到处都需要他们，我们没有专家，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招到 1000 个精通本行业务的第一流专家，这些专家重视自己的业务，热爱大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

布哈林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在《共产主义 ABC》中对此

《共产主义者》1918 年第 1 期第 8—9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284—285、253 页。

同上书，第 252 页。

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共产主义力求报酬均等,但是我们不可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目前仍然应当遵循简单的核算原则。如果我们给专家以粗工的待遇,那么对他们来说,做壮工、工程师、通讯员和服务员就都是无所谓的。要这些习惯于另一种生活的人好好工作,而又让他们处于这种状态,这是不明智的。最好是给他们以好的待遇,只要能够出成果,无产阶级应该像一个机敏的老板那样:多给点钱。这可以使这些人好好工作。布哈林同时指出,在实行报酬均等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过去高级职员(经理、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科学专家、顾问等等)的报酬加上各种奖金要比粗工高几十倍,而现在只高3倍,待遇上的差别大大缩小了。他举了一个统计数字。1914年有4.43%的工人的日工资是50戈比,与此同时,也有日工资超过10卢布的工人,其工资差别是20倍。1916年日工资不到50戈比的男工占0.5%,而超过10卢布的为1.15%。而现在根据1919年秋的决定,最低工资为1200卢布,最高工资为4800卢布,并且只给予专家,布哈林断定,“苏维埃政权愈是巩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便会愈快脱离资产阶级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把他们推开是没有道理的”。另外,从布哈林上引数字也可以看到,简单地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划分阶级,而不看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行不通的。

布哈林论证上的某些失误是同当时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把握不准有关。在这个时期布哈林经常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大知识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相对应。1919年10月完成的《共产主义ABC》中把大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0—301页。

知识分子(教授、律师、作家、经理等)与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地主相提并论,称之为“他们的卫士”,“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的奴仆”。“资本家国家同样培养了一批从事愚弄、麻醉和驯化无产阶级的专家,如资产阶级教师和教授、牧师和主教、资产阶级的文人和办报人”。相应地,他把小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列入同一范畴,这包括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公务员和小官吏。布哈林对这部分人的评价要客观一些,认为“这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相当混杂的一部分人。所有这些人多少都受资本的剥削。他们的工作常常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程度。其中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被毁灭了”。布哈林在这里对知识分子所作的阶级分类只着眼于他们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生活水平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以脑力劳动谋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资本家创造利润,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他们所起的不同的社会作用和领取不同的收入,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十月革命后国内出现严酷的阶级斗争,部分知识分子因不理解新政权而进行的怠工,致使布哈林在判断上出现某种失误。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还是这样判断的: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会受到各方面的反抗,这包括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组织者和经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组织者、工业界的“实干家”、大工程师、同资本主义世界有直接联系的发明家等等),熟练的官僚(文职的、武职的和教会的),技术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多数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动物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记者、教师等等)城市中的中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24、30、78—79页。

产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阶级和集团,都必然在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领导和将军们的军事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不过他仍然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知识分子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他接着写道,随着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对阵营里经济上有用的非寄生集团的旧心理也开始出现迅速瓦解的过程。需要查明这些人的人数,把他们集合起来,安排到新的位置上去。而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起强制作用的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组织能加速吸收这些对新制度也有用的成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过程。布哈林这里把技术知识分子列在争取的首位,这是因为他们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比较容易做工作,而且在经济建设中也迫切需要他们的参与。至于他在这里强调强制的作用,显然是当时流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的表现。

1921年写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观点。他把劳动区分为“物质劳动”和“上层建筑性劳动”,认为如果社会要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就要有某些哪怕是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假如一个国家一夜之间所有的科学家:数学家、机械专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不见了,“现代化的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因为它是以科学计算为依据的,这样生产就会倒退。另一方面,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都变成了不参加生产的博学的数学家,也会出现完全的破坏:社会顿时就会一落千丈。布哈林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把过多的劳动用于维持剧院,或国家机关,或教会,甚至艺术,那时生产力必然开始低落。为什么呢?这同一个劳动组合中生产下降是同样的道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12页。

理：在这个劳动组合里，一个人劳动，七个人统计他所干的活，两个人唱歌给他鼓劲，还有一个人监督他们全体。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要吃饭的是全体，而不是一个人，所以很清楚，这样的劳动组合是不能存在很久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统计所干的活，没有人团结这个劳动组合，没有人协调各个成员的行动，甚至只要没有人和外界联系，事情也行不通，不管我们的热爱劳动的同志多么努力。在整个社会中情况也大致相同。”所以布哈林认为，必须掌握适当的比例，使物质劳动和上层建筑劳动两者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同时也要保持上层建筑本身内部分工的恰当比例，即“精神”活动、管理活动等不同领域之间的恰当分工。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提出一个社会的阶级划分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如下阶级：

1、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阶级(本来意义上的阶级)。

2、中间阶级，列入这一项的是这样一些社会经济集团：它们不是旧制度的残余，而是它们所处的那个制度所必需的，它们在指挥的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处于一种中间地位。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技术知识分子便是如此。

3、过渡阶级。它们来自前一社会形态而在当前社会形态中不断解体，分化出在生产中起对立作用的不同阶级。

4、混合的阶级类型。

5、“沦落分子”。

在这个分类中知识分子不再列入剥削阶级，而被当作处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他在另一个地方写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257—258 页。

同上书，第 258 页。

同上书，第 333—336 页。

道：在生产中处于中等地位的是技术员和工程师，技术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在国家机构中充任中级官员并常常应征当军官。对知识分子地位看法的改变，使他后来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争论，对知识分子的发展前景提出独特的见解。

1925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的讨论会，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政论家、文学家参加。党的著名活动家、文化政策问题的权威人士如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参加了。

卢那察尔斯基在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把知识分子定为小资产阶级。

布哈林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卢那察尔斯基只看见俄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看看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一定义就不够了。布哈林解释说，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断解体的阶级，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消失。然而，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并不消失，反而得到发展。如果看看最近的美国人口调查，就会看到，在所有社会集团中职员阶层，包括高级职员，增长得最快。工程师的收入也提高得最多。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知识分子被叫做第三阶层，这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用语，但有存在的权利。

接着，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看法”：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不仅物质生产的范围在扩大，而且物质劳动领域的工人人数也在绝对减少。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日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越是发展就产生越多的脑力劳动的新种类。据此，布哈林说，“说句奇谈怪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随着生产力的极端发展，体力劳动将消失。在资

本主义社会这一过程极其清楚地向我们展示”。这显然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作为经济学家,布哈林一直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关心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当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离第三次科技革命尚有半个世纪之遥,但他已敏锐地感觉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人类的体力劳动将越来越减轻,甚至消失,当然,这里还有体力劳动的概念本身的变化问题。这种前景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发展方向,已比半个世纪前显得更清楚了。布哈林的“奇谈怪论”有一天也许会变成现实!

《布哈林选集。到社会主义之路》,新西伯利亚 1990 年版第 101—102 页。

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

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反思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初，布哈林曾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一整套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以便“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这些主张起初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批评是不彻底的，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持消灭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实行计划经济的观点，1919年通过的党纲就非常清楚地表现了当时流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布哈林为解释和宣传这一党纲而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的《共产

主义 ABC》准确地阐述了新党纲,因而受到列宁的称赞。其次,1918年春国内战争爆发,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对全国的生产和消费实行高度的集中。这种做法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基本措施符合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因而普遍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好方法。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正是军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整表现。但是苏俄的现实证明,这套主张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大敌当前有高度集中之必要,广大群众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一旦内战结束,其弊病马上就暴露出来,以至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个严重的信号,它迫使俄共(布)中央废除余粮收集制,实现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写道:“胜利的无产阶级,由于面临的任务复杂、新颖、独特、困难,使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错误、幻想、不正确的估计和目标错误的尝试。然而由此也产生了冷静的自我批评,从这种自我批评中得出正确的行动路线。幼年时期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并且消失得毫无踪迹……”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破灭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破灭了。”其实,这也是布哈林本人思想认识转变的写照。

1921年3月改行粮食税以后,党的领袖们以至全党都在进行认真的反思。这是一项很有益的工作,随着反思的一步步深入,新经济政策也得到一步步的发展。

“军事共产主义”一词就是列宁在反思中提出来的,它准确地概括了前一阶段所实行的政策和方针。然而对这一政策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起初,1921年6月,列宁认为军事共产主

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而没有提及内因，即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到同年10月，列宁开始谈论后一点了。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提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这样，列宁就开始把军事共产主义原则同直接向共产主义原则过渡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了，不仅看到了外部原因，也看到了内部原因。他说：“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列宁看到，这种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成了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的看法和列宁完全一致。1921年8月他已看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弊病——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其宗旨是要立刻获得产品以保卫红色国家，哪怕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后来他又进一步看到，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需要，当时“把事情想象成这个样子：我们取得政权，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抓到自己手里，马上开始计划经济，即使冒出一些什么小事情，我们有的追究责任，有的加以制止，这样就完事了。”换一种说法，那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页。

同上书，第42卷第181页。

同上书，第42卷第182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08页。

同上书，第358页。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这样军事共产主义就不是为解内战燃眉之急的暂时措施,而是实现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或“幻想”,那时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只要把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一步延长”,“完全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为时不远了”。所以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

“军事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

布哈林把这一切叫做“幼年时期的幻想”,由于不切合俄国的实际,这种幻想的破灭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要被一种“有时从外表看来是不太激动人心的,但却是比较正确的、牢固的、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布哈林从一个狂热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转向这种冷静的反思,用他本人的话说,“自我批评”,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认识上的深刻变化使他成了列宁以后捍卫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最坚定的战士。

当时并不是党内所有的领导人都达到这种认识高度的,且看 1928 年 7 月 5 日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的一段讲话:

“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主要采用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组织产品分配以保证对前线革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0 页。

同上书,第 109 页。

同上书,第 107—108 页。

命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显然,假如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不会有军事共产主义”。

时至 1928 年斯大林仍不承认,在实施军事共产主义问题上除了形势所迫外,还有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这种认识比列宁和布哈林所作的分析倒退了一大步。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只把军事共产主义看作是“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只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由进攻转向暂时的退却,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因而念念不忘转向进攻,在他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从 30 年代初起重新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

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正是在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开始认真分析苏俄的国情,对苏联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提出自己的大胆的独特设想。

布哈林说过,“分析具体事物,是进行任何马克思主义概括的首要前提,玩弄凭空臆造的‘定义’、‘原理’和死板的‘分类’和公式等等,都是同这种概括格格不入和水火不相容的。”那么俄国这个具体事物情况如何呢?布哈林对此作了反复分析。

1924 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中提出“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俄国在革命前是落后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既有在外国资本影响下形成的先进的资本主义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1 卷第 129 页。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83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198 页。

同上书,上册第 195 页。

大企业,也存在着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落后经济,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据此布哈林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大工业,这些工业在国有化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来参加建设事业。“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形式中表现出来”。1925年布哈林在同“新反对派”争论时声明:“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乌龟速度”一时成了名言。布哈林解释说,我们建设的将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对此我们丝毫也不应当感到难以为情。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对此必须采取承认的态度。他引列宁的话告诫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75 页。

同上书,中册第 24 页,上册第 64 页。

同上书,上册第 64 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版第 3 号第 50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75 页。

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布哈林继续考虑并发挥他的这一思想。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写道:“不同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的类型和革命过程的不同条件,使得建设中的新关系绝对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的类型,这是向这个漫长的时代发展的必然特点。”他的这一思想遭到斯大林的反对,在后来经过修改并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名义发表的修改稿中已删去这段话。

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布哈林提出了仍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1922年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还存在阶级的等级制,但它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阶级当然不能说是靠剥削为生的……”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经济学界思想相当活跃,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例如在《进攻》文集之后出版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也划分了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他把马克思和列宁对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两个阶段的历史划分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197 页。

《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7 期第 136—137 页。

布哈林:《进攻》(文集),莫斯科 1924 年版第 197 页,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3 页。

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得出结论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前将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存在着‘旧的残余’,这首先应当是指生产工具公有化过程没有完成,这也就是说,还存在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残余,即存在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虽然前者占巨大优势。”

不仅如此,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作中还出现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用语,甚至“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词组。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当前要研究的大概不完全是典型的、可能甚至是完全不典型的、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有史以来第一次试行的、具体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认为,“我们的经济整个来说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国营经济和价值规律仍起作用的私有经济并存。

但是,布哈林认为,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各国革命的胜利,类型上的差别将会缩小以至消失,“这种差别将随着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世界生产的增长而归于消灭。”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面对严酷的现实,提出“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颇有见地和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各个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各国普遍适用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45 页。

同上书,第 60 页。

同上书,第 1 页。

同上书,第 91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4 页。

的模式。列宁早就指出,“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
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
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方法。”
布哈林所说的就是其中之一种。布哈林关于落后型社会主义理
论的提出,给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
会的多样性、多类型性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论证和理论论据,是布
哈林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一大贡献。

捍卫和发展新经济政策

1921年春苏俄开始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当时所能找到的较为适合俄国国情的政策。然
而,这一政策本身还有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实行之初,用
粮食税取代了余粮收集制,这被看作是为解决燃眉之急的暂时
退却,一种迂回。虽然这里开始用经济利益去鼓励农民多生产
粮食,但是没有涉及商品市场问题。这种状况在布哈林的著作
中也有所反映。

1921年8月他发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在这里他把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仅仅看作是一种新方针,而没有认为这是一
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军事共产主义同新经济政策的对立
只在于前者是不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政策”,而后者才是着
眼于发展生产的政策,是“加强大工业”的政策。布哈林看到,为
此需要发展农民经济,但同时也忧心忡忡地写道:“发展农民经
济也就是发展资产阶级关系。”因此他认为,一旦建立起社会化的
大工业,就要“把航舵拨向另一个方向”,即消灭私人的大经济

以及使小生产者在经济上服从大工业的领导。当然,这不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余粮收集制,不是通过强迫手段,而是用经济实惠把小生产者吸收到社会化的经济中来。

可以看出,对新经济政策的这些论述是很不够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列宁本来是打算把新经济政策限制在产品交换上的,但是形势的发展冲破了这个限制,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才使新经济政策发展到新的阶段。

现实的发展,理论上的探讨,使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有了飞跃的发展。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的进化的道路。他说:“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进化的道路‘成熟’成共产主义,同社会的国家组织一起消亡”。但是当时他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发挥。1922年11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时,全面地从过渡时期的整体上去考虑向社会主义发展同新经济政策的关系问题,构思了一条新的过渡时期的发展道路。布哈林看到,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严格地说,是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1924年2月,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报告中进一步解释说,“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布哈林在这些报告里用‘有机’、“进化”来说明‘长入’的过程,他这是试图把过渡时期看作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33页。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93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63页。

是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因而在这里各种形式的“ 揠苗助长 ”式的暴力、“ 革命 ”行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反对那些‘ 揠苗助 长 ’者”),据此布哈林多次反对再搞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

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握政权之后,要实现这种有机的长入社会主义,必须采用列宁所说的‘ 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新经济政策就是进行这种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的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方针,还得找到实行这一方针的运行机制,列宁生前已开始看到商业、市场的作用,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布哈林发挥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关系。他说:“ 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布哈林这里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退却、进攻、迂回等等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常用的论据和字眼,而直接触及新经济政策的本质问题——市场关系问题,打算借助于市场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已不是一般的方针的转换,而是一个崭新的运行机制,在过渡时期运用市场机制。布哈林认为,有了这个机制就可以做到把过渡时期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各种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 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同上书,第392页。

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

从市场关系的角度去阐述新经济政策,这是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后来他同斯大林的重要分歧之一,斯大林之所以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正是不能容忍市场关系的发展,认为市场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随着市场机制观念的确立,布哈林对生产和消费的看法也有了变化。

十月革命前布哈林在《食利者政治经济学》中批驳了奥地利学派分析商品价值的主观心理方法,捍卫劳动价值理论、商品价值的客观性。然而,布哈林在批判柏姆—巴维克只从消费立场看价值时,自身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只从生产的角度去看,而对消费在生产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生产的变动决定消费的变动。马克思解释价值时不是从生产立场,而是从再生产立场出发的。价值是商品的属性,而商品是消费价值的体现,是能够满足人们使用要求的有用的产品。因此单纯生产的观点把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使作为价值基础的社会必需消耗的学说失去意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社会上多次出现的“商品荒”带来的恶果,使布哈林开始辩证地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看到消费不发展,生产也无法发展。1927年1月他在党的第十五次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说:

“归根到底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群众需求的增长,如果我们在经济方面没有正确执行自己为这些群众服务的职能,他们会立即让你知道的。”他指出,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对消费者通常有一种鄙视的态度,说从他们的需求出发乃是一种低级的消费观

点,说是不应持消费的观点,而持生产的观点。布哈林认为,“在我们这里经济应为消费者服务,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服务……应当抛弃‘反消费的’偏见”。

布哈林这里决不是无的放矢。纯生产观点发展到极端的一例就是 30 年代的重工业化。在这种片面的重工业化的政策下,完全不顾居民的消费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借口下不断压缩消费。由于消费不发展,投入的资金无法回收,只好搞工业内部的自身循环,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不可能得到平衡发展,这种做法同时也制约了重工业本身的发展。

在 1928—1929 年的争论中,布哈林曾受到鼓吹“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指责,他在 1929 年的中央四月全会上对此予以反驳,他说:

“我首先必须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一语,即使我没有说坚强的国家调节,也是一种绝对毫无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市场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即使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中、贫农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之间不受国家调节的市场关系基础上有一种自由市场关系,那么这种市场也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国营工厂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而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也决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说由于市场的缘故,资本主义会生长(局部地),这是对的;但是要把这种类型的市场叫做资本主义市场,那需要有非常大胆想象力,或者不懂得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次,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条件下谈论‘自由市场关系’,这等于说‘干的水’一样。请说一说!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存在生产的高度集中化,而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生产更加集

中,工厂更加集中,可能有‘自由市场’吗?要存在自由市场,需要有‘一点小东西’才行:需要取消土地国有化,需要取消工厂国有化,需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不多不少!这种‘解释’,客气点说,是对什么叫做‘自由市场’作某种粗浅的理解。”

布哈林这里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市场机制,需要培育市场,但是现今世界一般说来并不存在不受调节的纯粹的自由市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是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更是如此。其次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不是资本家,虽然在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会有所发展,但不会形成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这两点认识,对运用市场机制就不会因为担心市场失控、资本主义因素的某种发展而惊慌失措。

当然,布哈林还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过渡时期需要市场,随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市场也将随之消失。“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些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由于当时实践的限制,他还未能突破市场同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的理论。

这同他对市场关系的理解有关。他认为过渡时期之所以需要市场关系,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小生产,对这些小生产者必须通过市场关系来巩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将通过市场上的斗争,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排挤私人资本。而这种排挤的结果将使市场本身也消失,而‘一切都会由国家和合作社进行的产品分配所代替’。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第293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2页。

尽管如此,尽管布哈林未能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在新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找到了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之间的正确结合”。布哈林对过渡时期市场关系的认识 and 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

顺便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发展是集体的创造,当时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决定新经济政策发展基本方向的有3项措施:废除实物税和取消工业中的实物供应的残余;完成货币改革,使外汇稳定;缩小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差距。制定这些措施的首先是具体负责国民经济工作的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索柯尼里柯夫。特别是李可夫1925年12月5日在第十四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纲领性的报告,对新经济政策作了当时相当完整的论证。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是吸引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布哈林写道:“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布哈林在20年代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二是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社

同上书,第442页。

同上书,中册第25页。

会主义之路。

1921年之后农村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国内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并进而发展生产。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布哈林后来总结的,“长期禁止小生产者,首先是农民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破坏农民所习惯的全部关系,引起广大农民阶层反对我们,因而必然遭到失败。为了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允许他们交纳粮食税后能自由支配他们的农产品,而他们有了剩余就会要求自由贸易,如果不使之合法化,他们就会非法经营,禁是禁不了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在贸易自由的基础上使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更多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布哈林认为,农业的发展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农产品,它还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这是工业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前提。十月革命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苏俄失去国外市场,因而农村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到1925年在新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工农业得到了恢复,然而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个是雇工和租佃没有合法化,当时一些缺农机具的贫农及部分中农想出租土地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谋生,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只能在地下进行,这样他们往往遭受更为严重的盘剥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就有必要完善立法,使农村的租佃和雇工合法化,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另一个问题是一些经济得到发展的农户不敢冒富,不敢扩大再生产,有先进的农业机器不敢使用,有钱不敢盖铁皮房子,等等。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布哈林在1925年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的口号。他在一个

报告中指出：

“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去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

因此布哈林认为应当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他在报告中号召说：

“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这个口号一提出，很快就“到处传播和流行”（季诺维也夫语），显然受到农村的广泛欢迎。然而也在党内引起一场争论。当时持“新反对派”观点的克鲁普斯卡娅认为，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号召富裕农民和富农”发财。斯大林起初曾为这个口号辩护，到30年代却上纲为：“‘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

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国有人认为，如果把此语译作“富裕起来吧”这个口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问题不在译文，而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7页。

同上书，上册第368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4号第9—10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7页。

见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王具，《布哈林“发财吧”这桩公案》，见《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在这个词的历史背景,否则,那些讲俄语的人就不必争论了。

“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基佐。当时掌权的是中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因此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连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这些人要求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基佐对此回答:“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民的。”这样,“发财吧”的法语 *enrichissez - vous* 及俄译 就具有特殊的含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因此,当布哈林在 1925 年使用这个词之后,一些对当时斯大林和布哈林政策不满的人就抓住这个词不放,大做文章。

正如借用“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词来表达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机增长过程一样,布哈林借用“发财吧”这个词丝毫不是要号召恢复资本主义。如果不是蓄意断章取义,那么只要看看布哈林提出此口号的上下文就清楚了。紧接着上引“发财吧”的一段之后,布哈林写道:

“从农民经济的积累中,我们将得到什么呢?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这是对工农业相互促进的很好说明。布哈林解释说,我国的工业取决于农民市场,社会主义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的需求包括消费性的需求,如对纺织品的需求,生产性需求,如对农机具及各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由农民的经济状况、水平及其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其需求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发

展生产,农民经济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用一部分资金去购买农具,而不能吃光花光,因此农村需要积累。而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则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为工业提供资金。可以看出,布哈林提出“发财吧”的口号的着眼点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

当然,既然是号召全体农民发财,其中当然也包括富农和富裕农民。在这种政策下富农经济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布哈林认为,这并不可怕。第一,富农在发展经济时必须遵守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奉公守法。其次,无产阶级国家可以通过征税,通过经济竞争,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排挤以至最后消灭富农经济。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实行“第二次革命”,即用暴力去剥夺富农。道理很明显,既然要在农村鼓励积累,就不能安排两年后又农村实行剥夺政策,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取信于民的政策。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号召,特别是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怕积累、怕发家的思想而发的,这种情绪在那些善于经营、经济得到发展的中农中间是相当普遍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而当时在农村一些干部当中也确实有一些人把贫穷当作光荣,认为应当保持贫穷本色。这种思想情绪和论调迫使斯大林到30年代还不得不出来予以批驳——那时还有人认为,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么工作中究竟依靠谁呢?没有穷人我们究竟怎样工作呢?可见,当布哈林指出“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这决不是无的放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方针应当是逐步消除贫穷,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布哈林说,我们应当采取的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6页。

可惜,由于批判“发财吧”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上的是非完全混淆了。

让耐普曼、富农发财就真的那么可怕吗?其实列宁早就从法律的角度对此作了准确的规定,1922年2月20日他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中同样发出“发财吧”的号召,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们守法。列宁写道: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列宁指出,必须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

如果不是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发财吧”本来是个无须争论的口号。实际上布哈林的反对者也提出过类似的口号,例如加米涅夫在1925年就提出“使农村日益富裕”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提出“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当然,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党内斗争的压力下,布哈林曾三次声明收回这一口号——在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文章中,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在党的第十四次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他在批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文章《革命面具下的恺撒主义》中写道,“发财吧”的口号“无疑是对完全正确的论点即党应该采取提高农村福利的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8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4号第9—10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6—317页。

《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

方针的错误的表达方法”。可以看出,他只承认表述上的“缺点”,并未做实质性的检讨。

合作社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

布哈林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他说,“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同样,发展农村生产力也需要引向社会主义。为此就需要找到一条广大农民所能接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在其晚年已经指出这条道路,这就是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列宁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充分的阐述。进一步阐述列宁的合作社思想,把这一思想具体化,并作出充分论证的是布哈林。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承担这一任务。据说,列宁在病中曾多次同他谈过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后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来阐述列宁同他谈话的内容,据布哈林说,列宁“遗嘱中的重要之点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不能剥夺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一条根本原理。如果说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军事共产主义下,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那么在正常的过渡时期是绝对不能对农民使用暴力、强制和剥夺的。

对农民进行耐心的改造,这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所以它必须“力求把农民阶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517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1 页。

《权力和苏联权贵》,纽约 1965 年版第 13 页。

级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从经济上和文化上改造农民阶级,溶化农民阶级,使农民阶级本身在无阶级社会中自行溶化”。

使农民阶级“在无阶级社会中自行溶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提法,这就是使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他们加入的合作社的发展而逐渐消除他们同工人的差别,同工人溶为一体。这是布哈林“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他的这一设想同后来斯大林强制集体化,在消灭“富农”的同时也消灭农民这个阶级,使他们成为“集体农庄庄员”的实践大相径庭——一种是溶化农民,一种是消灭农民!

布哈林根据列宁晚年的思想和《论合作社》一文中的提示,论证了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写道:“列宁在具体说明应当在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上使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小的以及最小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时,阐述了自己的‘合作社计划’,即通过‘合作社的流转’实行结合的计划……因为这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向‘新制度’过渡。那时候居民根据个人的利益通过合作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布哈林解释说,列宁所说的合作社首先指的是流通领域的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用这种合作社,通过贸易把城乡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农结合,这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布哈林指出,“农民从自己的私有经济即单个的小农户的利益出发,必然会走上自身联合的道路,从而越来越和睦地同无产阶级的国营工业结合起来”。他举例说,任何一个农民都希望尽量廉价地购买满足生产和消费需要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进行有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08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349—350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414 页。

组织的采购,要比各自为政的个人行动合算得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行情的变化,可以获得批发价的优待,可以节省人力、时间和运费,等等,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成立采购合作社。同样,组织起来共同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也能得到个人销售无法取得的许多好处,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农民就会组织起销售合作社。而这种共同销售自己的产品,在某些部门又会促使他们从生产上组织起来,例如,加入牛奶销售合作社的农民如想共同销售各种奶制品,他们就会进一步组织合作的黄油厂或奶酪厂。这就自然而然地从组织供销进而组织共同的生产了。此外,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或者为了解决困难,都希望能得到低利息的贷款,组织信贷合作社必然会给农民经济带来好处。布哈林总结说:“从商业合作社开始组织农民经济的过程,将通过在农产品加工方面组织生产,逐步发展到直接意义的农业生产本身。这个过程将随着向电气化的过渡而彻底完成。”这就是布哈林设想的农民通过合作社逐步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认为,在当时(20年代)苏联的具体情况下,组织农民的基本形式是合作社,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而不生产上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强大的东西,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但是布哈林并不主张一刀切,把全体农民统统塞进供销合作社。他认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不同农民参加什么样的组织,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广大中农和富裕农民,他们有剩余产品出售,也有购置生产和生活之需的工业品的需求,对他们来说,首先可以通过采购、销售和信贷合作社组织起来。由于十月

同上书,第 420 页。

同上书,第 388 页。

革命后农村中农化,中农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因此这类合作社也必然在农村占多数。广大贫农和雇农除土地外缺乏生产资料,缺乏马匹和农具,没有剩余产品可出售,因此他们需要的首先是从生产上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而富农有大量闲置的资金,有可能组织信贷合作社,无产阶级国家则可以通过银行同他们联结起来,使之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

布哈林还认为,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绝对不能搞强迫。他在1925年曾经指出,直到最近农民对合作社运动还不怎么信任,究其原因是合作社还有很多从军事共产主义继承下来的缺点。针对这一点布哈林强调,合作社必须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实行社内民主原则即管理委员会和一切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因为农民不会把股金委托给“完全由上面委派的人”,而希望有他们所认识、所信赖的人。只有这样建立的合作社,农民才会感到放心,感到同自己休戚相关。党是依靠贫农和中农的,但在选举中“必须靠说服来竞选”,并且必须由农民自己选举。另外必须把政社分开,“使合作社摆脱多余的、应当直接由国家机关去解决的任务”,例如不应当让合作社去收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应当成为提高他们经济的机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两个任务:“第一,在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的任务,即积累合作社的‘资本’的任务,提高合作社周转额的任务等等;第二,吸引群众参加合作社建设事业的任务,如果不把群众吸引过来,那么,合作社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布哈林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合作社进行了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什么样的合作社,即使是由劳动农民周转的合作社,也都必然依赖或受制于资产阶级

银行及其他大资本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庞大经济机器的部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长入到一般资本主义机构中去”。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发展的总的框框是由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信贷体系都受无产阶级国家支配这一点决定的。在这里国营经济越巩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就越发展,中农和贫农的合作社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的支持。因此,“农民合作社必然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正如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它长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一样”。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种长入并不是自发发生的,而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资助、扶植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力援助下进行的。“如果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那么,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这将意味着工农联盟的加强,这将意味着我们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说布哈林鼓吹农村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符合事实的。布哈林的这些观点主要是在同托洛茨基派的争论中形成和表述的,当时斯大林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到1928—1929年间却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评。斯大林断言,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大道”的争论,是只配一些“年轻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的烦琐争论”。“很明显,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就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

自己愚昧无知。”

斯大林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列宁并未制订一个完整的“合作社计划”,他的《论合作社》一文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设想,那里与其说是制订什么计划,不如说是要纠正人们对合作社的错误认识,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合作社在组织农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作用、新功能。在这篇著名文章中从头到尾讲的全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而没有涉及生产性质的合作社,更不可能主张建立集体农庄。

其次,合作社并不存在高级低级之分,每种形式的合作社都有其自身的职能,都是社会所需要而不能互相取代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选择合适的形式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集体农庄同公社一道出现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但是并不像斯大林所说集体农庄一出现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恰恰相反,经过几年的实践,公社和集体农庄都受到农民的反,被列宁否定了。1920年12月列宁写道:“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1922年3月又说:“说‘集体经济’一概都好,没有得到证明。”到1923年1月列宁就明确选中被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作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因为这是一种“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列宁甚至把这种合作社等同于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7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77页。

此处也可译作“集体农庄”。

《列宁全集》第43卷第43页。

同上书,第362页。

社会主义。因此关于组织形式的选择并非只配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烦琐争论的问题,而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在农村的成败的大问题。布哈林在 20 年代大力宣传发展合作社,断定合作社是大道,决不是搞烦琐哲学,而是出于对农村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怀,是坚持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所提出的新思想,是想把列宁的思想具体化。

最后,合作社的发展终点是什么?斯大林认为是其高级形式集体农庄。布哈林虽然不赞成用集体农庄取代合作社,但也认为发展的趋势是由消费领域的合作社向生产领域的合作社发展。

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发展的终点不会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也未必是布哈林的生产合作社,更大的可能是农业的社会化。这就是说,合作社逐渐朝社会化发展,朝组织起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体系发展。一家农户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得到并同时提供各种服务,各种合作社之间也建立起各种横向联系。这样的农民已不是单干的农民,而是参加一种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他们获得各种服务,本身又提供服务,他们拥有独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又受各方面的制约。农民没有消灭,但他们的劳动是社会化的劳动。国家则通过法律、政策和各种经济手段,予以扶植、支持和调节。这种社会化不排除商品市场关系,反而要以市场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说,不只是国家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之间、合作社之间也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相互提供这种服务。这是列宁所未曾具体描绘过的因素,但却是列宁提出的建立在市场流通基础上的合作社合乎逻辑的发展前景。如果新经济政策不被中断,如果不是强制推行集体化政策,那么列宁设想的合作社最终恐怕是能够走上

农业社会化这条道路的,在布哈林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端倪。

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

经济建设中必须保持经济平衡,按比例分配劳动,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哈林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布哈林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中提出了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并作了论证。关于他们两人的争论本书有专门一章论述,不过这里如果略过这个问题,那么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将是不完整的,所以还得扼要介绍一下。

布哈林的劳动消耗规律是以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为根据的。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上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要按一定的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布哈林认为,这就是“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而要以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所以劳动消耗规律是披上价值规律拜物教的外衣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劳动消耗规律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调节向计

划调节过渡。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之所以仍起作用,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有私人经济,农民的小经济,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同国营经济联系,同时这些小商品经济是难以完全纳入计划的,只能通过价值规律对他们进行调节。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消耗规律才能和自觉实行的劳动消耗额相符合,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到这时候这一规律才完全脱去价值规律的拜物教外衣,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

这里有一个价值同计划的关系问题。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原则同商品资本主义原则斗争的时期,同计划相适应的调节者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同自发势力相适应的调节者是价值规律。这样,在过渡时期就有两个相对立的调节者。

布哈林则认为,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统一的调节者,这就是劳动消耗规律。但是用以实现这一规律的机制则有两个,这就是计划和价值规律,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计划的制订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的因素,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计划实现平衡。价值规律最后“只能转变为普通的劳动消耗规律”。

在 20 年代中期苏联曾有过关于计划的争论。当时托洛茨基认为,经济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如销售危机等等,其根源在于缺乏完整的计划。对于在过渡时期需要制订国民经济计划这一点布哈林是同意的,他写道,过渡时期的社会是某种统一体,制订计划就是要把国民经济的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消灭比例失调现象,保持动的平衡。但是他警告说,不要把计划看作是万能的、绝对的。过渡时期的计划只能是相对的,这

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98 页。

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93 页。

是因为“计划因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起同样作用的各自自发因素的预测上的。”这里的难点是如何确定国营工业同农民市场的关系问题。农民市场是许多自发因素的合量,这些因素包括粮食产量、商品粮食额、全部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商品量以及价格等等,对这些因素只能做预测,而无法确定准确的数字。在这种基础上制订的计划自然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理想的”、“完备的”计划。就工农业关系来说是这样,就工业内部来说同样如此。布哈林断言:“‘自在’的,即与农民市场无关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的概念是一种荒谬的概念。”尽管如此,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导的责任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尽量做到计划的动的平衡,保持必要的经济比例。他认为,这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计划领导机关由于某些失算而破坏了必要的经济比例,那就会造成一种可能被阶级敌人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的局面,同时也会损害工农关系。

由于实行商品交换,由于存在各种自发因素,所以在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仍起作用,劳动消耗规律部分地仍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因此制订计划时要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计划原则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将逐步缩小,“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胜利的过程无非是劳动消耗规律脱去自己身上罪恶的价值外衣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是社会基本调节者消除拜物教的过程。”按照布哈林的看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价

同上书,第 87 页。

同上书,中册第 277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93—94 页。

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那时的经济平衡就可以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了。但在这之前,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在生产的发展中消灭价值规律。用布哈林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价值规律‘帮助’我们——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并准备着自己灭亡的条件”。需要说一下的是,布哈林那时所指的社会主义是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

布哈林警告说,国民经济如果违背基本的比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会出现经济危机,“独特的‘危机’”。他指出,过渡时期如果在生产和消费各部门之间、生产各部门之间失去正确的比例,失去“动的经济平衡”,那就会出现危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同,这种危机具有“颠倒的”性质:前者是积累过多,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而这里则是资本缺乏,商品荒,求过于供。布哈林指出,这里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在某一时刻更为迅速增长的需要,这是正常的现象,它表明社会确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需要的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另一种是商品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一种破坏再生产过程的危机性质的因素,是在经济平衡条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是由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造成的。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并不存在必然产生危机的基础,但必须注意保持基本的比例关系,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保持高度警惕,“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方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

同上书,第 100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77 页。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是各种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其目标无非是想达到劳动消耗的最佳比例,或换句话说,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布哈林对过渡时期借助于价值规律以实现其劳动消耗规律,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恰当比例的论述是对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当然,和他的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哈林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认为到那时候劳动消耗规律就可以脱去价值规律的“罪恶外衣”,对这种认识只能从他那个时代背景去理解。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只是一个追求、奋斗的目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病尚无法预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把计划理想化。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布哈林也看到计划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对计划工作中的唯意志论提出警告,头脑是相当清醒的,正因为如此,在20年代末斯大林搞“大跃进”、“大转变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提出异议,同斯大林展开争论。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是布哈林经济平衡观点的基本依据,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布哈林要求工农业平衡发展,要求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保持平衡发展。

农业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否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而工农业关系上的根本问题是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还是片面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从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出发,根据实际可能稳步发展,还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问题。关键是把农业放在什么地位上。

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到并提出了这一问

题,引起了全党的重视,这是他的功劳。但是他的解决方案却是错误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有一个剥夺农民的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同样必须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积累的来源是剥夺农民。他把这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一规律的提出引起了布哈林同他的一场争论。

布哈林把他的论点归纳为两点:“1、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剥削小生产者进行的;2、这些小生产者(……)无非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从这一规律得出的实际政策就是向农民征收贡款,扩大剪刀差,即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以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

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要取自农业,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段取得这笔资金。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农村看作殖民地,而应把它看作市场,苏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工业比在旧制度下更依赖于农民市场,这是因为:1、由于不再执行掠夺扩张政策,因而失去了国外市场。2、由于取消了舰队等巨额军事订货,军工必须转向民品生产,首先是农业所必须的用品、农具。3、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的政治需要,也要求更加重视农民市场。

从政治上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须为其政治领导奠定经济领导的基础,而要奠定经济领导权,首先必须“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从经济上说,“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18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40 页。

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布哈林用这样一段话去说明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

“我们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因此必须关心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

相反地,如果把农村看作殖民地,看作剥削对象,用不等价交换的扩大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大量攫取资金,虽然从短时间来说能很快得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但从长远看必然搞得民穷财尽,市场容量缩小,使工业失去宽阔的农村市场,最后造成工业本身停滞甚至倒退,“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布哈林认为,这种做法无异是“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他提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全部工业产品的40%和轻工业产品的60%都是在农村市场销售的,沙皇制度崩溃的最深刻的真正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这个教训不应忘记。

这就涉及价格问题。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用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品,用低价收购农产品,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布哈林认为这是“一种行会的、狭隘的、

同上书,第299—300页。

见同上书,中册第422页。

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33页。

同上书,上册第204页。

笨拙的、目光短浅的政策”。他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时指出,有两种社会主义积累方法,它表明了两条政治路线:1、反对派要获得单位商品的高额利润,而中央则是要获得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这样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获得大量的利润。2、或者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中央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3、也可以说,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而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而中央的立场恰恰相反。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把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中央则是放在向银行贷款过渡上。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而中央则指望组织经济因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对派主张高额利润和高速度的社会主义积累,而布哈林则主张最低的利润和低速度的积累。布哈林反驳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他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而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他解释说,如果从单位商品上拿得少些,但能扩大农民市场的容量,同时既缩短生产时间,又缩短流通时间,从而加速资本的周转,这样开始时固然走得慢些,但随后完全可以赶上并超过反对派所要求的积累速度,把它远远抛在后头。他援引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论据:“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人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

同上书,上册第424页。

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28—329页。

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布哈林这里提出用薄利多销的办法加速资金的周转的积累是比较现实的。

布哈林特别警告防止“工业走上因垄断而腐朽的道路”。当时有人主张利用无产阶级国家拥有的垄断地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的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的可能,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向私有经济征税的另一种形式。”布哈林指出,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得到“现成的”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由此也产生出“寄生的腐朽和停滞的危险性”。他举1923年秋出现的所谓“销售危机”为例,照理滞销会促使价格下降,但是事实不然,价格并没有下降,原因就在于存在“工业中的百分之百的垄断”。这种特权地位就形成“垄断的腐朽”现象。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享有行政特权,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遇到困难和商业周转不灵就向国家伸手,靠对社会主义祖国有功而索取贷款,等等。布哈林指出,无产阶级拒绝利用垄断地位是荒唐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他列举三种不同的利用方法:1、利用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政策。这是垄断经济寄生性腐朽的最高表现。2、确定价格不变。这将是“正常的”腐朽,经济停滞,国内积累极端缓慢,经济萧条。3、确定越来越低的价格。这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扩大等等的表现。这是前进运动,也就是在我们的条件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7页。

转引自《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36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37页。

下向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是以最高的积累速度的运动的表现。

布哈林总结扩大剪刀差的恶果时指出,这种做法虽然有一两次在短期内收益甚多,但最后却陷入了绝境:生产缩小了,销售危机掐住了工业的脖子,再生产过程停顿下来了。但是,只要一压低价格,就出现了新情况:“1、工业发展速度大大提高,开始求过于供;2、工业利润并没有消失;3、积累的速度加快;4、与此同时,农业也开始更快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5、结果是经济获得全面发展。”布哈林告戒说:“我们的‘官办’工厂……丝毫不应该具有垄断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懈地努力扩大生产。”

可以看出,同样是主张从农村取得工业化的资金,但方法却截然相反,一种是利用垄断地位,采取剥夺、剥削的手段,强迫农民“纳贡”,一种是采用经济的办法,发展农民经济,用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通过正常的商业活动,用加速流转的办法,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取得工业所必须的资金、粮食和原料。

在工农业关系上,布哈林既反对托洛茨基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的主张,也反对那种要求取消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以保护农业的主张。他指出,后一种人不懂得农业的发展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拖拉机、化肥、电气化,农业就要陷于停滞状态,不懂得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

同上书,第 238 页。

同上书,第 206 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21 页。

野蛮和贫困。

1928年苏联再度出现商品荒,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是工业落后造成的,因此应当加速发展工业,有的说是农业落后造成的,应当加强农业。布哈林认为商品荒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工业落后于农业,苏联当时工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他认为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工业”落后于“其自身!!”具体说就是:1、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例如冶金工业大大落后),2、工业经常性生产的增长同基本建设的增长比例失调,3、发展的极限取决于原料生产:棉花、皮革、羊毛、亚麻和粮食,这些物资的缺乏大大限制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其中的谷物生产有落后于最低限度的必要速度的危险。

在这里占突出地位的是基本建设和谷物业问题,其中一个涉及工业内部的平衡问题,一个涉及农业内部的平衡问题。

布哈林认为,不仅工农业之间要保持平衡,而且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发展。就基本建设而论,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和需要,当时基本建设纷纷上马,这对扩大再生产和保持工业的高速度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布哈林指出,不能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这里有一个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制订基建计划时不能以投资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为出发点,而必须考虑国家的后备情况,包括外汇后备、货币后备、粮食后备和商品后备情况。布哈林尖锐地指出,“从一种在经常没有后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政策中会闻到一点冒险主义的气味”。他指出,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要有供求平衡表,对计划做详尽的供求平衡分析。其次,光有货币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基本建设的物

同上书,中册第279—280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2页。

质因素,即保证建筑材料的供应。布哈林指出,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拜物教”观点。布哈林要求在基建上不要把弦绷得太紧,投资不要搞得太紧张,否则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终减慢发展速度。他把那种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主张多搞基本建设的做法叫做“疯人的政策”。他指出,这种政策会发生连锁反应:加剧商品荒,而商品荒又会引起粮食荒,因为农民如果不能从工业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就不会出售自己的粮食。“工业品荒意味着粮食荒”。

布哈林建议大大缩减非生产性费用,降低建筑材料的指标,缩短生产时间,改变过于笨重的建筑型式,节约材料的耗费。他指出,在美国用两个月能建成的,在苏联要两年,苏联的五金的耗费量常常超过必要量的50%乃至1倍,等等。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就要消除俄国的闭塞性,采用当代的最新发明,运用最重要的新技术成果,“我们必须注视欧美科学技术思想的每一个进展并利用它的每一项实际进步”。

在农业内部也有个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的问题。1928年初苏联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量大大低于上一年度同期的水平。对产生危机的原因当时有不同看法,布哈林认为,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于谷物业的稳定甚至下降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生产下降的原因,其一是谷物价格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去饲养牲口,然后出卖畜产品,不种谷物而改种技术作物。其次,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

同上书,第309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8页。

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 39.5%，但却占赋税额的 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 27.8%，仅占赋税额的 5.2%。第三，货币不够稳固，只能起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未能成为农民的积累手段。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宁可用货币购买商品，而不愿把它存入银行。农民也不会愿意出售手头的粮食。布哈林认为，这就是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富农则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兴风作浪。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鼓励谷物生产，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生产保持平衡发展。此外还需大力扶持个体农户。布哈林指出，苏联当时大约有 2500 万小农户或极小农户，粮食的绝大多数是这些农户生产的，居民的大多数也是由这些中农和贫农组成的，他们生活得愈好，生产得愈多，出售得愈多，对于苏维埃国家就愈好。因此必须关怀这些农户，改善他们的个体经济，但改善的办法不是立即把他们组织进集体农庄，因为要根本改造农业，真正广泛地过渡到集体大经济，需要有新的技术，而苏联当时还缺乏这种农业机械。

基于这些考虑，布哈林坚决反对把临时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非常措施常规化，认为这虽能救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违背新经济政策的。由于实行非常措施，从 1 月到 3 月底共收购了 27500 万普特粮食，即多收购了 11000 万普特，这期间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但是 4—6 月虽采取了非常措施，却连 1 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而这时期触动的却是农民的“防荒粮”。动用非常措施去收购农民的“防荒粮”，这打击的显然已不仅是富农，而且还有中农甚至贫农了。这一情况也证明布哈林反对把非常措施常规化的主张是正确的。事实上布哈林对粮食危机的分析是同 1928 年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的精神一致的。

粮食收购危机及因此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引发了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的争论很大一部分是布哈林在此之前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如反对斯大林的“贡款”理论是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继续,反对斯大林的高速度工业化计划是反对托洛茨基“超工业化”计划的继续,反对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也是当年同托派争论的继续,布哈林当年为新经济政策所作的辩护现在也同样用到同斯大林的争论上。当然,在同斯大林的争论中也有新的问题。这就是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同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直接对立的。如果“长入论”是布哈林的创造,那么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则是斯大林的发明创造。关于布哈林同斯大林在 1928—1929 年的争论我们将在另一章中作详细的评述。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和劳动消耗规律之争

—1926年间在苏联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探寻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是最早的探索成果之一,但由于此书写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盛时期,正常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实践不多,因此书中理论推论多于实践的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被当作过渡时期的普遍规律,此书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经济规律。此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布哈林进行了反思,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又根据新的理论去总结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提出新的设想和指导方针,特别是在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

论战中,布哈林逐渐形成一套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体系,对原先被彻底否定和抛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范畴作了新的思考和阐述。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 ABC》的作者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在对新的苏维埃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于 1926 年写成并出版了他的名著《新经济学》。这同样是一本颇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其中的若干论点后来成了斯大林 30 年代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略长于布哈林,生于 1886 年,1904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哈林不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革命前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像所有留在俄国的革命者一样,他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从事地下活动,被捕,受审,流放,逃跑,再搞地下活动……1917 年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加了党纲起草委员会。就在这基础上,他同布哈林合著了《共产主义 ABC》这本名著。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尔后又当选 3 位中央书记之一。党的十大后被任命为直属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领导使货币流通和财政经济适应新经济政策条件的整个工作,大概从这时起他深入地研究了苏维埃经济,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写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货币》、《我国卢布贬值的原因》、《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等有关苏联经济的专著。作为中央书记他好像不很称职,所以十大后他就不再担任此职,但作为经济学家,却颇有成就。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实行了货币改革,稳定了卢布,控制了物价,这显然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人曾有过良好的关系,1918

年两人同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接着两人又合著了蜚声国内外的《共产主义 ABC》,此外,两人还在《真理报》共事多年。1923 年底随着党内争论的展开,两人开始分道扬镳,普氏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家,而布哈林则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普氏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布哈林则在批判和反驳“原始积累规律”中于 1926 年提出自己的“劳动消耗规律”。

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争论,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争论。展开争论的时候,普氏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已处于处处受压制的地位,而布哈林却正处于其鼎盛时期,但争论从总的讲是说理的,双方是平等的,尽管有时用词尖刻,但并没有以势压人的感觉。但是争论既没有结果,也没有胜利者。再过 3 年,当布哈林也被当作反对派——“右倾反对派”而被打倒之后,出现了第三方——斯大林的经济学家如列昂节夫、罗森塔尔,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普氏和布氏各打五十板了之。事情的奇妙还不仅在于此,在此后的岁月,尽管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理论上遭到了“彻底否定”,然而在实践上却得到了贯彻,并且其程度比普氏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布哈林所担心的东西终于在他被打倒之后以变本加厉的形式在苏联历史上贯彻了几十年之久!

积累问题的提出

这场争论始于 1924 年完全不是偶然的。

1924 年苏联开始进入一个转折点。1921 年以后苏联面临的任务是恢复遭到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这

一任务已大体上完成。但是仅仅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不能保证国家成为先进的工业强国。到 1924 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和提出今后怎么办的问题,或曰“苏联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来所总结的那样,是什么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向何处发展的问题是十月革命业已解决的问题,那时已明确无疑地确定苏俄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否则十月革命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 1924—1925 年间俄共(布)内部并没有人提出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建议。当时党内提出的问题是今后怎么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出现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之争。

旧俄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它没有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缺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经济前提。而偏偏这样一个国家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它要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经济前提,就有一个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只有实现了工业化,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建立在牢靠稳固的基石之上。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如果不迅速工业化,如果社会主义积累长期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所梦寐以求的现象: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取消社会主义关税保护,把苏联纳入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的世界劳动分工体系,结果就是通过相对加强苏联的农业化来保持欧洲目前的工业化水平。

实行工业化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资金问题。普氏作为国家财经的领导人首先感到并早在 1924 年提出了这一无法逾越的问题,这无疑是他的重要功绩。

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已不存在殖民地,因此也就失去了利用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以攫取工业化资金的可能性。其次,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利用战争赔款获取实行工业化,发展经济的资金。苏俄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战火的严重破坏,1918年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方面退出战争,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割地赔款,赔款额高达60亿马克。虽然半年后德国战败,布列斯特和约作废,但这一事实说明,利用战争赔款积累工业化资金一途是与苏维埃政权无缘的。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尽管以列宁为首的政府千方百计设法打破封锁,包括利用德国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同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同时在国内实行租让制,以争取吸收外资,但收效均不大,这就是说,苏联无法利用外资来获取工业化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必须另找积累的来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首先提出了资金来源的问题,相形之下,斯大林提出这一问题比普氏晚了两年,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在一个报告中谈到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并且谈得相当一般。

两个规律之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社会主义最初时期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时期进行了系统比较,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几十年内,在封建社会或被商品经济半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专制制度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生产和封建农奴制关系在经济上仍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就渡过了它的原始积累时期。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必须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开始其编年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统一的综合体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一点一点地形

见《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113—119页。

成。

马克思说过,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也必须假定已经有了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做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

普氏据此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原始积累时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情况如何?社会主义有没有史前时期?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回答说,由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因此社会主义的史前时期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大工业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个行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作为创造真正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前提的时期,应当是从夺取政权和国有化才开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积累,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它已经发挥它固有的一切特点和仅仅是它固有的优越性)的技术-经济基础上的积累,同样只能在苏维埃经济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后才能开始。”

普氏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概念:“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所谓“社会主义积累”,普氏指的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中去,这种剩余产品是在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出来的,不是用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4—685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页。

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范围内创造的部分剩余产品资本化以扩大生产。“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指的则是“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这是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靠牺牲非国营成分的积累。普氏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靠的是对小生产的掠夺,其办法是对农民使用暴力,进行掠夺,向农民征税;实行殖民政策,对土著居民征税,剥夺他们的财产、牲畜、土地、贵金属矿藏,使战败者处于奴隶地位,等等。

普氏进而分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殖民地掠夺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自然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最主要的积累来源应是非社会主义经济。“向非社会主义形式征税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像苏联这样的农业国中还必须具有巨大的、简直是决定性的意义。”普氏强调,“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把农村和手工业的部分剩余产品归公,最后,如果不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扣除一部分给社会主义积累,国营经济就没法应付过去”。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发挥它本身固有的优越性,但又失去了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他断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拿得更多。这一点正是普氏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的核心。至于积累的办法,普氏认

为,一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即从资本主义积累中经常不断地扣款,这种扣款实质上是工人劳动的积累和农民劳动的积累。二是半强制性的公债,这是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三是发行纸币。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发行货币是税收的形式之一,因此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之一。以上是非经济方法的积累。

普氏认为,还有一种用经济手段积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靠无产阶级在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形成的积累,但这不是普氏的重点,重点是另一种积累,是“一种经济制度或一个国家的较少量的劳动同另一种经济制度或一个国家的较大量的劳动的交换,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可以使用的办法有:1、铁路运价。对国家货物和私人货物分别确定铁路运价,实行一套对私人生产者和私商征税的办法,从而砍去私人资本的部分利润,普氏认为,“这一切将是对价值规律的打击之一,这些打击使社会主义积累的经济时期变成逐步改变、限制和部分消灭价值规律的时代”。2、运用银行系统。它可以重新分配国家闲置的资金,也可以通过信用系统重新分配国民收入。3、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及社会主义保护关税政策。

普氏最欣赏的办法是利用不等价交换进行积累。他在谈到工业品的价格时提出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一般地说,国营经济和非社会主义成分之间是否有可能进行等价交换?他分析了三种情况:

1、国营经济从非社会主义成分得到的价值比较少,这样社会主义大生产将不断瓦解,逐渐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结果是小生产战胜大生产。

2、国家的工业品同私有经济的产品进行等价交换。普氏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偶然现象”,这种平衡不可能长期存在

下去,因为一种体系一定会排挤另一种体系。实际上最重要的积累方法之一就是同非社会主义成分进行不等价交换。

3、实行有意识地把多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相当部分的剩余产品归公的价格政策。这种政策是向私有经济课税的另一种形式,通过相应的价格政策进行积累,比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之类的形式要优越,因为它征收方便,无需花钱设立专门的税收机关。由于大工业集中在工人国家手里,因此完全有可能凭借垄断地位实行这种价格政策。

实行这样一种政策是势在必行的。普氏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首先是为国营经济争生存,使社会主义成分活跃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在私人商品生产的包围中存在。不是社会主义成分听命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成分,就是社会主义成分“吃掉”商品经济的自发势力。

资本主义在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成分斗争时主要依靠的是经济手段,即自由竞争,由消费者作出最后的决定——购买较为便宜的商品。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情况则不同,社会主义成分在其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物质前提,缺乏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从事垄断的无产阶级缺乏教育等前提,还不能发挥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如此,它反而失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优越性。这就“使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在这一阶段企图通过自由竞争战胜资本主义,无异于自杀。这种情况在整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都是如此,需几十年之久。因此,无产阶级国家在推行其经济政策时必须借助于垄断地位,必须借助于暴力——像军事共产主义那样。

根据以上分析,普氏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1924年他将这一规律表述如下:

“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

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就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种形式的物质遗产愈大,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那么,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的剩余产品。”

在布哈林的批评下,上述定义的某些表述在 1926 年出版的《新经济学》中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改为“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在谈到“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一语后面删去了“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一语。

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提法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语中移植过来的。不过“社会主义原始

转引自《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册第 217—218 页。普氏在答塔尔海默时说,我已表示不用“剥削”这个术语。但他立即补充说,“虽然只要剩余产品由一种生产形式转归另一种生产形式,一种制度剥削另一种制度的现象就依然存在”。可见普氏虽然换掉了术语,但仍然认为,“剥削”是客观存在的。

积累”一语的最早使用者是弗·米·斯米尔诺夫,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语,并指出此语提出者为斯米尔诺夫。列宁对这一术语颇不以为然,在旁边批道:“极不成功。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当时布哈林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掠夺农民,使之成为无产者,因此其实质是:“生产无产阶级”。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是“劳动动员”,“动员活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后将是真正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技术的革命。可以看出,布哈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内容显然和普氏所说的不同。

普氏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基本点是,认为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其社会主义积累是靠剥削非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小生产来进行的。尽管后来普氏把“剥削”一语改作“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但其实质并无变化,反正是通过“剥削”或“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在普氏看来,这些小生产者或农民,无非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

正是这种提法引起布哈林的强烈抗议。他敏锐地看到,把无产阶级比作剥削者、宗主国,把小生产者农民看作被剥削者、殖民地,这直接威胁到工农联盟,他的反驳的论文题为《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不是偶然的。

布哈林指出,按照普氏的说法,“工人阶级骑在小生产者身上,从而工农两阶级(基本上)社会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而这在经济上是很好的),小生产者阶级是被剥削阶级。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愈落后,无产阶级的剥削性质就愈明显,因此,小生产者就愈是被剥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85 页。

削者”。布哈林认为,这种理论提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认为,社会主义工业毫无疑问可以从小生产者那里得到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也就是说,使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手中,但这里的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这种转移所表现的趋势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而资本主义积累的职能则是经常再生产出剥削关系,在这里,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这就会扩大阶级对立,就会经常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主人和他的雇佣奴隶之间的关系。因此决不能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布哈林强烈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殖民地”的说法。他指出,在普氏看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这种观点是同他的关于“剥削”的论断一致的。布哈林指出,“殖民地”概念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剥削的对象,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

针对布哈林的批评,普氏解释说,他用的是历史类比,而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积累中存在“殖民地”,他说的“剥削”也不是指阶级剥削。如前所述,普氏在后来的表述中作了修改,删去了“剥削”、“殖民地”一类的说法。他的解释也许符合事实,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提法势必使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想

到带着满身血污来到世间的资本,不管普氏本意如何,他提出的这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给人的印象无疑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剥夺,从而危害工农联盟。普氏还解释说,他这是在探讨纯粹的理论问题,而不是谈具体政策,因此并不涉及苏维埃政权对待小生产者、农民的政策,也就是说,他并不建议对农民实行剥削政策。但事实上普氏并不仅仅谈抽象的经济理论,布哈林在揭示由普氏的理论必然得出的具体政策时,引用了他的一些政策主张:

1、实行“有意识地旨在剥削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价格政策”。

2、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这“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应从小生产者那里“拿到更多的东西”。

3、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向私有经济剩余产品扩张(当然,在经济上可能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界限之内)”。

布哈林据此指出,这就是说:1、应当实行剥削农民经济的高价政策(从社会主义积累观点来看这是重要的);2、这里应当拿取经济上可能的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3、但是,必须把“经济上可能的”(非常不明确的用语)政策理解为决不拿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少的东西的政策;4、拿得更少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给农民的赠礼,是工业的损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布哈林指出,这是普氏在“价格政策”方面的概念,而其全部奥妙就是“卖得贵一些”!

布哈林认为,“这就是实行‘殖民地的’路线——剥削,攫取‘在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那时我们将会使农民经济衰竭,会

使其收入降低,会使农民经济消失和受到破坏,会使它被‘吃掉’”。

一定的政策是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的。就实际情况而言,虽然由于普氏当时所在的那一个派别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他的理论没有能变成具体的政策,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某些人对小生产的看法和政策主张,那时想剥夺农民者大有人在,使得布哈林不得不一再重申反对在农村搞第二次革命。而普氏的理论确实为某些人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至于在托派和布哈林派被打倒之后剥夺农民成了官方的正式理论,其代表就是斯大林在1928年下半年提出、并在以后长期执行的‘贡款论’——为了工业化而向农民征收一种“额外税”,“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也就是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对这种‘贡款论’,布哈林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时(1928年7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贡款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没有任何不同之处”。由此可见,普氏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一提出,布哈林就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看到这种理论后面问题的严重性,把问题提到‘毁灭工农联盟’的高度,予以严肃的批判。然而布哈林回天乏术,在他和他的对手都被打倒之后,这个“规律”就以“贡款论”的面目出现并合法地贯彻了几十年。

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批判仅仅是一种否定,还不能解决资金的积累来源问题。而资金来源问题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不容回避的问题。布哈林在同普列奥布拉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29—231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139—140页。

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任斯基论战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布哈林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应来源于农村,来源于农民经济,但办法不是通过国营经济对农民的“剥削”或“剥夺”,而是发展农村经济,为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布哈林写道:“社会主义工业是否能从小生产者那里得到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呢?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这里的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手中呢?是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不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扮演的也不是剥削阶级的角色。

实现这种价值转移的办法不是对农民的剥削或剥夺,不是“吃掉”农民经济,而是发展农民经济,改造农民经济。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从农民那里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而在于用什么方法取,取多少,极限在哪里。

布哈林是从增加国民收入这个全局性问题着眼的。他认为不能像普氏那样把问题归结为瓜分现有的东西,瓜分国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国民收入,即提高生产力,而且要采取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那种形式。布哈林写道:“因为任务在于经常提高这个‘国民收入’的‘现有数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问题必然作为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的问题提出来的缘故,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并且是属于纳入国营经济和逐步改造的经济单位的总和。”

布哈林指责普氏甚至没有提出“国内市场容量”的问题。而国内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工业只有拥有广阔的农村市场才能取得资金,才能获得积累,才能得到发展。而农村市场的容量决定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19 页。

同上书,第 232 页。

于农民的购买力,只有农民的经济发展了,农村才会出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工业品才会拥有广阔的市场。工业和农村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的关系。普氏所建议的“剥削”、“吃掉”农民经济的做法,就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

针对普氏提出的利用剪刀差实行工业品的高价政策,布哈林列举了三种不同的价格政策,并作了具体分析:

1、利用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是垄断经济寄生性腐朽的最高表现。

2、确定价格不变。这将是“正常的”腐朽,经济停滞,国内积累极端缓慢,经济萧条。

3、确定越来越低的价格。这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扩大等等的表现。布哈林认为这是前进运动,也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是以最高的积累速度的运动的表现。

布哈林并不否认利用垄断地位的必要性,但他认为应当把垄断的利用引入下述范围,即“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并且应当使增长产生如下结果:生产领域扩大,生产便宜,成本降低,从而在每一个随之而来的生产循环中的价格更为低廉。

这是能够达到、也必须达到的,问题只在于加速周转,扩大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生产,然后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哈林认为,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道路。布哈林强调:“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实现同农民的结合。”问题又被提到工农联盟的高度了!

在《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一文中布哈林对比了两种积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38 页。

同上书,第 238 页。

累方法——反对派的方法和他即正统派(中央)建议的方法:

1、反对派的目标是获得单位产品的高额利润;正统派的目标是获得单位产品的最低利润,这样,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提供大量的利润。

2、也可以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正统派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

3、换言之,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而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而正统派的立场与此相反。

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的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正统派的重心则是向银行贷款过渡。

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正统派则指望组织经济要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为防止误解,布哈林特意解释说,正统派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的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他说,如果我们从单位商品上拿得少些,但能逐年扩大能够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农民市场的容量;如果我们拿得少些,同时既缩短生产时间,又缩短流通时间,从而尽量加速资本周转;如果我们这样来加速城市和乡村,国营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相互影响,那么,我们开始走得慢些,随后满可以赶上、超过我们经济政策上的反对派方案所要求的积累速度,并把它远远抛在后面。必须看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成分的联系和相互倚赖,以及它们互为条件的运动。

布哈林的观点是把经济看作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特别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因此决不能为

了一个部类或一个经济部门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类或部门的利益,挖东墙补西墙,只有在各部门平衡发展的情况下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稳步增长。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而言,工业以农村为主要市场,只有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市场容量扩大,工业品才有销路,工业不能靠垄断的高价剥削农村,相反地,应当坚持薄利多销的原则去开拓农村市场,这样就每个单位产品来说赢利减少了,但从整体上说利润反而会不断增加。布哈林在 20 年代阐述的这一思想是很有创见的,它确定了无产阶级国家工业和农业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

为了扩大市场的容量,布哈林主张一方面发展农村的多种经济成分,让它们互相竞争,互相繁荣,另一方面用经济的办法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单独阐述。

经济调节者之争

两种积累方法之争提出了一个怎样看待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由此引出经济的调节者之争。

在 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都在努力探寻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按照原先军事共产主义亦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是没有商品货币、消灭价值规律和市场、计划经济取代了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过渡时期经济显露出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设想的截然不同的面貌: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出现商品货币市场,产生新的耐普曼阶层,等等。纯粹的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社会里,基本经济规律

即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是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完全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还是存在另一种调节者。经济学家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联的过渡时期经济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这里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也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存在不同的调节者。

在国营经济内部经济的调节者是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简单地讲，是计划因素。国营经济内部是靠计划来调节的，而它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则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来调节的。“苏维埃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和国营经济的经济活动都服从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首先扎根于主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环节，即国营经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作用扩大到完全是异类的私有经济”。他引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的话：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商品生产“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紧接着发挥说，“我们的国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垄断倾向的历史继续和加深，从而也是这些倾向朝着商品经济进一步退化和价值规律进一步消灭的方向发展的继续”。

在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另一种规律也在同时起作用，这就是价值规律。普氏写道，如果说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表现我们的未来经济的趋向”，那么，价值规律“则反映我们的过去，极力迫使我们停留在现阶段，并且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在价值规律上集中了我们经济中的成分和商品资本主义成分的总和，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总和”。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42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94—95页。

同上书，第100页。

普氏认为,就世界资本主义而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最有利的时期是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之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国家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调节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形式上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在最重要的部门变成了计划经济。自由竞争被遏制,价值规律这个经济过程的自发调节者的作用,在许多方面被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因素所代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价值规律开始受到限制。这个趋势表明,“现代经济制度客观上已完全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生产的程度”。一旦全部工业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这一进程势必推进得更远。

然而革命后的俄国存在特殊情况,这里存在 220 万农户及手工业,大多数价值是这些小生产创造出来的。调节这些私人经济的是价值规律。国营大工业同小生产的斗争,也就是计划因素同自发势力的斗争。同计划相适应的调节者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同自发势力相适应的是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对抗者。因此在过渡时期存在两个调节者,此两者的斗争是现代经济上的基本动因,是整个机制的推动力。随着计划因素的增长,价值规律将转变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普氏具体分析了价值规律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

在生产资料生产领域,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又是垄断定货者,这里价值规律的影响最小。在这里,价格向有计划地分配资源转变的过程发展得最快,商品成为产品的变化最大。

在国营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价值规律的影响则大得多。国

营工业的垄断性越小,小生产部门制造出来的原料在产品成本核算中所起的作用越大,价值规律的影响就越大。

至于私有经济,首先是农民经济,在供大工业用的农民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中,即在大多数由国家采购的技术原料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受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限制最大。

普氏还具体地考察了价值规律在国营工业同小生产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国营部门向小生产采购商品时,如有其他购买者的竞争,价值规律就起作用。如价格不为生产者所接受,价值规律也会起作用,生产者会去改种其他作物。在农业各部门,价值规律在畜产品的交换中作用很大,因为这里竞争的买主很多,如行情对生产者不利,他们会自己对原料进行手工加工。大麻、亚麻、棉花等交换中价值规律的影响较小,对价格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里。在粮食贸易里,左右价格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

普氏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是符合实际的,问题是他的总的提法——过渡时期存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两个调节者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以前者取代后者、计划消灭市场告终。

对此,布哈林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布哈林从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存在,认为它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同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极端矛盾的。针对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布哈林提出了“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与之对抗。

布哈林的依据是马克思 1868 年 7 月 11 日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的论断。马克思写道: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

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上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布哈林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一切社会历史形态中,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是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它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商品社会,“它给自己穿上了价值规律的拜物教外衣”,在这里劳动消耗的比例是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而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按照计划进行劳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价值规律不能转变成什么“社会主义原始规律”,而只能转变为一般的劳动消耗规律。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胜利过程就是从自发的调节者向自觉的调节者过渡的过程,也是“劳动消耗规律脱去自己身上罪恶的价值外衣的过程,是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布哈林总结说,劳动消耗规律是“经济平衡的普遍的和万能的规律”,问题只是这一规律的社会形式的变换。布哈林对不同的社会的调节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

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里,生产是小规模的、分散的,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 页。

范围狭窄,调节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自发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大规模地采用集中的劳动,劳动在社会上的分配最后同样决定于价值。但是,价格不是直接围绕价值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平均利润率是这个机制特有的中枢。价值规律仍旧是调节者,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的客观规律是和自觉实现的劳动消耗定额相符合的。波动首先是按照统计计算进行的,基础是自觉的和预先确定的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运动的刺激力不是利润,而是在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的条件下满足群众的需要。中介劳动消耗规律的机制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应机制。劳动消耗规律是基本调节者,并且是在最纯粹的形态上。

过渡时期的情况如何呢?布哈林认为,这里发生了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过渡时期存在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也存在农民的简单经济,因此这里有劳动消耗规律作用的不同形式,如劳动消耗规律、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即变态的价值规律,但不管怎么样,仍然是一个统一体。“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表现在,在计划的程序中半虚拟职能的‘价格’(即已经不是从‘市场晴雨表的波动’观点来决定的价格)是自觉形成的,和自发形成的不同”。这同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并不矛盾,因为这里预先估计到在自发的调节下事后才能确定的东西。

简单地说,布哈林的意思就是,在过渡时期劳动消耗规律起初仍然基本上以价值规律的形式发挥作用,即所谓披着价值规律的外衣,然后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劳动消耗规律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而以其纯粹的形态发挥作用。而在这整个过程

中自始至终发挥作用的是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变换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形式。布哈林指出了价值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辩证作用:“我们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价值规律帮助我们——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并准备着自己灭亡的条件。”

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新贡献。然而他未能克服认为市场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传统观点,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品的直接分配将取代商品货币关系。这很难说是布哈林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而只能说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历史表明,要认识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

顺便说一下,有人认为,布哈林的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来自亚·波格丹诺夫。1926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曾组织过一次讨论会,讨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苏联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一文。波格丹诺夫在发言中说:“无论在资本主义下,在过渡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下,调节者都是劳动的消耗——这是某种普遍的规律。”

“劳动价值规律在这里(在社会主义下)也在贯彻,不过贯彻得比在资本主义下更多,因为同可能的计划性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这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劳动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下是这样一种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生产因素的分配是由劳动消耗来调节的;实质上,这一规律必然是由国营经济来贯彻,甚至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00页。

转引自《发展之路:20年代的争论》,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国营经济是垄断的买主时也是这样,而在对待对立的个体经济贯彻……本规律的作用在一种情况下是较为自发地发生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较为有计划地发生的,但这是同一条规律,即劳动消耗规律,是同样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研究,这一规律如何以自发的形式发挥作用,如何以计划的形式发挥作用……”

也有人认为,两人所说的并不相同。在布哈林那里,劳动消耗规律是作为更为深刻的规律的新的表现形式去取代价值规律的。而对波格丹诺夫来说,价值规律实质上等同于劳动消耗规律,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仍保持其作用,改变的只是其形式——从自发的变成有计划的。因此最多只能说布哈林从波格丹诺夫那里吸取了名词,而在论证时追随的不是波格丹诺夫,而是马克思。

本来布哈林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争的,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人们本来可以期待普氏写出他的《新经济学》第1卷第2分册(即历史部分)和第2卷(具体分析苏维埃经济),以进一步阐述和论证他的观点,可惜这几部分都未能问世,尽管某些章节已经写成,甚至发表过,更糟糕的是,到了1928—192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杀出了第三者——一批新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布哈林和普氏两人各打五十板。普氏被作为托派经济理论学家打倒不说,布哈林的理论也受到最严重的指责。1929年列昂节夫认为劳动消耗规律是“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理论的基石”,价值

转引自《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莫斯科1990年版第331页。

见卢宾和什梅廖夫的文章《劳动消耗规律的概念》,转引自《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第332页。

规律向劳动消耗规律过渡等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更有甚者,他们指责布哈林在劳动消耗规律的外衣下企图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规律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辩护!

对这些政治指责今天已无须辨正,历史已做出回答。有一种批判倒值得一提。K. 罗森塔尔在其《评阿·列昂节夫对布哈林的劳动消耗规律的批评》一文中批评布哈林,说他在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中没有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是以不同的形式,“以这些比例的不同数量和质量表现出来”的。

这个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者接下去就引用了布哈林的有关言论:“说在资本主义下会有另一种比例这个一般性的原理是正确的”,“难道在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我们制度真的会有同样的比例?难道这些比例和相互关系的动态是一样的?最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别是什么意思呢?”可见布哈林看到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里比例数量的变化。对此布哈林还有更为详细的发挥。他接着说明,在每一个社会,生产是满足需要的方式,而需要彼此之间联成一个自然的体系。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些生产部门总的来说,或好或坏地满足了这些需要。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而在有组织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一点反映在经济计划上。劳动消耗的客观规律是和自觉实行的劳动消耗定额相符合的。波动首先是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自觉的和预先确定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同时相应地改变劳动尺度)在这里是基础。劳动量是集中使用的。运动的刺激力不是

见《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同上书,第230页。

利润,而是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的条件下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就使劳动消耗规律借以起作用的社会主义机制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机制。因此,发展的形式和速度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劳动消耗规律仍然是整个过程的基本调节者,并且是在最“纯粹”的形态上。

布哈林在这里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消耗规律不同于以前的特点讲得够清楚的了,特别是他强调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的条件下满足群众的需要,另一种的发展形式和速度——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统统写进短短的定义中去。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比例有计划地发展(能不能做到,这已是另一个问题了,至少在这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设想社会主义的,也许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理想境界),这是布哈林劳动消耗规律的基本思想。这个比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工业和农业确定什么样的比例较为合适,国民经济以什么样的发展速度较为妥当,这不是规律本身能给予具体答案的。事实上,布哈林在20年代下半期的整个活动就是谋求国民经济按一定比例的平衡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个理论推导问题,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修正调整的。盲目追求不同质和量的不切实际的“比例”关系,例如片面地高速度发展重工业,致使苏联经济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之中,这是导致后来苏联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重要思想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不断地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他们设想,一旦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掌握了

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97—98页。

全部生产资料,整个生产就可以按计划进行,从而彻底摆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恩格斯写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这样,社会就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社会需要知道的是,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恩格斯得出结论说:“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由此可见,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无需“价值”的存在,因此也无需借助价值规律去调节生产。整个社会的生产可以按计划进行,只需根据社会需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行了。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提出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是符合他们的原意的。马克思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也就是规律。“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其实现的形式。鉴于当时苏联仍

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布哈林想要着力解决的是,这一规律在过渡时期里是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的,换言之,价值规律和计划在过渡时期里在实现劳动消耗规律中各起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那么应该说,布哈林的设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过渡时期里逐渐由价值规律调节转变成计划调节,而到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价值规律,而完全由计划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正因为如此,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来消灭价值规律。

然而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证明,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

就苏联而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 20 年代批判和否定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从 20 年代末起实际上却执行了这条以剥削农民为主要内容的“规律”,长期以来通过强制集体化、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等,把农民挖得很苦,用强制从农民那里获得的资金、劳动力从事国家的工业化,而使农村长期陷于贫困落后、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境地。

另一方面,苏联于 1929 年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取消了市场经济,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完全用计划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在消灭私人经济之后可以用计划来统管一切,这样从 30 年代起,苏联逐步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经济管理体系。可以看出,这里既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子,也有布哈林所说的脱掉价值规律的罪恶外衣,直接实行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计划管理)的影子——这比例是否正确,姑且不论。这显然不是劳动消耗规律本身的错误,苏联的实践恰恰是违背了这条规律(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压制农业等等)。在实现这一规律的

形式(机制)上脱离苏联的实际,匆匆抛弃价值规律而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由计划统管一切!

布哈林提出的劳动消耗规律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保持经济的平衡,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否以其纯粹的形态——计划表现出来,在过渡时期这一规律是否从价值向计划过渡,布哈林的估计显然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不相符合。布哈林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种没有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却建立在落后的国家,实践已经表明,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靠计划来取得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收效甚微。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又重新引入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实践对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调节者的争论也作出了结论,或指出了问题的解决方向。从30年代开始,苏联只有一个经济调节者——计划,整个国民经济统统纳入计划之内,由国家计划予以调节。8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又在寻找第二个调节者——市场,即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或作为计划的补充,或与计划并行,或准备以市场经济取而代之。

在世界各国,纯粹的市场经济并不多见,在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市场经济之外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调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布哈林已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两个调节者,而不是只有价值规律一个调节者。

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人想回到价值规律一个调节者上去。看来,一个调节者——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行不通。较为符合实际的做法是市场同一定的国家

干预(宏观调控)相结合。至于两者之间的比例,这不是一般规律所能解决的,而必须在实践中探索,以尽量做到按比例地平衡发展。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下还要长期发挥作用,这件“外衣”还要穿下去。价值规律会不会消亡,这是遥远的未来的问题,可以让未来去回答!

60年前两个经济学家根据当时为数不多、为期不长的实践,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他们的答案有的尚不完善,有的包含错误,甚至完全错误,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至今仍给我们以启迪和教训。他们提出的一些很好的警告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人所接受或注意,终于在以后的实践中出现重大的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更需后人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以吸取历史的教训。

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管理,那么,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或裁定。苏联20年代有过好的做法,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在报刊上展开自由的争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一书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些论文在1924年就在报刊上发表,并引起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批学者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普氏继续写文章作解释、修正并提出反批评。1926年成书以后,共产主义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尽管编辑部并不同意书中的观点。编辑部声明:“编辑部虽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但是为了全面地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提出的重大问题,仍然认为可以出版他的著

作。”可惜的是,此书出版后没过几年就成了禁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看到这本书的反而是西方和中国的学者。

重评“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 1928—1929 年斯大林同布哈林的争论中,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布哈林被当作“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鼓吹者受到批判。这场对“熄灭论”的批判影响深远,后果严重,苏联 30 年代的“大镇压”,我国的“文化大革命”,都同批判“熄灭论”有直接关系。现在,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有可能根据历史实践和检验来重新评价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对它的批判了。

所谓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曾多次宣传过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1922 年 11 月,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说:“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者讲得很多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

在长入社会主义。不过,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就在于什么时候开始长入的问题。修正主义者不愿有任何革命,断言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认定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获得政权就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获得越来越大的基础,逐步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排挤出去,直到因此把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为止。”这里布哈林指出了他在长入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修正主义者妄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让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即解决了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开始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时间的划分是很重要的。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曾批判旧日合作社的提倡者,说他们想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通过居民合作社使阶级敌人转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转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这统统是幻想,“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但是当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全部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把这段话同布哈林的论点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两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列宁这里也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分界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获得了“长入”或“合作社的发展”的两个重要前提:1、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政权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了经济命脉,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140—141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67 页。

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与革命相对而言的。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整个社会就不再需要革命，而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了。这里有一个对革命的理解问题。布哈林所说的革命，指的是社会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以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腐朽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的正确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夺者的反抗。以后，新社会便开始有机地进化增长，这个增长本身就是伟大革命改造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代表社会多数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发展，由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不需要也不允许再经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在这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当然，苏联那时还存在富农问题，耐普曼问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要逐步地、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一般说来可不再采用暴力镇压等革命措施，而可以用和平的办法解决。

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正是指通过和平的、渐进的、进化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按照布哈林的设想，无产阶级从夺取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时期，相应地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时期。长入说的是过渡时期。布哈林认为，这个时期仍有阶级斗争，但是，除了矛盾、斗争这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是这样说的：“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

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和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它转变为国内战争,因此工人阶级政党是国内战争的政党。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专政被打碎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那么“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巩固这一专政、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就成为国内和平的政党,这就是说,它要求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各阶级、阶层和集团服从工人阶级;它要求它们保持国内和平,这时工人阶级就要惩罚和追究国内和平的一切破坏者、一切阴谋分子和怠工者——一句话,妨碍和平建设新社会的事业的一切人”。这种国内和平当然是有条件的,是“一切阶层——包括新政权过去的敌人——都完全承认这一政权、承认它的法律、它的机构的基础上,以及在服从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基础上的国内安定”。

布哈林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内和平口号一直被当作机会主义口号受到批判。实际上,这是列宁赞同过的口号。1921年8月5日,列宁在写给格·米雅斯尼可夫的信中说:“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斯大林在1928年7月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既然我们掌握着政权,既然我们巩固了这个政权并且把一切经济命脉集中在工人阶级手里,我们就不希望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5页。

同上书,上册第430—431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84页。

阶级斗争采取内战的形式。”道理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并大体上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提到了首要地位，而要发展生产，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无产阶级决不能用发动国内战争来打乱自己的建设部署，在国内战争、连年动乱中是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建设的。布哈林在1924—1927年多次提出的“国内和平”口号只不过是对列宁思想的阐述和发挥而已，但是当时重申并贯彻这一口号对苏联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过渡时期的社会是怎样发展的呢？布哈林认为，应当通过“进化”的道路，采用“改良”的方法。“因为对我们的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进行慎重的改造，我们的各项‘改良’，我们的‘建设’都不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他引列宁在《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的论点作为自己的依据。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方法服从于任务。列宁提出新的方法是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直接联系着的。列宁此文写于1921年11月，也就是国内战争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不久，当时全国重心已由军事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关于重心的转移，列宁在一年后写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从前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149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44、247页。

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布哈林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这决不是说,列宁在这里否认阶级斗争,因为‘和平组织’‘文化建设’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采取国内战争、没收剥夺的形式的。1924年布哈林曾正确地指出:“过去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首先带有军事政治打击的性质,而现在它却开始具有有机的和平经济的面貌。在这种类型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在这里撇开了外部的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把这段话同上面所引的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的论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布哈林的提法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起码的常识。把承认阶级斗争形式改变说成是否认阶级斗争,是站不住脚的。

十月革命后通过剥夺和国内战争,消灭了原有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也消灭得差不多了。不过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又出现了叫做耐普曼的新资产阶级。当时对耐普曼和富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用剥夺的办法消灭它们,实行“第二次革命”。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主张用经济的办法同它们作斗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43页。

同上书,上册第110页。

争,用排挤的办法逐步消灭它们。布哈林对比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指出:“如果我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在这里我们是错了,不是立即,而是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大大小的私商、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的,也不是一挥革命的宝剑就能把它们消灭的,因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存在市场,那就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产生私商。但是应当看到,当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起着某种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布哈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同它们进行经济斗争,在经济竞争中逐步把它们排挤出去。“我们用什么方式排挤直接的敌人,私人资本家呢?用竞争,用经济斗争。如果他们卖东西便宜一些,我们应当做到卖得更便宜。顺便指出,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为了使经济斗争得以正常进行,布哈林主张“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就是准备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加速经济周转来活跃城乡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用经济的办法,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根本上来讲,从发展周转自由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于斗争的结局,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私人企业进行竞争,大工业排挤中小工业,大资本吞并小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0 页。

同上书,第 360 页。

同上书,第 365 页。

资本,最后胜利的是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在过渡时期情况表面上大致与此相似,所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代替了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由于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所以在这里是国家掌握的大工业排挤私人资本主义的中小企业,国家的批发商业、国营商业网排挤小私人商业企业,首先是零售商业。斗争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作最后决定的是买主,而买主是哪里价廉物美就到哪里买。只要善于正确地组织企业,那么一切优越性都将在国营大生产方面,取得最后胜利的也必将是它们。在农村,把小农经济组织成能同富农较量的合作社,利用国家的援助,通过竞争同样能把富农经济排挤出去。

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始终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经济上要比私人资本强大得多,另一方面,它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用立法、税收等制度保护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排挤私人经济。布哈林指出:“既然我们掌握了经济命脉,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阶级力量的变动。如果我们没有银行,而建立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那么它就会压垮我们。而如果我们有了银行,那么它就会从属于我们,我们贷款给它。如果我们两手空空,那么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如果他是我们银行的存户,他就不能战胜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从各个方面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例如用立法保护工人的事业,保证工会有一定的权利,迫使私人企业主支付工人保险金,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课税,给予合作企业以优待和优先权,给它们以财力支援,用立法保证它们享有较大的权利,等等。用布哈林的说法,这就是“在我们的政治中包含了相当多的经济,因为在我们国家政权的机构里,已经包括了各种最重要的经济

因素”，其中经济命脉也包括在内。布哈林强调，“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战胜阶级敌人及其代表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我们要撵走‘耐普曼’”。他预期，“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营和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那时，一切都属于劳动人民，那时，全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

布哈林的这些设想和方案，到底如何，是否行得通，是可以讨论的。例如，在当时的认识下，他显然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说布哈林主张保护资本家，搞阶级合作，则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布哈林的上述言论只不过是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阐述而已。例如决议写道：“在经济政策方面，必须使一切经济部门（包括农村在内）尽量扩大经济周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真正得到巩固。对于最近几年内不可避免地要增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成分，将以经济斗争的手段和基本农民群众的日益合作化来加以克服。由于商品流转更加迅速，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速度也将加快，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将有越来越大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增长。”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71 页。

同上书，第 296 页。

同上书，第 436 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分册第 4 页。

会重申了这一政策,指出要由行政压制手段转变到经济竞赛和经济斗争,利用、克服并排挤资本主义成分。应该说,布哈林对联共(布)决议的阐述是准确的,并无歪曲之处。

对待农村中的富农,布哈林同样主张用经济手段同他们斗争,而反对采取剥夺、扫地出门的办法。

1925年联共(布)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行了一些新措施,其中包括放宽雇工和租佃的条件。这就是允许一定限度的剥削,使农村的雇佣劳动和剥削合法化,富农可以租赁贫农无力经营的土地扩大自己的耕地,同时利用雇工耕种。同样,这也使一些中农、富裕农民有可能利用这种新规定,发展自己的经济。事情很清楚,苏维埃政权既然采取这种措施,那它就不应该同时在农村宣传实行剥夺政策,搞第二次革命,否则势必使现行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布哈林论证了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他指出,由于雇工和租佃的合法化,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可以得到工作,他们出卖劳动力的时候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无力耕种土地的贫农在把土地出租给富农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以前,由于出卖劳动力和出租土地多半是贫雇农有求于富农,并且又不大合法,所以富农经常利用这一点私下加重对他们的盘剥。富农自然会利用新措施,利用贸易自由扩大和发展他们的经济,但布哈林认为这归根到底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他设想,富农积累的结果必然会出现大量的闲置资金,他们如果想使这些资金生利,只有把它们存入国家银行,而国家银行则可以把这些存款贷给贫农,援助中农,作为他们兴办合作社、发展生产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
第80—81页。

的资金。贫农、中农合作社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把富农排挤出去。

正是出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考虑,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1925年4月17日,他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他解释说,农民经济的积累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应该说,布哈林对农民经济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的解释是颇有见地的。

布哈林设想有两种“长入”：“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

这是1925年说的,3年后此语被当作布哈林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证据”。为了弄清布哈林的原意,且引他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作为注解。他在展望农村将会出现哪些成分时指出,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农村将会出现贫农合作社(集体农庄),销售、采购、信用等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一些地方还会有富农合作社(它们将在信用合作社中拥有自己的据点)。“这整个阶梯都将长入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页。

有关“发财吧”问题,详见本书“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一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8页。

的体系,并同时长入我们的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这样:如果富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如果贫农和中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过的社会主义合作社。”

可见,布哈林所谓富农合作社“长入”云云,指的无非是富农合作社同国家经济机关联结在一起,具体点说,就是把闲置的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以取得一定的利息继续发展它们的经济。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其次,布哈林的用词是谨慎的,说的是长入经济机关的体系,而不是一般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按当时的见解,社会主义社会是已经消灭阶级的社会,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不可能长入的。第三,布哈林说得很清楚,富农合作社长入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而不是社会主义成分,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成分来说,它仍然是“异类”。有人说,布哈林明知是异类,还认为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取消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实际上布哈林说的是,它虽然能长入经济机关体系,但毕竟是异类,并没有混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使富农合作社同银行等国家机关联结在一起,使它受无产阶级国家控制,这是同富农继续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

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光靠暴力是不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对富农的斗争除了镇压以外,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布哈林认为,对付农村中的私人店铺的办法不是封闭店铺,而是办好消费合作社,对付富农高利贷的办法是组织信用合作社,搞好低息的合作信贷。“我们的商品应当比私商的商品

价廉物美,我们的贷款应当比高利贷者的贷款额大息低,合作社应当比私人商业经营得更好,更能满足当地农村的需要。”

在同富农斗争中应当充分利用苏维埃国家的力量。例如国家的立法就是同富农做斗争的强大工具,是有利于农民的。布哈林指出,“甚至为富农做工并受富农剥削的雇农,尽管受富农的支配,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却支配着富农,因而可以通过法律,以一系列最独特的形式迫使自己的‘主人’富农服从自己的阶级意志。我们有合同,我们有工人立法,我们有征税制度,最后,我们还有信贷政策”,这些都是同富农作斗争的武器。在选举时使劳动农民的候选人当选,在征税时,对富农的课税多于其他农民,在贷款时只资助贫农、中农,这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用征税而不是用剥夺和强征的办法同资产阶级斗争,这是列宁早在1918年就提出过的办法。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办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列宁在这里不仅肯定了税收的办法,并且从原则上肯定了管理的办法优于夺取的办法。可以看出,布哈林的主张同列宁的看法是一致的。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5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64—165页。

布哈林认为,“对富农斗争的主要办法,就是使中农脱离富农”。富农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得到中农的支持,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对待中农的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例如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农当作投机分子对待,在经济措施上不给中农以支持,不注意抓好中农合作社,在同富农斗争中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等等,结果就会把中农推向富农那边,就等于帮了富农的大忙。在农村中只有使中农同贫雇农结成坚强的联盟,才能组成农村的多数,才能有效地对付富农。布哈林指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中农经济的增长,中农经济的商品率也在增长,中农开始关心起扩大商品流转的范围了,它们做的买卖增加了,他们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残余越来越感到不满。“凡是限制商品流转的一切措施,都给日益发展的中农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因此,1925年布哈林反复强调,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他说:“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村,对农民的让步。它同时也是我所说的战略手段:退却、改组队伍和以旨在保持同中农联盟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崭新方法实行进攻。”

布哈林这里提出的中农问题,是当时苏联农村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农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其经济状况很接近富农,在反富农斗争中稍不注意就会波及中农,损害中农利益。后来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偏差和错误,在许多方面都同不正确的对待中农有关,例如在和中农的关系方面采用暴力,剥夺中农的选举权,像剥夺富农那样剥夺中农财产,“忘记了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4页。

同上书,第6页。

同上书,第7页。

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同中农的妥协的基础上”。斯大林把不正确地对待中农看作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尽管始作俑者乃其本人。

“长入”问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能不能、允许不允许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实行和平经济改造,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把他们排挤出去,以至最后消灭这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原则上都赞同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写道:“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十月革命后,还在1918年,列宁也谈到对资本家实行镇压和赎买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认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当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赎买,还是通过经济斗争达到排挤以至消灭的目的,这是可以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7—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03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84页。

探讨的,也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提出对资本家和富农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论点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只承认镇压、剥夺是反对资本家、富农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这显然是片面的。

列宁说过:“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1929年4月布哈林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上曾引用列宁的这段话为自己辩护,但是他被指责为利用列宁的话否定经济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其实,早在1925年他在《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一文中就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并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任何社会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各阶级的统一,“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反映整个社会统一的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停止,而是阶级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就当时苏联的情况来说,新资产阶级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着对社会有益的职能;对待新资产阶级决不能只限于用镇压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有无产阶级的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之中就包含着阶级斗争”,这就是利用、排挤并最后战胜这个新资产阶级。关于合作,布哈林认为,“需要严格区分两种东西:一是在社会中的合作,一是政权中的合作,即在几个阶级之间分掌这一政权。合作甚至联盟,牢不可破的联盟,还不是分掌政权。”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5、296页。

《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选集)》,纽约1967年版第293页。

还必须指出,布哈林在谈论“长入”、“合作”的同时,也指出了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富农的可能性。他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说过:“如果我们不幸发生了战争,我们应该还去组织贫农委员会,如果富农举行暴动来反对我们,我们将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富农。”

布哈林还被指责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上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下面是布哈林受到批判的一段话:

“农村中阶级斗争形式也同样发生变化。诚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不过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他人发财并且钻进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现在开始向农村通讯员开枪,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开始,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构还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构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十分明显,这类现象会越来越减少,以至最后绝迹。”

尽管这段话里有表述不确切的地方,但意思是清楚的。第一,指出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这就指明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阶级根源,根本原因。第二,一些地方苏维埃机关软弱,给富农分子以可乘之机。注意加强苏维埃机关,不给富农分子提供机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之一,是无产阶级政权防止和制止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主要途径。此外,历史证明,造成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政策上的错误也往往人为地造成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扩大化,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87 页。

同上书,第 432 页。

这一点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应该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否认这一点,认为不管情况如何,阶级敌人总是要反抗的,阶级斗争总是要尖锐化的,这就势必走向宿命论的观点。布哈林指出苏维埃机关需要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建设,说的是从无产阶级政权方面主动采取措施,防止阶级斗争尖锐化,这同歪曲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扯不到一起的。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考察“阶级斗争熄灭论”本身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阶级敌人越是失去立足之地,社会主义越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更加尖锐的形式,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同这种观点对立的则是布哈林的被称之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被概括为三句话: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越多,经济斗争就越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进攻。

为了弄清布哈林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观点,有必要看看他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论述。

1919年底,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发展趋势时写道:“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捆住它的手脚,使它不能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反抗越激烈,它越疯狂地施展自己的力量,它越危险,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应当越严厉和无情,甚至必要时采取恐怖手段也在所不辞。只有彻底镇压了剥削者,当他们不再反抗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不再有任何可能来祸害工人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日益缓和下来(),那时从前的资产阶级将渐渐地同无产阶级溶合起来,工人国家逐

渐消亡();而整个社会就将变为没有任何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1925年初发表的《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对比了资本主义下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分裂和崩溃的时候,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而在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消亡’()。”同年出版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写道：“我们知道得很清楚,阶级斗争不会立即停止和消亡,而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期,直到一般的阶级划分最终消失为止。”

写于1927年的《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一文比较集中地谈到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文章写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但是,这决不排斥这些矛盾在一定发展时期内的尖锐化。……在发展的初期,当重心还在于某种比较公开和尖锐的冲突的时候,一个时期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说是一种规律。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排斥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这里需要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过渡时期的矛盾不会马上消失,它们将在阶级斗争中被克服。……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最后则会克服矛盾。但是,正是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行动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排挤城乡资产阶

参见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0—71页。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5页。

同上书，第430页。

级,领导农民和改造农民。”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布哈林的基本观点是:

1、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只有在这以后,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趋于缓和。

2、在过渡时期并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可能性。

3、阶级斗争的形式会起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不等于停止或取消阶级斗争。

4、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缓和,以至最后“消亡”,阶级斗争要延续到阶级划分最终消失为止。

现在我们把布哈林所阐述的阶级斗争消亡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对照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不是被废除、被消灭的,而是自行消亡,自行停止的。列宁曾称赞“国家消亡”的提法,认为它“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从一个方面讲,无产阶级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同样适用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被废除,被消灭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随着阶级的消灭而逐渐“消亡”或“熄灭”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那么阶级斗争就永无消亡之日,就会一百年、一千年地斗下去,不可能想象,这样斗下去的结果,有朝一日会突然出现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突然停止的世界。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没有发现“熄灭”()一词,这个词很可能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03、207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85 页。

是批判者概括出来的。但是如果抛开布哈林本人所没有说过的内容(如“立即消灭”,“很快消灭”,“阶级敌人不会反抗”之类),那么说阶级斗争将“熄灭”,或用布哈林自己的话说,将“日益缓和”、“消亡”()、“静息”(),这只不过反映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熄灭或消亡论正如国家消亡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什么异端邪说!

总的说来,布哈林无非是主张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及时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式,从镇压为主改为以经济斗争为主,用竞争的办法,排挤、改造并最后消灭私商和富农。他反对人为地煽起阶级斗争,而是设法使阶级斗争逐渐缓和下去。这一主张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他提出的办法是否行得通,也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探索和检验。但是把布哈林的这些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却是缺乏根据的。

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据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忆,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前不久,斯大林在同布哈林私下谈话时曾达成共识:从前景看阶级斗争不会尖锐化,而将随着社会主义沿无阶级社会的道路发展,采取越来越不尖锐的形式,但这不排除在个别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过“富农不是高尔察克”,发展的曲线将是逐渐熄灭。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一个正确的理论被当作机会主义遭到批判,混淆了是非界限,那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实践,使实际工作走上歧途。

正因为这样,在1928—1929年的争论中布哈林始终抓住阶

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不放,多次同斯大林及其亲信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在1929年的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指出:“现在有一种著名的‘理论’在党内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就是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就越多。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在七月全会上提出来,而古比雪夫同志加以特别发挥并天才地予以‘深化’的。我认为这一‘理论’混淆了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把某一短暂的阶段中阶级斗争尖锐化(我们现在就处于此类阶段之中)同发展的一般进程混为一谈了。它把目前尖锐化的事实本身变成我们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这一奇怪的理论就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而到抵达社会主义大门之时,我们显然应当或者发动国内战争,或者饿死战死。”

布哈林所说的古比雪夫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有成就,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反抗和对抗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增长。阶级的消亡(我们整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应当、自然也将在尖锐化的斗争的局势下进行。”

布哈林就此评论说:“这样,古比雪夫同志加深并提到更高阶段的这一理论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阶级的消亡越迅速,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显然,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在已没有任何阶级的时候燃烧得最旺最旺!这也属于最近许多理论‘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们已在某种程序上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它把我们导向我们在粮食收购、谷物经济及许多其他方面所遇到的那种奇妙的实际结果。”

布哈林特别强调,不能把发展的总趋势同阶级矛盾的暂时尖锐化混为一谈。他把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作为方针,随时准备

《真理报》1928年9月25日。

点燃阶级斗争火焰的理论主张叫做“白痴”。他说：“我把这种原理叫做白痴。我过去把这叫做白痴，现在也这么叫”。

苏联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反右倾的结果是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大镇压中都可以看到这场批判的严重后果。

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许多地方是歪曲对方的观点，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应当指出，布哈林在 1929 年受批判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言论多半是在 1925 年发表的，但批判者却完全脱离当时（1925 年）的具体历史条件，也不提当时党的政策，这样的批判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从这里可以吸取一个重要的教训，这就是在批判机会主义或所谓机会主义时必须完整地全面地了解对方的整个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断章取义，对机会主义或“机会主义”也不应该断章取义。用断章取义，取其片言只语，攻其一点的办法进行批判，对真正的机会主义未必能击中要害，对被误认为机会主义的理论则以讹传讹，混淆是非界限，弄乱人们的思想，也给实际工作造成损失。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 1989 年版第 297 页。

决定苏联命运的一场斗争

——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 (1928—1929)

—1929年联共(布)党内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后来又发展为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即所谓“反右倾”斗争。这是十月革命后继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争论之后又一场决定苏联以后发展命运的斗争,也是联共党内最后一场争论,此后在联共党史上可以说再没有“党内斗争”这个词了。这两场争论的主角之一都是布哈林,不过他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转换,在布列斯特争论中,布哈林站在列宁正确主张的对立面,如果布哈林那时的主张取得胜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沦丧的危险。10年之后在新的一轮争论中,布哈林已是列宁主义的坚决维护者,可惜这一次他失败了,伴随他的失败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止,斯大林模式的确立,从此苏联走上了另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不错,这也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是一条代价惨重的道路,曲折崎岖的道路,今日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它的最大后遗症。

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方式

1927 年底 1928 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

1926 年底苏联收购了 4.28 亿普特粮食,而 1927 年底才收购了 3 亿普特,缺额达 1.28 亿普特。粮食收购危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使工人、红军、城市居民以及经济作物区的农民面临粮食供应困难,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出口。为解决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 1927 年 12 月 14 日、24 日和 1928 年 1 月 6 日接连发出 3 个指令,要求加紧收购工作,完成收购任务。

1928 年 1 月 5 日政治局成立了由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粮食收购工作。1 月 6 日中央发布了由该委员会起草、斯大林签署的《中央就粮食收购问题给各地党组织的指令》。指令指出,中央曾于 12 月 14 日、24 日发出指令,责成在粮食收购工作上有一个坚决转变,但时过 3 周,仍无任何变化。地方组织的工作速度不能容忍的缓慢、毫无作为的状态在继续,基层机关尚无动作,合作社未履行其起码职责,政权机关和党的杠杆尚未启动。工业品未被用来为粮食收购服务。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没有出售自己的余粮,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提供全部商品粮,并且还出现把粮食卖给私商的事情。农民尚未交纳农业税和农业信贷的紧急贷款。“这一切证明党、苏维埃和合作社机关工作松懈以及对农业影响薄弱”。为此中央提出一系列措施,责成各地组织贯彻实施,坚决要求各省(边区)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的年度和月份任务,“商业部的一切指令均应毫不拖延地予以执行”。商

业部关于装运粮食的安排必须严格地准确准时执行。在回收欠交税款时立即采取各种严厉惩罚措施,首先是对富农,对富农和破坏农产品价格的投机分子必须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指令要求各级领导人对完成收购任务承担个人责任,“拖延执行本指令,在本周内粮食收购工作坚决转变上未做出实际成绩,将迫使中央面对撤换党组织现任领导人的必要性问题”。

这份指令尽管谈到要对富农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分析粮食收购困难的原因时仍认为关键在于各级组织工作不力。

1月9日政治局决定派奥尔忠尼启则去西伯利亚,但奥因病于12日取消此行。

1月15日斯大林秘密赴西伯利亚,先后视察了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卢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后又回到鄂木斯克。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到外地基层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产生了所谓“西伯利亚方式”。

就在斯大林成行之日,1月14日发出了《中央就加强粮食收购措施给地方党组织的电报》。电报继续上述指令的精神,认为“已经证明,收购工作中三分之二的错误属领导的失误”。同时也指出,私商和富农利用我们组织的宽宏大量和行动迟缓,破坏粮食市场,提高价格,使农民产生等待观望情绪。电报要求打击投机分子和富农,逮捕他们以及其他瓦解市场和破坏价格政策者。鉴于道路泥泞的停运时期即将到来,南方地区收购工作只剩下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也只剩下两个半月至3个月时间,电报认为,“如果不对政权和党的杠杆施加压力,那么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全年都会受到抑制”。粮食收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3—195页。

购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攻下的堡垒，“如果我们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施加布尔什维克的压力，那我们一定能攻下它”。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之行就是去“施加布尔什维克的压力”的！

1月18日斯大林出席了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常务局及粮食收购组织、其他组织代表会议，会议纪要第一次提出运用刑法典第107条于粮食收购工作。

此前，1月17日边疆区常委会曾决定，各基层粮食收购区把几名(4—10名)有粮食而利用粮食困难投机、哄抬价格、囤积粮食的富农作为恶劣的投机分子没收粮食。18日的会议纪要则进一步明确：“作为此决定的补充，认为有必要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执行上述措施(按照刑法典第107条的程序)”。同时责成边疆区检察机关在报纸和专门布告中发表关于第107条和105条及其实施程序和条件的通告。

所谓105条和107条是指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有关条文。其内容如下：

“第105条。破坏调节商业的条例……处以1年以下强迫劳动或2000卢布以下的罚款。合作或信贷机构管理机关的人员犯有为法律或机关条例所禁止的行为者，处以6个月以下的强迫劳动或500卢布以下的罚款。”

“第107条。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剥夺自由。”

上述行为如查明有同商人勾结者，处以剥夺自由3年以下并没收部分财产。”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7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7页。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这是用来对付在流通领域利用商品进行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行为的,并不涉及自家生产的产品,哪怕是富农生产的产品。但此令一出,凡拒绝按国家牌价出售余粮者,不管是富农还是中农,就统统按 105、107 条论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

斯大林 1 月 19 日从西伯利亚给中央的密电中指明了这两条的打击对象:1、根据第 107 条打击投机者及富农—收购者,他们是革命法制的破坏者。2、按第 105 条打击基层机关中纵容投机者及帮凶,他们是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

对这种做法在讨论时就有人表示异议。1 月 19 日西伯利亚农业银行理事会主席 . . 扎古缅内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于次日(19 日)写信给斯大林和瑟尔佐夫,表示反对对富农全面实施第 107 条,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不把粮食投放市场就运用第 107 条惩处。

另一项重大措施是 1 月 10 日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下成立“非常粮食小组”,由谢·伊·瑟尔佐夫、P. . 爱赫、A. H. 兹洛宾 3 人组成,这是一个在边疆区拥有全权的特殊机构。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成立此类享有特别全权的三人小组。

在中央领导人视察期间有大量的地方工作人员因“态度软弱”、“调和情绪”、同富农“勾结”而被撤职查办,开除出党。在莫洛托夫视察的乌拉尔地区,从 1928 年 1 月至 3 月有 1157 名边疆区、区和村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撤职。

与此同时,开始关闭市场,挨户搜查,把拥有存粮者送交法庭。而法庭则没收一切粮食,不仅储存的商品粮,还有生产和消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2 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0 页。

费所必须的粮食,往往连农具也没收。对农民实行体刑、打耳光,等等。最后还动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有关反革命鼓动的条文去对付敢于口头谴责暴力的人。

在斯大林施加的“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粮食收购进度大大加快。据斯大林本人给中央的密码电报报告,北高加索过去每5天共收购50—60万普特粮食,现上升为100—150万。俄罗斯中部4省过去为60—70万,现为150万。

斯大林在1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说,决定每昼夜给中央运送360车皮的粮食,每月约1100万普特。而1月29日的电报中这个数字又迅速提高,实际运送数1月26日为367车皮,27日为423车皮,28日达433车皮。决定2月份还往西线运送1240万普特,即每昼夜424车皮。2月2日的电报把2月份收购数提高到1800万,2月4日又改为2200万。在这一天的电报里他“祝贺中央委员会在1月份取得8000万普特的成绩”,欢呼“这是党的决定的巨大胜利”。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他的西伯利亚之行,于2月2日动身返回莫斯科,可能在5日回到莫斯科。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不只是解决一个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农业发展或农村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开端。

正是在这次视察中,斯大林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即发展集体农庄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联共(布)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14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第178—179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第179页。

2月4日斯大林还从卡梅什洛夫车站给中央发电报。

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常委会秘密会议上的讲话,其简要记录即系18年后才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上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1928年1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

斯大林指出革命前俄国约有150万个个体农户,而现在达250万。这意味着地主破产了,大经济被摧毁了,农户的耕地增加了。如果农业继续沿这条道路发展下去,那么每过10年就得重分一次地。斯大林认为,“农业的继续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或者发展大型的个体经济,或者是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苏联的中农同德国的不一样,是小农,他们很少使用机器,而贫农则是更小的小农,他们必须沿着扩大经济的路线发展,“沿着逐步把小农和小小农联合成大型的集体经济的路线发展农业”,并且现在就应采取认真的步骤,应当着手干起来。斯大林指出,“当然,在一年,甚至几年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必须采取这一方针。

斯大林为集体农庄辩护。他指出,集体农庄在我们这里还不多,它们有点被忽视,被认为不是农业中的大道。有人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集体形式则是另一回事。集体农庄不是合作成分的组成部分。他给集体农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什么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个体农户按照生产路线组成的生产联合体——不是按销售路线,如消费合作社那样,也不是按供应路线,如农业合作社那样,而是按直接的生产路线。这是三种,甚至四种形式的合作社:信贷、供应、销售和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一种生产合作社,正因为如此,集体农庄是合作制成分的一种。不应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相反地,应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4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5页。

当善于在合作制中发现集体农庄。”

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在首次发表在《斯大林全集》上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中就变得更理论化了,在这个很可能以后作了进一步加工的“简要记录”中指出,“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是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基础之上的。因此:一、“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二、“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把建立集体农庄提到首位,这是以前党的决议,包括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未见的,是斯大林的创造。这标志着苏联农业组织形式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十五大的决议中有关部分是这样说的:

“必须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农民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转上大生产的轨道(在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集体耕种土地)看作首要的任务,大力扶持和鼓励社会化的农业劳动的幼芽。”

“历年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合作社计划的正确性。”

“必须指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除了有巨大的经济意义之外,它们还是在经济上大规模地联合农民并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最好形式,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改造农民并把农民纳入总的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最好形式。”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7页。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反对派的特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这就是否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因此也就是直接背叛了列宁主义。”

决议提到了“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但认为这必须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逐步地、自愿地从供销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决议并没有把集体化和集体农庄提到首位,更没有提出让集体农庄布满全国的任务。

这一根本性的改动是斯大林在巡视西伯利亚时作出、然后用电报形式通知中央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实行非常措施和集体化在1928年初是联共(布)中央一致决定的,布哈林是赞同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联共(布)中央当时就这一问题作出的正式决定。恐怕最多只能说,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包括布哈林在内,没有人对斯大林的新提法、新决定表示过反对。

可以说,西伯利亚之行也开创了斯大林的新的工作方式——先斩后奏,先由个人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然后由中央追认。此后随着各种反对派被打倒,斯大林一统天下的形成,这种工作作风遂成为一种惯例和制度。

非常措施引起的分歧

非常措施的施行立即在两方面引起强烈的反应:首先是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其次是比较了解下情的地方干部的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60、402—403页。

反对。

西伯利亚农业银行理事会主席 . . . 扎古缅内在 1 月 18 日的会上就对实行非常措施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为基本农民群众所理解。次日又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不把粮食投放市场就对富农采取此类措施。富农的剥削不在商业方面,而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富农都没有采取过这种措施,而是采取旨在限制其增长的经济影响的手段。采用非常措施不会被基本农民群众所理解,而只会被看作同新经济政策不符的法律。他写道:“也许我错了,但我深信,中农和贫农基本群众会把只因富农不出售粮食而把他送交法庭看作是在某种形式下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回到余粮收集制时期”。他强调,“根本问题在于,仅仅因‘不投放’粮食而惩处富农会使中农相信,迟早会轮到他们身上,他们也存有一定数量的余粮”。他认为应当打击收购粮食的富农,在目前情况下,10 户富农就有 1—2 户从事此行当。他建议,对富农采取第 107 条措施时“要极端谨慎”。

斯大林在 1 月 20 日的会上反驳扎古缅内信中所说的富农的剥削实质不在商业而在生产方面,认为“这当然是错的,因为私人生产者搞生产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出售”。斯大林就此作了这样的概括:“个体经济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出售生产,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斯大林的这一结论是不确切的,个体经济,特别是像中农这样的个体经济,首先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如果还有剩余才会出售。把全部个体经济都看作为出售而生产,这是为扩大第 107 条的适用范围而制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7 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9 页。

造的理论,是为强制中农交出余粮而寻找的借口。果然,斯大林接着就说,一部分人,一部分中农将会叨叨,请看一个人在劳动,却不让他随意出售,“他们将感到委屈——我们把他们当作不把自己的商品投放市场的人,甚至当作收购者而揍了他们。我前天说过,中农会说,我用自己的钱购买粮食,如果你想要,你也买好了。显然应该执行谁也不得罪的政策,但从来也没有这种政策。我们不能这样处理富农而不得罪中农。这种政策是没有的,一部分中农将会感到委屈。中农会懂得,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转折。”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实行非常措施及以后全盘集体化中侵犯中农利益的种种做法不是一般的过火,而是一种有意制定的政策,而“新经济政策中的转折”一语则透露了斯大林早已心存取消新经济政策之意。

实行非常措施引起广大干部和各阶层农民的强烈不满。

1928年1月联共(布)“第199—202号磨坊”支部书记库兹涅佐夫向卡姆斯克区委书记报告农民的情绪说,农民都抱怨今年的赋税太重,这种征税伤了中农和贫农。完不成任务的农民往往被关在冰冷的仓库里。红雅尔村的一个农民无力纳税,就没收了他的几匹马和1头奶牛,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上吊身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愿多种,有的农民说,多种了,又从我这里拿走,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为自己播种,税额减少,我才播种。

1928年2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局西伯利亚边疆区分局有一个综合报告《农村党员和共青团员对实行粮食收购措施的态度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207—210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15—216页。

度》，其中谈到许多普通党员对强硬措施持否定的态度。党员和农民一起诉苦，说“现在的税收吃不消”，“当局的压力在扼杀农民”，“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考虑农民的状况？”等等。报告说，“在某些地区他们不是协助工作，而是进行公然的反革命鼓动”。

一个村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斯杰潘诺夫收到粮食收购的指令后说：“这是头脑发昏，这一切难道可以贯彻执行？为什么要一下子这么厉害地压榨所有的人？大概党有什么东西瞒着我们。反对派是对的，因为中央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危机。”此人因此而被撤职。还有一个支部书记也说：“不管关于反对派叫喊得多么厉害，我们执行的还是加米涅夫的政策，但这样能有好结果没有，我怀疑。”

党员戈洛瓦诺夫在党的秘密会上说：“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发布的法令和决定。依我看，这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甚至还要坏，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的转变的。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会在居民面前损害自己的威望，事情会发展成公开的暴乱。”

农民在谈论公开反抗。一个村苏维埃主席、贫农、共青团员说：“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共产党人疯了或正在发疯。不能靠收税去建设。去年也收税，但不像现在这样靠大棒去收。把最后一头奶牛或一匹马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有什么用？难道这样做能发展经济？看来农民只得像1919—1920年那样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了。完全是在抢劫，要股金，要收税，要保险金，

并且都要马上交纳,而又不供给商品。”另一个贫农说:“这种压榨有 1920 年的气味,因此看来只好去打长矛了……”

在西伯利亚 1928 年初因对粮食政策不满而发生的农民闹事达 13 次,每起参加的人数从 15 人至 300 人不等,其中有 11 次是由于粮食困难引起的。1928 年 1—6 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记录在案的在边疆区散发的反苏维埃传单有 76 份。恐怖活动日益增多,1927 年 4—12 月共发生 159 起恐怖事件,而 1928 年 1—6 月半年间就发生 252 起。

1928 年 3 月 2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谢·基谢廖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谈到了当时农村的状况:“采取了使我们完全破坏农民情绪的强制措施和行政压制手段……”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最近农村中反苏情绪剧增。如果仅仅拿走富农的粮食,那还没有什么,然而,还拿走了中农和贫农的……”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组以加强粮食收购……由于三人小组有逮捕权,所以它们就逮捕了没有完成指令的农民……在巴泰斯克专区有这样的事例:那里强迫运出用来养活全家和播种用的剩余粮食。在叶卡捷琳娜站,没收了一个农民自己买来的家庭用品。在沃罗涅日省一批被关押者写道,它们中间许多人已没留下可用来播种的粮食了,有些人被没收的粮食多于他们所拥有的,因此只好付钱,‘春天来临,已到播种季节,我们却被关押受苦’。他们要求释放”。

基谢廖夫指出,“对待播种运动的情绪很糟糕,农村出现减少播种面积的情绪(‘为自己播种’)”。“农民议论说,难道我们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7 期第 179—182 页。

《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缺乏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的稳定基础的信心……他们要求政府说明今后怎么办。我们认为做得过火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经济不可能运行”。

西伯利亚方式在短时期内在粮食收购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也使农村局势趋于紧张。广大农民不满,播种面积锐减,农村局势动荡。各地谣传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回到军事共产主义。

1928年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召开联席全会,讨论粮食收购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

关于四月全会的情况我们不很清楚,然而会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向地方组织传达会议精神的报告,充分说明党内在粮食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上存在分歧。

4月13日斯大林在党的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四月全会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然而却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问题就在于经过连续3年的丰收,富农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都积下了粮食,富农有操纵粮价的可能了,并且这些富农还得到城市投机倒把分子的支持。这样富农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投机,抬高粮价。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收购危机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因此,解决粮食问题必须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向富农进攻。

同一天,布哈林在列宁格勒向积极分子作了四月全会的总结报告,对收购危机作了另一种分析。

布哈林认为,在分析困难的原因时,应当既看到阶级斗争,

也看到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各阶级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市场，通过商品量，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占有，通过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关系展开斗争”。不能把经济和阶级两者割裂开来。布哈林认为之所以出现危机，是经济领导机关的失算造成经济比例失调，从而为阶级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粮食收购危机首先是由不正确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其中之一是谷物同畜产品、经济作物的比价悬殊。其情况有如下表。

1924—1928 年农产品价格指数

(一战前价格为 100)

年 度	谷 物	畜产品和经济作物
1924—1925	129	135
1925—1926	123	140
1926—1927	106	145
1927—1928	109	151

可以看出，谷物的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及畜产品的价格则不断上涨，在农业内部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如布哈林所说，“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交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

其次，税收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册第 211 页。

同上书，第 216 页。

同上书，第 216 页。

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 66.59%，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劳动收入）占纯收入的 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 5.2%。

第三，工业品供应不足。农民在秋收后出卖农产品获得一定量的货币，但国家不能及时投放足够的工业品来满足农民的需要。而货币还没有成为积累的手段。这也影响农民生产和销售的积极性。

这些情况造成的基本市场比例的破坏，使农民不愿种植谷物，也使手里有粮食的农民不愿出售粮食。顺便指出，手里有粮食的不仅仅是富农，斯大林也承认，“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

因此，布哈林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继续实行非常措施，而是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基建投资的利用率，调整政策，使谷物同经济作物、畜产品之间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以平衡经济的诸基本因素。

布哈林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新经济政策本身包含着自我克服的根源，即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源”；第二，必须看到非常措施的“过渡的、有条件的性质”，随着本年度粮食收购运动困难的排除，非常措施也应该废除。

布哈林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四月全会决议的精神的。

粮食收购危机实质上是经过数年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教育，懂得文明经营和经商的农民对于封闭的行政命令的价格、税收管理体制的一种抗议和反抗。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7 页。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24、226、230 页。

这说明如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就得进一步运用价值规律,进一步运用市场机制。

尽管实行非常措施后粮食收购进度曾大大加快,但到4月份速度又变慢了,出现了新的困难。1—3月收购了近3亿普特,而4—6月连1亿也没有收购到。斯大林的解释是1—3月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而到4月份机动粮已被收购完,开始触动所谓“防荒粮”了。这一事实说明,问题不是富农囤积,而是农村确实没有余粮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度采取非常措施,必然要进一步侵犯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利益,激起他们的反抗。

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直对农村的局势感到不安,李可夫在四月全会上警告说,我们同中农的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对富农的压制使他们缩减耕地,而这是我们无法弥补的。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在6月15日的信中指出,“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

再次实行非常措施使本来已存在的分歧趋于尖锐,并且逐渐超出粮食收购和非常措施的范围,终于爆发了一场新的党内斗争。

党的最高领导层逐渐形成两派,一派以斯大林为首,主要成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另一派以布哈林为首,主要成员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还有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兰诺夫和财政人民委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8页。

见 . . . 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莫斯科1970年版第125页。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2页。

员弗鲁姆金等人。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争论只在上层内部会议上进行，与此同时，在公开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对方的观点。由于在中央尚未形成占优势的多数派，在党的会议上各派能比较充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往往作一些妥协让步，决议多采取布哈林的观点和主张。

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在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理论，批判“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等等，强调“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

5月28日斯大林作《在粮食战线上》的讲话，认为粮食困难的根源是“商品粮食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斯大林批判了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阶级——富农和工人阶级的理论，说“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批判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的理论，认为集体农庄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断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12日斯大林在《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一文中指责“有些人想用放弃对富农斗争或用放松这个斗争的办法来和中农达成妥协，说什么进行对富农的斗争会吓跑一部分中农，即富裕中农”。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7、59页。

同上书，第72—78页。

同上书，第91页。

与此同时,布哈林也在内部和公开场合利用各种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1928年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进口计划,布哈林就米高扬的一项建议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条子,说明自己的观点:

“我对下列情况非常担心:

米高扬的3个便条有这样的倾向:1、加强工业品的出口;2、抛开作为出口物的粮食(谷物)不管。

结果:

- a. 我们会延长国内的商品荒;
- b. 在国内商品荒的情况下,我们却迫使工业为出口而生产;
- c. 我们不采取措施去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
- d. 一个农业国却搞工业品出口。

应当采取另一种做法:

1. 加强工业化,使之为国内市场生产;
2. 使农业工业化,提高其生产率(同时使谷物业机械化);
3. 为工业化的目的而采取出口农产品的方针。

农业缺乏一定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能白拿的,而一千台木犁也装配不成一台拖拉机。

我很担心下述本质性的缺陷:

打算搞的工业化并不同时使农业也工业化,而是使工业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等等。

这种政策只会加深巨大的困难。”

斯大林对这一便条的批语是: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第300—301页。

“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它不是来自某种自觉采取的方针,而是来自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经验主义和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米高扬在这里无权决定问题。斯大林。”

布哈林在这里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生产,用使之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办法提高其生产率,农业需要有一定的积累才有可能购置农机具,实现机械化等等重要论点。

尽管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意见表示赞同,实际上这时两人的关系相当紧张。布哈林甚至担心同斯大林面谈会崩,而于6月1—2日给斯大林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布哈林在信中指出,“我们既没有路线,也没有共同的想法”,中央最上层,“哪怕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次也没有讨论过总的政策问题”。问题在于,“首先,我们和全党没有任何完整的计划。我们做得比最草率的超经验主义者还糟糕。其次,我们在思想上也使党失去方向……我们的非常措施(必要的)在思想上已变成、发展成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如果必要的话,即使离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也一点不用害怕。但这种必要性在哪里?……如果全部问题在于富农,那么,这九亿之数算什么?——现在已承认这是神话般的数字。而如果我们的粮食本来就少,那怎么能说是‘富农控制了’我们?如果全部救星在于集体农庄,那么从哪儿取得供它们机械化之需的钱?在我们这里要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农庄,这总的说来正确吗?吸收小额储蓄的方针是继续有效,还是已经过时?提高个体经济的方针仍然有效还是也已过时?”

布哈林特别提到当时领导层中存在的不正常的气氛。他指

出，“我们甚至不谈这些问题：怕谈，谁都不喜欢听骂声。然而，如果连中央思想实验室都摧毁了，如果相互间不能不担心害怕地，不能推心置腹地商讨最重要的政策问题，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可怕。国民经济不是执行秘书。你不能用送交法办去威胁它，不能对它大声叱责。而我们缺乏深思熟虑。”布哈林向斯大林保证说，“我不要争吵，也不愿争吵。我知道得很清楚，争吵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我们全国和我们党目前所处的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鉴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布哈林要求斯大林“考虑一件事：使代表大会平静地举行，不要在这里制造不必要的裂痕；不要制造唧唧咕咕的气氛”。

布哈林的这封信说明，当时布哈林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掩饰存在的分歧，而是以正常的方式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斯大林所谓布哈林集团隐瞒分歧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布哈林的态度是心平气和的，语气是友善的，是有共同解决问题的愿望的。

6月15日政治局候补委员、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写信给政治局，对农村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农民和工人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农村采取的新方针加剧了我国阶级状况的恶化”，“最近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针对当时各地的过火现象，他指出不能用剥夺的办法同富农作斗争，“宣布富农为非法引起了对全体农民的不法行为”。他建议开放集市，开放粮食市场，提高粮价，提出“不要用突击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要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最后，他要求“回到第十四

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

1928年11月弗鲁姆金还向中央递交了第二封信。这里顺便把第二封信的内容也介绍一下。信中对苏联农业的状况表示担忧,指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农业停滞的图景,特别是在谷物部门……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在报刊上谈论退化。但我们在党内不应讳言,这种落后等于退化”。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之一,他建议“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 and 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他认为基建规模过大,投资过多,因此建议压制基建投资。

从以上转引的片断可以看出,这是对当时局势进行认真思考、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议的信。他的观点同布哈林等人的看法相近。因此当斯大林要求对信的论点作出政治评价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兰诺夫都表示反对。

斯大林于是以个人名义于6月20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认定弗鲁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的限制的申请书”。后来更上纲说,不妨碍富农经济“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也就是“给他们政权”。斯大林宣布,右倾的“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

1928年6月2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布哈林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兰诺夫的同意下宣读了一份手写的关于经济状况的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01—110、232—234页。

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莫斯科1970年版第118页。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5页。

同上书,第110页。

同上书,第236页。

同上书,第232页。

长篇声明。内容为：1、警告工农联盟处于破裂的边缘；2、要求为自由贸易和市场关系创造条件；3、要求提高和发展农民经济。莫洛托夫听后立即说，这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反党的文件。斯大林却说：十分之九我都可以接受。为制定与经济形势有关的经济政策，成立了由鲍曼、布哈林、米高扬、李可夫和斯大林组成的委员会。7月2日政治局赞同委员会制定的提纲，决定提交中央全会审查。提纲基本上反映了布哈林的主张。

七月全会上的争论

7月4—12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除共产国际问题以外，全会着重讨论了国内经济形势，特别是粮食收购政策问题。

斯大林在会有3个发言：《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政策》和《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些新提法，从而使分歧进一步扩大、升级。

首先，斯大林提出了“贡款”论。“贡款”俄文为 ，《斯大林全集》译作“贡税”，这里指的应是无偿的进贡，因此译作“贡款”较为贴切。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工业化资金的来源，指出苏联不能靠掠夺殖民地和举借奴役性外债来取得资金，所以只能取自农民。他集中论证了向农民征收额外税的必要性，说农民不仅要向国家交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还要高价购买工业品，低价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这种剪刀差是一种类似“贡

声明迄今未见。要点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145页。

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145页。

款”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必须征收这种“贡款”。

第二,斯大林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任何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都反映出城市或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

这两个新论点是斯大林的创新,是以后斯大林政策的基本点,也是党内两派争论的焦点。这表明争论已开始超出粮食收购的具体政策,而涉及更为根本的问题。

斯大林重申粮食困难的根源是农业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但在谈论摆脱危机的出路时,改变了三条措施的顺序。5月28日《在粮食战线上》把组织集体农庄放在首位,把支持个体经济放在末尾,现在颠倒过来,改为:第一,提高中小农民经济的生产率;第二,把小经济联合为一切形式的公共经济;第三,巩固并发展国营农场。顺序的改变显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斯大林在全会上还没有拥有多数,对他的主张有相当多的人表示异议。

1928年7月10日布哈林在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如他本人在开场白中所说,他的发言不仅涉及同粮食收购直接有关的问题,还涉及苏联当时经济政策的总的问题。关于这篇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同上书,第156—161页。

讲话过去只见到简短的摘要,因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布哈林的讲话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非常措施。对过去采取非常措施可以不必去追究,“现在对采取非常措施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措施”。当时的问题是,或者关闭工厂,或者征收粮食。布哈林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收购而是征收”。他认为,如果早几个月考虑到这问题,是可以采取别的解决办法的。“但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错过了采取别的办法的时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我们的过去,而在我们的目前”,要弄清楚,全会现在应抓住的政治环节是什么?布哈林回答说,“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取消非常措施”。因为非常措施“已经历史地过时了,它在经济上几乎已不再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相反地,它在完成前一段收购任务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个严重后果是非常措施不仅打击了富农,也伤及中农,从而造成对工农结合的威胁。布哈林指出,非常措施的施行实际上是走上军事共产主义——改行配给制,日常生活用品消失等等。这就“使我们同更为广大的农民发生争吵”。

布哈林说,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采用非常措施时,我们确实出现了某种由非常措施转向可以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倾向”的过程。不能掩饰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纲领的争论期间刚刚为军事共产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是在减少对小生产者的个人刺激,在征用、没收等等情况下以实行合理消费为目的的制度。

不用说,在我们的目前体制内存在这种因素,继续非常措施的体制,我们就不能发展。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但是,第一,没有战争,第二,这时保卫庄稼汉的“土地”这条根据业已消失。在过去那些年代我们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时,我们在一定程度

上在贫困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干部们也吃一份定量,而现在实行配给制,生活条件、消费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些实施配给制的人本身并不吃定量。……这种历史孕育着非常巨大的危险性,要看到这一点。

由于严重侵犯广大农民的利益,“在我们面前的是群众性的不满浪潮”。在全国一些地方,在乌克兰、在北高加索等地约有150起事端,有几十起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布哈林援引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一些人的发言片段:“我们在农民中间出现巨大的政治麻烦……我们不得不面对农村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我们区发生了近50起群众性行动,农民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贫农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不是走向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是走向工人——企业中支援自己的人。”“我们这里出现老革命游击队员的发动,他们找到苏维埃政权、军事委员会,声称:‘怎么样,给不给我们粮食?我们争得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也可以抛弃它。’”布哈林指出,像这样农民到城里游行示威,这是过去几年所没有过的。他警告说,“我们面前已响了两次铃,第三次铃马上就要响了”,可以说,“我们这里存在对工人阶级同农民结合的现实威胁”。布哈林大声疾呼,“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以允许扩大重新实施紧急措施为方针”,“我们政策的中心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造成对结合的威胁。否则我们就执行不了列宁的基本遗嘱”。

布哈林看到反富农斗争中的现实矛盾。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生产力,必然带来富农的发展,然而又不能不发展生产力,所以如何慎重地妥善地解决这一矛盾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布哈林主张运用税收政策去进行调节。他说,“像税收政策这样的杠杆,它使我们有可能几乎剥夺富农,而又不伤及中农。然而我们太少考虑为什么和怎样运用这一杠杆,以便不断收取富农的积

累,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又不使中农受损失。因此,我认为局势根本不是毫无出路的。我们的最主要的决定性任务是怎样做到既向富农进攻,又不使中农因此受损失的问题”。

从布哈林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向富农进攻,但认为进攻的手段应是经济手段,税收政策。而不是诸如没收、扫地出门一类的镇压手段。

粮食收购困难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布哈林在发言中再次对困难的根源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他反对把收购困难简单地归结为富农兴风作浪。他指出,去年出口 2.77 亿并且大家都吃饱了,今年不仅一点也没有出口,而且在许多地区还存在消费不足的迹象。“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分化过程,造成我们的整个经济出现如此迅速的危机性震荡”。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直接原因是“谷物在粮食市场上处于非常特殊的、非常不利的境地”。这就使出售粮食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因此,在这里起作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价格问题”。他引粮食情况最好的地区之一北高加索的情况为例,说明从 1925 年起农民从每俄亩和每普特小麦所得的收入逐年下降。现把他所说的数字列表如下:

年 份	每俄亩小麦产量 (普特)	每俄亩收入 (卢布)	每普特收入 (戈比)
1925—1926	69 9	72	115
1926—1927	37 9	32	102
1927—1928	39 8	24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植和出售小麦的积极性自然也随之下降。因此布哈林主张修改粮食价格,他说,“我绝对同意认为应

尖锐提出粮食价格问题的主张。这一问题首先是我们同中农的关系问题”。

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贬低价格作用的观念,布哈林从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的国情出发阐述了价格所起的特定的决定性作用。他说:“说价格一般只起有限的作用,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议论在这里是不完全正确的。一般说来,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也不具有这种决定性意义。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样,当然,在我们国家内部,价格或者价值形式是某种虚象,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我们的计算方法,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经济的体现。这一切全都对,但在我们同小农间的相互关系上,当市场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在这里价格范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这里价格不能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同样不正确的是,认为似乎在根本不存在价格形式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随意‘规定’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同样是不正确的。如果某一生产部门,例如农业、工业或这些大部类的分支不断地付出大量超过收入的劳动,如果它不能抵偿自身的劳动费用,那么这一生产部门就不得不收缩。在这种社会里不会有任何市场,不会有任何价格。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领导可以随意对待某一生产部门。如果使它‘受委屈’,它就不会发展。价值规律在消亡,但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仍存在。如果这某一生产部门不能从共同的经济机制中获得足够的营养,它就会衰落。要跳出这一规律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姑且撇开关于价格 and 价值的相互关系、关于价格转化成别的什么等等学术争论不论,但有一点还得说一下:如果某一生产部门在后备的分配上‘受委屈’,它就必然倒退。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里全部力量的分配主要是按两个渠道进行的:通过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

这里关于价格在苏联当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它道出了粮食收购困难的关键,实际上也指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

布哈林在这里重提他过去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认为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出发是不正确的,他反对从庄稼汉身上拿取“技术上所能拿取的”一切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指出如果不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那么“归根到底会打击到工业(通过粮食,通过原料,通过市场)”。布哈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是一种取决于农业积累的函数”。

实际上布哈林这里所发挥的已超出粮食收购这一具体问题,而深入到当时经济领导中的问题了,即他所说的“一般经济政策问题”。

布哈林认为,困难是由于一系列巨大的任务和经济的落后造成的,例如,想赶上西欧,想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速度,想使农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增产,想使工人和劳动群众有最大限度的消费额,而同时国内经济却普遍落后、贫困。“这些任务不可能同时解决。我们在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这些任务,有时倒向这一边,有时倒向另一边,自相矛盾”,结果“我们时而从这一端,时而又从另一端抱怨经济上的比例失调”。布哈林指出,国内出现了“口张得大大的漏洞、陷坑”。而其根源是没有执行当时所规定的“有后备的经济”这一政策。

布哈林揭露经济生活中的反常现象,即他所说的“我们的经济是头足倒立的”:马吃烤面包,而某些地方的人却在吃糠;农民不得不到附近城市去买粮;一个农业国在进口粮食,却出口工业品。他认为,“这种倒立的经济会造成倒立的分歧。必须予以纠正。”

造成大量失误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和管理的本领不够”。布

哈林引一位德国教授评论布尔什维克的话：“他们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卓越的政治战略家，出色的鼓动家，卓越的改造人的教师；但是他们缺乏经济训练，缺乏经济修养。别看经济战线上有一两万布尔什维克埋头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训练。”布哈林认为，“这种说法离真实情况并不远”。他指出，我们还没有通过改造时期的考试，“我们缺少解决这一时期任务的文化水平”。他说：

“西欧是直接进行技术变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以幻想来自我欺骗。在这里应当说，例如，作为积累，德国增加 100 万同我们增加 100 万不是一回事。

在德国这 100 万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因为在那里会以大量的先进得多的机器去改善经济。看看他们那种改善，我们会觉得，我们仍然处于穷乡僻壤。我们现在应提出经济领导的方法和经济管理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的中央机关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给自己背的包袱太大了——承担大大小小的领导，而不是把领导限制在一系列经过深思熟虑的基本经济问题上”。

布哈林批评了“超集中的官僚机关”。他指出，“在对待我们的经济机关上，我们用一种形式的主动性——来自国家，并且仅仅来自上头的主动性，取代各种形式的主动性。我们扼杀了下层的合作社的主动性，地方的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主动性。结果就造成超集中的官僚机关和上头负责制，它们终于走向自身的反面”。他很欣赏丘吉尔战时上台执政干的头一件事，这就是使业务机构非集权化，砍掉它的四分之三。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按此比例搞非集权化，但我认为这是个重大问题”。

布哈林对所谓个体经济已到了发展的极限的议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现在仍需“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要把个

体经济同个人刺激挂钩,促使其发展,他认为不应当把发展个体经济同建设集体农庄对立起来,“集体化本身是立足于发展个体经济之上的”。他指出,列宁直接反对了这样一种看法:个体经济越贫困,它就越易于走向集体化。他没有直接点斯大林的名字,而是间接地说:“包括米高扬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说,个体农业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关死,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针对当时已开始冒头的强制集体化,布哈林引列宁的话说,对我们的中农不要干蠢事。他大声疾呼:“请大家想一想吧,你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⁸这样你们就会出现庄稼汉的起义,富农则让庄稼汉承担责任;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

富农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中农群众跟他们走,那就会形成一支可怕的力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起义反对无产阶级,予以迎头痛击,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这里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布哈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避开这种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的前景,必须加强工农之间的结合。他指出,列宁写他的关于必须爱护我们同农民们的联盟的遗嘱时没有提及富农,事情很清楚,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而是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胜利地同富农斗争的问题。

会上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发言支持布哈林。

李可夫指出,当前“政治局势恶化,同农村的关系紧张”。一

布哈林发言全文载社会政治杂志《集议场》(),慕尼黑出版
1988年第19期第216—238页。

些人问,我们是否开始同中农分裂,另一些人说,中农离开了,还有人补充说,有些地方贫农也反对我们。据说,工人中间也出现某种不满。李可夫认为,“看不到当前的政治情绪,不试图给以清醒的估计,这是政治上的近视”。他认为同农村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非常措施。“我们在革命的第11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第一次对农民这个粮食的生产者大规模地施加行政压制,对这种做法可以也应当进行分析”。不能说中农要动摇就让他动摇吧,问题是要使他们动摇到我们这边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间阶层如中农等破产,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这样。他批评卡冈诺维奇的说法,卡只要求“同歪曲做斗争,而不联系非常措施。卡冈诺维奇发言的出发点是非常措施还要保留,仅仅反对歪曲”。但问题不在于各种歪曲,而在于非常措施本身。“继续非常措施实质上意味着国内政治危机,应当取消非常措施”。李可夫指出,“如果再采取非常措施,那就意味着同中农的决裂。现在没有同中农完全决裂,原因是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群众性的公开斗争”。他坦率地承认,“任何一个政府仅仅搞得这么糟都会受到攻击,甚至提出更换政府的问题。我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但我们应有更多的批评。”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他没有把自己摘开,承认自己是“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主要肇因者之一”。他强调向农民做让步的必要性,指出“当同农村的关系像有可能绷断的弦那样紧张,那就不排除让步。如果在国内战争与让步之间做选择,自然是选择让步”。

托姆斯基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在当前局势下向农民做让步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当前历史阶段,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在保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375,
.2, .73。

持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保障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关键之关键,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靠工人阶级,而且要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的手去干”。他主张向农民让步,他问道:“除了工人阶级向中农作一系列的让步外,能想象另一种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保障吗?”他回答说:“不,不能想象”。资产阶级和富农要对我们构成危险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得到外国的支持,另一个是能领导小生产者基本群众——中农来反对我们。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能领导小生产者基本群众来反对我们呢?托姆斯基认为,这就是当我们没能正确实现工农结合之时。他举历史上的三种情况为例:一次是大的破坏结合,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另一次是1923年因剪刀差引起的销售危机;第三次就是目前的危机,粮价偏低,农民不干,结果他们不是去反对富农,而是反对政府,反对我们的领导去保卫他们的利益。

这三次危机头两次都是以向农民做让步、改变或调整政策得到圆满解决的,这次同样应该用让步求得解决。他不同意莫洛托夫的下述论断:我们过去和将来都要打击富农,同时也要伤及中农。托姆斯基认为,这会直接威胁到工农联盟,而保持和保障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实际前提条件”之一。他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如果发生战争,实行配给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1个年头,迫使人们接受配给制,同时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好,我们的领导是正确的,而富农的破坏活动越来越多,这实在说不过去!”

真是不幸而言中,1928年底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但这并

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133—139页。

不妨碍斯大林在 1929 年底宣布“伟大的转变”！

布哈林等人认为,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应该千方百计地为此而努力。乌格兰诺夫认为必须扩大新经济政策,给私营企业以自由。归根到底对我们来说,由谁来生产是无所谓的,只要生产出来就行。弗鲁姆金强调说:“每取得 100 万普特粮食,不管它是从哪个集团那里得到的,都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在当时粮食收购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而不应在粮食上分什么姓社还是姓资,更不能在反富农的口号下侵犯中农和贫农的利益。

克鲁普斯卡娅在谈到反富农斗争时指出,有不同的斗争:一种斗争是限制富农的剥削,在这种斗争中,中农和贫农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给富农选举权,在某一运动期间限制富农剥削的可能性,在向贫农和中农供应时提供优惠,这时农民群众,中农和贫农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组织同富农的斗争只是使富农的经济破坏,同时也伤及中农和贫农的经济,那么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只会打乱全部计划。她指出,我们在实行非常措施时没有足够明确地区分剥削者和好的当家人。如果我们记得克鲁普斯卡娅在 1925 年曾同新反对派一起大力主张加强农村

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 134 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375, .2, .75。

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 131—132 页。

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次她确实看到了农村中过火斗争的现实危险性,看到了实施非常措施对工农结合造成的现实威胁。

会上争论激烈,并且持不同观点的人已逐渐分成两个阵营。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报告,还是布哈林的讲话都没有互相点名,仍保持一定的克制。斯大林尚未获得多数的支持,他的主张没能写进全会的决议。7月10日全会根据米高扬的报告通过了《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决议中关于粮食收购危机产生的根源、特殊原因、应采取的对策等等都采纳了布哈林的提法。而斯大林的新提法如“贡款论”等在决议中尚无反映。

决议通过后,7月11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各自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斯大林在全会会议上发表《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的讲话,为未写入决议的“贡款论”辩护,指责“一部分同志”在谈发展农业的办法时只字不提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是一种反常的和奇怪的现象”,同时不点名地批评托姆斯基的“不断让步论”,指责他主张“无止境地退却,不断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认为要加强工农联盟,就必须同富农即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尽管全会通过了体现布哈林观点的决议,但是鉴于斯大林的观点和主张在许多方面非常接近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布哈林担心斯大林把托派拉过去,所以他通过索柯里尼柯夫牵线,于7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人民出版社版第3册第446—451页。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64—170页。

月 11 日访问了原托季联盟的主要成员加米涅夫,向他谈了联共(布)中央,特别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争论情况。

在谈话中布哈林对形势表示深为不安,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对整个革命是灾难性的。它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事实上,革命已在危险之中”。布哈林把斯大林的路线概括为:1、贡款论。布哈林认为这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没有任何不同之处。2、社会主义愈是发展,反抗就愈强烈。布哈林认为,“这简直是愚蠢无知”。3、既然需要贡款,而反抗又要增强,这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自我批评”不应触及领导,而只适用于执行者。布哈林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警察统治。

布哈林的语气显示,他已同斯大林决裂,谈到了撤换斯大林的问题,甚至说斯大林“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是“分裂分子”,他“除了保持权力,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有时作让步,是为了把住领导权的钥匙,以便以后消灭对手。布哈林举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给斯大林写了第二封信后,斯大林把他请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和我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后来在政治局开会时布哈林引用了他这句话,斯大林却大喊大叫:“你说谎!你捏造事实让政治局反对我。”

会晤未产生任何实际结果。据布哈林说,会见的目的不是要结成政治联盟,而只是要加米涅夫的人不要去攻击他们。加米涅夫对不久前的论敌并不信任,从他所作的札记看,在整个会晤过程中他只是听布哈林一人说,仅偶尔提点问题,过后作了简短的纪要。1929年1月托派把这一纪要印成传单,在莫斯科散

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70页。本引文根据库恩·米克洛什:《布哈林及其敌友》,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订正。

发,此事后来成了斯大林对付布哈林的重要把柄。

七月全会上的两种声音的争论说明,党的领导层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党内外早已有所闻。不过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对斯大林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对全党、全国封锁分歧的消息。布哈林自然也不希望把分歧捅出去,至少希望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能平静地举行”。因此当时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个政治局内部完全一致的声明。

1928年9月19日古比雪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被称作“新的工业化宣言”的讲话。他说,国内外出现的危机和危险情况要求不顾一切代价地急剧加速和集中对重工业进行投资,即使造成经济不平衡和人民群众中出现“不满情绪和强烈的抵制行动”也在所不惜。他指出,“我们必须明了,减慢工业化的速度,从各方面看都是错误的”。针对有人指责搞“超工业化”,“不量力而行”,古比雪夫称:“我敢肯定,凡是认真研究了我国经济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最严重的不平衡……就是我国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不平衡”。

古比雪夫的讲话提出了工业化的速度和格局这一新问题。至此,1928—1929年间联共(布)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基本上都提出来了。

1929年9月30日在进入新的经济年度前夕,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是一篇在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论文,它是针对苏联当时的经济形势写的,但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当时的具

《真理报》1928年9月25日,转引自《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537页。

体政策,而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布哈林首先谈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民经济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指出苏联经济产生了危机。这是一种“独特的危机,它的表现同资本主义危机恰好相反,都是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所致,但在苏联这种失调是‘颠倒的’: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荒,不是供过于求,而是求过于供,不是资本积累过多,而是资本缺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资本主义危机是由生产的普遍无计划性造成的,而苏联经济的危机也是“由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即由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产生的”。布哈林进一步分析说,过渡时期的这种相对无计划性——或相对计划性,“是建立在小经济和市场联系的形式上,也就是说,存在着大量无政府状态的成分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制订出一种“理想的计划”,因为它包含着许多对自发的含量的预测的成分。因此不能过高估计计划经济的因素,也不应忽视大量的自发性成分。布哈林要求尽可能建立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动的经济平衡”。他警告说,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就会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他的这一警告既是针对当时的现实的,也是给当时制订五年计划提出一个基本方针。

他以托派的经济理论为靶子,批评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去,以保证工业的最大速度的主张,指出工业的高速度必须以农业能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但是目前工业蓬勃发展,而粮食数量却没有增长。粮食收购危机并非工业品荒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粮食危机毋宁说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谷物业的稳定或者下降造成的,它是在下列情况下出现的:1、谷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之间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2、非农业来源的收入增加;3、对富农经济的税率提高得不够;4、对农村的工业品的供应不足;5、富农在农

村的经济影响的增长。其结果则是“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从谷物业中(相对地)转移了”。布哈林重申,粮食生产必须在发展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在谈到工业品短缺的时候,布哈林指出,这并不是工业落后于农业,因而无法满足农村的需求,而是工业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极限。其表现为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不当,原料不足,粮食不足等等。布哈林特别批评了当时基本建设过大,缺乏后备保证,把弦绷得太紧,认为这有点“冒险主义的气味”。他指出,在基本建设上并非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必须保证建设材料的“自然的物理存在”,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欲速则不达。布哈林指出,基本建设的高速度是以预算的极端紧张、后备短缺、削减消费部分为代价达到的。而基本建设投资过于紧张将会产生如下结果:1、使实际的建筑工程不能以同样规模跟上;2、一段时间以后将导致收缩已经开始的工程;3、会对其他部门发生非常不利的影晌;4、使各方面的商品荒更加严重;5、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

布哈林提出学会文明管理,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一根本性任务,为此他主张消除俄国的闭塞性,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掌握西欧科技的进步成果。

他把问题又归结到国家的体制问题上去,提出“朝着列宁的公社国家的方向采取一些步骤”,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消除过分集中化。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化,学会更好的管理,我们就会成长,就能够而且会较少动荡地成长。列宁同志在他的晚年所说的正是这些问题”。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是他七月全会上的讲话,但是写得更系统化,更理论化了。由于是公开的文章,就更多地以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批判的靶子,但是其实际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正如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四月全会上所说的,“每个识字的党员都懂得这是怎么回事”。

这篇文章自然引起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但对文章的批判是逐步升级的。10月8日政治局用征询的办法,在9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人不在的情况下(布哈林本人也不在),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和斯大林4人通过一个关于布哈林文章的决定,说鉴于布哈林文章中存在一些有争论的论点,《真理报》本不应在未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下予以发表。1929年2月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所作的决议,也只能说“这一札记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折中主义的胡说八道”,而无法把它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在一段时间里斯大林还不得不替它辩护,说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提出的是(农业)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直到1929年1、2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才声称,“在我们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看来”(按:如上所述,只是9名委员中的4人),这是一篇“反党的折中主义的文章”,“它指望减

见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175页。

同上书,第175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01页。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24页。

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鲁姆金那封信的意见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

行政力量和思想理论之间的较量

这场斗争可以说是理论力量同组织力量之间的较量。布哈林等人当时倒也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包括共产国际、人民委员会、工会和《真理报》,但是他们没有凭借这些组织机构的力量去同斯大林抗衡。而斯大林一方则很懂得权力机关、组织力量的作用,作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他集无限权力于一身,长于运用行政组织力量,在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他就是主要依靠这种力量取得胜利的。在同布哈林的斗争中,他自然会扬长避短——发挥行政组织力量之长,避开理论之短。他依靠行政组织力量一步一步地剥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权力,而对理论问题则暂时放在一边,待时机成熟时,再用武器的批判去解决批判的武器,而历史证明,这在一段短时期内是颇有效的。

共产国际的争夺

争夺首先在共产国际展开。

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撤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后,布哈林一直作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在共产国际这个领域打击布哈林可以收一箭双雕之利——掌握党上之党的世界组织,同时又打击布哈林这一当时最大理论家在国际上的形象,为在联共(布)党内彻底摧毁布哈林作好组织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6页。

和思想上的准备。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斗争是围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展开的,以修改布哈林提交大会的文件草案的某些表述的名义进行的。

为准备共产国际六大,布哈林受委托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草案。7月14日布哈林把草案交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在大会召开以前予以审查。7月16日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参加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了草案并通过决定:“采纳提纲。根据交换的意见进行修改。”次日,代表大会开幕时,联共(布)代表团会议决定仔细审议布哈林的提纲,同时决定:“在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联共(布)派出的执委会委员必须建议以布哈林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作为基础提交代表大会”。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谓布哈林未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即将提纲分发出去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直到7月24日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会议和7月25日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才重新讨论了布哈林的提纲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斯大林做文章的第二个文件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几个纲领性文件的起草人,他为191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起草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接着又接受委托起草共产国际纲领,他起草的纲领草案收入他的《进攻》文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曾讨论过纲领问题,决定尽快公布纲领草案,并定于下次代表大会最后讨论批准。1928年布哈林完成纲领起草工作。斯大林建议改变结构并提出一些修改

见《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意见。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布哈林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报告,但起草者变成了两人——布哈林和斯大林。布哈林后来说:“斯大林在很多地方把我的提纲弄坏了。”他自己想要在全会上作关于这个纲领的报告。我无法摆脱他,他极力想要人家承认他是个理论家,他以为这就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文件的修改反映了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关键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布哈林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已失去其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仍有继续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他在代表大会上说:“实际上它(生产力)在发展,而且发展得相当快,甚至不排除在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能够异常迅速地发展。”他看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而修改了共产国际四大第一个纲领草案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提法,作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尽管布哈林对资本主义体系灭亡的到来估计得较为乐观,但他并不认为目前正处于革命爆发的前夜。斯大林对这一观点作了修正,认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因此斯大林得出结论,“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与形势密切相关的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问题。在统一战

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5 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9 年版第 3 册第 137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20 页。

线问题上当时普遍存在一种“左”的看法，布哈林也不例外，他把社会民主党领袖看作“叛徒”和“资本主义支柱”，但他没有抛开社会民主党内的广大群众，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他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在分析形势时，在制定共产党的策略时，都不能这样做。”但经过斯大林的修改，在有斯大林签署的纲领草案中社会民主党被称之为“最大的反革命势力”，表现出“法西斯主义倾向”，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起着“法西斯的作用”。

布哈林的形势提纲中谈到必须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斯大林认为这还不够，“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因为这个“左”翼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这样，斯大林就把共产国际内存在的左倾宗派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大大影响了以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

在共产党内反倾向问题上，经斯大林修改后的文件强调不仅要反对右倾，而且要反对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同时强调加强党内铁的纪律、保持党的统一。其目的就是禁止党内出现任何不同意见，把任何不同意见视为异端而予以禁绝。布哈林在这一点上也被迫作了让步，他本想就此展开“思想斗争和思想辩论”，然而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有关决定作为反对布哈林的锐利武器。

纲领中被斯大林“弄糟”的地方还有：把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多种条件和多种道路简单化为“三种类型”，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抛弃社会主义建设各种各样道路的提法；抛弃布哈林纲领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册第144—145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页。

案的结尾——强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富有创造性的提法。

由于对布哈林起草的文件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在与会的各国党的代表团中流传联共(布)中央领导中出现分歧,使布哈林的处境陷入困难。为此布哈林请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一个关于政治局委员中没有意见分歧的声明。7月23日政治局委托布哈林和斯大林起草这项声明,声明于7月30日得到批准。声明批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分歧的任何流言,认为一个最团结的领导集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可能没有争论,但这些争论不能成为散布存在意见分歧的流言蜚语的依据。在信上签署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布哈林、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莫洛托夫、加里宁、古比雪夫全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特别提醒不要拿共产国际问题上的传闻投机,认为这种投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7月31日在六大各代表团团长会上通报了这一声明,同时决定向全体代表通报。

尽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布哈林主持下召开的,但实际上他已被排除出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外。从此建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格控制,加强了共产国际中的宗派教条倾向。

1929年1月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塔斯卡(塞拉)在写给本党执委会的信中描述了那时共产国际的情况,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已不存在”,因为“斯大林不仅掌握了俄国党,而且掌握了整个国际”。斯大林是“教师和主人”,他决定一切。但他没有能力承担这么巨大的任务。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

见《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莫斯科1990年版第141—142页。

原则,而是对权力的垄断。在斯大林和列宁之间横着一条鸿沟。我认为,在列宁逝世后苏俄所遇到的最大不幸就是全部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俄国党和我们大家都将为不重视列宁关于他的准确指示而付出重大代价。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胜利

莫斯科市委是布哈林的坚强支柱。1926年在布哈林接替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职位的同时,乌格兰诺夫接替了新反对派另一名首领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职位,出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早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次全会(1928年1月31日—2月1日)上,乌格兰诺夫对局势所作的评价就显露出与斯大林不同,认为只能把非常措施看作是暂时的措施。他说,“对于我们,作为非常状态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们不能看作是正常状态的措施”。关于富农,他说,“依我看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对他们打得不够,而是可能打得过头了”。关于集体农庄的任务,他认为“如果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任务,至少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任务”。这些言论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为了能及时掌握莫斯科组织的情况,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鲍曼去莫斯科组织,参加莫斯科委员会的会议。3—4月莫斯科领导人两次会见斯大林,就工业化速度、轻重工业的关系、同农民的关系交换意见,但未达成共识。

4月23日乌格兰诺夫在莫斯科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作报告说,同联共(布)十五大以前不同,现在工人对党的领导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并提到中央存在分歧:“现在有许多传闻和谈论,说党中央中有斯大林集团,也有李可夫集团”,他认为“对那些喜欢

见《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第200页。

寻找倾向的人,喜欢组织反倾向斗争的人,应当打他的手心”。会议表明,乌格兰诺夫和他的同志们对中央多数执行的路线的正确性存有疑问。

六七月间莫斯科领导人又同中央领导人会见了两次。莫斯科监察委员会 . 莫罗兹一年后谈到会见的原因和内容时说:

“我们第一次在莫斯科仔细审查了中央委员会……我们的这一倡议正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满。我们的审查当然不仅仅在人……而在于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正确,需要纠正。从什么观点出发?必须放慢工业化速度,缓和对富农的进攻”。在7月会见时,莫斯科领导人受到背离党的方针、对中央提出错误批评的指责。接着,在莫斯科第五次全会上莫斯科领导人又受到“抹杀”右倾危险、贬低中央七月全会决定的指控。

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委举行联席全会(第六次全会)。报告人乌格兰诺夫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告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其中包含有矛盾的提法,一方面说莫斯科组织按照党的总路线工作,另一方面又批评某些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虽然没有点名。一些发言者尖锐批评乌格兰诺夫对右倾估计不足,另一些人又热烈支持乌格兰诺夫。19日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第一次正式使用“右倾”的提法,并且把右倾同复辟联系起来:“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须的条件增长起来”。过不多久,《共青团真理报》又引伸为,同右倾作斗争,就是“同那些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复辟道路上去的分子作斗争”。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转引自《季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404页。

斯大林列举的右倾的内容有：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要求收缩工业，认为目前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是浪费金钱；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机关；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等等。

“右倾”的提法对广大党员显然是很突然的，所以全会上有人要求指出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的名字来。有人问，“政治局内有些什么分歧，这些分歧在解决复杂问题的党的政策中有些什么反映？”在政治局和中央是什么东西引起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请问在全会上斯大林同布哈林的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发生争论？”如此等等。斯大林回答说：“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产生党内右倾危险的条件和环境”。他把右倾分子限定在地方机关，只说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甚至宣布：“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他认为莫斯科组织“有过犹豫和动摇”，但没有说明表现在什么地方。

乌格兰诺夫一般地承认存在错误，但否认容忍右倾的指责，甚至转入反攻，说存在一种企图用排除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的办法去寻求摆脱政治和经济困难的情绪。

然而采取的组织措施是无情的，支持乌格兰诺夫的一些区委 . . . 柳京、 . . . 片可夫、 . . . 雅可夫列夫，莫斯科委员会常委 . . . 莫罗兹、 . . . 曼杰利什塔姆等被解除职务，接替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93 页。

同上书，第 203 页。

的是莫洛托夫和鲍曼。

这样,布哈林的一个有力据点就被拔除了。12月29日向莫斯科各党组织下发了《莫斯科委员会的内部通告信》,这是在莫洛托夫和鲍曼直接参加下起草的,其中写道:

“在目前开展国家工业化的时期,右倾,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最大的危险,它力求收缩国家工业化的速度,麻痹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分子(同富农)斗争的警惕性,对于农业中广泛发展社会主义成分估计不足。然而这一倾向在党员群众中还揭露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对右倾及对右倾持调和主义态度的人,要给予主要打击的原因。”

这是一个进一步开展反布哈林斗争的动员令,接着在莫斯科党组织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胜利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了1929年同布哈林“集团”斗争的结局。此后布哈林等已无法指望首都共产党人的支持了。

“右倾”帽子的提出,表明斯大林找到了击败其对手的强有力的武器。布哈林等人对此反应软弱,书呆子气十足,他们没有理直气壮地否定右倾的存在,而是同意这种提法,仅仅设法缩小或缓和右倾的含义,否认自己是“右倾分子”。李可夫解释说:“我们所说的党内倾向,指的是这样一些有微小差别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是同党、党的纲领、党的决议一致的,是站在党性立场上并遵守党的纪律的……在谈到右倾时,指的是在现阶段必须采取思想斗争加以克服的那种党内倾

有关莫斯科党组织中的争论的材料转引自《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6期涅博金和萨莫罗多夫的文章《1928—1929年莫斯科党组织内部的争论》。

向。”这是相当无力的辩解。实际上，一旦承认“右倾”的存在，再谈什么原则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斯大林当然很清楚，李可夫、布哈林等自然也应明白。加米涅夫曾问过布哈林：“是你写了关于同右倾斗争的决议吗？”布哈林答称：“当然是我。我要告诉党，我不是右派。”但是，既然给自己写下了死刑罪名的判决书，其余的一切努力就不能不是白费的了。

《真理报》和工会的争夺

《真理报》是斯大林势在必夺的重要阵地。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哈林一直是《真理报》的主编，只在1918年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而暂时退出一段时间。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担任政府工作的。在他的主持下，《真理报》办得相当活跃，在《真理报》的版面上可以看到就各种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展开争论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围绕《真理报》有一批青年理论家，被称之为“布哈林学派”。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使他在国内享有盛誉。

1928年在布哈林还没有利用《真理报》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斯大林已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

1928年8月11日《真理报》发表莫斯科市委宣传部长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党的教育的基本内容》，强调要锻炼马列主义的革命思维，“要教育党员群众别害怕离开布尔什维克基本路线的这种那种思想上的细微差别，别害怕‘倾向’这个词本身，党的统一决不表现在大家都按一种死板公式思维。”

《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404页。

《反对派公报》1929年第1—2期第15—17页。

当时正在休假的斯大林,立即对此作出反应,给《真理报》和莫斯科市委发去电报,认为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调和主义。莫斯科市委常务局于8月29日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承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真理报》也对此文的发稿编辑作出组织结论。

9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著名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自然更引起斯大林的警觉。

过不久,《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 . . 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个声明,称 . . 阿斯特罗夫、. . 斯列普可夫、. . 策伊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借口。在新任命的副主编 . 克鲁明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已不能决定报纸的编辑方针。

斗争也围绕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展开。长期以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一直由布哈林的盟友托姆斯基担任,全苏工会是布哈林的又一个有力支持者。

12月10—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还在大会开幕之前报纸上已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工会的“官僚主义”,要求工会展开“自我批评”。

大会期间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加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大会选举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进入新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是旨在削弱托姆斯基权力和影响的措施。托姆斯基抱怨说,由于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进入中央理事会,使理事会形成“两个中心”,他已无法领导工会的工作,因此他于12月23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斯大林的组织攻势是一个接一个的。他除了给工会派去卡冈诺维奇之外,还往人民委员会派去奥尔忠尼启则,往布哈林的《真理报》派去萨维利也夫(后来改为麦赫利斯),往共产国际派去曼努伊尔斯基作为中央代表,规定这些部门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均需中央代表联署方为有效,并且中央代表拥有否决权。布哈林把这叫做“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众所周知,政治委员制度始建于国内战争期间,其任务首先是监督在红军中服役的前沙俄军官,现在竟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党的领导同志了。

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主要讨论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问题。

会前成立了一个由布哈林、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古比雪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李可夫和斯大林组成的委员会,为全会准备决议案。委员会开了近10天的会,会上争论激烈,特别是在农业今后的发展和党在农村的政策问题上分歧尤为尖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3人在会上提出集体辞职。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斡旋下,3人收回辞呈。一天后他们交给斯大林一个16点声明,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停止反右倾运动,对共产党人讨论党的政策不要乱扣“倾向”帽子,对所谓犯“右倾”错误的人不要滥用组织措施;恢复被解职的《真理报》工作人员的职务;停止对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的批判,等等。其中一部分得到了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505页。

见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177页。

满足。

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 1928—1929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因此全会再次声明“政治局内部没有意见分歧”。

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强调保持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性,主张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在谈到右倾时,斯大林把它同“资本主义复辟”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他表示,右的倾向“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右倾分子”还没有组成“派别组织”。

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代表政治局作报告,他特别担心地提到,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已使农业不堪负担,建议用提高粮价的办法来缓和这种抽取。他尖锐地批判了粮食政策,认为在实行配给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用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办法无助于摆脱粮食困难,因为小生产者提供 90% 的粮食,他们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李可夫为五年计划第一年的高速度辩护,但他认为,如果认为在许多年内都可以保持这一种高速度那就太轻率了。他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论断。

斯大林在会上批判了右倾,但他没有点布哈林的名字,而是拿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开刀,批判他在 1928 年 6 月和 11 月给中央的两封信,认为右倾的“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3 分册第 512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44、246 页。

同上书,第 232 页。

弗鲁姆金在发言中嘲笑了斯大林制造“右倾”的做法,他说:“我理解斯大林同志需要选出弗鲁姆金来打板子。尤其是因为迄今为止这是唯一的一个右倾的姓氏。当然不应为此感到委屈。既然这是党的利益所需要的,那就应当忍受下来”。

可以举一个例子看看当时是怎么给右倾分子上纲上线的。弗鲁姆金说:“向富农进攻……但在我们还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莫洛托夫由此得出结论,说弗鲁姆金“实际上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合作思想的辩护士”。斯大林抓住弗鲁姆金所说的“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 and 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上纲道:“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其实弗鲁姆金无非是说,在现阶段还需要富农经济提供商品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给以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同时又要限制其剥削。这里根本扯不上什么给富农以政权的问题。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共同探寻摆脱困境的办法的。

全会最后通过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16.5 亿卢布,其中 $\frac{2}{3}$ 用于重工业,上一年度的投资额为 13.3 亿卢布,即增加了 3.2 亿卢布。这是斯大林“迅速发展工业”的方针,即“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不过,布哈林等也为自己的刺激个体经济的主张在决议中争得一席之地。决议在谈到鼓励和大力支持集体的农

转引自 . . . 特鲁坎:《1928—1929 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27—28 页。

同上书,第 28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36 页。

同上书,第 213 页。

业经营形式的同时,也指出要“尽量加强对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认为“在刺激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方面,党和苏维埃机关远未采取一切保证基本农民经济大大提高的措施”。

全会闭幕后,11月30日李可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中央十一月全会的总结》的报告,称赞用市场方法收购粮食所取得的成绩,改善了曾一度恶化的同农村的关系。在谈到党内状况时,他驳斥了“政治局内有分歧的谣言”,但补充说,“不用说,对于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经济、文化等建设的某些具体问题,我们是有争论的”,不能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倾向,即使有些实际分歧,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争辩说,“党应该讨论并决定一切,我们有权也有义务进行讨论和争论”。

布哈林的三篇文章

全会以后布哈林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发表了3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同斯大林展开不指名的争论。

12月2日《真理报》发表布哈林在第四次工农通讯员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报告反对“疯人政策”,警告不要把弦“绷得太紧”。显然是回答关于不懂阶级斗争的诀窍的指责,布哈林指出,“城市和农村脱节的危险是我国最主要的内部危险”,“无产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愈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就愈有成绩,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愈是成功”。同富农斗争的办法是使中农跟我们走,使之在农村陷于孤立。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69页。

《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405—406页。

1929年1月2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强调要把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科学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计划政策应当成为一门(它已在开始成为)依靠自己的理论和依靠一系列科学的学科的特殊实用科学”。他警告说,在苏联这样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对经济领导的任何失算和错误,都会影响整个社会,其无益耗费有可能超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所造成的耗费。布哈林高度评价科学的作用,他写道:“科学,这是巨大的补充的社会生产力。并且,它愈是掌握更多的群众,就愈是成为更加强大的杠杆。”布哈林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强调是对已经冒头的唯意志论的一个警告。

接着,布哈林在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布哈林准确地把握了列宁的最后思想,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列宁的思想观点。他根据列宁在最后的文章中的思想的发展指出,使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的结合”无论如何应该保持下去,否则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基础就会丧失。在涉及工人政权同农民的关系的那些政策上要极其慎重,要防止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分裂,这种分裂将“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通过“合作社的流转”实行结合的计划。不卖弄聪明,不要花样,要用农民的利益吸引农民,找到对农民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农民从个人利益出发,通过合作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不仅不能同农民发生分裂,相反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其来源可以是花掉原有的后备,冒通货膨胀和商品缺乏的危险发行纸币,也可以是过分加重农民的赋税,

但这些办法“都不是工业化的健全的基础”，是不可靠的，“有与农民发生分裂的危险”。“从质量上提高全民劳动生产率，并且同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进行坚决斗争”，这才是积累的主要来源。

可以看出，列宁的晚期思想是同斯大林在 20 年代末的一整套做法根本不同的，这时候布哈林实际上是让列宁本人出来同斯大林论战。仅报告所用的标题《列宁的政治遗嘱》，就极富挑战性，自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失败以后，“列宁遗嘱”一词已成为禁区，拥有列宁遗嘱（即《给代表大会的信》）被等同于拥有违禁文件，甚至反革命文件。尽管布哈林给加上了“政治”这个限制词，但仍然使记忆犹新的广大党的干部联想到要求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布哈林的这一步自然使斯大林更加不能容忍。摊牌已指日可待。

总结 1929 年前的局势，可以说，联共（布）中央出现的实际上是持两个不同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布哈林派的观点主张并未越出联共（布）第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 1928 年历次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定，相反地，联共（布）的这些决定多半体现了布哈林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反对联共（布）中央的有组织的“右倾反对派集团”。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主张也只是一派的主张，还没有成为联共（布）中央的主张。斯大林所采取的行政组织措施，使他能逐步夺取原先支持布哈林观点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为他未来的胜利准备好组织力量。

摊 牌

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二月联席会议

1929年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转折点是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晤一事的披露。1月20日托派在莫斯科的一份传单中以《党被蒙着眼睛领向新的灾难》为题公布了布、加谈话的纪要。这就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的口实来指责布哈林进行非组织活动。

1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作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宣称“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说由于布哈林分子的严密隐瞒,“过去党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集团存在”。布哈林“受这个集团的委托”,曾和加米涅夫进行“幕后谈判”,“以便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来反对党和党中央”。

2月9日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中认定,布哈林就改变中央的政策和更换政治局的成员问题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并且是“几次幕后谈判”,谋求建立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派别联盟”,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却知情不报。

布哈林否认这一指责,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他称这一传单是一个“诈骗的文件”,“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编造和抛出来的”卑鄙的伪造”,他要求调查传单的来源。他声明传单中的下述说法

是强加于他的：“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比过去同你们的全部分歧要严重得多。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局势的一致看法是：如果我们现在在政治局里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取代斯大林情况就会好得多。”

托姆斯基把传单出笼的故事比做一本拙劣的侦探小说：两个人会了面，谈了话。不知为什么这一谈话用文件的形式记录下来，而记录记得令人奇怪地片面：只有布哈林一人说话，而加米涅夫要么沉默，要么提些聪明的问题。而接下去的故事就更难以捉摸了，札记好像交给了季诺维也夫，在他那里不见了，突然又被“阴险的托洛茨基分子”印成传单。托姆斯基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挑衅手段，目的是败坏布哈林的声誉，还顺便加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克鲁普斯卡娅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公布这一谈话记录的目的是“给党设下更深的陷阱，使我们由于个人的愤怒、个人的愤慨而背离只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去评价各种冲突”。

据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的说法，当时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并不知道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的事实。当时党内流行一种说法，说斯大林的亲信参与了传单出笼一事。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曾援引两个共产党员的谈话，他们说，整个札记是格伯乌搞出来的，“莫洛托夫的诡计”在这一品克顿式的拙劣的侦探小

转引自特鲁坎：《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莫斯科1990年版第31页。

同上书，第31—32页。

转引自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471页。

《旗》1988年第11期第119页。

说的炮制中发挥了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排除一些同志”。

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确有其事。加米涅夫所作的札记,就其内容和涉及的问题判断,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布哈林的观点,当然也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札记是加米涅夫事后追记的。拉林娜在其回忆录《往事难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她说,这不是谈判或会谈,而是一般的谈话;谈话也不是在加米涅夫家里进行的,而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露天下进行的。问题是不早不晚正好在斯大林反布哈林的关键时刻以传单的形式出现,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在同加米涅夫会见时曾警告说,电话有人窃听,身后有人盯梢。在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早就动用格伯乌了,因此他不可能直到1月底才从托派的传单中第一次了解到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见的事实。据拉林娜说,不迟于1928年秋,斯大林已经获悉谈话的事实。但是在这个时候宣布,显然会大大地加重他在反布哈林斗争中的砝码!

实际上,这时加米涅夫已公开声明退出托季联盟,并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曾多次公开和私下表示支持斯大林多数派的政策,表示不给布哈林以任何支持。因此当时不可能存在一个“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而把已承认错误、退出托派、并重新被接纳入党的人仍叫做托派分子也未必妥当。此外,加米涅夫等人才刚刚恢复党籍和工作,他们在党内已无足轻重,同他们建立联盟未必能壮大布哈林派的力量,更不可能通

品克顿是美国粗制滥造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一名侦探。十月革命前此书在俄国极为流行。

见《旗》杂志1988年第11期第118—112页。

《在右派和中派集团内部》,见《反对派公报》1929年第1—2期第15—17页。

过这种联盟的力量改变党的政策和更换政治局成员。作为政治家的布哈林不至于会犯这种简单和常识性的错误。不过当时斯大林是曾经有过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返回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的打算,因此,布哈林才在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阐述斯大林政策的致命后果。

斯大林把所谓布哈林集团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其根据是它有“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斯大林把这个政纲的内容归结为三点:1、要求降低工业发展速度;2、要求收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3、要求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并放弃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

尽管斯大林在列举时做了点“加工”,予以夸大和绝对化,但就基本内容而言,这三点“特殊政纲”既不特殊,也不新。布哈林从来没有向党隐瞒过,从1928年七月全会起,争论一直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展开,对中央来说并非秘密,并且如前所述,布哈林所反对的也说不上是“党的现行政策”。但是,由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十一月全会和共产国际六大多次发表政治局内部完全一致的声明,全党确实不知道领导层存在分歧,这显然不是布哈林的过错。斯大林列举的另外一些“罪状”包括:布哈林指责他的贡款论为“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布哈林等三人的“辞职政策”;“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等等。

1月30日布哈林在联席会议上代表三人发表声明,其基本内容为:

1、反对“贡款”理论。他说,“实际上是什么决定今后的政策?是‘文件’中所提到的东西,即斯大林同志关于贡款的讲话。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因殖民地和剥夺农民而大力批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而在七月全会上他却宣布‘贡款’的口号,

即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

2、对农民征收“超额税”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斯大林没有执行中央全会关于鼓励个体农民并提高其单位面积产量的决议。

3、国家外汇状况严重，布哈林曾预言过这一切，但没有引起重视。

4、党内缺乏民主。斯大林执行压制党内民主的路线，没有为自由讨论党的政策问题创造条件。布哈林问道：“如果关心粮食问题被说成是小市民习气，那怎么能讨论经济问题呢？……如果关怀同庄稼汉结合的稳固性被叫做农民倾向，如果建议提供或者减少追加拨款被说成是反列宁主义……谁敢就这些问题张嘴说话呢？这就是这些问题没有被提出来，而是藏而不露的原因。这就是全党都议论这些问题，然而是在‘心中’议论，在两三个人之间议论的原因。……出席会议，投一致票，通过正式的决定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党所必需的仪式”。党在“官僚主义化”，“我们在培植官僚主义”，党内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党不参与决定问题，一切都由上头来办。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目前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等等。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是错误的，斯大林用吆喝命令的办法对待兄弟党，这种政策使共产国际各支部瓦解、涣散、分裂等等。

6、党内有人对他们进行“组织上的包围”，因此他们不得不坚持辞职。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形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17，.2，.441，
.1，.2。

成了“两个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托姆斯基只好不服从政治局关于不准他辞职的决定。托姆斯基和布哈林辞职是摆脱现状的上策。

布哈林认为,由于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活动,党的领导出现严重的变形,斯大林用政客手段取代大政治,乱贴政治标签,不说出复杂局势的全部真相。然而,能不能找到共同语言,通过一致的决议呢?布哈林认为“能够而且应当”。

为此需要抛弃“小政治”,回到“大政治”上来。所谓大政治就是在危机局势中“向工人阶级讲清局势真相,指靠群众,倾听并感觉到群众的需要,同群众在一起开展自己的事业”。布哈林重申,谁也不能把他赶上派别的道路,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上层内部的斗争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当恢复相互间的信任和实行集体领导。

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处,成员有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柯罗特可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所谓和解方案,内容如下: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米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

布哈林的声明迄今未见公布,所以只能根据不同的来源加以综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01—508页;《反对派公报》1929年第13期第15—17页;《共产党人》1988年第13期第100—101页。

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演说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这是一个单方面要布哈林等人承认错误、全面投降的“和解办法”,布哈林自然拒绝了这种“和解”,也不收回他1月30日的声明。本来到1929年1月,由于农业税的改革,向农业供应农业机械的措施,关于中农的提法等等,已消除了经济政策领域中的许多严重分歧。然而恰恰在这时候,反而要采取措施把布哈林集团排除出领导之外。斯大林及其亲信在指控布哈林等人时已是不顾事实而随意上纲了。如指责布哈林反对向富农征收个体税。实际上,布哈林甚至要求征收更高的税额,但主张依法行事,而不要随意滥征。

2月9日,李可夫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签署的声明。

布哈林等坚决拒绝所谓企图同加米涅夫组织派别集团的指

责,说这是“粗暴的歪曲事实”,企图发明“一个派别”,而归根到底是想“败坏我们的声誉”,“给我们定罪”。布哈林只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不谨慎和错误”的,但他说明,谈话的政治目的很简单,他请加米涅夫“不要参加污蔑”。

声明认为,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极为严重,这表现在通货膨胀、工业品极端缺乏、缺乏后备,黄金和外汇状况严重以及从1928年年底开始恢复配给制,等等。近几个月来这些困难在增长,并可能变成整个经济的危机。工业化是靠“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花掉黄金储备及其他后备实行的。“我们认为靠‘贡款’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业化不应建筑在花光我们储备的最后一个戈比的基础上的”。农业处于停滞状态,而现行政策不能提高其生产力。出现对结合的威胁和破坏工业化的危险。布哈林写道:“不是发展集体农庄的结果,而是尽管集体农庄在发展,但国家仍缺乏粮食;如果在最近几年我们在农村的政策的全部成就只是同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话(当然对这个运动需要全力支持),粮食欠缺问题还会加剧。简单的算术表明,在最后几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能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来源还是个体农民经济”。

因此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提高农业,建议把国内资金首先用于农业,建立后备,余下的用于工业。声明强调,只有在保证提高农业的条件下才能提出用较快速度实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声明警告,目前的所有做法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斯大林路线有使党滑向托洛茨基主义去的危险。声明重申布哈林1月30日提出的指责:培植官僚主义,压制党内民主,在共产国

际内执行不正确的路线。

对政治局委员会起草的决议案,布哈林等认为是要从政治上消灭他们的炮弹。布哈林3人强调,他们从来不反对党的正式决定,而是反对斯大林及其亲信歪曲这些决定,搞非常措施,反对把斯大林同党相提并论,使两者“分量相等”,把任何反对斯大林的言行看作是反对全党。

尽管在争论中提到过列宁的遗嘱,但是当时布哈林等并没有要求撤销斯大林的职务。他们写道:“我们只是认为,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所提的忠告(很英明的忠告),不背离集体领导。我们认为,可以也应当纠正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如同纠正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一样,而不会因此冒变成‘党的敌人’的危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的任务就是保证政治局委员拥有此类起码的工作条件。”

可以看出,布哈林等人当时是准备妥协的,双方达到和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时候斯大林在联席会议上已拥有多数,他利用这个多数的地位,通过了一个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抓住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一事指责他们企图秘密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改变经济政策和“相应地更换政治局成员”,斥责布哈林“毫无原则性,而且违背了忠诚老实的起码要求”,认为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情不报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会议决定:1、认为布哈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2、责成布哈林在国内政策上同弗鲁姆金划清界限;3、不同意辞职;4、责成布哈林

转引自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第202—203页;《共产党人》1988年第13期第100—101页。

和托姆斯基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党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这一决议使党内斗争继续升温,最后的摊牌势在必行。

四月联席全会

四月全会前夕,李可夫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纲,其中指出,“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和基本指标是在计划中规划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五年计划的政治基础,“五年计划的实施能够也应该遵循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李可夫还提出一个补充的两年计划,以使用税收、价格和农艺等措施消除农业的极端落后状态。政治局否决了李可夫的提纲,责成专门委员会制订新的文件。4月15日新制订的提纲提交政治局审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表决时弃权。

中央全会于1929年4月16—23日举行。斯大林对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4月16日全会开幕时共有302人出席,其绝大多数是坚决反对“反对派”的,这当然是斯大林工作的结果。虽然根据惯例全会一致选举李可夫为主席,但是定调子的报告是由完全支持斯大林观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作的。发言者的调子越来越高,例如日丹诺夫大力谴责了“削减重工业发展速度”和“使农村富农发财”的路线,并警告说:“……我们清算了托洛茨基分子,全党也一定会清算你们,如果你们不屈服,不承认错误的话”。

4月22日斯大林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99—511页。

特鲁坎:《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莫斯科1990年版第54页。

长篇讲话。讲话表明,这时候斯大林已不再需要和解,而是强调分歧和斗争了。布哈林在会上曾表示,我们赞同总路线,存在的分歧“可以这样来表述:下一步怎么办?”李可夫也说,分歧是“在统一的总路线范围内”的分歧。斯大林回答说,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中央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批判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断言“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举行反抗的”,这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斯大林在讲话中论证了他的“贡款”理论、发展集体农庄、超高速发展工业等措施。

布哈林作为理论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要打倒布哈林,就必须先否定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去动摇布哈林这个“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理论家”的地位。针对列宁在生前最后时日所说布哈林是“全党喜欢的人物”,斯大林借柏拉图的话称,“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然后又借列宁的话说,布哈林是“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为证明这一点,他重翻历史上的老帐,援引列宁同布哈林历史上在“炸毁”国家问题上的分歧,断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同上书,第35、26页。

同上书,第22、66页。

实际上,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第一,布哈林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第二,“炸毁”国家一语是恩格斯的用语,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并非无政府主义的公式。第三,1917年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正式向布哈林转告过,列宁认为在国家问题上他同布哈林没有分歧了。国家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不足以证明布哈林是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而当时列宁说布哈林不懂辩证法也不是最后的判决,并且列宁马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当然,我对两人(指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引注)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的大量著述和行动证明,他显然在新的条件下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克服了自己的片面性,成为联共(布)党内对辩证法理解得最深、掌握得最好的理论家,列宁没有说错,布哈林确实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

斯大林讲话的另一个突出之点是进一步断定布哈林组织了一个“派别集团”,说“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所谓吹毛求疵无非是因为布哈林等人对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不断提出了批评。

4月18日布哈林在全会上发表长达数小时的讲话。这时候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他在会上说,“我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7页。

觉得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发言已是最后一次了”。因此他利用这不可再得的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批判了斯大林的诸如阶级斗争尖锐化、贡款等理论主张。

布哈林首先批判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他说：“现在有一种著名的‘理论’在党内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就是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就越多。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在七月全会上提出来，而古比雪夫同志加以特别发挥并天才地予以‘深化’的。我认为这一‘理论’混淆了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把在某一短暂的阶段中阶级斗争尖锐化（我们现在就处于此类阶段之中）同发展的一般进程混为一谈了。它把目前尖锐化的事实本身变成我们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这一奇怪的理论就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而到抵达社会主义大门之时，我们显然应当或者发动国内战争，或者饿死战死。”布哈林引了古比雪夫的以下说法：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有成就，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反抗和对抗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增长。阶级的消亡（我们整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应当、自然也将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局势下进行。”

布哈林就此评论说：“这样，古比雪夫同志加深并提到更高阶段的这一理论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阶级的消亡越迅速，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显然，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在已没有任何阶级的时候燃烧得最旺最旺！这也属最近许多理论‘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它把我们导向我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 1989 年版第 253 页。

《真理报》1928 年 9 月 25 日。

们在粮食收购、谷物经济及许多其他方面所遇到的那种奇妙的实际结果。”布哈林特别强调，“发展的经营趋势是一回事，阶级矛盾的暂时尖锐化则是另一回事”。他并不否认在一特定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认为当时在农村确实存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但这不是一种经常趋势，经常趋势应该说是趋于缓和。“有一种理论说我们应当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当作我们改造时期的规律，我们应当点燃阶级斗争，我把这种原理叫做白痴。我过去把这叫做白痴，现在也这么叫”。

布哈林否定所谓他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责。他指出，这一指责最初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来的，可以在它们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纲中找到。后来又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搬过来，老调重弹。布哈林郑重声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语在我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小册子、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找不到的。”由于米高扬也曾公开提出过这种指责，布哈林曾写信向他提出质询：

“敬爱的同志！

由于你对季可夫提纲的评论中提到似乎是我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此词还加了引号，请告知此词引自我的哪本著作(务请指出版本页码等等)。致

同志的敬礼！

尼·布哈林”

米高扬没有给以书面答复，却一会儿口头说是从某一报告中引来的，一会儿又说是从《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中引来的。卡冈诺维奇在讲话中也引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中的引文对布哈林提出“长入”的指责，但是不把引文引全。

针对这种手法,布哈林在讲话中完整地宣读了书中的这段引文:

“因此,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由‘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

有人就此指责布哈林竟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同富农合作,允许有富农合作社的窝巢,等等。布哈林指出,允许富农参加一般合作社网“是政治局的决定”,“这是同资产阶级某种合作的一定形式”,而这种合作是列宁也同意的。列宁在确定我国阶级结构时说:我们目前的制度是建立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资产阶级加入这一合作。布哈林问道:“或者你们想既容许资产阶级,又要它处于国民经济之外?”这是童话,是不可能的。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写于1925年,布哈林问道,这是不是说那时我是极右倾的化身呢?如果是那样,为什么那时给我压了那么重的担子,而对右倾却不置一辞呢?

此时,奥尔忠尼启则插话说:“你抛弃了这些错误。”布哈林回答说:“不,我没有抛弃这些所谓的‘错误’,小册子后来还多次再版。如果你们自己真的相信现在的这些废话,就该高喊‘执政官提高警惕!’这些小册子就会被抛到它该去的地方!”

关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本身,布哈林认为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8页。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269—271页。

是“荒唐透顶的”，“因为这种公式意味着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阶级、还有富农。怎么想都可以，但认为共产主义下会有富农，这犹如说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一样，是天才的发现”。

至于对布哈林等三人的种种指责，布哈林列举了一个“指责”的清单：

- 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
- 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
- 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指望富农；
- 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
- 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 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

卡冈诺维奇中了布哈林的圈套，插话说：“对你来说清单是正确的。”

布哈林接着指出，这些指责几乎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托洛茨基的政纲同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竟有如此奇怪、如此可疑的‘思想上的一致’！”然而托洛茨基当时不是针对布哈林，而是“针对全党的”。

布哈林接着详细阐述了他对当前一系列迫切问题的看法。

一个是经济比例失调。他认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基础“在于基本的经济比例遭到某种破坏，而首先是破坏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问题不在于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也许还可以再快一些，但是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使作为工业基地的农

业得到发展,城乡之间有很快的经济周转”。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我们对基本农民群众缺乏足够正确的态度”,如不灵活的价格政策,对农业税的过度征收,政策常变,实行非常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商品流通,等等。这使得农业,特别是谷物业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

布哈林进一步分析了谷物业的状况,重申他在1928年春天所作的分析,认为在农业税方面,在价格方面,在农业的各种价格和工业价格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在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方面,谷物业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这就使得生产力从谷物业向别的部门转移。农民或者不去扩大谷物的耕种面积,或者用谷物去喂牲口,或者改种其他作物。谷物生产下降又导致谷物出口创汇率下降,而谷物是创汇的主要产品。这就影响到进口,不能从国外购买足够数量的原料和装备。为了获得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不得不削减消费以出口消费品,这就使国内粮食市场更加恶化。布哈林指出,“我认为我国经济困难的机制就是这样转动的。这些因素是互相影响的”。

在谈到农业的状况时,布哈林进一步指出,结合的基本形式在长时间内本应是“市场联系的形式,通过粮食的买卖来实现,然而,现在小商品生产者从卖粮者变成了交粮者”,粮食的出售变成向国家缴纳的贡赋,粮食本身越来越多地由商品变成了贡赋的对象,同时也成了货币的代用品和积累手段,因此它开始在市场上消失。由于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用行政命令办法征收粮食,因而“机关的开销”和取得粮食的花费也随着市场联系的消失而剧增,收到的每一普特粮食的附加费用急剧上升。配给制、摊派制使粮食生产的基地继续减少,秋播面积减少了3—

4%。经济刺激的杠杆的作用削弱,为取得粮食只好加强压制,采取行政命令的措施,形成新形式的非常措施。

布哈林认为,非常措施同新经济政策是不能共存的,是相互排斥的。他重提斯大林本人也曾同意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布哈林认为,不能从理论上认为我们已可以越过此定义,已可以跳出新经济政策阶段。他主张“重申新经济政策和扩大商品流转”。“市场联系的形式在许多年将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我们领导的经济作用应是通过经济关系,即通过扩大商品流转。他警告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天的时间靠压制手段取得粮食,但明天怎么办?“总不能搞只顾一天的政策!”“已成为一种制度的非常措施堵住了我们的所有出入口”,必须坚决抛弃化名的或不化名的非常措施,这“应当是我们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新经济政策的体系”。

斯大林用“富农毕竟不喜欢非常措施”来辩解。布哈林回答说:“不过,可惜中农也不喜欢非常措施。您没有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全部问题就在于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

针对所谓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指责,布哈林对所谓“自由市场”作了理论阐述。他说,所谓“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一语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市场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即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278—282页。

同上书,第298页。

同上书,第298页。

使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中贫农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受任何调节的市场关系基础上有一种自由市场关系,这种市场也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国营工厂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而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也决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说由于市场的缘故,资本主义关系会(局部地)生长,这是对的,但只有具有非常大胆想象力,或者不懂得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才会把这种类型的市场叫做资本主义市场。其次,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条件下谈论‘自由市场关系’,这等于说‘干的水’一样。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那里存在生产的高度集中化。而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生产更加集中,可能有‘自由市场’吗?要存在自由市场,需要有‘一点小东西’才行:需要取消土地国有化,需要取消工厂国有化,需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国家经济机关的力量是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势力斗争的强大武器,但这同使用非常措施、动用庞大的机关采取镇压措施有天壤之别。

布哈林批判一种“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概念”,即把个体经济等同于富农经济,一谈到提高个体经济似乎“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各种各样的,其中包括富农经济,但是谈到发展个体时,指的是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即个体的贫农中农经济。当时的农村从整体上说是贫穷落后的,不少地区无马的农民占40%以上。中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半贫困者。布哈林认为,这些贫困的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离富农还很远,不用担心它们会很快发展成为庞大的富农阶层。这里不能以贫富程度来划分农村阶级。布哈林指出,我们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293—294页。

的社会范畴是以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富农也许并不特别富,但如果他经常剥削雇佣劳动力,那他就是小资本家。目前富农在农村还掌握一定的力量,这是因为许多产粮区用非常措施伤害了中农,而在许多消费地区,又没有给贫农及部分中农供应足够的粮食。富农却挨家挨户分送粮食,这就建立了富农同部分中贫农的联盟。

布哈林认为,对富农要限制,要排挤,但不应剥夺,不要搞“第三次革命”。向富农加紧进攻首先应沿着征税的路线展开,“可以用这种办法使之陷入绝境”。会上有人指责布哈林一方面说要同富农斗争,一方面又主张废除富农的个体税。布哈林回答说,个体税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滥行征税,所以他主张“用更高的、非个体税来取代它”。为了使赋税能准确地落到富农身上,布哈林要求“更加仔细地查明富农的地区性特征”。无视地区的差异,把划分农民的统一标准用于完全不同的条件,没有地区的标准,没有区分农民的各种各样阶层和集团的特殊标准,这就使中央规定的赋税定额在地方上引起混乱。赋税和税率不很适应地方条件,因此经常打得不是地方。实际上问题还不仅在于缺乏地方标准,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当时也缺乏科学的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到底谁是富农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符合实际的答案。这样在实行非常措施以至后来搞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时把中农当作富农打,就毫不奇怪的了。

布哈林提出自己的解决危机的4点办法:

1、进口粮食。布哈林认为,从各种角度,用赊购的办法进口粮食比实行非常措施对我们要合算一些。

2、坚决抛弃非常措施,因为作为一种制度的非常措施是排斥新经济政策的,它堵死了所有的出入口。

3、确立革命法制。这也是针对非常措施的。布哈林说:“我

们需要的革命法制是‘真正的’、长期的、牢固的、经常的革命法制。经济要求某种法的、立法的措施，它们一旦受到破坏，经济就往往不能发展”。他指出，农民应当事先知道，要从他们那里拿走多少，在什么期限内，按照什么样的日程安排，等等。

4、灵活的价格政策。布哈林认为，应当制订一个“较为灵活的按季节和按地区区分的价格政策”。在市场价格上，富农、中农和贫农都是站在卖主的立场上的，因此不能到处都实行“阶级”价格。而我们现在的收购价同“自由市场”的价格出现严重的脱节。

与此相联系，还应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税收制度，使得进入较富裕户手中的东西，能通过税收制度超额地收回。

然而，这些建议在全会上遭到了否决。奥尔忠尼启则认为，问题不是在进口粮食和非常措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进口和工业命运之间作选择，今年用进口粮食解决困难，明年用什么解决？

在讲话的结束语中，布哈林只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错误的，对所有其他指责概不承认，他声明赞同在国家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但坚决反对在执行经济政策时采用非常措施。他严正声明，他之所以不能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并自我污蔑，是因为“必须在我们党内捍卫可以思考、可以讲话的做法”，不能用赤裸裸地挥舞拳头的政策去取代思想和思考！

布哈林的这次讲话确实如他本人在开头所说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发言已是最后一次了。”尽管在这次全会上还没有把他开除出政治局，但实际上已失去政治局委员的实权。此后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 287—291 页。

同上书，第 308 页。

他再也没有可能在党的会议上全面地自由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了。

全会的决议草案由维·维·柯秀尔、基洛夫和鲍曼起草，完全贯穿着斯大林讲话的精神。在约 250 名与会者中投反对票的仅 10 人，另有 3 人弃权。

列宁妹妹玛利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她在写给全会的信中写道：“我投票反对把这三位同志或其中的某个人开除出政治局，反对谴责和破坏他们的名誉。”但是会议主席鲁祖塔克没有宣读她的信，也没有把此信收入全会的记录。此信直到 1989 年才首次公布。

决议不仅谴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背离党的总路线”，而且以决议的形式使斯大林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观点合法化。

布哈林被解除《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而托姆斯基被解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布哈林后来揭露斯大林的这种不准辞职、只能撤职的手法说：“起先需要予以抹黑，羞辱，损害声誉，踩在脚下，然后问题已不是满足辞职的要求，而是因怠工而‘撤职’。这里玩弄的把戏是尽人皆知的。”

4 月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了四月全会《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七月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扩大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的决议，撤销其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真理报》1989 年 2 月 3 日。

不是尾声

六月全会以后,反布哈林的运动一步紧似一步。布哈林等人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布哈林甚至没有发言。李可夫在做报告时也极端谨慎小心,没有提及同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多数的分歧。

由于解除了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的职务,出现了由谁接替问题。在改组《真理报》编辑部问题上,还发生了一场冲突。

1929年6月政治局撤销了《真理报》主编的设制。为了领导报纸的日常工作,建立了编委会的常委会,由克鲁明、波波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三人组成。

对这种做法李可夫、布哈林、乌格兰诺夫、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递交声明,提出了不同意见。

6月22日,李可夫在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中写道:

“关于《真理报》的组织及编辑部成员问题我投反对票,理由如下:

1、在实际编辑部里(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明、波波夫同志)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除了一段时间(那时中央机关报由代表大会选出,同中央委员会并行),在我党的整个历史上,领导中央机关报的总是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这一点现在尤其有必要和可能,因为目前我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中央委员组成的。

2、在这3人组成的编辑部里,在党内最知名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党内广大人士会要他承担更多的领导《真理报》的责任。然而,他(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是中央监委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是其主席团委员。作为小编辑部的负责成员,他在

《真理报》的工作完全服从于中央委员会,并为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对中央委员会负责。作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他代表由代表大会选出、对代表大会负责并具有监督职能的机关。我觉得,这种状况不符合党章的精神和中央监委的列宁组织原则。

3、在政治局的决议中没有关于划分大编辑部和小编辑部职能的指示。同样也没有划分小编辑部3个成员之间的职能的指示。这种状况会使大编辑部和小编辑部每个成员的工作和责任不清。

4、根据政治局的建议,波波夫同志是三人小组(实际上的编辑部)成员之一,并可能是对机关报实行日常领导的人员,然而他不久前还是孟什维克。我不反对让原孟什维克担任重大的工作,但坚决反对让他起由中央机关报的领导工作所带来的那种政治作用。由于把像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这样的老党员和中央机关报的老工作人员排除在报纸的领导之外,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5、上次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同志对中央机关报的领导,但无论中央全会还是政治局,在我动身之前都没有讨论过改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组织本身以及撤销主编建制的问题。

我认为原先的体制要正确一些:由中央全会选出主编并由他领导编辑部(在他下面设两个助手则更好)。

鉴于中央机关报在领导党和国家中的特别重大的作用,主编应由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

布哈林给中央的信的基本精神同李可夫的完全一致。他写道:

“我投票反对本建议。

理由:

1、没有理由取消主编的职务。

2、在编辑部中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这意味着极大地降低了中央机关报的作用,这是前无先例的。

3、在小‘工作’编辑部里同样没有中央委员,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是中央监委,其职责是监督。

4、实际上解除了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工作,而她是《真理报》的老工作人员,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起者,并且这样做的时候事先没有同她谈过话。

5、排除了马列茨基同志。

6、进来的 . . . 波波夫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孟什维克。”

科托夫建议由乌里扬诺娃代替波波夫。库利可夫主张保留主编的建制,对编辑部的组成投弃权票。克鲁普斯卡娅也对《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政治局暂时压下了这一问题。直到9月6日才以征询的方式通过“关于《真理报》”的决定。决议对布哈林等人的意见提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反驳论据,所以只能环顾左右而言他了。决议说,李可夫要求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担任主编,这并不能掩盖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从去年开始使《真理报》脱离党的事实。在1928—1929年间《真理报》的党的列宁路线并不是由布哈林担任主编得到保证的,而是由于从去年8月起改组编辑部,任命克鲁明和萨维里也夫进入编辑部后得到保证的。所谓“排除”乌里扬诺娃是造谣。她是编辑部的成员,并像过去一样是编辑部的秘书。关于波波夫,决议说,“政治局指出李可夫同志(还有布哈林同志)对波波夫同志的卑鄙的攻击。政治局提请注意以下事实,波波夫同志当时(1928年8月)曾被一致批准为党的另一个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部成员,而1924年根据布哈林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的提议参加了《真理

报》编辑部”。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决议认为,李可夫等人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李可夫反对一名中央监委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参加编辑部常委会,而另一方面,又抗议不让另一名中央监委委员(乌里扬诺娃同志)进入此常委会,还有,现在李可夫同志反对雅罗斯夫斯基同志担任上述工作,而过去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投票赞成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从原则方面讲,李可夫同志在声明中所说的,同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处,但同过去托洛茨基分子把联共(布)中央监委会同中央对立的企图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援引党章和‘中央监委会的列宁组织原则’,只不过证明其作者政治上的无原则性”。

可以看出,决议存在某种诡辩的东西,它把一般监委委员同中央监委会的领导人相提并论。其次,它把原孟什维克波波夫担任一般编委同担任主要的或实际上的执行编委混为一谈。这就完全避开了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提出的关键问题。

8月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8月21日、2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点布哈林的名字,称他为“倾向分子的主要鼓舞者和领导人”,此后,各种指责铺天盖地而来。

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大转变的一年》,宣布农村开始全盘集体化,农村“整村、整乡、整区加入”集体农庄,国家“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的断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青年俄罗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4页。

事实上,3年后苏联农村出现了使大批人饿死的大饥荒。

言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

这篇文章也为3天后召开的十一月中央全会定下了调子。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批判了“农民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的公式。按照斯大林的看法。“它(这个公式)使人认为小农和中农经济能够以其现在这种形式长入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经过改造,不对它们进行根本的改造就能够长入,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这当然不仅是批判布哈林了,这也是对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中的论点的否定。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一再论证,合作社,并且是流通领导的合作社,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去的最好形式,认为“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并不认为,农民合作社还需要经过什么“根本改造”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合作社有高低级之分,认定供销合作社是“低级形式”,只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才是“高级形式”,从而为自己用集体农庄顶替列宁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制造根据。其实,合作社不能以生产和流通来分其高低,它们各有自己的职能,并无高低之分。区分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当时发展生产的需要,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就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能接受的、并且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仍然是合作社,而不是集体农庄。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6—118页。

实际上,这个公式曾得到192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批准。

转引自特鲁坎:《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第41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2、367页。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7页。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 1929—1930 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在“反右倾”的一片喧闹中，同李可夫领导下制订的五年计划的任务（得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相比，控制数字大大提高了，首先是生铁、钢、拖拉机、有色金属。在粉碎了右倾之后斯大林开始实行其超工业化计划了。

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对布哈林等人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约·米·瓦雷基斯认定，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是“孟什维主义的”。加马尔尼克斥责“右倾分子的不祥的乌鸦预言”。发言者要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放下反党的机会主义武器”，否则就把他们赶出“党的参谋部”。埃赫提出“对反列宁主义者、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布哈林该作出组织结论了”。彼得罗夫斯基曾想缓和指责的语气，却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

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阐述对总路线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观点，这是他们所作的最后一次有限度的抗辩。这一次他们把分歧集中到实行非常措施上。他们声明“过去和现在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赞同五年计划和“政治局决议中向本次全会建议的控制数字”。他们还进一步声明：“我们坚决赞同工业化规定的速度，赞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规定的速度。我们主张同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主张依靠贫农，全力组织他们去反对富农，主张同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因此他们声明，“我们同中央多数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消失”。

他们同时也指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包括：尽管集体化规

转引自特鲁坎：《1928—1929 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第 44—45 页。

模巨大,但机器供应等等的增长未完成,整个农业的产量计划,特别是其谷物部分未完成;更没有完成畜牧业计划,牲口的数量有所减少;最后,实际工资计划未完成。

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基地的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还没有消除。“我们认为关于必须发展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的问题尚未取消”。他们强调,“我们不能在任何程度上闭眼不看摆在党面前的一系列困难”,“如果按照我们在四月全会上所指出的贯彻党的总路线的方法行事,我们就可能通过较少痛苦的道路取得合乎愿望的结果”。

他们认为,同中央多数的分歧只有一点,即非常措施问题。声明说:“我们担心实行非常措施,把它变成长期的制度必然也伤及相当数量的中农阶层,所以我们在上次(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反对实行非常措施。我们同中央和政治局多数的分歧正在于此。”他们指出,“毫无疑问,实行非常措施在短时期内保证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粮食储备,但也在一些地方使某些中农阶层的不满有所增长,把这部分中农推向进行残暴反抗的富农一边。同样无疑的是,实行非常措施也造成某些农业计划未能完成”。他们认为,“非常措施在明年已成为多余”。

从三人的声明可以看出,这时他们已不把争论纠缠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甚至对工业化的速度、集体化及其速度也不再提异议。实际上,这时候定的速度同几个月后斯大林所实际达到的速度有很大的差距,他们三人这时候所赞同的速度几个月后就被认为是相当保守的速度了。他们把分歧集中到一点,即反对把非常措施变成长期的制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他们早就看到的,非常措施是同新经济政策不能并存的,因此反

对非常措施也就是保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此其一。其次,反对非常措施实质上是反对经济领域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就这一方面而言,三人的斗争的意义远远超过反对具体的、在1928年春为收购粮食而实行的非常措施。他们显然看到,此口一开,以后就不再有可能去制止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了。第三,30年代大镇压的实践也从反面证明,当时布哈林等人紧紧抓住非常措施问题不放,确实显示了他们的预感不谬,有先见之明。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30年代对各阶层人民以至高级领导人的镇压等等,究其源盖出于非常措施,是非常措施的延伸和扩大。

尽管布哈林三人表示取消分歧,但与会者仍穷追不舍,揪住不放。奥尔忠尼启则认为,分歧不在非常措施,而在于工业发展速度,在集体化基础上改造农业。布勃诺夫在发言中大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批判《列宁的政治遗嘱》一文,说布哈林用他本人的合作社计划来顶替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把《论合作社》仅仅归结为学会文明经营。

莫洛托夫作了长篇发言,批驳三人的声明:

三人声明说,上次(4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指责他们右倾,在党的队伍及其领导机关中置他们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只能说明该集团认为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是与中央对立的一方,“我们和中央”。

(斯大林插话:集团的联盟!)

三人称,他们支持总路线,但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实行总路线。莫洛托夫引原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孟什维克的巴扎罗夫承认总路线的说法批判他们说,巴扎罗夫认为,党采取了过快的速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441, .1, .2, .83 及以下几页。

度去进攻,右倾分子也这么认为。巴扎罗夫认为,我们取消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刺激,在供应问题上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右倾分子也是这么说的。三人声明,分歧在于他们担心实行非常措施变成一种长期的制度。这全是谎言。莫洛托夫认为,同右倾分子的分歧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首先是关于工业化的速度,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向富农进攻,同官僚主义斗争,首先是党内民主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等等。

“根本争论是对阶级力量的不同估计,对阶级斗争的不同态度,对阶级任务的不同理解。关键问题是如何动员工人阶级向苏联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进攻,为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他断言,反对非常措施是要反对加强对富农的进攻,想把进攻的政策改为退却的政策。右倾导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莫洛托夫在讲台上声称,他们捏造党要把非常措施变成制度,指责党似乎想用非常措施来建设社会主义,即实行行政镇压的政策。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的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布哈林等人所担心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

克鲁普斯卡娅在会上为布哈林等人说话,她肯定三人的声明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认为“布哈林的错误是把个别的事实普遍化,从个别的失误作出普遍性的结论”。她指出,现在人们怕说话,怕被指责为右倾。明明是在没有粘土的地方建砖厂,但人们怕说粘土不好,怕因此被指责为右倾,结果是国家遭受损失。克鲁普斯卡娅重提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说“伊里奇称布哈林为全党所喜欢的人,我们知道这三人的优点,我们可以持同一个观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441,
.1, .2, .111—118。

点一起前进:对党有利的就是好的,对党有害的则毫无用处”。然而,她的讲话和者寥寥。

11月17日全会通过《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定,指责他们拒绝承认自己观点错误,认定三人声明“是派别活动性质的文件”;“是敌视党的文件”,决定“撤销右倾分子领导者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加罗夫提出警告。

表决时投反对票的有三人:托姆斯基、乌加罗夫和布哈林。表决后会议主席宣读了布哈林的下述声明:

“1、我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2、关于把我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那一条我弃权,因为由于我党的完全恰当的传统,我不能捍卫某一职务的候选人资格。

尼古拉·布哈林

1929年11月17日于莫斯科”

李可夫没有参加此决议的表决,但其态度是清楚的。11月12日他有一个发言,其中说:“古比雪夫同志在报告中说我投票赞同提纲(1929—1930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提纲。——引注),但反对其中关于反右倾的部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历来主张并投票赞成同右倾作斗争。我的声明是说,我反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441,
.1, .2, .10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441,
.1, .2, .104。

提纲中指责我个人和布哈林、托姆斯基同志右倾的那一部分。”

这是他们三人的一致立场——反对右倾,但不承认自己是右倾分子。他们这种立场除了显示自己的原则性以外收效甚微。因为“右倾”这顶帽子是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是用以打倒他们的专用武器,只要他们承认右倾存在,就很难把自己同右倾分开,特别是那时候舆论已完全站到斯大林那一边。另一方面,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右倾”,他们除了否定自己是右倾分子以外,也不可能再指出“右倾”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的帽子只好由他们自己来戴,不存在其他可能。这是他们从1928年年中以来的一个严重的失算。

不过,可以看出,到这时为止布哈林等人并没有缴械投降,只是作了某些退让。然而全会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定,给了他们以巨大的压力,报刊上的攻击有增无减。可以想象斯大林等对他们又施加了压力。11月25日三人向中央提交了新的声明,其中写道:

“最近一年半在我们和联共(布)中央多数在一些政治和策略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我们在一些文件、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以及其他会议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在这一争论中党及其中央是正确的。在人所共知的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承认自己的这种错误,我们从自己这一方面将竭尽全力和全党一起同偏离党的总路线的一切倾向,首先是右倾和调和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克服任何困难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档案, .17, .2, . .441,
.1, .2, .104。

和早日胜利。”

1929年11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一声明。

声明没有承认自己是右倾,但承认了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标志着布哈林等三人的彻底失败,斯大林达到了要失败者公开悔过的目的。至此斯大林可以认为,在20年代连绵不断的党内斗争中自己已打倒所有的对手,整倒了列宁的所有战友,在党内、国内以至共产国际内确立了唯我独尊的地位。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年的12月21日斯大林举行了自己的50大寿的盛大庆典,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赞颂斯大林的文章。其登峰造极之作恐怕要数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和红军》了,伏氏在文中断言,国内战争是在斯大林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把斯大林50寿辰同列宁寿辰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党内风气严重恶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正式出台!生日午宴没有邀请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获悉这种安排后李可夫也拒绝出席。

由于布哈林及其一整套主张的失败,苏联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或者用斯大林的话说,“伟大的转变”。这个转折表现在:1、取消新经济政策。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2、抛弃列宁的合作化方针,强制实行农村的全盘集体化。3、实行消灭富农以至全部个体农民的新方针。4、实行“超工业化”,高速度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5、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开始对全国各阶层的大规模镇压。6、在30年代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全集译作“我们就把它抛开”。

确立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行政命令体制。7、开始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等。

从此布哈林脱离了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地位,尽管后来有一段时间担任过《消息报》主编,但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已不可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党的最可宝贵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已无所作为,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了。

神话与现实

20年代末的苏联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所说的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是贴切的。当时苏联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发展和深化新经济政策,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按照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很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另一种选择是斯大林的选择,中止新经济政策,“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改行行政命令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或者说,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去,这就是苏联自30年代以来所实际走的道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从根本上讲就是这两条道路、两种建设方法之争。

这场争论以非常措施为契机,始终围绕着非常措施展开,并且最后以非常措施或变相的非常措施取代新经济政策而告终。长期以来对这一大转变议论纷纷,评价各异。从斯大林直到今日苏俄的某些历史学家,不少人认为新经济政策发展到20年代末已发挥完潜力,妨碍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代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新经济政策是在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走入死胡同、经济崩溃、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严重不满、社会形势紧张的情况下采取的新政策。这一政策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个人物质利益

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成效显著,很快就使国家经济摆脱了困境,在四五年中就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或接近战前水平。到1928年工业已超过战前水平的32%,农业24%。同1921年相比,国民收入提高2.3倍,工业提高3.2倍,其中大工业6.2倍,工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战前水平。在短短的几年里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且是工农业同步增长,这在整个苏联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时期所达到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1926、1928、1929年为25%,只有1927年略低一些,为14.6%。而1929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的五年计划“理想”方案所规定的增长速度也只不过21—25%,斯大林把这叫做“疯狂速度”,但同1928年或1929年所达到的速度相比根本算不上“疯狂速度”,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加速工业化”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作为比较,现在再看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按照斯大林选定的“理想”方案规定,5年内工农业应增长180%,其中生产资料增长230%,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0%,国民收入增加100%,农业增长55%。然而,执行的结果,工业生产增长不是180%,而是100%,工业年平均增长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23.8%降至19.4%,轻工业发展速度下降了几乎一半。从绝对数字看,许多重要产品都没有完成指标:生铁计划指标为1000万吨,实际完成620万吨;电力指标为220亿千瓦,实际为135亿千瓦;化肥计划800万吨,实际为90万吨。如同新经济政策时期(1923—1928年)比较,则1929—1932年的年产量钢由67万吨降为40万吨,鞋由850万双降为720万双,布匹、糖等的产

《新世界》杂志1988年第5期第171页。

《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7期第21页。

量都下降。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几个重要指标——电 1000 亿千瓦,煤 2.5 亿吨,铁 2200 万吨,直到 1950 年才实现。据经济学家哈宁用新方法计算,1928—1941 年经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同原定计划相去甚远: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是 4.5 倍,而是 50%;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是 3.5 倍,而是 36%。国民经济基本生产资金增加近 1 倍,但资金每卢布单位生产率下降 $\frac{1}{4}$,最终产品单位物资消耗上升 25—30%,这就使原料部门生产的增长贬值。正是从那时开始,苏联长期出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严重比例失调。至于农业就更不用说了,1929 年斯大林曾保证 3 年后苏联将成为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 3 年之后苏联出现严重的饥荒,致使几百万人饿死。直到 1950 年谷物产量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1933 年牲口比 1928 年减少一半,到 50 年代末才达到 1926 年的水平。

斯大林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去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然而,如果撇开这两部分的畸形发展不论,就国民经济的整体而论,斯大林模式并未显示出比新经济政策有多少优越性,它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在苏联的经济发展中显示出来。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从 1921 年春实行粮食税以来,新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商品(实际上是“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把商品货币关系引进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中间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和困难、甚至危机(如 1923 年的销售危机,等等),但都通过调整政策方针,最后解决。新经济政策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完善的政策,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在实行之初列宁连用“商业”这个词也相当

谨慎,不轻易首肯,而到 1922 年底,列宁已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在实行之初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暂时的退却”,后来才明确这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

这样,到 1928 年布哈林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

“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这就把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然,布哈林那时是把市场关系的存在同小生产者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还没有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 1928 年布哈林看到小生产者还将存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得靠市场关系把小生产者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轨道上来,因而自然会得出新经济政策将同样存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结论,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见解。按照这个思想,工人同农民的关系要依靠市场关系来调节,工业同农业的关系也要靠市场关系来调节,而市场关系的发育决不可能人为地局限于某些阶层和某些领域或部门,因此起码可以由布哈林的上述论断推定,市场关系至少将存在于整个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如果斯大林不急于消灭小生产者,用生产效率并不高的集体农庄取代个体农户,如果斯大林不急于宣布社会主义建成,那么新经济政策将继续下去,市场关系也将存在并得到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有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列宁的文章《论合作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提示或潜在的可能性。在那里列宁把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看作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

参见《布哈林文选》下册第 392 页。

最简便易行的组织,把合作社的发展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既然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中自然也会包含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流通领域合作社的发展的。

这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20年代经济发展的实践),都为苏联在20年代以后继续向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某些依据和提示。放过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机,致使苏联的经济长期得不到全面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迅速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先是在集体化运动中被消灭(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被消灭),继而作为集体农庄庄员长期被迫交纳“贡款”,不少人处于贫困之中,苏联国民经济的这种状况,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伏笔!

1921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然而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支持,政治制度上没有一个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体制,基本上仍然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留下来的那一套。

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曾决定放弃党组织的军事化,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实行“工人民主制”,规定在党内实行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在决议通过之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等等。然而,由于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及宣传上的偏向,十大通过的包含“工人民主制”原则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并未引起党内,特别是领导层的重视,而禁止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却成了党内生活的唯一的准则,在列宁逝世后成了被不断引用并付诸实施的残酷斗争的武器,在党内生活中持有不同意见者往往被说成派别活动,而遭到撤职开除

的命运。党内尚且无民主可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更难有民主的立足之地。列宁生前感到问题的严重,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其中包括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以增强党的稳定性,改组工农检察院以加强监督,包括对政治局以至总书记的监督,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位,精减和改善国家机关,等等。然而列宁不久即因病完全脱离政治生活,而他的那些继任者并不理解列宁提出的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对列宁的建议或直接予以拒绝,或阳奉阴违,在实行过程中完全变了形。

20年代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国内战争前线,他们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军事方式,不少人甚至仍欣赏过去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向往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此外,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中吸收的大量党员,文化水平较低,素质较差,这些人最容易接受的也是军事命令的工作方法。这样,不要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连已经确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是阻力重重。新经济政策本来首先是为农村制定的,然而到1925年布哈林还不得不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的口号。

政治和经济改革不配套的结果是使经济改革、新经济政策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体制的支持和保障,以至于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予以废除。布哈林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正在于此。而在这方面,布哈林本人也难辞其咎。在过去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新反对派”及以后的“托季联盟”中,布哈林以自己的威望和才干支持了斯大林的不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击溃了这些反对派,然而这样一来,也就同时消灭了对斯大林的制衡力量,打破了政治权力的平衡,使斯大林拥有越来越大的无限权力。布哈林本人在党内斗争中的某些片面的、过激的言论也助长了不正常的党内斗争方法,他本人就曾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法之争上纲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容不得不同意见。例如,在反对新反对派的斗争中,他反对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的维护少数派的权利的建议:保护党内的少数派按照民主程序阐述自己的立场的权利。其苦果就是当他同斯大林发生分歧之后,也失去在党内阐述自己的观点、讨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的可能,还不得不处处提防对方给自己戴上“搞派别活动”的帽子。

布哈林之所以遭到失败,还因为他同斯大林使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布哈林等人遵守了争论的规则,始终采取说理的方式展开争论,而斯大林却不断地运用他所掌握的行政组织手段,在他还不占多数的时候集中力量从一个一个组织机构中把布哈林及其拥护者打垮和排挤出去,最后经过精心安排,把1929年的四月中央全会扩大成为有300多人参加的、能保证斯大林拥有绝对多数的会议,达到最后打垮布哈林及其盟友的目的。在苏联这种特殊的社会里,组织力量显示了对理论力量的无比强大的优势。何况布哈林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在几次全会上的长篇大论始终只是党的秘密会议上的发言,除与会者外,无人知晓。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然而布哈林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始终只是一种被同群众隔离开的理论而已。这种状态也就使布哈林所坚持的理论斗争的方法在斯大林的严密的组织力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不堪一击。有些本来支持布哈林观点的政治局委员也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倒向斯大林。例如加里宁就是这样,他曾说过:“斯大林昨天收拾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今天想收拾布哈林和李可夫。明天

就要轮到我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明天不致轮到他！

列宁生前最担心的是两种分裂，一个是党的分裂，特别是中央的分裂，另一个是工农分裂。

列宁在其“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中央的6位核心人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列宁逝世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经过几年的党内斗争，先是排除了托洛茨基，然后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最后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党的领导核心中最后只剩下斯大林一人，而正是此人，列宁曾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我们看到，到20年代末列宁所不愿看到的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分裂成了既成事实。列宁时代的领导人一个个被排除出领导核心，打破了平衡的政治格局，使党的核心中失去了制衡力量，这就为确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极权体制打开了大门。

20年代所做的一切，也为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分裂做好了一切准备，30年代的全盘集体化的实际后果是工农分裂，尽管这一分裂没有以内战的形式出现，但其后果，其造成的历史损失，其造成的人员损失完全可以同国内战争相比。

党的分裂、工农分裂以及3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和历史因素。

转引自 . 列斯托夫：《阿·李可夫时代》，莫斯科1990年版第267页。

然而他的夫人还是没能幸免。

布哈林之死

不祥的预言

1918年夏,布哈林赴柏林,任务是草拟布列斯特和约的补充条款。在柏林他听说城郊有一个神奇的看手相的女人,能够根据手纹预言命运。出于好奇,他同索柯里尼柯夫去找了她。这位手相术家对布哈林说: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什么,您认为苏维埃政权要毁灭?”布哈林没有去想自己的命运,而是急于打听俄国革命的前途。

“您将死在什么政权下,我没法说,但一定是在俄国,伤口在颈部并被吊死!”

“怎么会这样?一个人只会死于一种原因:或

者由于颈部受伤,或者吊死。”

“将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女手相术家说。

1936年或者1937年初,布哈林把此事告诉妻子时说:“预见到大规模的恐怖,使我透不过气来。用女手相术家的话说,这就是颈部受伤,以后将被吊死——是不是被子弹打死,这无关紧要。”

在1918年的时候不要说布哈林,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设想这些革命家会被自己的政权所处决,所以想象力丰富如布哈林者,也只能猜想,是不是苏维埃政权要毁灭。那时如果有人预言,列宁的同事们将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那一定会被看作是疯子,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乏先例。

斯大林的危机

进入30年代,布哈林的地位大大下降了。他不仅被排挤出了决策圈,而且对国内政策已不可能发表什么认真的看法。对斯大林的一切只能赞同,不能反对,就是这样,还得不断作检讨。当然在报刊上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文章,一般只限于无关政治大局的问题,如文学艺术问题,科学研究问题等等。

1928年12月布哈林当选科学院院士。这就是说,当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的学术成就却得到充分的肯定。顺便说一下,斯大林也被提名为院士的候选人,但由于缺乏有分量的理论著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选票,未能当选。这时候权力还没有能完全控制学术!由于科学院在列宁格勒,所以布哈林定期到列宁格勒去上班,他的工资也由科学院开支。1929年5月被任命

《旗》1988年第12期第148页。

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改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在这里他同顶头上司,也是老朋友奥尔忠尼启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2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月27日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此后《消息报》的工作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在短短几年里他把这份报纸办成最受欢迎的报纸。

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以及随后发生的3年饥荒,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党内也议论纷纷,他的实际威望在下降,尽管到处可以听到向他欢呼“乌拉”的声音。而有的领导人的威望则显然在逐步上升。在1934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得到的反对票大大超过基洛夫(据说基洛夫的反对票为3张,而斯大林为270张),私下里有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而把斯大林调去担任人民委员会或者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的议论。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

“这时已经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情况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那些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大障碍。”

1962年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写道:“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的老干部的不安。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

《真理报》1964年2月7日。

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他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从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后来的遭遇也可以得到旁证——139名委员中有110人被消灭,而这次代表大会被称之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们的命运如此,而有可能接替斯大林的基洛夫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发生了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暗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凡与暗杀有关的嫌疑人员,以及有可能多少了解内幕的人员,都先后神秘死去,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罪证。暗杀事件为开展大规模镇压提供了,或者说,制造了极好的借口。

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加强和扩大镇压的措施。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讨论,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修改:

“1、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并研究是否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3、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经国家元首加里宁签署就公布了(只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

此规定实施后,各类案件的审理速度大大加快了,全国开始了新的镇压浪潮。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88—389页。

巴黎之行

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同行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和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 . 阿罗谢夫。稍后,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也在4月初去巴黎会合。

这次出差是斯大林给的任务。斯大林在向布哈林交代任务时说:“阿罗谢夫无疑是能够谈生意的,但我对阿多拉茨基的知识有怀疑,别人会把别的东西当作马克思的塞给他。只有你能够核查手稿。”斯大林交给他政治局的决定。其中规定了此行的目的,购买档案小组的成员,为进行谈判所必须接触的对方人员,其中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阿德勒,流亡国外出版《社会主义通报》的孟什维克唐恩和尼古拉耶夫斯基。斯大林甚至对出行的服装也表示关心。他对布哈林说:“尼古拉,你的衣服太破旧了,这样出去不合适,赶快去做件新的,我们现在时代不同了,应当穿得好一些。”布哈林就穿着这次做的新衣出行巴黎,后来也是穿着它被捕和受刑的。

路过柏林,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布哈林购买了一批图书,其作者都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他这是为写作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著作做准备的。

档案分藏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因此布哈林一行先去了维也纳、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看看那里的藏品。3月中旬才到达巴黎。由于布哈林在巴黎有一个报告,并准备把报告出小册子,因此有一笔稿费收入,他就把已怀孕的妻子拉林娜接到巴黎。这样布哈林巴黎之行就有了一个见证人,关于布哈林在巴黎的

活动,只有两个人留下文字记载,一个是拉林娜,另一个是尼古拉耶夫斯基,后者留下了两个材料:《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和访谈录。

小组的3人中,只有布哈林有外交护照,按规定有外交护照的必须住在使馆,但大使接到通知,让布哈林同他的小组成员一起住在外面的旅馆。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谈判。鲍威尔和阿德勒给布哈林提供了研究文件的可能性,在巴黎的谈判主要集中在价格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要价很高,也许作为中间人的孟什维克也想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布哈林等人用电话向斯大林请示,斯大林宣布,苏联不能支付这么多的钱:“你们不会做生意,让阿罗谢夫去施加压力,你尼古拉干这个不在行。”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价格上做了很大的让步,眼看档案的买卖即将成交,于是向斯大林请示,但没能同斯大林本人通上电话,只是由波斯克列贝舍夫转告,斯大林坚持最初的价格。

布哈林闻讯后不禁叹道:“柯巴,难道他在什么地方做过让步!为这点钱讨价还价对国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后来他在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单独谈话时表示:“要是我的话,会比你要的价加倍支付的,只要我有这种可能性,为的是抢救档案和停止这种生意经。”而尼古拉耶夫斯基则宣布:“我们一个法郎也不让步了。”这样,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告吹。但布哈林始终关心这批档案的命运。他建议把档案运到美国去保存。他说,“是保存,而不是出售,那里谁也不会给你们钱的。美国不需要这些文件,但可以保存它们。”

布哈林谈到德国人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他说:“我决不排除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我认为,同德国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对此做好准备,并且不仅在军事领域要建立有强大技

术装备的军队,还要做好后方的心理准备。农村的困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我认为,尽管战争将是沉重了,但胜利将属于我们,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我们能保存好档案。”

看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是有意找机会同布哈林单独见面的。一则他想向布哈林打听自己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的情况,后者同李可夫的姐姐结婚,住在莫斯科。他还想请布哈林给李可夫捎去荷兰的郁金香块。但也许他更想同布哈林作较为自由的谈话。他问及苏联的生活情况。布哈林谈了苏联工业的蓬勃发展,电气化的发展,他对第涅伯水电站的观感,以及科学的高速发展,等等。只是他不再多提斯大林的名字,这在当时的公开场合是非提不可的。当然,尼古拉耶夫斯基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他问集体化到底怎么样。布哈林回答说:

“集体化是已经过去的阶段,艰苦的阶段,但已经过去。时间消除了分歧。桌子已经做好了,这时候再去争论用什么材料做桌子腿是毫无意义的。你们那里写道,我反对集体化,但这只是廉价的宣传员所使用的一种手法。我建议另一条道路,较为复杂,不那么急速的道路,它最终也导向生产合作社,这条道路不会有这么大的牺牲,能保证集体化的自愿原则。但现在面对法西斯的进攻,我可以这样说:斯大林胜利了。”

在巴黎的时候,《金融资本》的作者希法亭曾从外省专程来巴黎看望布哈林,他们就理论问题进行了交谈,布哈林认为同他的谈话极其有意思。

按照拉林娜的说法,布哈林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只单独谈过一次,当时她也在场,所以她否认尼古拉耶夫斯基后来在访谈录中提供的同布哈林谈话的很多内容,但拉林娜是中途来巴黎的,

在这以前的情况她是否一定清楚,恐怕还是个问题。

就在布哈林访问巴黎之后,西方曾流传一篇题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的文章,文中谈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关于苏联党和国家的情况。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承认,这是他根据1936年同布哈林的谈话写成的。1964年1月30日,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扎戈里亚和西韦林·比阿勒访问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询问当时他同布哈林谈话的情况。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谈话内容判断,他们的谈话大大超过了拉林娜所介绍的内容,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拉林娜在场的那一次,他们确实只谈了拉林娜所介绍的那些东西。这样,尼古拉耶夫斯基所谈的内容就只可能是在另外的场合交谈的东西。另一种可能就是拉林娜所记不全。

尽管当时布哈林的境况已经不妙,但谢绝了一些人要他留在国外的建议,而毅然回国。例如,卢森堡的原秘书法尼·叶捷斯卡娅曾在共产国际布哈林手下工作过,据说她企图劝他留在国外,帮她办一份反对派报纸。这个报纸要真正了解苏联发生的事情,她认为,布哈林是唯一能担当这一任务的人,但是布哈林拒绝了。他说:“我不认为没有俄国我能生活得下去。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于那里的事情,已经习惯于紧张的生活。”

布哈林等一行于1936年五一节前返回莫斯科。布哈林立即同斯大林通了话,向他报告说档案文件非常有意思,对苏联有巨大的价值,建议不要再讨价还价,买下这些文件。斯大林回答说:“不要激动,尼古拉,不必着急,他们还会让步的。”这样,购买档案一事终于告吹。

布哈林的巴黎之行为后来对他的迫害和审判提供了一个“把柄”,因此有人认为,派布哈林去巴黎本身就是有意设下的陷阱。

这里起很大作用的是1936年12月—1937年1月《社会主

义通报》发表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编者按说,是在本期付印前刚刚收到的。信的署名为:“ . Z. ”。此信的内容涉及当时苏联的许多敏感的问题,如农业集体化问题,基洛夫暗杀案,当时举行的几次审判案,正在追查的柳亭纲领等等。日益扩大的恐怖是信中议论的中心。还有对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的评论,谈到只有排除斯大林才能拯救国家。许多人认为,此老布尔什维克即布哈林,至少他为此信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一切都成了后来指控布哈林的材料。实际上信中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布哈林是不可能知道的,例如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于布哈林已不是政治局委员,是不可能了解的。后来知道信的真正作者是尼古拉耶夫斯基。

山雨欲来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给全国党组织发了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在全国掀起了第一个大规模逮捕的高潮。

1935年1月对原“新反对派”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人进行审判。据称“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然而,季诺维也夫仍然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为5年。

1936年8月15日开始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的审讯,在审讯中一些人的供词牵扯到布哈林。8月20日和21日莫斯科各报开始发表许多集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彻底查清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同罪恶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之间的联系”。此类决议也刊登在由布哈林任主编的《消息报》上。

8月22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说在前几次庭讯中一些被告在供词中指证,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参与了被告现在本案负有罪责的那些反革命罪行”。为此已于昨天发布命令,开始侦查被告关于布哈林等人的指证。

这时候布哈林并不在莫斯科。1936年7月中旬他开始度假,去吉尔吉斯,到帕米尔山区去打猎了。在季诺维也夫案结束前,他从帕米尔回到伏龙芝城,这才从报纸上看到审判案的消息。这是审判的最后一天——1936年8月24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判极刑。布哈林知道一经判决将立即执行,因此立即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请求推迟执行,以便同他们对质。然而,枪决如期执行了。

从1936年8月休假回来之后,布哈林已不去《消息报》编辑部上班,当时在《消息报》工作的拉狄克曾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回答说:只要不在报刊上公开推翻无耻的诬陷,我的脚就不会踏进编辑部。拉狄克告诉他,日内将召开编辑部党的会议,党委会要他务必出席。布哈林对党的会议也拒绝出席,他认为在编辑部一级不能解决问题,徒然弄得神经不安。拉狄克表示想同布哈林会见。布哈林拒绝了,他不想使侦讯复杂化,他说,他非常想见到李可夫,但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没有同李可夫通话,也没有设法去见他。拉狄克说:“您不会有什么倒霉事的。”布哈林答道:“这一点我们还要看看。”

1936年8月28日,他给《消息报》写了一张便条:“致维里柯德伏尔斯基同志并转党的会议”。布哈林表示歉意,因为他不

《真理报》1936年8月22日第4版。

《旗》1988年第12期第138—139页。

能“参加作为编辑必须参加的会议”。他解释原因说：“昨天我给政治局委员们送去一封有事实有分析等等的长信。在信的末尾我写道，只要不撤销对我的指控，我无论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去上班工作”。尽管《消息报》上刊登大量污蔑布哈林的材料，但报纸每天仍刊有“主编布哈林”的字样。

此后不久，有电话要布哈林去见卡冈诺维奇。这是要布哈林去同已经被捕的索柯里尼柯夫对质。索是布哈林童年的好友，两人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这一次索却向他提出了莫须有的指控。按索的说法，似乎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平行中心，他本人也参加了，中心发布指令，进行暗害破坏活动，打算用恐怖手段对付政府成员，组织暗杀斯大林，而“右派”也赞同中心关于推翻政府和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观点。索似乎曾亲自同布哈林谈过此事，布哈林警告他，需尽快行事。他指出了何时何地何人参加下进行此类会谈。对质时卡冈诺维奇在场，但没有说话。当索被带走后，卡冈诺维奇突然说，“从头到尾全是扯谎，扯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走，回编辑部去，安心工作。”布哈林则向他声明：“只要不在报刊上公布苏联检察院驳斥诬陷并因缺乏犯罪成分而中止侦讯的公告，我就不去工作。”卡冈诺维奇答应一定做到。

侦讯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确凿的罪证，《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苏联检察院公告说：

“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

《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旗》1988年第12期第140页。

《真理报》1936年9月10日第2版。

侦查的措施对公众来说是一种试探气球或舆论准备,而对布哈林等当事人则是一种神经战,看到维辛斯基的公告后,布哈林的朋友托姆斯基当即自杀身亡。

停止审查的公告发布后,罗曼·罗兰给布哈林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帕斯特纳克也写了祝贺的信。甚至到1937年1月下旬,拉狄克—皮达可夫案件已经昭示布哈林的处境极为不妙的时候,帕还给布哈林寄去一封短信说,“任何力量也不能使我相信您是叛徒”。

看到公告后布哈林给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说过几天就去上班。但是当他到了编辑部,看见联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波里斯·塔里占了他的办公桌和执行主编的职务,他立即向塔里声明,他不打算在“政治委员”手下工作。他离开了编辑部,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镇压的风声日紧。拉狄克在被捕前几天(他在9月17—20日被捕),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去找了布哈林,说他即将被捕,但斯大林不会允许逮捕布哈林的。拉狄克向布哈林保证,他早就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他同揭露的托洛茨基秘密组织无关。他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没有联系。但他说,“我为格里戈里(即季诺维也夫)感到难过”。拉狄克请求,一旦他被捕,请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案件经斯大林的手处理,并告诉斯大林,他在1929年通过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收到过托洛茨基的唯一的一封信,但没有拆封就交给了格伯乌。布哈林问他,为什么不在被捕前自己给斯大林写信。拉狄克答称,他的信不会交到斯大林手上,而会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的,因为他是受调查的人。而布哈林的信则会直接送交斯大林。临走前拉狄克重申:“尼古拉,相信我,不管我出了什么事,都相信我,我没有犯任何罪行!”过不久,拉狄克的妻子也到布哈林的别墅来,提出

同样的请求。

此后不久,拉狄克果然被捕,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转达了拉狄克所说的一切,但他感到没有把握,信的结尾作了某种保留,他写道:“然而,谁知道他呢!”

拉狄克在城里的住宅里被捕,住宅经过搜查,他的别墅也被搜查过。《消息报》的别墅的清洁女工杜霞跑来告诉布哈林,说在搜查拉狄克的别墅时发现了一批秘密的犯罪文件。布哈林估计,如果拉狄克真有这种文件,那么在宣布对他进行审查的一个月内他完全有时间烧掉。所以,这要么是臆造,要么是栽赃。

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审判于1937年1月23—30日举行。除两人外,所有被告都被判处死刑。也许是因为签署包含大量诬陷材料的假口供有功,需要留个“宽大”的样板,拉狄克和索斯诺夫斯基被判处10年徒刑。布哈林认为这是一种诱饵。

一封信的遭遇

这时候布哈林本人也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伏罗希洛夫。1936年9月1日给他写了一封信。

刚从帕米尔回来的布哈林对天上地下之别感慨不已。天上,“真是好极了——零下8度,钻石般的纯洁,安宁肃穆的气息。”地下,“这是梦、幻影、疯人院、错觉?”但他知道,“这是现实”。问题是由基洛夫被暗杀引起的,布哈林告诉伏罗希洛夫他同基洛夫的友好关系的起因。他写道:“是的,我写过有关基洛夫的文章。顺便说一说,当我失宠被黜(活该)而又病倒列宁格勒时,基洛夫来看我,坐了一整天,问寒问暖,拨出他的车厢,把

我送到莫斯科。对他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我至死难忘。”他针对各种指责问道:“我对谢尔盖(基洛夫——引注)哪一点写得不诚实呢?请老老实实地把问题提出来。如果不诚实,你们就应该立即把我逮起来干掉:因为这样的坏蛋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们认为‘不诚实’,而又让我逍遥自在,那你们自己就是不值得尊敬的胆小鬼……”

信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对当时的案件本身并没有提出怀疑,把加米涅夫等人叫做“坏蛋”,声称“枪毙走狗——这我非常高兴。通过审判案,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经死了,这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第二,布哈林对伏罗希洛夫声明他对“大政策”的支持。所谓“大政策”布哈林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大事业,布哈林以后曾多次声明准备为这种“大政策”作出牺牲。

第三,布哈林肯定自己是无罪的。他说,“我的确没有罪,不管别人怎样千方百计败坏我的名声,迟早是会弄清楚的”。“我要的是真理:真理在我这边。”他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所以在信的结尾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拥抱你”。

布哈林为自己的老朋友托姆斯基的自杀感到惋惜:“托姆斯基真可怜!他也许是‘糊涂’了——我不知道。我不排除这一点。他一个人生活。如果我常到他那里走走,他也许不至于这样压抑和糊涂。人的生活是复杂的!然而那是抒情诗。而这里是政治,是抒情味不足而严酷有余的事情。”

他以布哈林式的天真向伏罗希洛夫提出请求:“如果战争爆发时我还活着,我将请求参加打架(这个字眼不好听),到那时请你帮我最后一次忙,在军队里哪怕安排我当一个列兵(即使加米涅夫的毒弹把我击中)。”

收到布哈林的信后,伏罗希洛夫于1936年9月3日给布哈

林写了一封短信：

“退回你的来信，你在信中竟敢对党的领导进行卑鄙的攻击。你想通过自己的信使我相信你清白无瑕，可是现在你使我相信的只有一点：今后离你更远点，无论对你的案件侦查结果如何，如果你不以书面形式放弃哪些加在党的领导身上的可恶的形容词，那我将把你看成坏蛋。”

布哈林同伏罗希洛夫的私交本来是不错的，否则在这种关头他决不会给他写信的。布哈林家里有一支伏罗希洛夫送的枪，上面刻有题词：“送给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应伏罗希洛夫的请求，伏的一些报告是布哈林代为起草的。就在上封信里，布哈林还说，“你对我是那么好”。但是，他忘了那时候伏罗希洛夫已是斯大林的心腹，在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他是一员干将，他所写的《斯大林和红军》这一小册子为在军事领域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立下过汗马功劳。失望之余，布哈林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回信：

伏罗希洛夫同志：

收到了你的来信。我的信的结尾是“拥抱你”。

你的信的结尾是“坏蛋”。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每个人都有，或者确切些说，都应该有自己的个人自豪感。但是我想消除一个政治上的误解。我写的是私人性质的信（现在我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是在心情沉重的情况下写的；我受到陷害，无奈之中就向大人物写信；我一想到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一想到有人真的以为我有罪，我就会发疯。

于是我大喊大叫地写道：“如果你们认为‘不诚实’（例如，认为我写的有关基洛夫的文章‘不诚实’），而你们又让

我逍遥自在,那你们自己就是胆小鬼”等等。其次,“如果你们自己不相信加米涅夫的编造的谎话……”等等。怎么,你以为我认为你们是胆小鬼或者把领导称为胆小鬼吗?恰恰相反,我这样说,因为谁都知道你们不是胆小鬼,所以你们不会相信我会写不诚实的文章。这从信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既然我写得杂乱无章,以致可以把这理解为攻击,那么我(不是由于对犹太人的恐惧,而是就事情本身而论)可以3次以书面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收回所有这些话,虽然我想说的完全不是你所想的。

我认为党的领导是卓越的。就在给你的信中,我没有排除你们把我搞错的可能性,我写道:“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卓越的人物和优秀的政治家也犯局部性的错误”……难道信中不是这样写的吗?这也是我对领导的真实态度。我早就承认这一点,而且将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一点。我敢说,这些年来,我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我请求消除这个误解。对于上一封信,我十分抱歉,今后决不以任何书信来使你为难。我的神经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因此才写了那封信。可是我必须尽可能耐心地等待侦查结束,我相信,侦查将证明我同匪徒毫无关系。因为这是事实。

永别了。

布哈林

1936年9月3日

收到布哈林的上述两封信后,伏罗希洛夫立即指示自己的助手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叶若夫等人写了一封“绝密。亲启”的信。内称:

“遵照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命令,随同尼·布哈林今年9月1日写给你们的信(No 2839 . . .)送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布哈林的回信抄本和布哈林的回信抄本。附件共3页。”1936年9月4日。

尽管不近人情,有背交友之道,但伏罗希洛夫这种做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为了自保,他也必须采取这种措施,以防万一,更不要说他同斯大林的关系了。那时日,敢于出头仗义执言者,确实是罕见的。正直敢言如奥尔忠尼启泽这样的人,最后也只有以死来抗争。

诬告和对质

尽管表面上停止了审查,布哈林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对他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12月15日《真理报》第2版“宣传员辅导材料”栏发表无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初起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布哈林所担任的《消息报》总编辑正式易人。

1936年12月,中央书记处通知布哈林出席十二月全会。

见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40—343页。据拉林娜回忆,这期间,布哈林曾给伏罗希洛夫写过便条:“克里姆,你要知道,我没有犯任何罪行。尼·布哈林”。次日,布哈林收到伏的回信:“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侦查会说明您有罪没有。伏罗希洛夫”。按照拉林娜的说法,给伏罗希洛夫的信是在1936年12月底的事,当时她同时发了两封信,另一封信是就策特林的供词给斯大林的信(《旗》1988年12月号第149页)。但从沃尔科戈诺夫所引的布哈林给伏罗希洛夫的信看来,12月再给伏罗希洛夫写信似不太可能。

全会讨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会上对两人提出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指控。新提升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作了报告，极力攻击他的前任亚戈达，声称在揭露季诺维也夫等人方面迟了好几年。然后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布哈林和李可夫，指控他们同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等等。当提到基洛夫的时候，布哈林禁不住愤怒地大喊：“住嘴！住嘴！住嘴！”大家都转向布哈林，但谁也没有吭气。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提出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陷自己的。”

全会只开了一个晚上。布哈林从全会直接回家，一进门就对妻子拉林娜说：“认识一下！你的忠实仆人——叛徒 - 恐怖分子 - 阴谋分子。”这是会议上指控布哈林的罪名。

当时的做法是把审讯中的供词寄给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1936年12月底起，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陆续收到针对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的各种供词。供词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其中没有任何矛盾，指证的时间地点都完全一致。按照这些供词的说法，布哈林出席了某些地下会议，如果没有出席，也必定有人传达布哈林或者李可夫关于为恢复资本主义而推翻政府，暗杀斯大林，实行“宫廷政变”等等的指示。提供指证的大多是一些不知名的外省人员，他们过去同反对派没有任何联系，有的连布哈林也不认识。

对这种现象布哈林没法解释，他对拉林娜说：“无法理解。也许柯巴(斯大林)发疯了？”

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驳斥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并无回音。

布哈林曾多次被召去同各种各样的人对质。

除了同索柯里尼柯夫对质外，布哈林还被叫到政治局去同

他曾经为之向斯大林说情的拉狄克对质，拉狄克同样给布哈林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同拉狄克对质后，斯大林问布哈林，怎么解释大家都对他提出指证，布哈林回答说：“这一点您能解释得比我好。”他要求成立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委员会。

回家后布哈林对拉林娜说，“我从地狱，临时地狱回来了，但毫无疑问我将永久待在那里，其实今天就可以逮捕我的。显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向自己彻底解释清楚所发生的一切……”

布哈林还被叫去同皮达可夫等人对质。

1937年2月拉林娜路遇奥尔忠尼启泽，奥对她说：“要坚强一些！”这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因此这个表示显得非同寻常。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决定给他的这位老朋友写信。信的结尾是：“我开始担心，我一旦被捕会落到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姆拉洛夫的地步。别了，亲爱的谢尔戈，我的所有打算都是真诚的。无论以后我的命运如何，我都是清白的。”他请求奥尔忠尼启泽，如果他被捕的话帮助照顾他的全家。但是信没有发出去，奥尔忠尼启泽就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正是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全会开幕的日子，为了安排丧事，全会只好推迟到23日开始。

二月—三月中央全会

中央全会原定2月18—19日召开。议程是：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2、组织问题。

得到通知后,布哈林决定不参加全会,他认为没有他参加也一样可以处置他。他决定绝食抗议,为此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

“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

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增加了一个议程:关于布哈林向全会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由于有这项议程,布哈林决定出席会议,但不停止绝食。在衣帽间遇见了李可夫,他对布哈林说:“最有远见的是托姆斯基。”同布哈林握手的只有两人: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当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进入会议厅,布哈林因头晕而摔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

“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

“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这是斯大林在逮捕布哈林之前4天给的保证。

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并宣布停止绝食,指望全会会取消对他的骇人听闻的指控。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在全会上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在会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了3点

指控：

第一，布哈林和李可夫在递交完全服从党和放弃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声明之后，欺骗党，用两面手法伪装放弃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但仍保持自己的派别，成员转入地下，继续坚持自己的旧的政治纲领，没有停止反党斗争。为领导这一派别，早在1928年就建立了中心，它一直存在到最近。此中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就是布哈林和李可夫。

第二，布哈林和李可夫拒绝放弃有害于国家的政治信念，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

第三，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在同所有苏联敌人结成的联盟内，采用恐怖手段，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

叶若夫还补充说，还可以给他们加上一条政治指控：“他们仍然是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在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继续干，隐蔽得深一些，如果落网了，不要承认。路线就是这样。”

为了最终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

委员会会议在2月27日召开。有35人出席，其中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但记录在案的发表处理意见的只有20人。处理方案基本上是两种：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军事法庭并处以极刑——枪决”。斯大林则建议“撤销联共(布)中央候

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转送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张枪毙的有6人,其余14人主张不处死,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的意见是:“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在这种场合,像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这样一些同布哈林关系极好的人,如果真的出席了会议的话,唯一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同意斯大林的不处死的建议了。

会议最后按斯大林提的方案形成了决议:

“1、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一致通过)。

2、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叶若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草案。”

做好充分准备之后,2月27日晚,斯大林的秘书通知布哈林出席全会会议。布哈林知道同家人最后诀别的时刻到了。在这以前他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要年轻的妻子背下他给未来的领导人的信。在诀别的时候,布哈林嘱咐拉林娜:

“看着,安妞特卡,不要生气,历史经常有令人懊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胜利!”

而拉林娜则叮嘱他:“当心点,不要给自己抹黑!”

布哈林和李可夫到了会议室前面的衣帽间就被逮捕,直接送往监狱。

这一边,告别后不久,抄家的队伍就来到布哈林的家。当时还留在家的有布哈林的年迈的父亲,不到1岁的儿子,年轻的妻子,还有长期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的已经瘫痪的前妻卢金娜。

记录的影印件上可以看到各种修改,看来不像经过加工伪造的。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24—25页。

全会结束后,召开了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央全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介绍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全会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原因。赫鲁晓夫说:他们来到全会是要欺骗党,向党掩饰自己的反党反苏勾当。他们没有走上悔过的道路。显然,对待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须像革命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对付他们。赫鲁晓夫这里只说开除出党,而隐瞒了逮捕这一重要决定。

铁窗生涯

把布哈林关进狱中问题还没有解决。1937年6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斯大林主张把布哈林等右派肉体消灭。但会上出现明显的不同意见。

在6月24日晚间的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发言,表示反对肉体消灭,认为从事派别活动开除出党就够了,以后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于国民经济。他反对把他们交叶若夫全权处理,并建议加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包括对叶若夫的监督。

在他发言后,斯大林中断会议,宣布休息。中间有人劝皮亚特尼茨基收回建议,而多数人都离他远远的。过不多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把他叫到一边,说斯大林要同他会谈,要他收回建议。然而,他拒绝了。他们就以其子女为威胁。

被关进监狱后不久,布哈林给拉林娜写了一张便条:“不要为我担心。这里千方百计地在驯服我,照料我。请写信告知,你

《真理报》1937年3月17日。

《莫斯科新闻》1988年4月10日第16页。

们那里怎么样？孩子怎么样？给尤拉照个相，给我照片。你的尼古拉。”

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作《法西斯主义下的文化退化》、《哲学短篇集》以及长篇小说《时代》等著作。

1937年12月10日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机密，亲收”的信。

这是一封向斯大林告别的信，其中展示了布哈林在厄运面前的极其矛盾复杂的心情。布哈林没有请求宽恕，这时候他已做好死亡的准备。但是，他对斯大林却还寄予希望——要斯大林“本人了解情况”，否则他就不能去死。

他向斯大林表白的第一点是重申他没有犯“在侦查时曾承认犯下的罪行”。他在全会上讲的完全是真话，在这里写的也绝对是真话，“我既不是党的敌人，也不是苏联的敌人”。但是，别无出路，“只能认罪，证实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否则，就是拒绝缴械投降。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被迫的。

第二，他试图“解释”他的“悲剧”的原因。他设想，这是“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需要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所以对有罪的人，有嫌疑的人，以及对潜在的有嫌疑的人进行了清洗。布哈林声明，他这样说不是“含沙射影”，而是他真实的想法。“宏大的计划、宏大的构想和巨大的利益高于一切”。布哈林对斯大林说：“与首先落在你的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相比，提出我的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布哈林已经准备为了他所猜想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宏大事业而牺牲了，他所希望的只是斯大林也承认他是无罪的，他所做的牺牲仅仅是“大事业”的需要。

第三，布哈林的这种估计充分说明，他至死也没有明白是谁

造成他的厄运,是谁制造了这 30 年代的全国性的大冤案。他既不清楚制造这些冤案的目的,也不知道制造这众多冤案的罪魁祸首。所以毫不奇怪,在这封斯大林“亲启”的信中布哈林天真地一再向斯大林表白:“从心底里”对他的“依恋”。他告诉斯大林:“你因为失去我而失去了一个最有才干、真正忠实于你的将军之一”。在永别的时候他恳请斯大林给予“最后的宽恕”。

第四,布哈林不能忍受他被作为叛徒受审和处决的结局。他希望斯大林让他“在审判之前死去”,不要枪杀他,而让他“在囚室内自己服毒”。布哈林强调,“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布哈林不知道,这时候重要的是公开地把他作为叛徒审判和处决,在公众面前彻底摧毁布哈林作为“全党喜欢的人”的形象。要布哈林死去,但决不能让他悄悄地消失,而必须大张旗鼓地予以宣判。

最后,布哈林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允许他同妻子和儿子告别,在生命结束之前同她见一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了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由于感到意外而去结束自己的性命的。”布哈林不知道的是,这时候他的妻子拉林娜早已被流放他乡了。

布哈林还没有完全绝望,因此,他提出,万一能保全性命的话,他请求把他送到美洲去呆上若干年,他“将就几个审判案发动一场运动,与托洛茨基进行一次殊死的较量”。如果做不到,他要求把他发配到伯朝拉或科雷马集中营去呆上 25 年,他将在那里建起一所大学,一个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等等,或者建立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创办集中营杂志和报纸。“总之,为了着手进行一项拓荒者的奠基性的文化工作,

我会定居在那里的，我和家人将在那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8年1月15日，在“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即将开庭的前夕，布哈林给妻子拉林娜写了绝笔信：

“亲爱的安努施卡，我的宝贝！

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审判即将结束，给你写信的目的有三点，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做好准备。我既为你担心，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为你担心。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则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的。你面临着巨大的磨练。我亲爱的，我求你采取一切措施，绷紧全部心弦，但不要让它们绷断了。不要同任何人闲扯任何东西。你知道我的状况。你是我最亲密，最亲爱的人。所以我用咱俩间最美好的一切请求你尽最大的努力，倾全部的心思去帮助自己和全家人渡过这可怕的阶段。我觉得，不必让父亲和娜佳读到这几天的报纸，让他们暂且像睡着了那样。还有，你自己看着办吧——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震荡。既然我提出这种要求，那就请你相信，我饱经忧患，其中包括提出这一要求，一切都会发生的，正如伟大的重大利益所要求的那样。你知道，我给你写这样的信要花多大的代价，不过我写信的时候深信，我只能这样做。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这短短的几行表达了多少意思，你是懂得的。像我所请求的那样去做，要控制住自己，就像石雕像那样。

我非常为你担忧，如果允许你写信或者就以上所述给我写

《史料》1993年第0期，参见《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期。

几个令人放心的字,那就会多少减轻压在我心头的这一重负。

这一点我求你啦,我亲爱的朋友,恳求你了。我的第三个请求要小得多,但对我个人却极端重要。将向你转交3份手稿:

- 1、数量很大的哲学著作,计310页(《哲学短篇集》);
- 2、小诗集;
- 3、小说的头七章。

它们需要用打字机各打3份。父亲可帮助加工诗歌和小说(诗歌附有设想,表面上很混乱,但可以理清楚;每一首诗都要打印在单张的纸上)。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还有另一本书(《资本主义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其头一半我还是在家里写成的。你设法把它找出来:它不在我这里——如果丢了,那太可惜了。如果你收到手稿(好多诗歌是同你有关的,你从中可以感觉到我对你的眷恋),而如果允许你给我写几行或几个字,也不要忘记提一下我的手稿。

现在畅谈自己的感情,不是地方。但是你从这封短信可以看到,我是多么无限深情地爱着你。在我这艰难的时刻,请你用完成我的第一个要求来帮助我。不管审判的结局如何,无论如何,宣判后我将看到你并能够吻你的手。

再见吧,亲爱的!

你的科利卡

38年1月15日

又及:我有你和孩子的照片。替我亲亲尤尔卡。还好他不会读报。我也很为女儿担心。关于儿子哪怕写几个字——大概

已长成大孩子了,然而还不认得我。拥抱并爱抚他!”

列宁曾经说过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这指的是当时布哈林对打入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的怀疑的揭发,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哈林是对的。对流言蜚语布哈林并不轻信,但在别的方面倒确实有点轻信。他至死仍相信斯大林,而把问题归结为内务部机关不正常,所以才会向他提出很不现实的请求。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真的轻信。尽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轻信是最可以原谅的缺点。但轻信确实使他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最后遭杀身之祸。

据理力争和“跪着造反”

布哈林案件并不是一件孤立的案件。这是从 20 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案件发展的顶点,在此之后,镇压没有停止,但像布哈林这样著名的人物已经没有了。这就像一张展开尔后又不断收紧的网,打上来的最后一条大鱼就是布哈林。20 年代末的沙赫特事件是对工程技术人员镇压的开始。此后在 30 年代前期陆续举行了所谓工业党、农业党、孟什维克中央等等的案件审判。其矛头起先是党外的知识分子,然后逐渐转到党内,例如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案。应该说,30 年代镇压运动的第一个最大的牺牲者是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当然他不是被镇压的,而是被暗杀的。普遍认为,他的死是 30 年代大镇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政治需要。以基洛夫遭暗杀为契机,在苏联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党内大镇压,镇压从 1935 年开始,但用斯大林的话说,已经晚了 4 年。1936 年 9 月 25 日斯大林

《消息报》1992 年 10 月 13 日。

和日丹诺夫给莫洛托夫等的电报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地紧急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胜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破获此案延误了4年。”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了，目标首先是除去现实的竞争者，于是像基洛夫这样深孚众望的总书记的潜在竞争者就在劫难逃了。斯大林不会忘记党的十七大上出现的撤换他的企图，他说过，“只有敌人才会说，免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基洛夫之死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下一步就是回过来同过去的论敌算旧帐，把已成为“死老虎”，但斯大林仍感到某种威胁的20年代的反党派彻底消灭——不仅是政治上打倒（这一点早已做到），而且还要肉体上消灭。于是在基洛夫暗杀案之后，随即开始了对原新反对派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逮捕和审讯。这些审判又为下一步清洗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原“右倾分子”做好了舆论准备。苏联法学家乔姆施金认为，对公认的党和政府最著名的活动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是斯大林在党内彻底树立自己的无限统治权所需要的。因为他俩在一系列观点上不同意斯大林，他们还是当时还活着的为数不多的列宁近卫军，有勇气作出自己的判断，还敢同“人民之父”顶嘴。他们尽管已被排除出领导核心，但依然在党内外，以至在国内外交有很高的声誉。当然，在随后的镇压中还消灭了一批握有实权，但并没有反对斯大林的人物，如军界的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在当时的

罗·亚·麦德维亚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见《全苏历史学家会议》，莫斯科1964年版第291页。

见《苏联大清洗内幕》，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95—196页。

政坛上,他们已经是第二流的人物了。

布哈林案件不仅仅是 1938 年 3 月的那出公审闹剧,它至少应从 1936 年对布哈林的正式审查算起,其中包括对布哈林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 1937 年 2—3 月召开的全会。

对布哈林在 1938 年审判案中的表现,一般还比较了解,但不大清楚的是为什么布哈林在法庭上有那种表现。至于布哈林在党内法庭——中央全会上的表现则鲜为人知。今天已无需去证明布哈林无罪,这一点历史法庭和苏联法庭已作出明确无误的结论。现在的问题是要查明布哈林在各种审讯中的表现和态度,解释他的不同表现的原因。我们且改变一下顺序,先从结尾开始。

1938 年 3 月上旬,莫斯科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的审判案,这是苏联在 30 年代公开举行的一系列审判案中的第三大案,被告共 21 人,大多数是党政领导人;3 名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1 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拉柯夫斯基,4 名党政领导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沙兰戈维奇,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也夫,中央消费合作社主席捷连斯基,3 名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医生——卡扎科夫、列文和普列特涅夫,还有几名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处于特殊地位的是不久前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

审判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举行。全体被告被指控犯有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阴谋肢解苏联、从事破坏活动、暗杀基洛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谋杀列宁、图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等“滔天罪行”。经 11 天的审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决 18 人死刑,3 人长期徒刑。死刑于 15 日执行。

在法庭上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苏联检察官维辛斯基。此人

有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十月革命前他是孟什维克,1917年他以第一亚基曼区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无条件执行临时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命令,即搜查、逮捕并审判德国间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然而革命后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他已经爬上苏联检察官的高位,继续他的老本行——审讯老布尔什维克了。在审讯中此公极尽诡辩、胡搅蛮缠之能事,在堂堂的公堂之上拿不出过硬的铁证来证明被告的罪行时,就破口大骂布哈林是什么“万恶的狐狸和猪的杂种”——这在苏联的政坛上是颇有特色的语言,后来日丹诺夫在攻击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时用的也是这样的造句,称她是什么“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在这场审讯中的另一个主角或“主犯”显然是布哈林,无论从他在俄国革命史上的作用来说,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来说,还是从在法庭上的表现来说,都是如此。由于布哈林今天已经获得彻底平反,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论证他是无罪的,更没有必要去论证30年代的审判案纯属假案和骗局,需要的只是看看当年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颇耐人寻味的。从审讯记录可以看出,布哈林在法庭上并非一只驯服的羔羊,他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为自己同时也为同伴辩护,在不动声色的状态下,同检察官维辛斯基进行了一场舌战,并且往往使得检察官狼狈不堪。在法庭上他始终是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的全部“罪行”,但接着就一条一条地予以具体否定。他承认自己是“右派和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接着就指出,要结成一个匪帮,其成员应当“相互认识”,

见《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而且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成员沙兰戈维奇、马克西莫夫、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等人素昧平生，有的甚至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同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捷连斯基讨论过反革命的事。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这样，布哈林只不过是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承担空头责任而已。

这种一边抽象承认，一边立即具体推翻的例子是很多的。他承认“犯了组织一个阴谋进行‘宫廷政变’的罪行”，但马上声明，“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而且的确不知道”。他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负有责任”。但接着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他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但随即加上一句：“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关于搞破坏活动的指示。”

对另一些指控，布哈林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他在反驳给他罗织的诸如此类的罪名时，指责检察长“把有待于证明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接受下来”。他肯定，“在这个案子中，真正的逻辑完全在我一边”。由于一些被告对布哈林的指供是在逼供下提出的，而对布哈林的指控只是这些犯人的口供，布哈林指出，依据被告的招供定罪，“这是一条中世纪的法学原则”！这样，布哈林就向维辛斯基所信奉的“被告人的招供乃证据之王”的中世纪法学原则发起了公开的进攻。

见《真理报》1938年3月7、8日和布哈林的最后陈述。

布哈林在狱中写作的《哲学短篇集》开头第1章已经在同唯我主义者的辩论中准备了法庭辩论。这一章的标题是“论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兼论唯我论的诡计”。唯我论是“关于否定其余的世界和其他所有人的理论”。在布哈林的笔下,魔鬼靡菲斯特是唯我论的化身,他利用各种逻辑手段来论证了除了他的意识,什么也不存在。他的逻辑似乎十分严谨彻底,但其基础却是荒唐的哲学格言。唯我论者的特点是“死板的乖张行为,是孤家寡人的顽固不化,是智力单干户的极度贫乏和精神上的一无所有,是挤在小脑壳里的一个贫瘠的世界。”他没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发生联系,因为他就是一切。他是一个暴君,他的心灵不仅不向提出美的和伟大的东西敞开,而且也不向家庭和朋友敞开。靡菲斯特穷思极虑,用尽一切鬼蜮伎俩,否定外部存在和世界,否定其他人。唯我论者的立场是暴君的立场,这种立场片面武断,反人性,泯灭世界和个性,否定个人的生存权,极力使人回到愚昧无知的原始状态,“回到野蛮人的天真状态”。布哈林在哲学的论题下,揭露一个信奉唯我论的掌权人所具有的魔鬼的性质,他因蔑视世界和其他人,而使用暴力。布哈林自己承认,这一章具有政论的性质。

在法庭上,唯我论这个哲学题目也成了布哈林同维辛斯基辩论的论据,成为一种证明事实存在的要求,这个事实与一个人的招供和认识无关。

在3月7日的法庭上,维辛斯基企图把布哈林同北高加索的农民暴动扯在一起。下面是法庭上的一段话:

“维辛斯基:你的同谋者在北高加索和境外的哈萨克白俄集团有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讲了这件事,斯列普可夫也讲了这件事。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

布哈林:如果李可夫讲了这一点,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您能不用哲学语言回答我吗？

布哈林：这并不是哲学语言。

维辛斯基：不要用哲学语言拐弯抹角地讲话。

布哈林：我已经拿出了我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说明。

维辛斯基：您是在对我说‘不是’。

布哈林：我不能说‘不是’，也无法否认有这件事。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不置可否？

布哈林：并非如此，因为事实是存在的，不管它们是否被什么人意识到了。这是外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我不是一个唯我论者”。

布哈林的出发点是，起诉必须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仅仅依靠口供定罪是中世纪的法学原则，因此这场审判就其实质而言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正因为他不是唯我论者，所以他强调，被告的承认不是必要的，必要的是事实。侦讯和指控必须依据的正是事实。

这样，实际上布哈林就成了一个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间谍，没有背叛行为的叛徒，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不过不管怎么说，布哈林还是承认了加于他头上的种种“污秽”，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尽管这在 30 年代的审判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并且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这些了。然而，布哈林所做的抗争毕竟是一种“跪着造反”！这不是布哈林本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他没有像他的难友克列斯廷斯基那样利用法庭这个讲坛去翻供，去公开揭露非法的逼供。克列斯廷斯基在出庭受审的时候，曾公开否认对他起诉的全部罪状，拒绝承认他以前招认的供词，他声明自己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也没有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过，等等。为此，法庭不得不中止审判。当然在下一次出庭时，

他又承认了一切。

而当年在沙皇的法庭上,布哈林他们都曾经英勇无畏地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可以说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老手。这种反常的现象,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有的认为,出现在法庭上的并不是布哈林本人,而是替身。有的认为,布哈林出席法庭之前服用了某种药物。例如布哈林的中学同学爱伦堡曾出席旁听对布哈林的审讯,他觉得好像是给布哈林用了什么药了。他看见每过一段时间卫兵就把布哈林领出大厅,过几分钟再回来。而其他被告没有出现过此类情况。爱伦堡估计是给布哈林打了瓦解其意志的针剂,因为他们最怕的是布哈林。另一种看法是“掉包”计。克列斯廷斯基当庭翻供之后,第二天再出现在审判厅的时候,据目击者说,看起来完全换了一个人,肯定已不是克列斯廷基本人了。当然,还有使用刑讯的可能。原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 1956 年提供证词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严刑拷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没有一块好肉。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 3 天”。苏联最高检察官 1988 年 1 月 21 日提出的抗诉书中写道:“通过威胁、暴力和欺骗手段迫使被告人提供了针对自己和他人的假口供,审讯和说明的记录是事先写好的,并作了任意修改”。上述各种手段很可能都用过。问题是对布哈林采取了什么样的逼供手段。

用药物看来还是难以解释。因为布哈林在法庭上答辩清楚,思维敏捷,处处显露出布哈林所固有的机智,甚至不乏幽默。

《旗》1988 年第 10 期第 142 页。

《苏联大清洗内幕》第 196 页。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一个受药物控制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像布哈林这样的政敌,斯大林也未必愿意让替身出庭受审。苏联有一位作者认为,从目前所知道的材料看,未必可以认为斯大林会同意用替身来演戏。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他需要的是复仇并且静观猎物在他的复仇的火焰中挣扎。

现在我们知道,在最初的一些审讯中,布哈林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和违法活动(这些审讯纪录没有归卷,被藏在特别档案库,直到1961年才被发现)。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布哈林在另一种场合下的表现,这就是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表现,尽管那时他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但他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还拥有合法的发言权。所以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对种种诬陷不实之辞,他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就在这次全会上布哈林在谈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声明,他要用和承认错误同样大的力量“去坚决否认强加于我的罪行,并且以后也要永远予以否认。这不仅是因为具有个人意义,还因为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承担额外的东西,特别是当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我个人不需要的时候。”当会场有人以关进监狱相要挟、要他招供的时候,他回答说:“你以为你喊关进监狱,我就会有另一种说法?我不会说的。”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提出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

尤·费奥法诺夫:《恢复事实真相》,见《苏联大清洗内幕》第220页。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17页。

陷自己的。”

莫洛托夫回答：“把你逮捕了，你就会招供了。法西斯报刊报道说，我们的审讯案是一种挑拨离间。否认自己的罪行，您这就证明，您是法西斯走狗！”

1937年2月20日布哈林给政治局一份由两部分组成的近100页的声明，回答了“各种供词中包含的弥天大谎”。他在给政治局的信中写道：“我再次以在我守护下死去的伊里奇的最后一息，以我对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引注）的热爱，以我最神圣的一切向你们发誓：所有这些恐怖活动、暗害行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等等——都是对我最卑鄙的诽谤，闻所未闻的诽谤”。他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直到撤销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他声明，他的绝食是针对诽谤者的，而不是同中央作斗争。因此，他仅把绝食的声明通知政治局，而要求不向中央全会通报。但他要求，把他给中央全会的声明告诉全体与会者，他说，“对此我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从1937年2月21日夜零时起布哈林开始绝食。

布哈林给中央全会的声明是他的一份相当雄辩的辩护书。

针对大量伪证的出现，布哈林指出，“这些数量相当多的诽谤性证词出笼的原因是，在托洛茨基匪徒所造成的目前这整个气氛中，在某种政治方针下，在了解了已有的证词的情况下，后来的假证人认为，他们大体上也应当这样来作证，于是一个假证人出笼了，而且逐渐增多。”这里如果把“托洛茨基匪徒”换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完全符合实际了。

接着，布哈林对各种证词所提供的伪证逐一予以驳斥。在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63—64页。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65页。

今天,花时间去读那些大量的伪证实在没有意思,它们早就被历史和事实所否定了。同样,再去读布哈林所作的反驳,也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读它,只不过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场在庄严的中央全会和国家法庭上上演的一场场闹剧而已。

拉狄克在证词中说,布哈林在巴黎会见唐恩时,“把存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存在右倾组织及其纲领等情况告诉了唐恩”,并要求孟什维克中央同布哈林等联系,而一旦联盟垮台,请求第二国际开展一个声援运动,等等。布哈林就此声明说:“我是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与作为第二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唐恩会见的,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在这些会见时都在场,他们能够证实我就党委托我办事与唐恩交涉得不错。”

拉狄克在供词中说,存在一个“右倾中心”,其内部还有分工:布哈林和乌格兰诺夫抓恐怖活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抓破坏活动。布哈林反驳说,从1932年起,他对乌格兰诺夫的“生死存亡”都一无所知,而在基洛夫遇刺前和后,他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见过一次面,“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同他们谈话和讨论任何问题”。

尽管供词是经过精心炮制的,然而还是矛盾百出。例如,“托洛茨基中心”成员之一索柯里尼柯夫交代说,托姆斯基代表右派参加了“托洛茨基中心”,并且是以3人的名义参加的。但是,他在法庭上却说,右派没有参加中心,他们声明,即使他们一切都赞成,他们还是想保存自己独立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并只与联合中心保持联系。布哈林由此得出结论:“就是说,一个索柯里尼柯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是庭审时听到对质的检察

官不能不予以驳斥的骗人的花招”。另外两人——拉狄克、皮达可夫对参加中心的人员又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布哈林完全有理由质问：如果案件中并没有夹杂某些不真实的、骗人的东西，那么托洛茨基中心的4名著名成员中能有3人对中心本身的人员组成这一重要的政治组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吗？这无非是在撒谎前没有来得及统一口径。当人们成立一个由4—5人参加的、非常秘密的小组时，其中的4个人中竟有3个人完全不知道是否还有第5个人，尤有甚者，这3个人对第5个人是谁又各执一词，这是十分荒唐的。“由此可见，不确定性是有的，这不是客观情况不确定的结果，而是主观上对如何诽谤没有统一的口径造成的结果。”

皮达可夫在转述加米涅夫的话的供词中说，托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纲领，其共同目标就是推翻斯大林并消灭斯大林制度，放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相应地改变经济政策。布哈林对此批驳说，“任何一个略微认真研究过党史和反倾向斗争史的人都知道，我纵然犯过种种错误，甚至有重大罪行，但在各个时期都是这一理论的激烈反对者”。布哈林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说这种话，实际上在20年代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多少说出点道理来的，也就数布哈林了。对比一下布哈林和斯大林当时的言论就可以看出，布哈林在说理，而斯大林则是戴帽子，并没有提出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据。

关于“中心”问题，布哈林指出，他们从来没有用过“中心”（ ）这样的字眼，更不用说“右倾中心”了，即使在1928—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88—89页。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90页。

1929年当时事实上存在“三人团”的时期也没有用过。乌克兰诺夫供认，“领导至今存在的右倾分子组织的是全联盟中心。参加中心的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施米特和我乌克兰诺夫”。布哈林声明，从1932年起，即将近5年，乌克兰诺夫从来没有见过我。他怎么能证明我加入中心至今呢？这完全是为了迎合已经提出的指控而制造的诽谤。而在中心内部成员的分工上也是各说各的，拉狄克说布哈林负责恐怖活动，李可夫负责破坏活动。科托夫则认为整个恐怖活动由李可夫集中负责。这充分说明他们在捏造时没有统一好口径。库利可夫在交代他同布哈林谈话时说，布哈林下达了暗杀的指令，但他在对质时说的是杀害卡冈诺维奇，而在审讯时说的却是杀害斯大林。这是同一次谈话的两种说法。而对质和审讯只不过相隔一天而已。布哈林提出，必须揭穿此类诽谤手法并加以惩罚，“因为这类事对国家构成了直接的危险”。关于宫廷政变也是说得五花八门。蔡特林说布哈林是宫廷政变思想的创始人。而扎伊采夫则称李可夫是宫廷政变方针的创始人和主要执行人。布哈林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恐怖活动和宫廷政变没有技术上的细节，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手段，依靠什么部队和社会力量等等去行动。这样的“恐怖活动”和“宫廷政变”是完全不可能实施的。布哈林庄严声明：“在我一生的任何一个时期从未给任何人下达过也不可能下达过任何恐怖主义的指令。”“在‘三人团’真正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有过一点恐怖主义方针”。

当时对布哈林提出一项指控，说他是柳亭纲领的真正作者。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103页。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135页。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139页。

库利可夫供认,他曾在街头遇见布哈林,两人谈论了柳亭纲领问题。布哈林就此指出,他们的路遇是在1932年的春天,而那时谁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柳亭纲领,柳亭纲领是1932年6月制定出来的。他布哈林10月6日才从中亚休假回来,而这时候柳亭分子都已被捕,他布哈林在什么时候“赞同了还没有出笼的文件的呢?柳亭纲领我只在中央委员会里见过,是斯大林给我看的。如果我反对党,我自己会写纲领,而不必采用柳亭纲领”。关于柳亭纲领的作者,也是各种说法都有。斯列普可夫说作者是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兰诺夫,同时事先约定,一旦败露,就把纲领说成是柳亭纲领,以保护右倾上层。乌格兰诺夫认为,柳亭纲领的作者是柳亭、加尔金、卡尤罗夫。蔡特林则说,“这个柳亭起草的文件是经我们组织中心的布哈林及其他人同意后出笼的”。而库利可夫竟称,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极左分子与我们磋商后参与制定的。扎伊采夫认定,纲领的直接作者是柳亭、斯列普可夫和马列茨基。供词的这种混乱,是在逼供下胡编乱造的结果。现在已经清楚,柳亭纲领的作者就是柳亭本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时间上牛头不对马嘴的供词比比皆是。布哈林的秘书蔡特林称,他是“1926年参加右倾组织的”,“布哈林学派早在1925年就实际上开始反对联共(布)”。布哈林反驳说,任何一个对党史稍有了解人的都可以看出这些断言无知之极,1926年还没有任何右倾分子,他布哈林也不可能领导任何反党组织或反对派组织。据说,1932年9月,曾召开过斯列普可夫分子的代表会议,扎伊采夫供称,布哈林领导了会议,会见了会议的参加者。但是布哈林指出,会议期间他不是在天山的冰川上,就是在伏龙芝,至少不在莫斯科。因此既不能领导代表会议,也没有会见过与会者。

在 20 年代曾存在一个“布哈林学派”，蔡特林曾开了一个名单，计 18 人。对这个布哈林学派，早在 1928 年斯大林就打算予以消灭了。到 1932 年底，在种种罪名下其绝大多数人被捕。因此布哈林写道，从 1932 年底至 1933 年初我即使坚持反党观点，身边也没有“能用的人”。当然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布哈林重申：“我本人按照党性和捍卫党的路线的原则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消息报》全心全意地（而且是愉快地，尽管有诸多令人扫兴的不快和圈套）工作。我尽量不与任何原来的志同道合者见面”。

布哈林回顾了所谓右倾集团发展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28—1930 年。这是右倾产生并与党斗争的时期。这时期“三人团”的所有文件都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会或政治局）。一些中央委员的聚会绝不像现在供词中所描述的那样都是非法的、秘密的会议。多数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那里始终有充分的监督，而且大家都知道谁同谁常来往。布哈林和李可夫处还有肃反委员会派的警卫。后来就出现了“不具任何组织形式的”的“三人团”。在党的正式文件里，这个“三人团”以“布哈林同志派”出现。谁也没有加以掩饰。而现在却提出诸如谁加入了反革命组织的右倾中心一类的问题，“这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1930 年“三人团”投降了。“在‘三人团’实际存在（并不是虚构存在）的那一期间，从来没有过任何关于恐怖活动及破坏活动等等的念头”。第二个时期是从 1930—1932 年，是“彻底克服过去的观点和错误的时期，是反党斗争逐步结束的时期。内心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缴械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第三个时期从 1932 年至今，过去的一些联系，甚至一些私人联系都断绝

了。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联系越来越少,1934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1935年,1936年一次也没有联系过。这一时期是齐心协力、义无反顾地为党工作的时期。布哈林说,“在这一时期我对党和党的领导的态度已经没有丝毫两重性;即使过去也不能说我真的耍过两面派手法。”

布哈林在结束语中颇有感慨地说,“面对诽谤我只能孤军作战,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材料、机构及助手。但我确信,我只要有人力,并且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揭穿一大堆荒唐的诽谤性谎言,并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但是,这已不是事实胜于雄辩的时代,这是强权压倒公理的时代。各种诬陷不实之辞实际上并非出自被告本意,提供供词的人本身也是受害者,正如布哈林自己所说的:“有需求才有供给。”而这个需求显然不是来自被告,而是来自这整个大审判、大清洗、大镇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雄辩都无济于事,都注定要失败的。不过,从布哈林的辩护我们可以看出,在面对屠刀的时候,布哈林并不是一只羔羊,只要有可能,他就奋起抗争,维护自己的声誉。

对当时大量出现的伪证的原因布哈林作了分析。他指出,现在的形势,逼得人们对他诽谤中伤。“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不会讲真话,而是只说我的坏话,否则就会被怀疑为不老实。例如我现在很难找到辩护方证人(每个人都在想,干吗要牵涉进去呢?)而如果某个人一声不吭,什么都不说,那就说明他‘在掩盖罪行’。为了不被人怀疑包庇坏人,他就说话了。由于他非常清楚‘该’说什么(因为指控已定性,并且作为几乎已证实的罪行通过报纸传遍全世界),那么他也来‘定性’,何况还

是回答侦察人员直接提出的问题。因此,看来就产生了:1、大量的供词;2、这些供词中有许多东西如出一辙。这并不是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矛盾。尤其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要口径完全一致是很困难的。但矛盾往往能(当然不都能)揭露供词在说假话,通过对供词进行批判的分析就能予以揭穿(我再重复一遍,为此需要时间及最起码的心平气和)”。

在这封信里,布哈林始终采取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的态度,使他感到无能为力的是,他收到大量的供词,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详细的研究,因而也不可能提供详尽的答复。布哈林说,这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嫌疑犯或被告有权研究与他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是任何一个(正式国家的、党内的、政治的)诉讼程序中最起码的准则”。

布哈林也曾给斯大林写信,驳斥各种证词中的不实之词。1961年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拉林娜,在斯大林档案中有几封布哈林的信,反驳一些供词中对他的诬蔑,但没有李可夫的信。

在1937年2—3月全会上布哈林继续坚持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的这种立场,尽管这时候,他已明显感觉到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在全会上的发言是他给中央全会全体成员的说明的继续。在这里布哈林又提出了证词中的诬告问题。他说:“我个人并不事先先验地认为证词都是正确的。由于我觉得自己在如此这般问题上是全然无辜的,所以请允许我不是为这些证词辩护,而是摧毁它们。辩护的任务在于摧毁不正确的证词”。有人认为,摧毁证词就是攻击内务部。布哈林回答说,这不是对内务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120—121页。

拉林娜:《难忘岁月》,见《旗》1988年第12期第137页。

部的攻击,因为内务部不是证词的主体。它不必为证词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它不必为每一个证词的真实性负责。这是侦察的材料,还有待检验。针对某些人所谓反驳诸如莫洛托夫等人的话就是“反对中央”的论调,布哈林指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就不能作任何辩护了。他说,“我不想败坏任何人的名声,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尽我之所能为自己辩护,我有责任辩护,这不仅是我的责任,也是党的责任,因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我就有责任出来辩护。”布哈林认为在中央全会上同样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党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党的法庭”,在我们这里,“问题先按党的程序详尽解决,然后按苏维埃程序贯彻。”

在布哈林声明中曾提到所谓“布哈林反革命档案”问题。在审问布哈林的秘书蔡特林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知道你们的组织拥有档案,其中集中了反革命内容的文件?这是些什么档案?现在藏在什么地方?答:档案中有如下文件:1928年底起草的右倾组织纲领草案;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一个装有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材料的文件夹。一些信件,其中有斯列普可夫、马列茨基及我们组织的其他积极分子的来信……这个档案现在保存在布哈林的柜子里。事情很清楚,所谓反革命文件就是布哈林保存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文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却被揪住大做文章。

在中央全会上伊克拉莫夫又提出所谓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档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5页。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8页。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8页。

案问题,并对其中的一个文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个文件就是 1928 年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关于形势的提纲草案。布哈林就此回答说,那是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是我提交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很大的修改的初稿,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把这个草案看作反革命文件。其次,这个文件保存在档案中,这也没有任何错误,因为档案中保存的是同某一重要事件有关的全部文件。

全会的一些与会人员捕风捉影,千方百计地给布哈林罗织种种罪行。甚至在与案情毫无关系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布哈林在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中曾写道,“我再次以在我守护下死去的伊里奇的最后一息……向你们发誓:所有这些恐怖活动、暗害行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都是对我的最卑鄙的诽谤,闻所未闻的诽谤”。对布哈林的话,对他的誓言当然可以根据事实予以批驳,然而在全会上发言的人却抓住列宁是否在布哈林的守护下死去大做文章。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在会上提出质问,断言布哈林把一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他布哈林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守护下去世的。他写声明给中央委员会说,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说这个干什么?现在我来读一读报纸,季诺维也夫写道……(莫洛托夫:什么报纸,哪一天的?)这是著名的《真理报》,192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第 23 号。季诺维也夫在报上写道:“……医生证实了一切。而现在来电话了:‘伊里奇去世了’。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哥尔克已去世的伊里奇身旁——布哈林、托姆斯基、斯大林、李可夫病

《历史问题》1993 年第 2 期第 3 页。

《斯大林研究》1994 年第 3 辑第 63 页。

倒躺着……”

当时会场上出现了如下的戏剧性对话：

布哈林：伊里奇去世时在场的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佐里卡医生和我。对不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叶若夫：我给您读文件。

布哈林：我用双手扶着他——已去世的伊里奇，还吻了他的脚。

波斯蒂舍夫：也许你扶过死者。

布哈林：我那时是住在哥尔克！

波斯蒂舍夫：死者，这就是说，是在他死后了。

叶若夫：同志们，我举这个事实是为了说明布哈林企图用什么方法为自己辩护（波斯蒂舍夫：这是亵渎行为。梅日劳克：犹太当年也吻过。）他的学生们，他的密友们称他为“恬不知耻的政客”。我认为可以把此种行为说得更严重一些。我认为，这是政治娼妓行为，企图用任何方法和手段为自己洗刷，当面扯谎。当他开始读这些证词的时候，他公然歪曲文件。谁需要它？同谁互相呼应？（贝利亚：同敌人。）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一个严肃的党的中央全会上竟然拿这种问题做文章，可就有点不严肃了，何况列宁逝世才不过 10 多年，当时还健在的列宁夫人也在场，是很容易核实的问题。不过，显然也在会场的克鲁普斯卡娅没有说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不可能出来当众揭穿叶若夫之流在此类问题上所耍的把戏。

事情很清楚，只要布哈林的名字及经历同列宁联系在一起，

就无法消除布哈林在党内和国内的巨大影响,就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罪犯来审判。党内毕竟还有不少人还记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记得正是列宁把布哈林叫做“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必须割断布哈林同列宁的任何联系!

布哈林在各种场合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高尚的品质。他没有像某些被审查、被审问的人那样在压力下胡说八道,按照上面的意图去诬陷他人。除了对托洛茨基分子外,对其他人他不随意指控,拒绝谈论他们的问题。例如对那些他已多年没有联系的人,他拒绝对他们的证词作任何判断。他说:“关于他们我什么也不能说。理论上什么也不能排除。但是对我目前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我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非,因为我不熟悉他们,我已经不了解他们。我不能解任何一个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在会上,有人问布哈林对李可夫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布哈林回答说:“他说什么,那是他的事。他说是托姆斯基的过错,这是他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死了,就说是他的过错”。即使“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布哈林也不一概认为全部符合实际。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布哈林对托洛茨基是曾经怀有好感的,但自从1923年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两者的关系显然开始恶化。众所周知,布哈林是从理论上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力,而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斗争的时候,也是紧紧抓住布哈林的一系列言论作为靶子的。而在30年代两次有关托派的审讯案中,一些“托派分子”不断地对布哈林提出指供,结果是布哈林也被网罗进庞大的“反革命”组织,最后终于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出“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布哈林对托派的恼火和愤慨是可以想见的。

莫洛托夫问他：有过两个托派案件，被告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们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暗害分子，等等，可以相信这些供词吗？布哈林答道：可以。但一涉及具体的人时，布哈林就认为“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例如，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针对他的供词就不属实。布哈林表示不相信罗济特和蔡特林会搞恐怖。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地说话？因为我不习惯于简单地指责别人，说某某人从事恐怖活动，我认为‘属实’……为此需要哪怕某些资料”。

布哈林指出，有两类事实，一类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私下谈话。要推翻这类事实，只有对人说：没有这回事。另一类就是上述以外的事实。“这里要求仔细分析，对事实、矛盾进行比较，确定你那时不可能在那里”。只有这样才能予以推翻。布哈林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无可指责。

正因为如此，会上有人说他“就像所有被告的律师”。是的，布哈林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也尽一切可能为被诬陷的人们辩护，他维护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尊严，他也维护了自己的良心。其实，在那个恐怖年代，在那即使是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在高压之下即使有人说了不实之词，甚至诬陷他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布哈林从不轻易地给他人扣莫须有的罪名，他最多也只是给自己抹黑，给自己戴上各种帽子和罪名，不过，到全会为止，他连这一步都还没有迈出。在人性扭曲的30年代的大镇压的浪潮中，这种表现是不多见的。

“大事业”情结

布哈林为什么最后屈服,不顾拉林娜的叮嘱而给自己抹黑,承认加之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议论纷纷、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各种各样的猜测。如前所述,有的认为,布哈林是在酷刑逼迫下招供的,有的认为布哈林是以妻子家人的安全作为交换条件而屈招的。甚至有人认为出席受审的不是布哈林本人,而是他的替身。

在30年代的苏联监狱里,刑讯逼供是常有的事,甚至是一种常规。拉林娜在卢比扬卡监狱里曾遇到一个以间谍罪被捕的女林务员。审讯员要她承认从事间谍活动。她回答说,她只知道自己管区有多少林木,谁要这样的情报!审讯员问她,认识不认识布哈林?她回答说:“我怎么会认识他的,他没有来过我们森林。”别装疯卖傻,好像就没有听说过人民公敌布哈林。”听倒是听说过,有关于人民公敌的,也有关于过去的”。审讯员立即警告:“关于过去是什么意思?我要你丢掉这过去!关于他过去是什么人,必须忘记。布哈林3个月不招供,总是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干,像个泥塑木雕的菩萨那样坐在那里。而一把他关进特别室,他就开始招供了。把你关在那里,你也会招的。”

在审讯中使用刑讯在当时是合法的。1939年1月10日一个由斯大林签发的密电,说明从1937年起,联共(布)中央已批准在刑讯中使用肉刑。密电称:

“联共(布)中央说明,从1937年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实践

中采用肉刑是得到联共(布)中央的批准的……众所周知,所有的资产阶级侦探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使用肉刑,并且采用的是最残酷的形式。试问,对十足的资产阶级奸细,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明显敌人,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侦探机关要表现得较为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作为一种例外,肉刑的方法对明显的不缴械投降的人民敌人今后也必须采用,这是一种完全正确的、适当的方法。”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对布哈林使用肉体折磨的可能性。但是应当说,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只要看一下,从被捕到处决,在这短短的1年时间里布哈林写下了多少东西——长达20多个字数印张(每印张合4万个字母)的《哲学短篇集》、近400页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还有一扎抒情诗,何况这仅仅是他的“业余成果”,他的“正业”并非写作这些东西,而是书写更重要的“文件”——供词。可以断言,一年之内能给我们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的人,其身体遭受严重折磨的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

肉体的折磨对布哈林这样在革命前多次坐过牢的人也未必能起多少作用。有可能起作用的倒是精神和心理因素,或者说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布哈林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有人要指控自己,给自己抹黑。他指出在逼供的情况下被告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这些被捕的或受审查的人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既然对他们讲,你反正要被揭穿,你撒谎,你是两面派,他们就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他们承认点什么,自我诽谤,这对他们会好一些。于是就出现自我诽谤,给自己抹黑这种怪事。布哈林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对犯人施加精神压力的非法行为。

布哈林显然不是个会选择以自我诽谤来换取较好境遇的

人。如果说他屈服了,那一定有更充分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者根据。

有可能起作用的倒是精神因素,或者说精神的折磨。对布哈林这样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早就置个人生命于度外的革命家来说,有更大的包袱迫使他们在“自己的”法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这就是为革命的“大事业”而作出牺牲的难解情结。

当时的逼供经常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例如在中央全会上,当布哈林否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时,有人就指责他攻击内务部,否定对季诺维也夫案的审判工作,是同国外资产阶级报刊一唱一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莫洛托夫是这样对布哈林说的:“法西斯报刊报道,我们的审讯案是一种挑拨离间。否认自己的罪行,您这就证明,您是法西斯走狗!”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才能证明自己是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这就制造出一种怪圈,为了“大事业”的需要,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反革命,是搞暗杀的阴谋家,是外国的间谍,是法西斯走狗,而在你以接受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你就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镇压。这真成了颇有特色的“黑色幽默”——你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走狗,那就证明你是法西斯走狗,而如果你承认了,那你理所当然地就是法西斯走狗了。在两种情况下,你都应当作为法西斯走狗而被处决!

布哈林显然最终被迫接受了这种荒谬的逻辑。他在 1937 年 12 月 10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按照他布哈林的理解,之所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是因为,“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由于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于是有罪的人,有嫌疑的人,潜在的有嫌疑的人统

统成了清洗镇压的对象,使之无能为害。于是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举报,永远互不信任。这样领导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个逻辑显然太荒谬了,布哈林不得不声明,他这不是在含沙射影,而是真实的想法。他说:我已不再是孩子,我懂得宏大的计划、宏大的构想和巨大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斯大林说:“与首先落在你的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相比,提出我的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

布哈林在1938年1月写给拉林娜的绝笔信中也是以这个“论据”去说服她的。他对拉林娜写道:“给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的震荡。……一切都会发生的,正如伟大的重大利益所要求的那样。”

对所谓伟大的重大利益的考虑,就成了布哈林头上的解不开去不掉的紧箍咒,为了这个大事业的利益,他准备承认加之于他的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在这个大事业的名义下,他准备从容就义,但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家去就义,而是作为“叛徒”、“间谍”、“阴谋家”被处决。他在临刑前对斯大林的最后表白是向他保证:“我没有犯我在侦讯时曾承认的罪行”,“我既不是党的敌人,也不是苏联的敌人”。布哈林恳求斯大林发发慈悲,允许他在判决之前死去,免去那无法承受的羞辱,他要求允许他在囚室内自己服毒,而不是死在刑场上。“如果注定要我死去,请给我一盅吗啡。恳请满足我的这一要求。”他还想为自己的死亡做好亲属的工作,要求在审判之前同妻子见一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了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由于感到意外而去结束自己的性命”。显然,这时候他已准备承认要他招认的一切,但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287—289页。

《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是对这种做法,他需要向亲人解释清楚,求得他们的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事业”的需要,是献身于“大事业”!荒唐的时代,制造了荒唐的逻辑,而布哈林身处荒唐的时代,也只有接受这种荒唐的逻辑,按照荒唐的逻辑去迎接自己的末日!

从他被审查时起,他所担心的已不是他个人,他担心的是他的家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布哈林清楚,他们已成为斯大林手中的人质。

在《哲学短篇集》的第1章中布哈林这样别有所指地写道:

“镇静一些!激动有害健康。也不要抓住一个无辜的婴儿不放。因为他一点也帮不了你们,确实一点也帮不了。我们已经约定,这里只涉及大人,只涉及哲学。而如果一个成年哲学家觉得要淹死了,像抓一根稻草那样,需要婴儿的帮助,那也可以谈谈婴儿。”

同唯我论者相反,布哈林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否认朋友、家庭和子女的存在。他力图使自己的家庭脱离危险,他要唯我论者不要抓住婴儿不放,因为这是大人的事。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允许他同妻子和儿子告别,他写道:“请允许我同妻子和儿子告别。同女儿就不必了,她太可怜了,那样做对她的打击将会太大了,娜佳和父亲也一样。而阿妮塔,她年轻,经受得住,所以我想对她说几句最后的话。我请求能让我在审判之前与她见上一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了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由于感到意外而去结束自己的性命的。我应该做点这种准备。我感到这样做对于事业和官方的解释都是有利的。”布哈林在狱中给拉林娜写了一张便条:“不要为我担心。这里千方百计地在驯服我,照料我。”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290页。

请写信告知,你们那里怎么样?孩子怎么样?给尤拉照个相,给我相片。你的尼古拉。”1938年1月15日,在所谓“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即将开庭的前夕,布哈林给妻子拉林娜写了绝笔信,其中写道:

“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人做好准备。我既为你担心,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为你担心。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的。”

布哈林要求她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以及家人渡过这可怕阶段。他请求,在他这艰难的时刻,要用完成他的要求来帮助他。

他还担心,他的被捕和遭镇压会累及一大批党内外无辜的人们。他在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中写道:“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丝毫无罪的头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7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右倾反对派时期也从未曾有过的”。正因为如此,他在给斯大林的绝笔信中要斯大林相信他是无罪的,他写道:“只要一想到你可能认为我是有罪的,想到你本人会从心底里认为我罪大恶极,我的心中就热血沸腾。其后果会是什么呢?后果就是,我在亲自帮助消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也就是说,我是明知故犯地在干坏事!因此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了。我的脑子里

《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引自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纽约1974年俄文版第361页。

一片混乱,我想大声喊叫,我想用头撞墙,因为我造成了他人的毁灭。”这里布哈林是为自己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假证词而自责,他明白,他的这些招供将为开展更大规模的镇压提供根据,从而使更多的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他希望斯大林承认他无罪,他不是以此要求他个人因此得以平安无事,得以自保,他清楚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斯大林承认这是一桩假案,从而不去追究被指供的其他人。究其实,这里的罪魁祸首决不是布哈林,但是他希冀自己的牺牲不致招致更多的无辜者的灾难。

综上所述,看来促使布哈林最后屈服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为“大事业”而牺牲,另一个是期望以自己的屈服换取家人以及其他人的安全。这一点也许布哈林同什么人达成过某种协议或者默契,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猜测,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证实。何况在布哈林被捕之后,布哈林的家人并未得到安全,而布哈林一案也确实招致了一批人人头落地!应该说,布哈林所作出的牺牲并没有为“大事业”、为他个人以及家人换来什么好处。

和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布哈林同斯大林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两人之间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也有过在政策和路线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而经过这种大起大落之后,在30年代之初开始了相对平静的工作阶段,尽管布哈林在这个阶段还得不断地做检讨,但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布哈林再也没有公开提出异议,相反地,布哈林从30年代中期起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斯大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288页。

林,他同斯大林已经没有分歧。他甚至向斯大林表白自己对他的“依恋”!

1936年布哈林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表白说:“最近这些年来,我始终是怀着极为忠诚的信念来捍卫党的政策和柯巴的领导的,只是我没有搞阿谀奉承”。

布哈林在给未来一代领导人的信中说,“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他在给斯大林“亲启”的绝笔信中更是表白说:“多么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心底里对你的依恋。”他惋惜斯大林因为失去他(布哈林)而“失去真正最有才干、忠实于他的将军”。在信的结尾写道:“现在,在你柯巴面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恳求你给予我最后的宽恕(仅就心灵而言,别无他意)。我因此在脑海里将你拥抱。永别了,我这个不幸的人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原谅吧!”这样,我们看到了布哈林在临刑前的独白,在这时候他对斯大林除了认为他有一种病态的多疑症外,没有往更坏的地方去设想。他临死前不但没有诅咒斯大林,反而请求斯大林原谅!这种现象颇值得研究。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这封绝笔信公布之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许多人不理解,布哈林为什么对自己的杀星持这样的态度。为弄清这一问题,还得回顾一下布哈林同斯大林的关系,或者说,除了我们已经评述过的争论和分歧以外,再补充一些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布哈林同斯大林认识当从1913年开始,这年初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文章赴维也纳收集资料。但他不懂外语,幸得布哈林帮忙翻译,才算圆满完成任务。这时他们没有特殊的交情,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纽约1974年俄文版第362页。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292页。

但有了交往。应该说,在开始的阶段布哈林同列宁以至托洛茨基的关系都要超过同斯大林的关系。据托洛茨基说,1922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病倒的时候,布哈林去看托洛茨基,对他说:“别生病,求求您,别生病……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死去总感到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但从1923年底斯大林开始了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之后,布哈林同斯大林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政治上和组织上,布哈林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理论斗争方面斯大林则需要仰仗布哈林。例如,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遭到“新反对派”的猛力攻击,特别是他的“发财吧”的口号。正是斯大林在大会上全力保护布哈林,他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质问新反对派:“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

不过,就是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对反对自己的言行也是不能容忍的。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民族路线,主张把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并转述列宁的话说:“我们作为前大国民族应当制止民族主义的要求并在对民族潮流作更大的让步的意义上使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在我们有意使自己处于比其他民族更低的地位这种政策下……我们才能换取过去被压迫民族的真正信任”。这段话当时触到了大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斯大林的痛处。他在总结报告中称之为“胡说八道”：“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俄文版第207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0号第24页。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1923年版第464—467页。

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这里斯大林借批判布哈林来批判列宁，这且不说。要知道，那时候布哈林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首席理论家！布哈林当时不管是反对托洛茨基，还是反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民族政策，都是出于公心，为的是贯彻列宁的方针路线而不是为了谋求一人、一派的私利。

不过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一致是基本的。直到1928年，观点的一致和相互的需要使他们的关系达到最佳状态。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需要借助于布哈林这样理论功底深厚的理论家。众所周知，斯大林是拉一派打一派的行家，他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去打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和李可夫去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直到打倒了这两大对手之后，他才动手去收拾最后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个“右倾反对派”。而布哈林在贯彻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也需要得到斯大林铁腕的组织支持。布哈林是一介书生，既缺乏组织能力，更缺乏行政经验，他的想法只有依靠斯大林的行政组织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这种互相需要是两人联盟的基础。这一时期确实可以说是两人的“蜜月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布哈林在对待反对派，实际上是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表现出来的某种过火倾向——他以自己的威望帮助了斯大林对异己思想和倾向的无情打击。这种做法到了1929年终于使布哈林本人也尝到自己参与酿造的苦酒。1928年开始出现分歧，当时斯大林还想把布哈林哪怕暂时地拉到自己一边。在争

论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把布哈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们两人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是微不足道的。斯大林当然知道布哈林的价值,至少他希望在焦头烂额的粮食危机和党内的不满之中能暂时把布哈林稳住。当布哈林公开了斯大林的这句话时,斯大林又指责布哈林造谣,唆使其他政治局委员去反对他。

从布哈林在这一年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某种看法,例如他对加米涅夫说,他已同斯大林决裂,他谈到了撤换斯大林的问题,甚至说斯大林“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是“分裂分子”,他“除了保持权力,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有时作让步,是为了把住领导权的钥匙,以便以后消灭对手。

对 1928 年开始的斗争,布哈林把它看作是一场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斗争,而斯大林则除了为自己的路线斗争外,还有除去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对斗争的结局,斯大林并不以自己在党内获得多数为满足,他还要失败的对方名声扫地,为此他要求对方不断地承认错误,无休止地忏悔,并承认他斯大林是伟大英明的领袖,是今天的列宁……对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样一些列宁的战友来说,要他们驯服到这种程度殊非易事,只有靠反复的打击、羞辱、抹黑才能达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彻底投降了。在布哈林身上斯大林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托姆斯基以死抗争。托洛茨基则利用他流亡国外的条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来揭

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6—170 页。本引文根据米·库恩·米克洛什:《布哈林及其敌友》,莫斯科 1992 年版校订。

露和攻击斯大林，他也为此招致杀身之祸，死于苏联特工的手下。

不过在 30 年代初期，布哈林尽管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但给他安排的工作还算不错。应该说，他在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下面工作是心情愉快的，他得到奥氏的尊重，在科研规划和制定五年计划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斯大林是不会放过他的，在这一时期“右倾分子”所受到的批判甚至要超过托派分子。布哈林必须随时准备做检讨和忏悔。这时候在政治上布哈林同斯大林已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他未必会同意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久前的分歧自然记忆犹新，而且斯大林路线的恶果已得到相当充分的暴露。但面对这一切，布哈林保持沉默。用他后来的话说，既然桌子已经做好了，再去争论用什么材料做桌子腿已没有什么意义。

在私下的场合或者在较小范围内，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态度同公开的场合有所不同，关系应当说还过得去。布哈林是力求和解的。1930 年 1 月 1 日晚间布哈林和他的战友李可夫、托姆斯基手提葡萄酒专诚来到斯大林的寓所向他祝贺新年，表示和解。他对斯大林始终用他党内的化名“柯巴”相称，在对话中用你，而不称您。特别是布哈林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以及他的一家有着良好的关系。阿利卢耶娃对当时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同布哈林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恐怕是招致她 1932 年 11 月自杀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在妻子自杀之后，甚至还同布哈林对换了住宅，原因是继续住在那里他受不了。而当布哈林和年轻的姑娘拉林娜结婚的时候，斯大林在深夜给布哈林打来了祝贺的电话：“尼古拉，我祝贺你！你在这方面也超过我了。贤慧的

妻子,漂亮的妻子,年轻的妻子——甚至比我的娜佳还年轻!”

1934年夏季布哈林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了颇受欢迎的报告之后,斯大林祝贺他作了个“很好的报告”。

1934年斯大林在观剧时同布哈林在休息室长谈达一幕戏之久,斯大林向布哈林回忆了自己的妻子。这以后不久,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

1935年春,布哈林出席军事学院毕业生晚会。斯大林举的第一杯酒不是为军人,而是为布哈林干杯:

“同志们,让我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热爱他,而谁要是老记住过去的事,那就请他滚蛋。”

1936年由斯大林提名,布哈林被派遣出国去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商谈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档案事宜。

这一年的十月革命节,布哈林持《消息报》的请帖出席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和游行的观礼。诚然,是在普通的观礼台上。然而不久卫兵奉斯大林的命令请他登上列宁墓去观礼。卫兵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让转告您,您站的不是地方,他请您上列宁墓去。”

斯大林的这一切做法,也许出于真心,也许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私人关系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193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对两人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李可夫走近

《旗》1988年第10期第140页。

《消息报》1992年10月3日。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270页,《旗》1988年12月号第143页。

布哈林说：“应当动员一切力量同诬陷做斗争。托姆斯基的自杀加剧了局势。”

但布哈林却回答说：“应当说服斯大林改变主张，否则毫无用处。”到这时候布哈林仍然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内务部出了问题。当然，此话也可以理解为，布哈林认为关键在斯大林。

全会最后是斯大林讲话，他表现得并不那么极端：

“同志们，不要急于做决定，侦查机关也有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但我们搞清楚了，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现在可以安心工作了。”

我认为，李可夫也许知道点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但没有向党报告。至于布哈林我对此表示怀疑。对党来说，谈论像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一些过去有如此威望的同志的罪行，是非常沉重的。因此，不必急于做决定，同志们，我们要继续侦查。”这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说：

“柯巴，应当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成立一个委员会去检查一下那里搞些什么名堂。在革命以前，在革命期间，以及在革命完成以后的困难年代，我们只为革命服务。而现在，在困难已经消除的时候，你竟相信这些诬陷的供词？想把我们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吗？醒醒吧，柯巴！”

斯大林则回答说：

“怎么，你想谈自己过去的功绩，谁也没有把它们从你的身上剥夺去，不过，这种功绩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有这么多的革命功绩，这仅在我们之间说说，我们之间说说。”

一天,布哈林住宅来了3个人,要“布哈林同志”搬出克里姆林宫。这时候,突然来了斯大林的电话:

“你那里怎么啦,尼古拉?”

“让从克里姆林搬出去,我对住在克里姆林并不感兴趣,我只要求有一个能放下我的藏书的地方。”

“你让他们见他妈的鬼去!”斯大林回答说,放下了话筒。

来人听到了斯大林的电话,走了。斯大林的电话来得那么及时,很像是事先安排好的。

1937年2月布哈林在绝食的状态下出席了中央全会。进入会议厅,布哈林因头晕而摔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

“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这是斯大林在逮捕布哈林之前4天给予的保证。

当全会设立的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委员会表决处理决定的时候,叶若夫提出的决议案是: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军事法庭并处以极刑——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亚基尔等人也跟着主张枪决。这是一种完全无法无天的主张,它让党的中央全会行使国家法院的职能。既然中央全会这个党的机关有权决定人的生死,可见所有以后的什么审判无非是把事先写好的剧本搬到舞台上而已!在一片喊杀声中,斯大林提出的方案却不用“枪决”的字眼,而是提议“撤销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转送内务人民委员部”。此提议同移送法庭予以枪决的提议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区别,但它毕竟显得温和一些,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较为符合法制。

可以看出,在众多的场合,斯大林并不以极端的面目出现,可以说,他是以中间派的调和的立场出现的。他的这种表现在一定的程度上多少会赢得布哈林的某种好感,而把当时的镇压浪潮看作是内务部出了问题,因而多次要求审查内务部机关的工作。布哈林最多只是怀疑斯大林有一种病态的多疑症,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了解真相上。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说,斯大林对布哈林是又爱又恨。同样可以说,布哈林对斯大林也是又爱又恨,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给斯大林写了如此这般的信就可以理解了。正因为如此,他最后替斯大林惋惜的是:“你因为失去我而失去了一个最有才干、真正忠实于你的将军之一。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记得马克思曾写道:亚历山大一世因巴克莱·德·托利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白白失去了一个助手。回想这些事是令人痛苦的。”

这种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身上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许多人都希望斯大林能过问他们的案件,使案件得以公正解决。例如,拉狄克希望他的案件能经斯大林的手。1936年8月22日托姆斯基自杀前写信给斯大林,还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战友”,信中说:

“我写信给你,不仅是写给党的领导人,而且是写给老战友,我的最后一个请求——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的无耻诽谤,我从来没有同他一起参加过任何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阴谋。”

他显然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季诺维也夫的“无耻诽谤”是怎么

《斯大林研究》1994年第3辑第291—292页。

《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炮制出来的。而他的“老战友”则接着逮捕了他的妻子，枪毙了他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也遭到迫害，在这以后瘫痪了将近十年。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到，1938 年被捕的埃赫也是一再给斯大林写申诉书，其中写道：“我决没有背叛您，也决没有背叛党，我知道，我正在走向死亡，那是由于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对我进行挑衅和捏造的家伙的卑鄙无耻的暗害”。联共（布）中央另一位著名活动家鲁祖塔克被捕后在军事法庭上声明：“被告在军事法庭上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未被肃清的骨干分子，他们炮制出离奇的事件，强迫无辜的人做口供，而我们则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口供制造出来的犯罪案件毫无关系这一事实。”

可以看出，当时绝大多数无辜遭镇压的人最多只是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内务部出了坏人，或者是托洛茨基分子在进行挑拨活动的结果。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布哈林也未能例外。

布哈林口授并由其妻子拉林娜熟记在心头的给未来一代领导人的信历来被看作布哈林的政治遗嘱，尽管在这以后我们还读到他给斯大林的信，以及经过半个多世纪才交到收信人手里的他给拉林娜的绝笔信。应该说，作为政治遗嘱的这封信写得极为感人，但就在这封信里贯彻始终的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在信里说的是他在“恶魔的机器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而此机器不是别的，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请看：“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就其多数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从事最卑鄙的勾当，而他们不懂

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鄙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和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的。”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布哈林认为是一个什么万能的机器在支配一切,统治一切,连斯大林本人也处于它的控制之中,他没有看到,是谁在支持这个万能的机构,这个机构决不是自成系统的独立王国,它最多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从两任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和叶若夫的遭遇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虽然能够逮捕以至处决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远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出于某种需要,他们可以得到升迁,出于另一种需要,他们也会被送上断头台。如果要寻根问底的话,那么应该说,造成这一切不正常现象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及其一手缔造的极权体制,这个体制取消了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使政治局以至中央委员会形同虚设,使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面对破坏党纪国法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无能为力。其中不少人先是赞同对其他人的镇压,然后这镇压的利剑又落到自己的头上。

应该说布哈林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这种体制的创建。这就是在 20 年代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他的某些明显过火的言论,把本来属于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轻易上纲为派别活动,其后果就是当他自己后来同斯大林发生争论时,这种做法被如法炮制,应上了请君入瓮的典故。他和李可夫等人在政策上与斯大林的不同看法,被指责为派别活动而遭严令禁止。以后又成为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主要根据之一。凡此种种,可以说布哈林本人也是始作俑者之一。

在苏共中央的档案里有一篇叶若夫早在 1935 年已着手写作的“理论著作”《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其中包含对“右

派”的所有指责。斯大林亲自修改了这部“著作”。可见从这时起斯大林已开始策划整布哈林了。

时间还可以再往上推。1928年底或1929年初,在政治局会议后布哈林偶然在地板上捡到斯大林在会议期间手写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应当消灭布哈林的学生们。”这就是说,早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动了杀机。对这些东西,有的布哈林并不知道,有的尽管知道,但作了另一种理解。例如对于那张条子,布哈林认为“斯大林是想通过把他们同我隔开的办法使他们不再成为我的志同道合者”。直到1937年他才看到,“现在我不排除要把他们统统枪毙”。

1938年3月在临刑前布哈林在内务部的监狱中先后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两封赦免请求书。两封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第一封详细一些,内容如下:

“我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赦免。我认为法庭的判决是我所犯的反对苏维埃祖国、反对它的人民、反对党和国家的滔天罪行应得的惩罚。对此我内心毫无反对之意。为我的罪行应把我枪毙十次。无产阶级法庭作出了我罪有应得的决定,我准备接受我所应得的惩罚,并在我卑鄙地背叛的苏联伟大英雄人民的正义愤慨、仇恨和鄙视之中死去。

如果说我现在还敢向我跪对的我国最高政府机关提出请求,那只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能得到赦免,我还能对国家有用;我不说,也不敢说,我能够赎回自己的罪行:我所犯的罪行是如此之可怕,如此之大,我的余生无论怎么做,都不足以赎罪。

不过我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保证,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促使我作了反思和重新审视,连我本人也怀着愤慨和鄙视的心情看

待自己的罪恶的过去,现在它在我的头脑中已荡然无存了。我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和宽恕,这不是由于对我所应得的惩罚的恐惧,也不是由于对我所面临的作为正义的报复的死亡的畏惧。我的内心已解除武装,并按新的社会主义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我重新思考了所有的问题,从我的理论错误开始,它起初是我个人错误倾向的基础,后来则越来越成为可怕罪行的基础。我一步一步地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生。过去的布哈林已经死去,他在地球上已不再存在。如果能赐我一命,我还会为社会主义祖国做点好事,而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在单人牢房,在集中营,在北极,在科雷马——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行。我还有知识和能力,保存了完整的头脑机器,过去它的活动实际上都用于犯罪方面了。

现在此机器已转向新的轨道。我想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工作。我在监狱里写了一些著作,它们证明我已完全解除了武装。不过我也能不仅仅在纯科学领域工作。因此我斗胆向你们,政府最高机关,请求宽恕,理由是我有工作能力,并期待从革命的适宜性来考虑。如果我已丧失工作能力,那就不值得提出请求,我就会期待尽快地执行死刑,因为如果那样,我就没有理由提出请求。作为解除了武装,但没有用处、没有工作能力的敌人,我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用我的死作为他人的教训。

正因为我有工作能力,所以我斗胆向政府请求赦免和宽恕。我们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党和政府实行了总清洗。反革命已被镇压,无能为害。社会主义祖国迈着英雄的步伐,走向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斗争的舞台。在国内,在斯大林宪法的基础上正在发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伟大的富有成果的创造性的生活蓬勃发展。请给我机会哪怕在铁窗内力所能及地参与这种生

活！我请求，恳求你们，让我哪怕部分地参与这种生活！请给新的第二个布哈林——哪怕叫彼得罗夫也罢——以生的机会，这个新人将同已经死去的完全对立。他已经诞生，请给他做点什么工作的机会。我为此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请求。旧我已永远地、永不复返地死去。我很高兴，无产阶级政权粉碎了所有把我看作首领、而我确实是首领的犯罪行为。我坚信，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必将越过伟大的历史界线，而你们将不会抱怨我的赦免和宽恕请求；我将竭尽全力向你们证明，无产阶级的这种宽大为怀的做法是正确的。”

1925年在党内争论中，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抓住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不放，大做文章。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正言厉色地为布哈林辩护。他问道：“他们对布哈林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要求布哈林的血。”斯大林接着宣布：“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斯大林的保证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是的，斯大林没有把布哈林的血给予“新反对派”，但是10多年以后，布哈林毕竟还是没有能保住自己身上的血！

全党喜欢的人物

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给予布哈林以高度评价，说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他所以能成为“全党喜欢的人物”，除了他对革

转引自库恩·米克洛什：《布哈林及其敌友》第465—466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0号第24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命所作出的贡献、他的高度的原则性等等因素以外，还因为他博学多才，性格随和，平易近人。

1928年出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对布哈林的性格有很生动的描写。其中写道：

“在联共(布)队伍中布哈林居于一个首要的显著地位，是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他像水银一样灵活好动，他酷爱生命的一切表现，从极其抽象的新思想直到打棒游戏。他的谈吐和文章‘顽皮淘气’，对自己的私生活极端严格，而对同志们的小缺点却态度宽容。他是个尖锐的、无可反驳的雄辩家，而在同志关系上却温厚随和。此外还应加上极端真诚，诙谐机智，在多种多样的知识领域博闻强记，善于迅速领会别人的思想，并且永远乐天愉快。所有这些品质使布哈林成为俄国革命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布哈林的头脑具有鲜明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布哈林是从考察经济的理论问题开始自己的著作活动的。在这一领域布哈林是罕见的巨匠。布哈林能对他所接触的任何理论问题提出有趣的见解。……布哈林思想的抽象性质一方面是他的巨大长处，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他的弱点。布哈林专心致志于思想的抽象发挥，而对具体现实却常常不给以应有的注意。这有时使得布哈林缺乏灵活的策略，作出过分直接的决定。布哈林之所以出现一系列左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思维的抽象性质。”

拉林娜在回忆录中曾谈到布哈林的为人：

“布哈林不是个典型的讲究的知识分子，尽管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同他相比。他脚穿俄罗斯皮靴，这不是因为在国内战争期间以及此后在布尔什维克中极为流行，他早在革命前就穿它，因

为这种靴子很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他戴鸭舌帽而不戴礼帽，认为自己戴礼帽就像猪脑袋上顶一顶小圆帽一样，尽管出国时他还得戴它。然而，当他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外事活动时，外交人民委员会电话通知他，要穿像样的服装，布哈林回答说：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知道我穿皮外衣，斜领衬衫，戴鸭舌帽，着皮靴，我也这样去参加接见。

他的举止也能表现他的性格：他能像庄稼汉那样通过牙缝啐口沫，能用两个手指放在嘴上打口哨，就像街头顽童那样；他会干调皮捣蛋的事。与此同时，布哈林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几乎带有少女的腼腆，同时他的易于激动几近病态。

我觉得他的外表也不总是一样的：有时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男人，有一对愉快的、狡猾的、不断转动的眼睛，有时又是一个思想家，带着沉思的深邃的忧郁眼光看着远方。

他用细小工整的书法撰写雄辩的宣言和小册子，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夹杂着外语的复杂的理论研究著作，交替着供大众阅读的通俗讲演、文章、小册子和书籍（我 13 岁的时候，父亲把《共产主义 ABC》拿来给我研读）。

他从来也不故作地模仿人民，也不玩弄人民，他本身就是人民的体现，既是普通老百姓，又是知识分子，他始终保持廉洁的作风。”

他敏感，极富同情心，极易为人民的苦难而激动。在集体化时期，布哈林到乌克兰去，在沿途的小车站上看到成群饿得肚子鼓胀的孩子们在讨饭，他把自己带的所有现钱都给了他们。回到莫斯科后，他去看拉林娜的父亲，谈起路上所见所闻时不禁大喊道：“革命胜利后 10 多年还能看到这种现象，这怎么能行？”他

拉林娜：《难忘岁月》，见《旗》1988 年第 12 期第 131 页。

甚至在大哭中晕倒过去。当布哈林知道莫斯科的十月起义不像彼得格勒那样没有流血,而是死了上千人,他不禁大哭起来。

布哈林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家,又是苏联的政治家,是公认的经济学家,也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他对系统论的探讨已走到现代系统论的大门。他的兴趣极其广泛,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着广泛的兴趣。从蝴蝶标本的收集,到系统地观察宇宙万物,他都下过功夫。对艺术他更是情有独钟,他的绘画可以说已达到专业水平。1935年底1936年初,他的画曾在特列基雅可夫斯基画廊展出。画家 . . 尤昂曾劝他弃政从艺:“扔掉您的政治,政治不会带给您什么好东西的,去绘画吧。绘画才是您的天赋!”他博学多才,掌握多种语言,能用德语读歌德和康德的作品,以法语读莫里哀和孟德斯鸠的著作,用拉丁语看凯撒的书,还能用古希腊语去读古希腊诗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还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他在生命旅程的最后时日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哲学著作、一扎抒情诗和一本自传体小说。

像这样博学多才的人物在苏联党和国家里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极其罕见的。在文化修养上据说只有卢那察尔斯基同他相似,但卢不是个政治家。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超过布哈林,但在文学艺术领域则涉及较少。据当时见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的人说,布哈林是他们中间最有文化修养的人物。

至于他对革命的忠诚,在今天甚至已是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他在被捕之前留下的、让他的年轻的妻子熟记的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是他留给后代的遗言。他在信中写道: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

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能和下面的谎言划等号,就等于说,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一辈子从事和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作斗争,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时代不一样,风气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设有争论专页,大家争论,寻找道路,争吵了,又和好了,继续一起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早晚必然会把我的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并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为什么失败

到这时候,人们不由地提出一个问题,布哈林为什么失败?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切合国情的方案,为什么会夭折?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的大问题,它始终困扰着历史学家们。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民主革命的熏陶,东方专制主义色彩浓厚。这里的广大群众信奉“好沙皇”,而在没有“好沙皇”的情况下,对坏沙皇,不好不坏的沙皇,也一样顺从。农民起义往往先制造出一个沙皇来作为旗帜。这样一种相信沙皇,推崇极权的传统,在革命后就变成了一种对领袖的崇拜的情绪。毋庸讳言,在列宁逝世前后已经出现某些人制造的对列宁的崇拜,而在列宁逝世之后,这种领袖崇拜心理又被有意识地利用来制造对“活着的当代列宁”的崇拜。一旦“有钢铁意志”的人独揽大权,就可以以“活着的列宁”的身份号令天下。而这种做法,是那些像布哈林那样在国外流亡多年,受过西方民主训练的革命家所不屑的。布哈林多才雄辩,但不善于发号施令,缺乏大刀阔斧的果断作风。就性格而言,布哈林向来以“软蜡”著称。这样的人在俄国这块土地上难以被接受为领头人的。

在俄国革命史上当然也有民主主义的传统。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种传统的代表。布哈林继承和发扬的恰恰就是这种民主主义的传统。然而在俄国这样在整体上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布哈林用理论的力量去同有组织的行政力量对抗,无异是螳臂当车。布哈林的理论主张要实现,必须找到行政力量作为依靠。他在同托洛茨基派的左倾激进主义斗争时,依靠了斯大林的行政组织力量,但到了同斯

大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依靠。这一事实事先就决定了布哈林的命运。

在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并不以极端的面目出现,相反地,他经常充当冲突的调解人。在 1924 年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党内曾有人主张采用开除的办法,正是斯大林出来公开反对“割除”政策,把托洛茨基留在政治局(当然是暂时的)。1925 年有人抓住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不放,斯大林出来保护布哈林,宣布不会把布哈林的血给他们的。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斯大林并没有走极端,他让布哈林为当时的政策作论证,因此托洛茨基派在争论中往往集中火力攻击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而斯大林却被看作“中派”。在围绕执行“列宁遗嘱”的争吵中,斯大林曾经数次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给人的印象是他并不迷恋这个高位。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大量违法乱纪现象,然而出来“纠偏”的却是斯大林,报上发表了署名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这样,他自然就被广大农民看作自己的“好沙皇”。斯大林为自己精心塑造的这种“公众形象”,在一段时间里颇能得到党内外的拥护。而他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志,那已是 30 年代中期及以后的事了。

问题还不在于个人,十月革命后的 3 年国内战争培养了一大批习惯于依靠军事命令办事的干部,战争结束后几百万红军复员,他们被分派到全国各地,这些人是行政命令体制的中坚。其中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有着本能的反感。列宁逝世后举行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在短短时间里一共吸收了 24 万多人加入党的队伍,而 1923 年召开党的十二大时一共才 38.6 万党员。大批的新党员没有经受过俄国三次革命的锻炼,基本上是主持组织工作的总书记的依靠力量。上述两支力量的结合

保证了斯大林有一支在党内斗争中取胜的人数众多的队伍。列宁曾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以保持党的稳定性。在斯大林的主持下,中央委员会倒是扩大了,但增加不是列宁建议的没有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而是从事领导工作的各级干部。这些由斯大林一手提拔的领导人,自然也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布哈林同斯大林的斗争是首先围绕农民问题展开的。布哈林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然而他却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最后还是服从了斯大林的集体化做法。强制和暴力是斯大林取胜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俄国的农村长期存在宗法制的村社的传统,土地不被看作是农民的个人私产,而是归村社集体所有,村社土地集体所有的思想深入人心。斯大林的集体化多少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宗法心理。所以农民在经过某种局部的、分散的反抗之后能够接受集体农庄的既成事实,毕竟集体农庄同村社有共同之处。何况布哈林捍卫列宁合作化道路的斗争只限于党的秘密会议,农民是不得而知的。

20年代以来,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党内斗争的方式越来越不正常。1921年党的十大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本身是必要的,然而派别活动同正常的意见分歧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楚,操作起来极为困难。十大还同时通过实行“工人民主制”的极其重要的决议,然而在后来的党内生活中一遇到不同意见,就片面地引用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而把实行民主的决议束之高阁。结果是在禁止派别活动的名义下,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一个一个被开除出党,最后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在这一点上布哈林本人也难辞其咎,在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布哈林也说过过头话,做过过头事,以致于到他自己同斯大林发生分歧之后,为怕被打成“派别活动”而不得不处处设防。在不正常的党内生

活中是很难进行理论争论,进行说理斗争的。

以上所述,也许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布哈林失败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致使布哈林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不过,最后还可以提出一个更为有意思的问题——布哈林失败了没有?答案也许是这样的:就他的选择方案而言,就他个人的肉体而言,是失败了,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中实行的是斯大林的选择。然而,就他的思想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失败。思想是无法扼杀、不能消灭的。在当今的改革中,人们不难感到布哈林的某些思想和主张。布哈林加进人类文化遗产中的“新东西”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漫漫平反路

——兼谈国外布哈林研究

布哈林在 1928—1929 年党内争论中失败，1938 年 3 月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审中被判处死刑。这以后布哈林问题被搁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二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又重新加强国内的镇压。因此在斯大林生前，根本谈不上为被无端镇压者平反的问题，而为布哈林平反更是渺渺无期。

截然不同的评价

苏联对布哈林的评价几经反复，不同时期的评价截然相反。

1927 年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8 卷由马列茨基撰写的词条“布哈林”，对布哈林作出了当时所能作出的最为详尽，也比较符合实际

的评价。作者认为布哈林是“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革命活动，特别是高度评价了他的主要著作。对布哈林的评价比较客观全面，除了他的功绩，也不讳言他同列宁的分歧、他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18年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错误，指出“以后布哈林公开承认自己在布列斯特阶段的政治错误”。在介绍布哈林的理论观点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他所提供的“新东西”，例如“他当时第一次把在革命过程中炸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必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论点提上了日程”，坚持了当时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可能性的论点，认为布哈林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促进了列宁关于国家理论的有重大价值的深入研究”。作者高度评价了布哈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最有才能的经济学家 - 理论家”，是“创造性地接受《资本论》作者遗产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他“使马克思主义一系列老论点更明确了，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作者同时也指出了布哈林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如“以形式逻辑代替辩证法；超乎内容的‘空泛的’和‘左的’词句；不了解农民的作用”，等等。对作者的评论，读者当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那时候对领袖不是一味吹捧，歌功颂德，这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不错的，而这也正是布哈林在20年代所努力营造的气氛。对布哈林著作的介绍，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在评介《过渡时期经济学》时大量引用了列宁对此书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肯定赞许的，也有指出其错误和不准确之处的。顺便说一下，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全文发表于1929年，即反右倾的高潮之时，在这样的时候公布列宁的评论，目的显然是要借列宁的评注去打击布哈林作为理论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1928年出版的《苏联小百科词典》写法与一版大百科类似，当然篇幅小得多了。这版小百科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介绍了布哈林的性格特征，说他“酷爱生命的一切表现”，对自己的私生活极端严格，而对同志却很宽容随和，他博闻强记，有很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对他所接触的任何理论问题都能提出有趣的见解。“所有这些品质使布哈林成为俄国革命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

1928—1929年联共党内展开了反对所谓“布李集团”的斗争，布哈林被撤销了党内和共产国际中所有重要职务。1934年出版的第2版《苏联小百科词典》对布哈林的评价也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它详细列举了布哈林在历史上所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及同列宁的分歧，说“布哈林犯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成了联共（布）党内右倾的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客观上是富农在联共（布）队伍中的代理人”。本版百科对布哈林的评论还只限于理论领域，说他“缺乏辩证思想”，“持机械论观点”，因而提出了错误的“劳动消耗规律”，“反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口号等等。作者指责布哈林“不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不懂得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只能通过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通过克服农村中的富农分子的反抗”，并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途径才能达到。指责他提出富农的合作社窝巢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农村阶级斗争停息（ ）的论点，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说他要求降低工业化的速度，为发展轻工业而改变轻重工业的关系，要求放弃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等等。这一版有一些强加于布哈林的东西，但不多，有一些倒也是布哈林的观点，问题只在于怎样看。这种片面地列举一个人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错误的做法，是苏联30年代以来的

一种典型做法。

1938年3月举行轰动世界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布哈林等以“叛国罪”被处死。同年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程》利用一切机会列数布哈林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教程》第一次提到布哈林时(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说他“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然后是布列斯特和约期间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称布哈林为托洛茨基的“帮手”(其实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中，主将是布哈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但当时托洛茨基的名字等同于敌人，所以必须把托洛茨基排在第一位)，说他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策划过反苏维埃政府的阴谋”，“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一切当然都是30年代捏造出来的罪名。接着列举了布哈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党纲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成立“缓冲”集团，“维护和掩护最凶恶的派别分子托洛茨基派”，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前“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因而是“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当然不会提斯大林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的忠实盟友，并同样受到列宁的批评)。在1925年“布哈林派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下一个高潮是1928—1929年间的所谓布哈林—季可夫集团，《教程》给这个集团戴了好几顶政治帽子：炮制“阶级斗争熄灭论”，恢复“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它“公开出来为富农辩护”，而布哈林本人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1934年12月基洛夫遭暗杀，《教程》就此写

道：“后来查明，基洛夫同志就是被这个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杀害的”。最后一个高潮是 1938 年的审讯，出现了一个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其罪行是企图谋杀列宁、斯大林，向列宁开枪，发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妄图推翻列宁的领导，而在列宁患病和逝世后，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出卖国家的机密，向外国间谍机关提供情报，进行凶杀、暗害、破坏活动，把苏联的领土割让给日本、德国等等。此后，苏联的各种版本的百科全书不再出现‘布哈林’的条文。1955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 版的有关内容只不过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翻版而已，给布哈林等戴的帽子是“孟什维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它的走狗、继承人，是外国间谍机关的奸细”，给右倾分子加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定语：“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着重强调了 1938 年对所谓‘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审讯”。

步履维艰的平反历程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事情出现了转机。苏联有关当局开始为过去的冤狱平反，为在冤假错案中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他们陆陆续续从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获得自由。

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长期过着集中营和流放地的生活，同在集中营认识的 . . . 法捷也夫结婚。法捷也夫在被捕前曾领导哈萨克共和国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农业生产局。获释并恢复名誉之后为了拉林娜他自愿留在西伯利亚。因拉林娜的关系，在不同的借口下曾 3 次被捕。他们两人并不能经常生活在一起。他或者关在监狱里，或者在拉林娜流放地的附近找一个工作，在假休日见面。因长期折磨，身体衰弱，于 1956 年前后病故，留下两个子女。不久，拉林娜找到了离散 19 年的儿子尤拉，

在西伯利亚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们母子为布哈林的平反而进行的漫长奔波。

1956年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镇压大批无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平民的情况，但没有给布哈林平反。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前，我召见了总检察长鲁金科同志，他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曾参与过许多案件的审讯工作。我问他：‘鲁金科同志，我想了解一下那几次公开审讯的情况。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佐夫、洛米纳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中很知名的人物提起公诉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真实的事实根据？’

鲁金科同志回答说，从司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提交审讯。因为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

然而，为了照顾兄弟党的处境，赫鲁晓夫采取了“暧昧”的做法，“无限期地搁置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等人的平反”。后来他对此表示后悔，说“我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当时最好还是把一切事情都讲出来。坏事总是要暴露的。你不能永远使这类事情保持秘密”。

1968年赫鲁晓夫在看过沙特罗夫的话剧《布尔什维克们》后，在同作者的谈话时曾说，1958年，在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清除出党的领导以后，曾经考虑给一批领导人恢复名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同上书，第514页。

誉,其中也包括布哈林。关于重新审查历次莫斯科公审的决议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决定把这项决议在报纸上发表。一个特别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建议宣布平反。但是,当时苏联国内外都有反对为布哈林平反的势力,党内有苏斯洛夫等人反对,国际上,例如法共的莫里斯·多列士也要求延缓给布哈林等人平反。1964年赫鲁晓夫本人被推翻下台,他也面临着给自己恢复名誉的问题了。他在晚年经常告诉来访者,他非常懊悔在他执政时期没有及时替布哈林等人平反昭雪。不过,即使赫鲁晓夫给布哈林平反了,充其量也只是政治上的平反,即摘掉他头上的叛徒之类的帽子,对布哈林的一系列理论观点那时显然尚未做好重新评价的准备,这从那时出版的各种党史著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60年代以来,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呼声在苏联国内外越来越高。这是几个方面同时并进的过程。

一方面是布哈林的家属——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儿子尤里·拉林-布哈林提出的为布哈林平反的申诉,他们于1961年第一次提出了平反的要求。她本准备给赫鲁晓夫本人递交申诉书的,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赫鲁晓夫本人已被赶下台。申诉书只好送交勃列日涅夫。执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当然不会去为布哈林及其朋友恢复名誉。当时拉林娜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党内的元老、布哈林的朋友米高扬身上。但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米高扬也逐渐失势,对此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党内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提出了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要求。显然,官方是打算这样做的,所以在苏

见科茨:《布哈林案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同上书,第118页。

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中央委员、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院士在1962年12月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回答与会者提的条子说:

“大学生常问,布哈林及其他一些人是不是外国间谍,您能推荐我们读些什么书?”

我可以宣布,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文献,就能得出结论说,无论布哈林还是李可夫,当然都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

但是正式平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1965年苏共4名最老的活动家叶·斯塔索娃(1898年入党,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17—1920年曾任中央书记)、维·卡尔宾斯基(1898年入党,1904年认识列宁)、卡塔尼扬(1903年入党)和鲁登科(1905年入党)联名写信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要求为布哈林平反。信中引用了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同时指出,尽管列宁批评过布哈林的错误,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布哈林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他们认为,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不仅是为“列宁时代的一个杰出的活动家个人伸张正义”,而且对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因为现在“我们关于布哈林只能写坏的,因而导致对有关历史时期的歪曲”。他们认为,被列宁叫做全党喜欢的人物的人,是不能老是列在党的叛徒和开除者的名单上的。

这封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看到苏共中央采取什么行动。只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版的各种党史专著和词典如《苏联共产党历史》(1959)、《苏联历史

《全苏改善历史学科研和教学干部培养方法会议(1962年12月18—21日)》,莫斯科1964年版第298页。

百科全书》(1968年出版)和第3版《苏联大百科全书》(1975年出版)中的“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条等等,都不再提及30年代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实际上为布哈林摘除了叛徒、间谍的帽子。但在理论观点上,在路线的问题上,仍然给布哈林集团戴上“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列宁的合作社计划”、鼓吹“富农口号‘发财吧’”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帽子。这就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依然坚持20年代末对布哈林的所有批判,没有任何改变。

1970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博士 . . . 瓦加诺夫的专著《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1928—1930)》,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本系统地批判“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专著。作者也可以说是批判布哈林的最后一个“大权威”。第3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条就是他执笔的。从书中引用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出,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内部档案,照理应当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和1938年冤案的真相,写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著作来的,然而作者所用的资料完全是用来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注解的,只不过是《简明教程》的讲解本而已。1977年出版了此书的修订增补第2版。

苏共二十大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布哈林的平反问题在苏联没有多少进展。然而历史在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是首先在西方开始的。

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以后,世界各国的一些学者和理论家开始从苏联的历史中去发掘曾经存在过的代替斯大林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这样,对布哈林的兴趣日益增大。西方的学者在这方面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作了一些扎实的工作。美国学者西特尼·海特曼先作了布哈林著作目录的搜寻工作,1958年出版了他编的《布哈林著作解题目录》。1959年在柏林出版了由

西·海特曼和彼得·克尼尔施撰写的《布哈林。第1卷：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的著作目录报告》。在此基础上，1967年美国哈佛研究所出版了《布哈林：解题目录，附其著作在欧美各大图书馆收藏情况》。布哈林著作目录的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工作。

与此同时，布哈林的著作也开始在西方出版。1966年出版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海特曼编辑作序，用英文出版。1967年在纽约出版了《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选集）》，这是一本编得相当好的选集，也由海特曼编辑，他还为选集写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序言，全面介绍了布哈林的生平和思想。

论述布哈林的专著也相继出版。

在论述布哈林问题的早期著作中，在西方出版的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占重要地位。此书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开始写作，于1957年完成。作者30年代在联共（布）中央工作，1937年毕业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比较了解苏联20—30年代的政局，加上流亡西方后专事研究苏共历史，掌握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因此，本书关于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年代末的斗争情况以及30年代的大清洗等等问题的论述成了西方苏联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他写的另一本著作《党治制的由来》（联邦德国1973年俄文版）对布哈林问题有进一步的论述。

1959年柏林出版了彼得·克尼尔施的《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是一本较早的研究布哈林的专著。1962年西·海特曼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布哈林》。1969年G. 勒维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共产主义的幻想》在维也纳问世。1973年斯·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出版，这是西方研究布哈林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译成意、

法、西、俄、日和中文出版,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虽不是论述布哈林的专著,但其中相当详细地涉及了布哈林的活动和理论观点。如亚历山大·厄尔里希的《1924—1928年的苏联工业化的争论》(麻省1960年版),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心:苏俄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剑桥1960年版),尼·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左派共产主义学说》(慕尼黑1960年版),摩西·莱文《俄罗斯农民和苏维埃政权:集体化研究》(埃文斯顿,伊利诺斯1968年版)和《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伦敦普林斯顿1975年版),等等。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从理论上给布哈林平反制造了舆论,从50年代起,也许还要早一些,在西方布哈林已不被看作什么叛徒或奸细之类的刑事犯,而被看作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的代表。

从50年代开始布哈林问题成了博士论文的题目。1954年纽约大学的约翰·弗莱厄蒂的博士论文题为《布哈林1929年以前的政治生涯》。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西·海特曼完成博士论文《布哈林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构想:其1923—1928年基本观点的分析》。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芬·科恩写成了关于布哈林的博士论文,此外还有乔治·菲利普斯的博士论文,等等。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布哈林问题进行严肃的研究。1961年南斯拉夫哲学家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布哈林的观点,作者不同意布哈林的一系列观点,但仍然认为,“布哈林虽然有过种种迷误和理论上的缺点,他仍然是一位光辉的和有修养的人物;是一位独立大胆地分析了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的和困难的问题的马

克思主义者”。1974年匈牙利出版经济学家格·萨穆利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书中肯定了布哈林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他概括说：“布哈林的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依靠着社会主义成分和小商品生产成分之间的市场竞争，这个竞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可以看出，他对最初模式的探讨，是为本国面临的改革任务服务的，布哈林的思想是同当代的改革直接联系在一起。

到了70—80年代，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出现了苏联国内外相结合的形势。

1977年6月初，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克利莫夫打电话给拉林说：“我奉命通知你，你们申请恢复布哈林在党内的地位和他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资格是不能批准的，因为根据审讯他的罪行而作出的有罪判决尚未撤销”。这个电话是对16年前第一次提出，一年半以前最后一次提出的给布哈林恢复名誉的申请的第一个答复。接到答复后，他们于1977年6月11日再次给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寄去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申诉书，但仍然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拉林决定向国际呼吁。

1978年3月12日，在布哈林惨死40周年前夕，他给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写信，请求他参加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活动。信中写道：

“贝林格同志：我向您求助，不仅因为您是西欧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并已摆脱了斯大林罪行的重担，而且还因为布哈林是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0页。

萨穆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142页。

一位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成员。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识他,并且经常热情地缅怀他。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健在,还在意大利共产党队伍里工作着。”

这封信是通过罗素和平基金会转交的。罗素基金会收到后,把它散发到许多国家去征求签名,它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得到的第一批签名近百人,意大利共产党的保罗·斯普里亚诺在《团结报》上发表《布哈林案件》一文,支持为布哈林恢复名誉,文章写道:“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30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要求”。“正视斯大林时代以及苏共最高领导人所公开谴责的那些错误和缺陷,这是使苏联现社会再生的条件之一。至于对我们来说,重提‘布哈林案件’,除了具有一般来说的重大意义之外,还在道义上、理论上、教育上和政治上有其连带的影响。”

受罗素基金会的委托,肯·科茨撰写了一本专著《布哈林案件》,详细分析了40年前的莫斯科审讯,根据大量的资料反驳了当时给布哈林罗织的罪状,特别是书中指出了50年代以来布哈林案件中的“同案犯”大都已获得平反,这就等于完全推翻了对布哈林的全部指控。给布哈林恢复名誉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这个基础上,在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学院及其社会主义国家资料中心的倡议下,于1980年6月27—29日在罗马召开了“关于苏联和国际共运中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布哈林问题的各国学者50人出席了讨论会,其中就有斯·科恩、亚·厄尔里希,中国有观察员出席。会议讨论了5个问题:

科茨:《布哈林案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同上书,第105页。

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与革命的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确立和布哈林审判案，关于东欧国家改革的争论及其与新经济政策的联系。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无疑大大推动了布哈林的平反运动。

面对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压力，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在《新闻公报》上刊登了约·伊凡诺夫的文章《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申了布哈林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和“复辟计划”，声称“苏联劳动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布哈林分子的复辟计划”。

历史证明他无罪

转机出现在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随着戈氏的上台，苏联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摆在改革的议程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平反冤狱，为苏联各个时期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这项平反工作，在 50 年代已经开始，所以现在的任务实际上是一种补课。然而就是在改革时期这一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 1975 年，哲学家恰金在《苏联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斗争》（列宁格勒版）中，就开始对布哈林的一些著作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在批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同时，肯定了这本书在当时所起的启蒙作用。着墨不多，但至少表明苏联的某些严肃的学者已开始认真地、客观地对待历史上的思潮和学派。

同年，当时的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

《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18 页。

的《让历史来审判》在西方出版(纽约 1974 年俄文版)。本书以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介绍了布哈林案件,揭露此案纯属假案,书中公布了布哈林的遗嘱《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还有 4 名老布尔什维克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信。从而把为布哈林平反的问题提到国际舆论面前。他于 1980 年出版的《布哈林的最后岁月》又进一步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布哈林在 30 年代的情况。在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过程中,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其中写道:

“ 尽管国际局势紧张,我仍向您提出关于我的丈夫和我儿子的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平反的问题……我提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最后一次出席 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时,预感到他已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 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 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知 ’。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我想,对于我的请求,您作为党的领导人只有一种回答的可能——给予肯定的回答。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的劲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

1985 年以后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开始直接冲击禁区,提出了为列宁时代的党的领袖们恢复名誉的问题。开始这一工作的不

《星火》1987 年第 48 期。

《旗》1988 年第 12 期第 169 页。

是历史学家,而是艺术家、政论作家。剧作家沙特罗夫描写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进行激烈斗争的剧本《布列斯特和约》(此剧本始写于1962年,1987年改定后在《新世界》杂志全文发表)、描写列宁晚年思想的《这样我们一定能胜利》和稍后的《前进,前进,前进》里,把布哈林当作列宁的战友、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来描写,尽管他同列宁有过尖锐的分歧和争论,甚至还有过严重的错误。

1987年在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人们有理由期望当局加大力度,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这一年出版的《十月革命大百科全书》开始一反传统的做法,把在30年代被镇压的一些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入辞书,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有了单独的传记了。虽然从评价上看,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们寄予更大的希望。10月4日英国《观察家报》在题为《俄国终于向布哈林道歉了》一文报道,苏联日内将撤销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给十月革命的“隆重庆祝活动锦上添花”。然而,希望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在肯定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斗争的同时,肯定了布哈林等人“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又认为:“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条件要求把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作为迫切的任务。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在自己的筹划中、理论观点中实际上都对在2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间因素的意义估计不足。他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条式的思维,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不合辩证法的评价。布哈林本人和他的拥护者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在这里回顾一下列宁当年给布哈林所下的不懂辩证法的评语是

适宜的。戈尔巴乔夫给布哈林的评语,显然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在坚持辩证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巨大进步。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是有可能看到布哈林在狱中所写的充满辩证法的《哲学短篇集》的。这种情况表明,苏共当时实际上还没有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也表明苏共党内,在历史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或许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仍然面临着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当然,实际上这时已经清楚,布哈林的正式恢复名誉已是大势所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了。

从 1988 年起,苏联开始出版布哈林的著作,多数是布哈林选集:

《布哈林选集》,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8 年版。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苏联出版的第一本布哈林著作。

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到社会主义之路。选集》,新西伯利亚 1990 年版。

上述 3 本选集收入的主要的是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著作。首先出版这篇文章,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广大群众读不到布哈林本人的著作,不了解布哈林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中的主张,那么给布哈林平反,就仅仅是为一个被错判的刑事犯平反,其意义就小得多。苏联理论界在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时候,都在探寻可以取代斯大林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米·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革命在继续》,莫斯科 1987 年第 15—16 页。

关于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的评价,我在 1988 年的文章《新思维:历史和现实》中有简短的评论,见《读书》1988 年第 4 期。

或者替代方案。布哈林的理论理所当然地首先受到理论界的重视。

下面两本选集颇有特色,收集的主要是布哈林关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著,其中不少是布哈林被解除党的领导职务以后,担任科学技术规划的领导工作之后结合工作写成的:

《布哈林选集。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组织》,列宁格勒 1988 年版。

布哈林院士《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和规划。选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还出了一些布哈林的专题论文集,如《布哈林致新的一代。有关青年问题的报告、讲演和文章》,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1990 年版。由布哈林基金会编辑出版。

1988 年莫斯科“书籍”出版社还重印了 1932 年出版的布哈林文集《论文集》。这是布哈林生前自己编辑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内容广泛,涉及技术、科学、艺术、哲学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各种布哈林选集的大量出版,为深入研究布哈林的思想遗产提供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资料,在苏联掀起了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布哈林的新热潮。可惜的是这时候布哈林的著作的出版缺乏统一的规划,虽然出了不少选集,但所选文章往往重复,而布哈林的另一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却没能重印出版。如果能联合各方的力量,出一部比较能反映布哈林思想和活动全貌的选集,那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的这位思想家、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遗产,将会起更大的作用。

1988 年是布哈林诞辰 100 周年、遇害 50 周年。1987 年德国学者特奥多尔·贝尔格曼教授在莫斯科同安娜·拉林娜商定,1988 年在联邦德国恩格斯的故乡乌珀塔尔举办“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1988 年 10 月 10—13 日讨论会如

期召开。会议由贝尔格曼、格特·沙费尔、京特·特劳特曼等7位教授发起,有来自19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与会,我国有5位学者出席。苏联学者也出席了会议。会后,出版了《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88年恢复历史正义的一天终于到来了。2月6日《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补充研究有关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委员会的公报:

“1988年2月5日委员会听取了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关于审议苏联总检察长关于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阿·巴·罗森霍尔茨、. . . 切尔诺夫、. . . 布拉诺夫、列·格·列文、. . . 卡扎可夫、. . . 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 . . 克留奇可夫和克·格·拉柯夫斯基案件抗诉结果的报告,他们是在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中负有刑事责任而受审的。

这些人于1938年3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罪名是:根据敌视苏联的外国侦探机关的指令,组织旨在推翻苏联现存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阴谋集团,从事暗害、恐怖以及其他敌对活动。

业已查明,该案在预审时是靠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伪造、对被告施加不能容许的方法而取得口供的。

通告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的下述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于1988年2月4日作出决定,撤销了军事法庭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罗森霍尔茨、切尔诺夫、布拉诺夫、列文、卡扎可夫、马克

《Bucharin-Theoretiker des Sozialismus .Beitrag zum internationalen Bucharin-Symposium . Wuppertal, 1988》VSA-Verlag Hamburg, 1989. 中文版由郑异凡和殷叙彝主编,于199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克留奇可夫和克·格·拉柯夫斯基的判决,由于他们的行动中沒有犯罪成分而终止该案。

此前,苏联最高法院根据同样理由已完全恢复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格·费·格林科……的名誉。

苏联检察院没有提出关于亚戈达的抗诉。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在继续自己的工作。”

至此布哈林案件中的全体被告,除一人(亚戈达)外,全部获得平反。

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平反时发表的背景材料中指出,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争议,然而,现实生活和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他提出和发挥的许多论点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包括关于把农民个人的和公共的利益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合作企业存在的极端重要的前提,关于合作活动和个体活动的结合,关于在苏维埃经济体系中必须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关于完善经济核算制度,关于利用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杠杆等等思想和建议。可以看出,对布哈林的评价是同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结合的。

1988年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号。《消息报》记者在评述此决定时说:“现在轮到在学术界恢复他的理论遗产了”。“在他的遗著中,也有与我们目前进行的思考和探索现今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相似的东西”。

1988年6月21日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讨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问题,鉴于在把他们开除出党时提出的政治指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131页。

《消息报》1988年5月10日。

控缺乏根据,他们已按司法程序完全平反,同时注意到他们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功绩,决定恢复其党籍(死后)。

在布哈林获得平反之际,报刊纷纷以“正义的胜利”,“回归”,“时代的声音——真理的声音”,“恢复真理”,“正义的恢复”为题发表文章志庆。

这一年苏联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布哈林的文章和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的上半年就发表了各种文章 16 篇,其中有布哈林的重要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有拉林娜的回忆文章,有介绍布哈林生平和论述其思想的文章。

历史学家开始加入布哈林问题的研究。1988 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布哈林传,即戈列洛夫著的《尼古拉·布哈林》。学术界对此书的评价颇高。历史学博士菲尔索夫写道,本书是我国历史学的一个成就。作者作了一个通过布哈林的政治肖像阐述党的历史的有益的尝试,对党史提供了许多新的细节。书中提出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问题、关于建设新社会的形式和方法问题的思想理论争论也是目前社会主义更新所关心的问题。这一切使戈列洛夫的著作具有现实意义。不过,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此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美国学者科恩在《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研究成果。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5 期第 68 页。

见《历史的篇章。1988 年 1—6 月》,列宁格勒 1989 年版第 295—296 页。

《苏共党史问题》1989 年第 7 期第 138 页。

见《政治教育》1989 年第 8 期第 71 页;叶梅利亚诺夫:《关于布哈林的札记》,莫斯科 1989 年第 101—104 页。

此后研究布哈林的著作陆续问世。1988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布哈林：学术遗产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该所青年学者委员会组织的纪念布哈林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是用打字机打印出版的。所收十几篇论文涉及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1989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硕士尤·丽·叶梅利亚诺夫的《关于布哈林的札记。革命、历史、个人》。此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如布哈林和“苏联学”、布哈林和列宁、布哈林和历史等等。对某些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作者的目的是要解释革命及其领导者的矛盾。他写道：“了解布哈林的生平及其时代，可以知道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既影响过去的主要活动家的性格，也影响历史的进程。苏维埃国家的这段历史的教训，对面临深刻改革的我们社会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由苏共马列研究院的历史学博士...茹拉甫列夫主编的文集《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这是由一批苏联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撰写的论文集，他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布哈林的思想理论遗产，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时期国外的作家继续写作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历史学家米克罗施·库恩用俄文出版的《布哈林及其敌友》。米克罗施·库恩是著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贝拉·库恩的孙子，在苏联长大，熟练掌握俄语。本书基本上是一本传记作品，作者广泛利用了苏联、欧洲和美国所藏的有关布哈林的档案材料，书中所收资料之丰富暂时恐怕连俄罗斯的学者

叶梅利亚诺夫：《关于布哈林的札记》，莫斯科1989年版第12页。
1992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

也无法超过。

1993年德国出版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坎的专著《尼古拉·布哈林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人运动》。坎原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后移居瑞典，在瑞典的大学任教。在布哈林的一生中，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他在这里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论著。坎的著作显然填补了布哈林研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空白。

苏联改革时期的布哈林研究，既有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伸张正义的成分，也有消除苏联历史学中的空白、恢复历史真相的成分，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布哈林的遗产，寻找替代斯大林模式的另一种历史选择。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是30年代苏联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出路。对布哈林的研究证明，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另一种现实的选择，这就是布哈林所竭力捍卫和发展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时也被叫做布哈林选择。实际上布哈林并没有提出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另一套方针路线，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学者正是试图从布哈林的理论里找到当代改革的理论和历史根据。这是当时苏联掀起布哈林热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的崩溃，布哈林热也随之降温。有关布哈林的文章和论著显著减少。以布哈林问题做政论文章的现象已不多见。因为从布哈林的遗产中是找不到恢复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所谓“右派”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云云，是毫无根据的莫须有的罪名。

这几年陆续公布了对布哈林研究有重大价值的资料。最有

价值的是发表了布哈林的狱中遗作：《哲学短篇集》和未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这是研究布哈林的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历史问题》杂志陆续发表了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三月全会速记记录，为研究布哈林和李可夫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近期未见有分量的布哈林研究著作问世，很可能有一些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理论家在深入研究布哈林的政治遗产和政治经济学、哲学遗产，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严肃的有关布哈林的论著问世。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可惜只发表其中的一部分。

《时代》莫斯科1994年版。

布哈林研究在中国

布哈林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思想家,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就引起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他的一些著作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已经译成中文出版,有的著作甚至有好几种版本同时问世。

20 年代末的高潮

我国进步的出版社“新青年社”在 20 年代即系统地出版布哈林的著作,把这看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重要内容。

1926 年新青年社出版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 B C》,这是一本在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

著作。此书出版后立即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材。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众多的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薄一波说,“中国老一辈革命者当年能得到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当不容易。20年代初,基本上没有什么马列著作可读。只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后来经成仿吾同志修改过),大革命时又译出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 ABC》。一般党员就靠这两本书来进行活动。以后,有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以及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伍修权写道,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用的教材是《共产主义 ABC》。当时的北京市委也把它当作党课教材。1926年还出版了《农民问题》,由新青年社出版;《共产党底计划》(即《共产主义者纲领》),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是康民尼斯特丛书之一。1927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作的报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新青年社)。

与此同时,其他出版社也纷纷译介布哈林的著作。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1929—1932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共出了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982年6月23日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126页。

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86、32页。

种版本,书名分别译作:《唯物史观》(东京改造社,1926),《辩证法的唯物论》(上海江南书店,1929),《唯物主义观》(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历史的唯物论》(上海现代书局,1930),《唯物史观大纲》(上海平凡书局,1930),《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北京书店,1930),《史的唯物论》(上海乐群书店,1931),《唯物史观社会学》(北平东亚书局,1932)。《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在1930年出了两个版本:《有闲阶级经济学批判》(上海乐群书店,1930),《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上海水沫书店)。《过渡时期经济学》在1930年也出了两个版本,当时译作《转形期的经济学》(上海北新书局)、《转形期经济学》(上海东华)。这一年出版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当时译作《社会主义之路》,上海垦新书店,1930);《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译作《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上海垦新书店,1934)。

有的著作不是照译原书,而是经过编辑加工的。例如1930年平凡书局出版的《社会主义大纲》(高希圣、郭真译)收入了《共产主义ABC》和《到社会主义之路》,译者在后语中给布哈林本人以高度评价,说他不仅是政治活动家,而且“具有深远的学问和敏锐的思索力,创作出了许多的名著”。译者认为《共产主义ABC》过去“尽过伟大的作用”,今日“依然不失为社会主义运动上一部最重要的教科书”。《到社会主义之路》“乃是布哈林根据了俄罗斯革命及苏维埃权力八年来的经验,而分析横亘在眼前的社会主义之路,所以他的言论,要算是最实际的了。”这番评价可以说是当时进步的学术界对布哈林的普遍看法。译者表示“尚拟进而选择布哈林所著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与农民问题》、《社会主义党的纲领》等等,作为这部《社会主义大纲》的续集”。这显然是准备出版布哈林的系列专题文选,可惜没有看到它们问世。

布哈林的有些著作和报告的译文是在报刊上发表的。中共党刊《布尔什维克》先后刊载了布哈林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1928年第2卷第1、2期合刊);《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1929年第2卷第6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1929年第2卷第4期),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报刊也结合联共(布)党内的斗争评介布哈林的观点,认为在20年代末布哈林是“共产党内代表的理论家”,代表联共(布)内的“稳健派”,因而被斯大林指责为“右翼妥协主义者,而施以排斥驱逐了”。布哈林代表农民的利益,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败标志着苏联农民政策的根本转变。1930年《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俄国实行五年计划后,政府起初对于农民尚取和平的态度,行宽大的政策。但自去年年底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对于农民宽大的主张失败后,政府便取压迫其所谓‘富民’的手段”。有文章认为,布哈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理论“不合时宜”,“稳健派布哈林之流所主张者虽与托洛茨基异,但以积重之下,亦属无能为力”。

这些文章多半属于新闻述评性质,对联共(布)党内的分歧和斗争自然难以提出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多少触及了当时分歧的核心问题。

从以上简介,特别是布哈林著作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在20年代下半期,3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出版和

《苏俄五年计划的现状和其次的大计划》,见《时事月报》1931年第4卷第2期。

《苏联农民的反抗左倾农业政策》,见《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1号。

《时事月报》1931年第4卷第1期。

研究布哈林的高潮。这是中国革命的需要,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需要。当时并不教条保守的思想界,多方位地探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布哈林在苏联失势了,他的著作在苏联受到批判,遭到禁止,而在中国却争着出他的著作,有方兴未艾之势,并且非常全面,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到现实的政策著作统统出版。当时布哈林著作在中国出版品种之多,恐怕连斯大林的著作也难与之相比。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斯大林的那套机器暂时还没有控制这片天地。

老调和“创新”

1938年3月苏联举行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中国各报作了广泛的报道。同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中国很快见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译本,从此布哈林就以“人民公敌”、“匪帮”的面目出现,在以后的长达40年的岁月中,我国再没有出版过布哈林的著作。从解放区到解放后的全国,干部学习、高校授课、报刊论文以至一些专著中,按照《简明教程》的口径,布哈林都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富农代理人”、“外国间谍”的面目出现。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可以说我国对苏联史,对联共(布)党内斗争没有过真正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简明教程》的结论。

在某些场合,当年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的“经验”还成为中国党内斗争的借鉴。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的高潮之际,康生于8月3日给毛泽东送去《斯大林论苏共党内的

右倾危险》的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个演说),声称“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的参考”。毛泽东于8月4日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样康生在发言中就名正言顺地借批布哈林来批判彭德怀了。

在60年代,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1964年《红旗》杂志增刊第2号发表的郑言实的长文《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时正是举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批布哈林既是为了国际上的“反修”,也是为了国内的“防修”。布哈林的主张被说成是“布哈林主义”,这是一个创造。作者把布哈林说成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企图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瓦解苏维埃政权”。小册子中有3章是直接批判布哈林的:第5章“反对维护富农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认定“布哈林分子是富农的代理人”;第6章“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把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第7章专门批判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这篇文章尽管给布哈林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但依据的只是斯大林的引文,既没有认真考察布哈林本人的观点,也没有认真研究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更没有根据历史的实践去检验孰是孰非,可以说是典型的八股加教条的文章。此书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和理论的准备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布哈林成了“大批判”的靶子。这时批判布哈林是为了批判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配合打倒刘少奇这一直接的政治目的。1967年8月9日被张春桥控制的《文汇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277页。

报》发表的《比布哈林更布哈林》一文就很有代表性。

1976年初三联书店出版《布哈林言论》，这是60年代开始出版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之一。此书的编辑方针及所写的前言和按语都贯穿着《简明教程》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自不必说，不过此书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已不再给布哈林戴“帝国主义间谍”和“人民公敌”之类的帽子。其二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供了布哈林本人的第一手资料，使读者有可能不是经过转述，而是直接看到布哈林本人的著作。编辑这本书的本意是为批判布哈林提供材料，然而，也为有心人提供了研究布哈林真实观点的重要的中文材料。

1976年底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这时候还不可能对联共(布)党史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1978年8月，郑言实的《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一文还出版了单行本在全国发行。这时离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已两年，国内的学者已开始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本书的再版显得同当时的形势极不协调。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在继续起作用。尽管书中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作者接着即不作任何论证地作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对联共(布)中央和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集团所主张的路线，作了最好的检验。”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出现题为《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列宁主义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这样的文章就不足为奇了。该文认定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发展生产、破坏国民经济，反

郑言实：《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4页。

对列宁主义路线”，说“不粉碎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进攻，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苏维埃政权就会变色，回到资本主义”。属于此类文章的还有李集成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斗争》。

布哈林著作的再发现

但是，历史在沉思，学者们在思索。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取的共同模式？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不是只能走斯大林模式这条道路？有没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斯大林在推行他的模式前必须打倒布哈林，中国在十年动乱前需要以批判布哈林主义作舆论准备，这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种问题促使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对布哈林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再评价。

这是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失误，很大一部分是同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对布哈林的错误批判分不开的，要认识中国的左倾路线，需要从斯大林模式那里去寻根探源。对历史的再认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新任务的需要，是探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需要，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用历史的实践去检验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检验布哈林和斯大林当年的争论。为此就必需详细占有资料，作为评论的依据。具有很大片面性的《布哈林言论》所提供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解放日报》1977年8月29日。

的材料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的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开始翻译出版布哈林的著作。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余大章和郑异凡根据俄文本译出的布哈林的名著《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布哈林著作。《读书》杂志为此发表了评介文章，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进一步解放”。以此为开端，接着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王家华等译，1982）、《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李光谟等译，1983）、《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此书收入争论双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两本著作，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的《布哈林文选》（郑异凡、周邦媛、宋洪训等编译），全书分3册，上、中两册收入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下册收入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共计100万字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篇幅最大的布哈林著作选集。

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两本有关布哈林的译文集：《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8年东方出版社以《世界评布哈林》为书名再版），内收世界各国学者论述布哈林的论文。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徐葵等译），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

《读书》1981年第2期。

绍布哈林生平和观点的外国学者的著作。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980年在罗马举行的“关于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中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任延黎译)。1993年又出版了《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文版主编郑异凡和殷叙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是1988年为纪念布哈林诞辰100周年、牺牲50周年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其中收入了中国学者的论文。199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苏联 . . 茹拉甫列夫主编的论文集《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尤开元等译)。

研究的新热潮

布哈林著作的大量出版,国外学者有关论著的介绍,无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思想界对布哈林问题的研究和再认识。然而,这只是外部条件。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则是更重要的内在推动因素,它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去寻找我国发生这种大悲剧的原因。这样,布哈林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日程。

1980年对布哈林问题的研究在南北几乎同时初见成果。1980年孙振远在《世界经济增刊》第1期发表文章《苏联20年代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方针的争论与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文中介绍了布哈林的几个经济观点,如破坏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就可能发生危机;必需保持生产和消费各领域互相协调,保持动的经济平衡;注意留有后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等等。5月初郑异凡在成都举行的国际共运史学术讨论会上,不久又在北京市共运史学会举办的报告会上,就重新评价布哈林做了长篇发言。

几乎与此同时,叶书宗在上海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对布哈林提出了新的评价。同年《世界史研究动态》第10期发表叶书宗和傅俊荣文章《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为强加于布哈林的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平反,提出反对“以权力写历史的腐朽的史学观点”。接着《世界史研究动态》第12期又发表叶书宗的《让历史来公正地裁决》,对布哈林一生的功过提出了新的评价,强调布哈林是“列宁称许过的理论家”,“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指出布哈林“是一个犯过许多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主要错误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而在列宁逝世后的时期,“恰恰是他多年从事理论研究、从事苏联社会的实际调查,提出许多独具慧眼的卓越见解,并敢于向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直率地提出不同意见的大大值得肯定的时期”。由此可见,有些学者认为到1980年6月罗马“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布哈林问题才有所了解,认识上也开始变化”,是不符合实际的。

1981年1月《世界历史》杂志第1期发表郑异凡的论文《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地公开重新评价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的文章。文章肯定了布哈林的历史地位,认为“布哈林是联共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鉴于对布哈林的重新评价必须推翻影响甚大的强加于布哈林头上的种种罪名,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否定了对布哈林的一系列指责: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发财吧”的口号,“阶级斗

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争熄灭论”，“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郑异凡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全国各报刊纷纷发表论述布哈林的文章，有同意对布哈林重新评价、肯定他的一系列观点的，也有反对郑文观点、著文同郑异凡商榷的。1981—1982年间国内掀起了一个研究布哈林问题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就发表了36篇文章，其内容几乎涉及布哈林理论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 and 经济学、哲学、文化等等都有涉及。在整个80年代，布哈林问题始终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如前所述，郑异凡的文章已给布哈林作了肯定的评价，主张恢复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叶书宗认为，“综观布哈林的一生，我认为他不是‘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富农的代言人’，更不是‘叛国犯’、‘间谍’，而是一个犯过许多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哈林案件“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冤案”。

有几篇文章是直接批驳30年代强加与布哈林身上的罪名的。叶书宗和傅俊荣的文章以大量事实证明，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这个罪名是《简明教程》的作者“不顾历史事实，而是根据权力意志和打倒布哈林的政治需要”，硬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接着杨彦君发表《布哈林企图杀害列宁的罪名辨》，根据1923年12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材料指出当时布尔什维

《中国历史年鉴。1982》。

作为综述，本文列举一批作者的文章，为的是留下历史资料，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随着档案资料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作者的观点已经改变，有一些作者则更加坚定原先的观点，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布哈林问题的研究并未终结，尚有待深入，不同观点的争论，也许会给以后的研究者以启迪。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10期。

克党内根本不存在企图谋杀列宁的问题,作者还揭露了1938年审讯中的种种矛盾,以及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伪造。这些辨伪的文章对纠正视听、恢复历史真相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布哈林一系列政治观点的评价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里关键问题是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看法。他在这方面的观点过去一直被看作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郑异凡的文章依据对布哈林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有关言论的考察,认为布哈林从来没有鼓吹过《简明教程》中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缓和以至消失的观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一些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周耀明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布哈林“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阶级和平’的各阶级‘互相合作’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布哈林心目中变成了‘阶级合作’的机关”。“这简直是在思想上解除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武装”。

与此有直接联系的是对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郑异凡认为,布哈林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分界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长入”,即有机发展,而摒弃“革命”的形式(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正确的,它符合列宁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3期。

周耀明:《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也谈谈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见《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

晚期的思想,针对所谓布哈林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指责,郑异凡指出,布哈林的有关论述遭到了歪曲。布哈林在谈到富农合作社发展的前途时说的是:1、富农合作社长入国家机关,即同无产阶级国家的银行等联结在一起,而不是长入社会主义。2、富农合作社长入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它对社会主义来说依然是“异物”。张镇强认为,“布哈林‘和平长入’论,无论从目的和手段来说,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理的”。

周耀明认为,不仅富农,而且“连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商品生产者也不可能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他断言,“否定一切革命和变革,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有机地进化增长’的过程,这样的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实质是鼓吹资产阶级、富农可以自发地、自觉自愿地‘长入’社会主义。这样的‘长入’,无论是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资本主义内部就开始,或者是‘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都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时候,曾援引1916年底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指责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认为这是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到底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和布哈林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郑异凡有两篇文章谈及这一问题,认为:1、布哈林在《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中说的敌视国家是指帝国主义国家;2、布哈林并没有否定过渡时期的国家;3、“炸毁”国家并非无政府主义公式,而是恩格斯的用语。布哈林并未犯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后来随着列宁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列宁

《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见《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

同布哈林之间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消除了。1929年斯大林旧帐重提,显然是把列宁的批评当作打人的棍子。

王炳煜等不同意上述观点,断定布哈林说的敌视国家“当然包括着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列宁在国家问题上同布哈林的分歧已消除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这次争论中的是非曲直是必须弄清楚,含糊不得的。周耀明认为,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确实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估计不足的错误,其理论根源是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宋洪训的文章《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一场争论》大体上也持这一观点,认为“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列宁对布哈林的错误的批评是对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也是论据充足的”。李振海的《实事求是地评述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也持类似的观点。由于资料缺乏,上述作者都没有看到布哈林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郑异凡翻译了这篇文章,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布哈林论“新列维坦”》一文从反对集权国家的

郑异凡:《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分别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1983年第4期。

《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辑。

《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0辑。

角度考察了布哈林的国家理论。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当年布哈林和斯大林有一场争论。郑异凡认为,布哈林从来没有宣传过《简明教程》中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他承认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必要性,承认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某一阶段尖锐化的可能性,他只是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会起变化,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缓和以至最终消失。“这是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相当完整、相当精彩的论述”。王斯德和陈兼在《重评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斗争中提出的‘两个公式’》,分析了斯大林所说的“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除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作者认为,斯大林所总结的公式,既歪曲了列宁的思想,也歪曲了布哈林的本意。他所说的“长入社会主义”含义是明确的,“就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即对资产阶级可以用和平经济改造,而不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同列宁的观点一致的。

在布哈林的政治观点中,关于防止无产阶级国家蜕化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汪义诚等的文章系统地考察了布哈林从1921年起关于蜕化问题的言论。布哈林认为,防止无产阶级国家蜕化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作者认为,布哈林这方面的研究,“为马列主义理论增添了

《读书》1988年第5期。

《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内部文稿》1981年第9期。

新的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万智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布哈林关于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发生蜕变危险的思想》也谈了这一问题。张森的文章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

布哈林的经济观点和主张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有关布哈林的文章中这一类的论文占多数。普遍认为，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是他的全部理论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不少文章肯定布哈林是列宁以后新经济政策的宣传者、解释者，他不但坚持，而且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谓布哈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模式。郑异凡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论文指出布哈林关于经济建设论述中下列颇有独创性的思想：从俄国国情出发提出苏联所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将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这是布哈林考虑苏联整个建设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从这点出发，布哈林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政策，认为合作社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经济建设中必须保持经济平衡，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布哈林经济思想中仍具生命力的重要思想。学者们肯定了他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战中提出的“劳动消耗规律”，认为这是布哈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从这一规律出发，布哈林要求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发展。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布哈林关于利用市场、商

汪义诚、汪毓清、陈为汉：《布哈林关于防止无产阶级国家蜕化的思想》，见《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9期。

《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3—4期。

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尽管他是针对过渡时期说的,但其基本思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论述布哈林经济思想的论文还有:章良猷《苏联20年代下半期一场理论经济学问题争论的始末》;罗卫东《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祁绍征《试论布哈林过渡时期思想转变问题》。

1921年以后苏联实行的是与军事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新经济政策模式,布哈林参与了这一模式的设计与制订,而在列宁逝世以后又承担起捍卫和发展这一模式的重任。继郑文指出布哈林提出的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后,金雁在《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中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论述。王福春在《简评联

郑异凡:《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见《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宋洪训:《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值得认真研究》,见《世界经济增刊》1981年第2期;王守海:《苏联2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争》,见《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2年第7期;徐博涵:《布哈林与到社会主义之路》,见《理论研究》1981年第9—10期,《布哈林的社会主义之路》,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3期;此类文章还有:冯深:《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5期;林岗:《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及苏联工业化论战》,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2期;陈其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法论》,见《安徽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赵新文:《布哈林经济模式论》,见《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9年第3期。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64期。

《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1期。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3期。

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争论中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意见分歧》中,从不同的模式(类型)、不同的新经济政策观和不同的实际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此类文章还有:周国平的《布哈林和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苏戎安《论布哈林“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张玉海《布哈林的“合作制模式”与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有一批文章考察了联共(布)在20年代的几次党内争论。张超群的《布哈林与托洛茨基派在销售危机上的争论》评析了1923年秋开始的俄共(布)党内的争论,认为布哈林为克服危机而提出的涉及极广的方案以及对新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形成了他的经济建设的新颖构思”,这包括以下论点:1、亲农主义的出发点;2、二元论的经济体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和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并存,把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3、“爬行”的发展战略。

1928—1929年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吸引了广大史学家的注意,有一批论文对此提出重新评价。侯尚智认为,当时出现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针和政策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模式。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对当时苏联基本国情的看法不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理解。斗争的结局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作者认为,在估计苏联过渡的长期性,肯定商品经济、价值

《苏联历史问题》198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3期。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9期。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5期。

规律的作用,承认农民问题的决定意义上,“布哈林的意见和观点更切合苏联的实际,更符合列宁的思想”。叶书宗的《斯大林同布哈林的争论及“反右倾斗争”》一文以教材的形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斯大林反右倾斗争的前后经过及主要分歧所在。他把整个斗争分为三个阶段:1、1927年底至1928年中,特点是理论上布哈林取攻势,政策实践上斯大林全面顶住。2、1928年7月至1929年1月,为斗争的关键阶段,特点是斯大林提出“贡税论”,组织上把布哈林的支持者挤走。3、1929年1月底至11月,为“反右倾斗争”时期。作者认为,“贡税论”是斯大林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王斯德和金仁芳认为,人们往往把分歧和斗争局限于粮食收购危机或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其实这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是一场怎样在苏联这样原先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与“布哈林模式”。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国家工业化,布哈林则强调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各项原则。斯大林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是变革生产关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布哈林主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布哈林则认为,需要的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作者认为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坚持要社会主义,分歧只在搞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道路上观点不同,对形势的判断不同,

侯尚智:《试论新经济政策与20年代苏联党内斗争》,见《苏联历史》1983年第1期。

《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3—4期;另见《论20年代末苏联反右倾斗争的后果和教训》,见《史学集刊》1983年第1期。

对时机的选择不同,不存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姚海认为,苏联 1929 年经济政策大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从 1926 年起苏联超过国力所允许的范围,强调工业化的高速度,特别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此而采取高积累的政策,其结果是使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生产骤减,终于酿成粮食收购危机。而为了摆脱危机,斯大林便实行全盘集体化,以建立一种不经过市场而获得粮食的制度。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单独列出一章《布哈林和联布(布)反“右倾”斗争》(郑异凡执笔)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这场斗争的历史,这是以前任何教科书上都没有过的。

针对国内多数学者对粮食收购原因的分析(赞同布哈林所说的主要是不合理的价格政策造成的),陈维廉在《苏联 1928 年粮食危机问题上党内分歧的实质》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富农对粮食进行投机”是造成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指出,1、布哈林低估了富农的力量,错误地以为单靠调整粮价就可以解决粮食危机。2、“在过渡时期存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在存在着私商和富农的条件下,实行粮食贸易自由是十分危险的”,布哈林“把粮食贸易自由作为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粮食贸易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基础之上,这是完全错误的”。3、布哈林认为集体农庄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忽视了占半数以上的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抹杀了富农组织的合作社与广大贫农和中农组织的合作社的本质区别,结果使他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

《世界经济和政治内参》1982 年第 1 期。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1 期。

础之上,这也正是布哈林的农村政策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作者断定,当时的分歧“实质上是斯大林的正确政策反对布哈林的错误政策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当时是必要的”。

顺便说一下,陈文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苏俄学者中也有争论的,这就是对当时苏联富农的估计——到底有没有富农,如果有的话,是否达到文中所说的4%,非常措施到底打击了哪些农民阶层?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说清楚。这要求对当时苏联的农村作更深入的研究。

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一直被当作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的口号,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郑异凡认为,布哈林提出这一口号“着眼点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农业的积累能以其对工业品的需求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会对农业起良好的作用,布哈林所阐述的思想是“颇有创见的”。周耀明坚持斯大林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很片面的”口号,其结果“会造成个别人发财致富,而个别人或集团发财致富就难免会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大多数人,就会导致剥削现象的增强”。王具在《布哈林“发财吧”这桩公案》一文中认为,布哈林这一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精神实质是“可取的、正确的,与当时俄共推行的农业政策也是一致的”。布哈林这口号着眼与工农结合、工农联盟,“无非是想表达要在农村中治穷致富从而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迫切愿望”。而工业积累同农民积累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不能把私人积累同公共积累对立起来,作者认为,把 译作“发财吧”欠准确,

《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

如译成“富裕吧”更符合原意。

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布哈林有自己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马裕兴的《布哈林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现实意义》、聂运林的《布哈林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探讨》以及上述徐博涵等人的文章都对这一问题作了阐述。

布哈林当年同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是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蔡恺民对此进行了探讨。她的《苏联 20 年代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调节者的争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争论》,分析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金字塔”理论和两个调节者的观点同布哈林的“平衡论”和统一的调节者的观点之间的争论,指出这场争论并没有随着这两人被打倒而告终,苏联 30 年代以来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又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立场上去了。而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都主张只有一个调节者即价值规律,争论在继续。曾启贤的《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市场作用的比较研究》,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两者在市场问题上的观点。

布哈林的哲学平衡论及其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引起哲学家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注意。曹天予在《布哈林主义与平衡论》的长文中详细分析了布哈林的政治平衡与经济平衡观,得

王具:《布哈林“发财吧”这桩公案》,见《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3 年第 1 期。

《思想战线》1988 年第 5 期。

《社会主义研究》1989 年第 4 期。

《经济研究资料》1981 年第 5 期。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第 5 期。

出结论说：“政治斗争的成败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东欧的经济实践及其丰富和深刻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布哈林的平衡论更为接近真理”。认为“布哈林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平衡的关注，并不能说明他忽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只能说明他找到了这种斗争和阶级力量变化的根源”。曹天予指出，布哈林的平衡论及其发展图式“在自然科学中的对应物不是古典力学，而是比它晚半个多世纪出现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如果把布哈林的平衡态理解为非平衡态热力学中开放系统的远离平衡的非平衡态——稳态，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扎实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科学的社会学概念”。赵成文的《布哈林的平衡论与系统论》一文则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中，“包含着不少系统论的思想”。布哈林平衡论的提出比完善的系统论的提出早半个世纪。并且就平衡论在认识世界的作用来看，并不比系统论小。康荣平考察了布哈林把系统方法用于帝国主义理论，作者以《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为例，指出他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对现代系统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认为布哈林对“系统”这一范畴所下的定义，比公认最先提出系统论的贝塔朗菲所作的类似定义，至少要早10年。系统方法的运用，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其最大的特别所在。论述布哈林哲学思想的论文还有吴振海的

《未定稿》1982年第4期。

《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2期。

康荣平：《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经济与系统方法（兼论“世界经济学”的方法论）》，见《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2年第6期。

《重评布哈林的平衡论》 涂赞琥的《布哈林哲学思想初探》、张念丰的《布哈林哲学思想新论》。蔡恺民从经济方面探讨了布哈林的平衡论观点。 此类文章还有刘伟、平新乔的《平衡与非平衡(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争)》、范苑的《布哈林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布哈林在苏联的文化建设中起过重要的特殊作用。赵水福的《布哈林与真理报》一文介绍了苏联报刊史上长期回避不提的布哈林在《真理报》的活动。王燎在《布哈林和苏联文学》中介绍了布哈林的文学批评,特别是在制定20年代苏联文艺政策方面所起的良好作用。马龙闪的《布哈林与俄共(布)的1925年文学政策的决议》,做了更具体的考察。许林森的《布哈林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问题》⁰、汪太理的《论布哈林的文化思想》¹也考察了布哈林在苏联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时起,布哈林就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各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1988年第6期。

《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1981年5月。

《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世界经济》1989年第5期。

《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苏联文艺》1981年第3期。

《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

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5期。

¹ 《湖湘论坛》1990年第1期。

项活动,从1926年起布哈林更是共产国际的第一把手,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柳子璧的《布哈林生平及其思想初探》中有专门的一节谈到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有的文章探讨了布哈林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如袁南生的《试述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李梅兰的《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贡献》、李甄馥的《瞿秋白与布哈林》。

布哈林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同列宁有过分歧和争论,但他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而在列宁逝世以后他更是主动地承担起阐述和发展列宁思想的重任。秦永立的《论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研究》、杨芳铮的《列宁晚年思想的忠实阐释者——布哈林》对此作了论述。郑异凡在《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布哈林和列宁关于党纲问题的争论,认为正如列宁所说,在党纲理论部分的两种写法上并不存在原则分歧。但布哈林在争论中提出的简单的商品形式不一定会产生新资本主义的论断,“可以说是今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起点之一”。

在80年代有一些文章是论述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这就涉及布哈林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次错误——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此类文章有杨彦君《布列斯特和

《国际共运史教研参考》1982年第1—3期。

《共产国际研究》1988年第2期。

《求实》1988年第7—8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

《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9期。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3期。

约时期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蔡抗《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分歧和斗争》、孙景峰《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布列斯特和约》。

在苏联 20 年代末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遭到了失败。布哈林失败之谜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安大峰的《试论布哈林的失败》、金雁的《论布哈林悲剧的理论根源》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郑异凡的《大事业”情结》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布哈林在 1938 年审讯中的表现。

有不少文章是专门评介布哈林的著作的。布哈林的一些著作特别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其中《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等等,都有评介文章。

对《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一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否定的著作,一些评论文章在指出书中的局限性外,肯定了布哈林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新观点;对《到社会主义之路》和《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些评论文章竭力发掘这些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工农业关系、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等等方面的独创性的理论见解,重新评价斯大林当年对布哈林

《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苏联问题》1985 年第 2 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2 年第 11 期。

《苏联历史问题》1989 年第 1 期。

《读书》1995 年第 12 期。

的批判。

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陈其人的《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理论》、郑异凡的《布哈林论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对此有所评论。

我国 80 年代布哈林研究的重大成果是出版了 3 本布哈林传记。1987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范玉传的《布哈林传》。1988 年闻一和叶书宗合著的《布哈林传》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朱庭光为此书写了序言。1989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张伟垣和许林森合著的《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这 3 本著作各有特点,范著吸收和总结了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综述了布哈林的一生。《被玷污的岁月》由于篇幅较大,有更多的可能分析布哈林的观点和活动。闻一和叶书宗的《布哈林传》则力求以通俗生动的笔法描绘这位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很有可读性。尽管有的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仍有可商榷之处,存在某些史实失误之处,但从总体上看,确实是我国 80 年代布哈林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

《布哈林 过渡时期经济学 评述》,见《读书》1981 年第 2 期;李琮:《读布哈林的 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见《世界经济》增刊 1981 年第 2 期;徐博涵:《布哈林的社会主义之路》,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 年第 3 期;马裕兴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书评等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 年第 3 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 年第 5 期。

在《世界历史》1988 年第 6 期上以《布哈林研究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为题发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还举行了几次全国性的研究布哈林的活动。1980年年底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在北京举办了短期的布哈林学习班,有40多人参加,为开展布哈林研究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1988年是布哈林诞辰100周年、遇害50周年,这一年5月中央编译局、天津师大和天津共运史学会联合召开了布哈林问题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首次举行这样的全国性学术会议,30多位学者在一起探讨了布哈林的理论 and 实践,对我国10年来的布哈林研究进行了总结。

80年代末布哈林问题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1988年布哈林在苏联获得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88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夏风的文章《布哈林研究在中国》,对半个多世纪我国研究布哈林的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杨玉圣的文章则对我国80年代的布哈林研究作了回顾。80年代确实是我国研究布哈林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同我国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中国的布哈林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在某些问题上已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1980年我国只能派出一个观察员出席罗马的布哈林国际问题讨论会,而1988年10月我国已有5位学者出席了在联邦德国乌珀塔尔召开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同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研究成果,他们提交的论文被收入了《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布哈林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党史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苏联兴亡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布哈林研究的深入,必然会推动以上各个领域

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马克思主义注入其应有的成分。应该说,我国对布哈林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献举要

《布哈林文选》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1983 年版。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

《过渡时期经济学》余大章、郑异凡译,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共产主义 A B 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王家华等译,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李光谟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3 年版。

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2 版。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

《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阿利卢耶娃,斯·《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北京 1979 年版。

阿夫托尔哈诺夫,阿·《权力学》张开等译,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原名《党治制的由来》)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艾伦斯坦,让·《斯大林现象史》方光明等译,时事出版社 1986 年版。

巴让诺夫,波·《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钢译,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

《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尤开元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苏绍智等主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布哈林著作目录》西尼·海特曼编,田大畏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郑异凡、殷叙彝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丹尼尔斯,罗·文·《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

范玉传《布哈林传》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弗兰尼茨基,弗·《马克思主义史》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任廷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克里姆林宫秘闻》万启智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克劳丁,费·《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方光明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科恩,斯·《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科恩,斯·《苏联经验重探》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科茨,肯·《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李可夫文选》周邦媛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莱文,摩·(卢因·莫舍)《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

莱文,摩·《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梅德维杰夫,罗·亚·《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章宏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梅德维杰夫,罗·亚·《让历史来审判》赵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梅德维杰夫,罗·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彭卓吾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

丘耶夫,费·《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萨穆利,格·《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苏联大清洗内幕》陈启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5 册人民出版社版。

《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7)》中国人民大学 1958 年版。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郑异凡编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闻一、叶书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沃尔科戈诺夫,德·安·《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夏皮罗,伦·《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郑异凡编译,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亚历山大罗夫,费·维·《列宁和共产国际》郑异凡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林利等编,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郑言实《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列宁研究》第 1—5 辑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辑。

《斯大林研究》第 1—5 辑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辑。

：

. 1924 .

. 1994 .

.

.1988 .

. 1988 .

. 1990 .

. 1925 .

.

. 1989 .

. 1988 .

. 20-

. .1990 .

.

.1989 .

.

.1990 .

. - .1967 .

1923-1936

.1993 .

.1932 .

. 1988 .

.1990 .

. 1966 .

. 1988 .

. 1990 .

()

1970 .

1960 .

. 1991 .

.1971 .

. 1964 .

.1988 .

1927-1929 .1929-1932 .

1989 .

...

. 1989 .

. .

. 1989 .

. .

. 1969 .

.Strathcona Publishing, Royal Oak ,

1979 .

. 1992 .

- . e . 1988 . 10-12 .

. . -

. 1993 .

. 1988 . - . 1989 .

. . . 1992 .

. . . 1991 .

. . . 1928-1929 .

. 1990 .

. . . 1917-1919 . 1994 .

. . 2 . 1925- —1985 .

. 1989 .

. .

20 . 1979 .

. . . 1990 .

. . -

. . . 1991 .

() 2 .1917—2 .1918 . 1958 .

() . . 1958 .

() . -

. 1962 .

() . . 1959 .

() . . 1960 .

()

1963 .

()

1961 .

() . . 1923 .

()

1963 .

. . . .

.1925 .

() . . . 1925 .

()

_ .1927 .

() .

. 1962 .

() . . 1934 .

.

.

.

.

Bucharin--Theoretiker des Sozialismus .Beiträge zum internationalen Bucharin-Symposium . Wuppertal, 1988 . VSA-Verlag, Hamburg, 1989 .

Kan .A .Nikolai Bucharin und die skandinavische Arbeiterbewegung .Decaton Verlag .Mainz .

Knirsch, P .Die ökonomischen Anschauungen N .I .Bucharina .Berlin, 1959 .

Lowy, A .G .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Bucharin: Vision des Kommunismus .Wien, 1969 .

Nicolaesky, B .I . Power and the Soviet Elite:“ The Letter of old Bolshevik ”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5 .

Stehr, U . Vom Kapitalismus zum Sozialismus .Bucharins Beitrag zur Entwicklung einer sozialistischen Theorie und Gesellschaft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sverlag .1973 .

..... (1)

..... (1)

..... (17)

a

“

”

“

”

..... (58)

?

“

”

..... (87)

..... (109)

“ ”

“

”

_____“

”

“ ”

..... (147)

“

”

..... (181)

“

”

..... (224)

“

”

..... (265)

..... (297)

, (320)

..... (419)

“ ”
“ e ”
“ ? ”
(.....) (497)
..... (521)
20-
“ ”
..... (551)
..... (561)